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长征英雄集团的传奇



歌唱吧，历史女神！

歌唱中国工农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史诗：
歌唱他们的领袖
落难复兴的巨人毛泽东，
他的多难跌荡的生涯，
他的意志，智慧和胆略，
他的仁爱、责任和使命！
歌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
山峰般挺立的英雄们，
他们瑰伟的情怀、飞扬的个性和传奇的岁月！
歌唱千万英勇的红军战士们，
他们为着救世信仰、
冒着死亡的威胁，乘着歌声行进
在亿万年人迹罕至的
丘陵、河流、雪山、草地上，
汇成了殊死奋斗、友爱互助、奔腾无阻的
红色铁流！
歌唱我们伟大光荣的先辈们，
由于他们的功业，
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长征 英雄集团的传奇

引子毛泽东的命运

毛泽东从他谙熟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厚的力量。针锋相对的个人抗辩已被证明于事无补，拉起旗帜，进行派别斗争，将会使中央陷入内斗和分裂，更是他不愿见到的。他已经找到了合法斗争的策略。他等待着历史按其内在需要把他接上舞台的时候。

1934年9月，秋风萧瑟的时节，就在中国工农红军即将突围西征前夕，落难已久、心情抑郁的毛泽东又遭受了新的政治打击。

3年了，他远离本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兵权，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的虚衔。这是对手们有意把他驾空的，他们才二十来岁，风华正茂，雄心勃勃，口舌滔滔如江河，对导师的经典横流倒背，尤擅在万众之中煽起信仰的激情。虽然腹中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无多，却长于控制群下、整压对手之权术。是权术加机运——靠近共产国际的机运，使他们登上了权力宝座的。当然，他们的信仰也是真诚的。除却权欲，他们也是正直，善良，可爱，小有缺点的常人。

他们属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苏区的部分，他们分据于主要权力中心，他们的领袖是一位尽力做出严峻表情的、黑面木偶般架着眼镜的书生。他在二十四岁时，即已成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登上统摄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和数百万造反人民的权力顶峰。他应该是勉为其难的。事实上，他是通过翻阅书本和听从数万里之外莫斯科的将令来决定他治下的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命运的。在苏区，他设置一个奇特的作坊，由一位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外国军事“专家”，一位长期从事上层组织策划工作的实干家和他自己组成的“三人团”，独断隐秘地处理军政急务。

两个月前，总负责从电报中获知：共产国际批准了“三人团”制订的中央红军突围西征的计划。当他向苏维埃中央主席毛泽东礼仪性地征求战略转移准备工作的意见时，桀傲不驯的毛泽东居然就既定的战略决策大发“宏论”，提供了他一贯的农民式保守狭隘的游击观念的最新版本。其貌似平静的言辞间，暗藏着对自己指导战争能力的怀疑和针砭。另外，他还干涉起干部去留问题。这是总负责不能容忍的。他自认深得他崇敬的导师统摄之术真传，从来不惧于运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对付政敌。

他果断地把毛泽东从红都瑞金调往于都。那里将是红军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他给毛泽东的任务是打前站。一招小技，即把这位名扬四海的井冈山元老排斥在战略转移的决策圈外。正如三年以来，在他权力需要时，他排挤、整慑这位井冈山元老，元老却完全无反击之术一般。

这是命运攸关的时候，毛泽东却似乎无法改变甚至影响命运。他远离改变命运的权柄。他的党，他的军队，他血汗浇筑的根据地，他多年来为之殊死奋斗的历史使命，眼看就要被人——一个专横幼稚平庸无能的宗派集团带入危境，他却无能为力，无处下力。他心中的愤懑是任何人也无法体味的。

他那至刚的个性，每在强敌压迫时激发出雄健飞扬、豪迈壮丽的伟丈夫情怀，如今却在内耗中无可奈何地在愤懑的胸腔内奔腾。急火攻心，如同过去历次落难时节一样，他病倒了，患了恶性疟疾，滚烫的高烧使他数次昏迷。

朱毛由争论到合作

1927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国大陆的国民党集团，在它即将统一中国之际，悍然向使它新生的盟友共产党人施下杀手。在这千古罕见的背叛和残忍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的英雄豪杰们，从血泊中爬起来，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7月，汉口，危急时刻。党中央鉴于毛泽东在湖南已成为全省通缉的“共党要犯”，分配他到四川去转圜一时。毛泽东却奋然选择回湖南领导武装起义。这位只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半年大兵的教书先生，在军事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凭着信仰，凭着急欲创造历史的胆略，他选择了一条充满生死考验的道路。

命运没有着意眷顾毛泽东。在他着手组织军队、奔走于工人与赤卫队之间的时候，他被反动民团抓住了，团丁奉命把他押往团部处死，他从一位同志那里借来的几十元钱救了他的命，他贿赂了看押他的团丁，终于在离民团总部数百米的地方，找到脱身的机会。他跑到一个高地，躲在茂密地草丛里，团丁上前搜索，有好几次他们几乎可以碰到他，最后还是没有被发现，天黑后士兵撤走，他脱了身。

秋收起义之初，参加起义的各路农军相继失利。在浏阳文家市集合时，原有的4000兵力只剩下1000。用这点兵力去进攻省城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去何从？历史在毛泽东唇边呼吸。

多少年来，毛泽东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古老的梦想，那是自他少年时代读《水浒》以来萦绕于心的梦幻。1917年，在长沙岳麓山顶，松涛阵阵，一群意气风发的学子指点江山，激昂地讨论着拯救时局之路。朋友们例举从政、教育、实业救国的可能，都被毛泽东一一否决。有人反问：那你说该当如何？毛泽东只说了六个字：学梁山伯好汉。

上山。在风云突变的岁月里，它由梦幻走向了现实。

7月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上山”的主张，党内巨头陈独秀、张国焘相继附议。8月9日，在《湖南暴动大纲》中，毛泽东明言：秋收起义万一失败，就应“上山”。现在是9月19日，收兵文家市之日，后来的历史将反复吟唱这一日发生的事情。早有准备的毛泽东决定在人间实践他的梦幻。秋风吹起的时候，毛泽东率领1千余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向湘赣边界荒凉、浓密的山林进军。

毛泽东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安营扎寨。在这片雄伟荒凉的世界里，他戏剧般地收服了两支劫富济贫的农民义军，他踏破青山、向早已金盆洗手的昔日“山大王”朱聋子请教做“山大王”的战法。朱聋子告诉他：“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在毛泽东心中那张了无军事知识的白纸上刻下了第一道印痕。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义军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时代。

朱德是位成熟的军事家。他有着在云南护国十年的战争经验，在德国和苏联学过军事。早在苏联学习时，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部队上山。”这是他在云南剿匪时向土匪学到的经验。在井冈山初期的斗争中，他总结出一套游击战术，即有名的十

六字诀：“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在游击战上，他起了带头作用。

毛泽东从他的第二位军事老师朱德身上学到了游击战的精髓，他的政治家视野和历史理论知识，使他善于把它们发扬光大。然而，起初，他的军事才能未显。他那“波澜式推进”的务实战略，未被众多英勇而性急的同事理解。他的领袖权威，注定要通过残酷的失败反证确立。

1928年7月，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奉命外线出击的29团湘南农军，乘坚决反对远击湘南的毛泽东远在永新之际，掀起了打回家乡的浪潮。他们的上司，宽厚的朱德、陈毅无法驾驭局势。部队打进郴州后，军纪涣散的官兵蜂涌而去抢仓库，傍晚敌人反攻，3000农民枪挑洋财奔向了死亡与溃散之路。主力28团返程的路上，被2营长袁崇全骗走两个连叛逃，后来虽被追了回来，却牺牲了团长王尔琢。湘南之行，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的局面，朱毛红军内部意见纷坛。

是年底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缺衣少食、奇寒难熬之际，又逢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会剿。毛泽东在形势压力下，突破了以前的思路，率红四军主力远击赣南。

转移的路上，朱毛红军陷入了摆脱追兵不得的困境，部队连打了五个败仗。在圳下，担任后卫的林彪28团凌晨时分先于军部开拔，追兵骤然迫近，军部险遭覆灭：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在梦中被枪声惊起，敌人已超过他的住房，他当即率贺子珍等乘昏黑向村外转移。朱德亲自与敌交火，夺路而出，他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俘去，后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军的危境一直延续到是年阴历三十，那时节，在大柏地，饥寒交迫的红军官兵拒绝再走。朱德、毛泽东顺从军心，回马伏击，歼灭了追兵两个团，使士气重振。接下来，红军几经转战，终于在赣南站住了脚跟。

此前这段红军最为困苦的岁月，积压了许多矛盾。在粮草紧张的时候，曾有不少人要求分兵就食，被毛泽东坚决压下不予开会讨论，令人们不满意他的“专断”。毛泽东一身兼任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数职，太多的事都由他拍板才能决定。他的原则性很强，凡违反政策纪律的人，即严加训斥处置，令许多不惯约束的人一时难以接受。逆境过后，不满的野草在蔓延。

这时，一位从苏联学习军事归来的朱德老友刘安恭充当了导火索。他自以为代表了“民意”，公开宣称：红四军中有朱毛两派，“朱同志老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他要求实行完全选举，轮流坐庄，实则逼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拥护毛泽东的28团团团长林彪则给毛泽东写信，攻击朱德利用“政客手段”拉拢人搞阴谋，毛泽东把这封信公诸于众。朱毛长期以来的意见不合终于公开化。朱德写信反击。双方争论激烈时、刚武而急躁的毛泽东声称愿意辞职，去莫斯科留学。

陈毅为化解纠纷，发动了基层大民主讨论。在红四军七大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以来发生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人对朱、毛提出了尖锐批评，会议的决议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重点批评了毛泽东“家长制”倾向，也指责了朱德的军事第一主义思想，最后改选前委书记，出现了支持、反对毛泽东留任各占一半的戏剧化场面，会议主席陈毅一票定乾坤，令毛泽东丢了官。再选时陈毅当选。

选举结果令毛泽东失去了贯彻其建军思想的主导权，萧索失落之际，他

染上了恶性疟疾，遂悄然离开军队，带着贺子珍前往闽西疗养，在山区毒蚊的攻击下，毛泽东一度病危，当前委以牺牲一名交通员的代价从上海购回特效药奎宁丸、把它交到贺子珍的手中时，毛泽东已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

8月底，陈毅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在他走后的这段日子里，部队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而陷入了极端民主化的混乱之中，朱德代管的前委，把大小事情全摆到会场上讨论，争论终日也得不出一个结论，这令拥护毛泽东的部分干部感到难以忍耐。他们联名写信，敦促毛泽东复职，朱德闻知后，也爽快地在“敦促书”中署了名。

毛泽东回信说：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他决不回来！

这消息令从上海匆匆赶回的陈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带回了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他向周恩来、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内的朱毛之争。令他震惊的是，中央站在毛泽东一边！中央严厉批评了陈毅等人主张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裁决红军党内“必须实行比较集权制”，毛泽东必须复职。中央指示是由陈毅执笔录下的，朱德阅后，慨然表示坚决服从。

由于军务紧急，陈毅随朱德率部队奉命南下。在广东，部队打了败仗，军纪越来越松懈，天天有人开小差，虽然每次行军前都要枪毙几个逃兵示众，也无法遏止。回到闽西点计，总共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

这些事实教训，令红四军官兵包括主要领导更加认识到，还是毛泽东领导正确，魄力大，能够控制军队，要求毛泽东复职已是众心所向。

陈毅亲自上门，向毛泽东道歉，毛泽东为朱德、陈毅等人的坦荡无私所感动，涣然而释前怨。1929年11月26日，在千呼万唤声中，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赶往红军总部，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朱德、陈毅用各自的方式艰难地探索着建党建军的真谛，最终又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朱毛红军中的领导权威，在历经沧桑之后，终于稳固。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辉煌的军事胜利，毛泽东、朱德率军转战半年，把赣南、闽西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了一片，红军进入了它有史以来的全盛时代。

巧斗立三冒险路线

1930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争霸战，在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双方投入兵力在百万以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驻扎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纷纷抽调北上。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判断，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良机。

李立三是一位热情澎湃的梦幻式的行动家，他惯于豪迈地、大刀阔斧地提出宏伟计划，由周恩来等实际工作者组织实施。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决议，在决议中，他以发烫的语言宣告：“新的革命高潮已经迫近，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他号召，要“猛烈地、猛烈地、猛烈地扩大50万红军！”

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宏伟”方略，命令红军首先攻占南昌、长沙，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他甚至幻想，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蒙古也要承认“是中华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战略才于是赏识的，他已经为毛泽东预留了全国红军领袖的席位，但他不满意于毛泽东“狭隘的游击战略”。他给朱毛直接下达指示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应立即执行中央最新指示。如有违误，“应即来中央解决”！

毛泽东和朱德不得不放弃战地指挥官的判断，对中央指示表示组织上的服从。他们内心对李立三计划的冒险性是有清醒估价的。7月底，他们率新成立的红一军团向南昌推进，在推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虚晃一枪，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途中，与彭德怀所率的红三军团会合了。两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余人。

彭德怀刚率红三军团创造了攻占长沙的奇迹，后来为避免被援敌包围而撤出。会师后，许多三军团干部还沉浸在过去的胜利中，力主再攻长沙。为了团结这支以勇猛见长的雄师，毛泽东作出让步，率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围城半月都无法攻克。毛泽东以先打援敌为名果断撤围，随即又声称“接受中央指示”，“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等地，终于把恋战不已的红军拉回江西。

红三军团的军官们把打南昌作为打长沙未遂的替代办法，而毛泽东的实际意图是攻克吉安，把部队转移至湘赣两江之间机动作战。于是围绕着是攻南昌还是攻吉安，一路上频频发生争论。9月21日，在袁州会议上，素有三军团理论家之称的袁国平激动地指责毛泽东：“你又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冷静而耐心地阐述了他的务实战略，赖有朱德、彭德怀的支持，把攻打南昌的意见暂时平息下来。

这天晚上，部队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沙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带着立三中央8月29日指示信赶到了，要求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事情似乎又要发生转变了，毛泽东和周以粟进行了彻底的长谈，第二天，周以粟竟放弃执行中央指示，成了毛泽东务实主张的积极鼓吹者。

红军兵临吉安城下，守敌弃城逃脱。

在吉安，毛泽东搜集到大量报刊资料，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经结束。他判断：蒋介石在解决了冯、阎之后，已腾出手来，必将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他的判断很快被军事情报证实。

在这严峻的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10月25日，在罗坊，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严峻的敌情，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新战略。这遭到了李文林、袁国平等联合反对。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今年三十岁。年初他潜至上海，见到过李立三，被李立三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在会上，他公开指责毛泽东不打南昌是“违背中央指示”，“断送革命高潮”。他还反对“诱敌深入”，说那样“把敌人引进根据地，人民要遭受严重损失”！他给毛泽东扣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令毛泽东面色难堪不已。

袁国平等三军团干部仍坚决主张攻打南昌。彭德怀也被他们激起了热情，表示可作一试。

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朱德退后合计，认为彭德怀是三军团的灵魂，只有他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李、袁等人才能转过弯来。毛泽东巧妙地请出周以粟去找彭德怀，进行个别说服工作。

周以粟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打动了彭德怀。彭德怀陷入长考，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曾制止了少数干部进攻武汉的狂热想法，也反对第二次攻打长沙。他胸怀坦荡，一直认先行者朱毛为师，自动服从朱毛的权威，他在弄清了毛泽东的全部意图后，爽朗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10月30日，联席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但是在执行东渡赣江的决策上，三军团有些干部不愿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夹江而阵。彭德怀动了雷霆之怒，吼道：现在最要紧的是集中兵力消灭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

彭德怀的一票是投向毛泽东的一票，在当时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在关键时刻避免了红军主力的分散。两年内，朱德、彭德怀先后自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权威，终于为毛泽东尝试运动战的新兵法搭起了历史舞台。

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属毛泽东前所未有的战略战术试验，在苏区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群众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初次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敌我决战，以一身系全军安危，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为了胜利，他决心以雷霆之力推行他的战略意图。

当毛泽东发现江西省委筹款不力、大军粮草多无着落的时候，他震怒了，下令把省委书记李文林抓了起来。联系到李文林的家属涉嫌反共 AB 团一事，出于大敌当前巩固后方的考虑，毛泽东下令立即在赣西南进行最坚决的肃反斗争。

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着毛泽东的命令和一个连的兵力，来到了赣西南富田打 AB 团。李韶九是毛泽东的狂热拥戴者，但心术颇多。为了搞出大的线索，他随便捕人，大搞逼供信，许多人吃打不过，胡乱咬人，6天之内，李韶九即从省委、特委和地方红军红 20 军中抓了 120 名 AB 团嫌疑犯，并把其中的 50 多人处决。红 20 军中主要军官为了自我保护发动了兵变，捉了李韶九，放出了被押人员。

兵变者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把仇恨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不久，朱德、彭德怀和红三军长黄公略各自都收到了一封似乎是“误投”的信。信中，“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把朱、彭、黄打成 AB 团的主犯，早日捕杀。信的笔迹酷似

毛体。

朱德读信后，把它交给了毛泽东，两人一笑置之。彭德怀识破了其中的破绽，他把毛泽东接到红三军团干部会上，使红三军团一般干部第一次看到了毛总政委的模样。

兵变者见挑拨朱毛彭内斗未遂，便将红 20 军拉向赣江以西活动，沿途高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在那里，他们继续打着红军的旗帜。朱、毛、彭、黄采取了应变措施，使红军内部得以稳定。

富田事变传到南昌，蒋介石以为红军内部发生分裂，正是进剿良机。12 月 16 日，10 万蒋军分八路，向苏区的中心区域分进合击。毛泽东率红军主力撤至苏区后部隐伏。苏区干部和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令进犯敌军在苏区如盲人行路，不知红军踪迹。

毛泽东见敌军已被诱入苏区腹地，且互相分散，决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先打突前的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

12 月 25、26 日，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两次伏击谭师未遂，又两次忍耐撤回。

为求初战必胜，毛泽东果敢地放弃眼前之敌，于 30 日率军潜行 30 里，隐伏于敌张辉瓒师前侧，敌误以为红军主力还在百里之外，仍毫无顾忌地向龙岗开进，进入了 3 万红军的伏击圈中。经过激战，红军全歼张辉瓒主力，连张辉瓒在内 9000 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

一战胜利，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跑，许克祥师向头陂跑，红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了两仗，各路蒋军畏打纷纷撤退，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这次迅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令毛泽东威望大增。

好人整好人的时代

1931年1月上旬，中共代表项英历经周折来到苏区。由于战争隔绝了交通，他在路上走了数月，带来的消息令人震惊：原来，立三中央，这个毛泽东虚奉实违的，为此与毛泽东争执不休的梦幻者们拥戴的顶头上司，早在数月前即已下台了！去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根据瞿秋白、周恩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指示，停止了李立三的全部冒险计划。此时，正是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带着立三中央8月指示赶到红一方面军中前数日。

下台后的李立三处境不妙，他在主政期间表现的独立性激怒了共产国际。尽管瞿秋白、周恩来对他的处理是温和的，但无法抵挡共产国际的压力，就在上月，沮丧的李立三撇下正临盆的妻子，心情沉重地应召前往莫斯科接受惩罚，他将在那里度过16年的监禁岁月。

按照新的中央指示，1月15日，在江西宁都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以前，由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项英自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

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了温和处理。与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不同，项英主张应争取党内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他的调解下，事变领导人参加了3月下旬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向党作了沉痛的检讨。造反的红20军也过江归队，他们将参加未来的对敌作战。

这时，蒋介石纠集20万大军，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鉴于上一次的惨败，前线司令官何应钦将进攻计划由“分进合击”转变为“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苏区周围气压骤升。

四月初，形势暧昧不明的时节，又一支中央代表团驾临了，它带来的消息，令前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的实干家们瞠目结舌——数月来项英所奉命的中央，竟也早已下台了！本年初的那段日子，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发生了中共自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件，几股不同的派别进行了公开的权力斗争，最后年仅二十六岁的王明操纵了局势。当时王明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不到一年，连中央委员的资格还没有获得，却在他的老师、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现场支持下，纠集了一支留学生集团，纵横捭阖，把现任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树为“调和路线代表”加以“无情打击”，迫使周恩来等实际工作者对其妥协，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大权。中共党史上“书生掌权”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为贯彻其自封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路线，从3月份开始，王明中央便有计划地向全国苏区派送“钦差大臣”，实行换血。毛泽东的老朋友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在那里，他将发起严酷的肃反行动，剥夺上万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的生命，令纵横一方的贺龙红军濒临绝境。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党内元老张国焘和二十四岁的留苏生陈昌浩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他们将在清洗了当地苏区创始人以后，组织起一个连中央将令也有所不受的宗派集团。留苏生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被派往中央苏区，他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中坚，将在苏区掀起惊天的波澜。

“三人团”下车伊始，即表现出“纯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魄力，首先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调解，把富田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据此，“三人团”开了杀戒。事变头目在奉命前来开会时悉数被捕，很快即以AB团的罪

名全部处决。红二十军中造反者因战争在即未加擅动。本次“反围剿”结束后，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律作为 AB 团骨干缴械关押，后来大部分被处决。这种严厉残酷的政策，使得重视口供的肃反运动迅速扩散到全军中，数千人面临身家之危。

在“巩固后方”的同时，为应付当前之敌，“三人团”召开了中央局军事会议。仍挂着中央局代主席虚名的项英，震惊于敌军 20 万重兵压境、严密包围之危，认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能硬打。他提议“分兵退敌”，又设想使用“牵牛术”，将敌军引出根据地外。他的意见是真诚的，严肃的，激发了了无军事知识的实权者任弼时的想象力，他提议红军必要时可退出江西，迁移至四川建立新苏区。他引证说，斯大林曾指出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云云。这个权威在当时还是很可怕的。毛泽东、朱德的实战经验在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他们未能使年轻的上司们相信红军具有打破敌人围剿的能力，双方争执不下。毛泽东天机灵动：何不听一听前线指挥官的意见？

第二天，彭德怀、林彪、黄公略、滕代远等红军将领被扩大参加了会议。众人踊跃发言，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胸中空落的项英、任弼时感到了踏实。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下一个问题立即提了出来。怎么打？先打敌人哪一路？大多数将领主张攻打十九路军，认为打胜它后红军出路广阔，便于向湘南扩展。毛泽东力排众议，指出十九路军在中国军队中以战斗力强著称，今又盘踞在经营已久的防御工事中，攻打它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他提出了首战必须“拣弱的打”然后乘胜连续作战的战略。他认为，敌第 5 路军实力弱小，又地形不利，首战歼灭它的把握比较大，胜利后可由西向东一路横扫，粉碎这次围剿。他的战略阐述平易而强有力，众人被说服了。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立即率军出发。3 万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在东固山区达 25 天之久，直等到敌 5 路军公秉藩师终于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向东移动时，即在白云山前设下四面埋伏，一举歼灭公秉藩师 1 万余人。此役一胜，大军势如劈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十五天中，走七百里，败敌五个师，缴枪二万条，痛快淋漓地把围剿敌军逐回出发地。

战后，豪迈而直爽的彭德怀对人说：还是扇鹅毛扇子的人厉害！他的评价表明了人们没有忘记当日论战的情景，毛泽东的战略预想在实战中几乎全部化为现实。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来得非常快，甚至超出了毛泽东等人的预料。第二次围剿在 5 月底刚被打破，新的围剿在 7 月份便开始了，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

蒋介石拿出了他与冯、阎、桂系争雄天下时的规模来组织这次围剿，这在对付红军上还是第一次。两次“围剿”失败后，他发现共产党军队已成为他的致命威胁。他调集了他的精锐 5 个嫡系师共十万人，担任这次围剿的主力，加上其它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 30 万人，他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镇南昌直接指挥。这使他与红军仅有数百里之隔。

他把围剿战略由“步步为营”改为“长驱直入”，企图以强大密集的优势兵力多路并进，压迫红军主力于赣江边加以歼灭。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是非常自信的。作为战略家，他隐秘地计划在消灭红军后，兵不旋踵，挺进广西，剿灭他的宿敌——桂系军阀。

7 月 1 日，“围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此时红军主力尚在闽西分

兵活动，鉴于严峻的敌情，毛泽东决定实行极端的退却，率军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逼面前。

当此危急之际，毛泽东决定迎敌而进，首先从富田突破敌阵之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的第一阶段。待敌挨打后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这个方针的核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当红军向富田开进时，被敌发觉，蒋嫡系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返回到兴国西部的高兴圩。此时敌 12 个师围了上来，仅剩一个圩场及其附近数里容许 3 万红军集中。

集中一天后，毛泽东决计向东面蓬塘、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红军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之间 40 里的空隙地带，转到蓬塘，接下来 5 天，疾驰 500 里，攻敌 3 部，缴枪逾万，遂屯兵于黄陂。

此时所有向南的敌军主力，皆转旗东来，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红军主力。坐镇南昌的蒋介石高兴地看到，他的大军终于找到了红军主力的踪迹，围歼朱毛在此一时。

至 8 月中旬，蒋军十余万兵力再次围住红军，是为红军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表现了历史创造者的胆略，他再次率军迎敌而进，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 20 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而过，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红二十军则按照毛泽东的指令，装扮成红军主力的模样向东佯进，一路上扬旗鸣号，丢掉杂物文件，敌主力果然被吸引过来，尾随红二十军不放，待其携着重武器，在崇山峻岭穿行多日，在南团合围扑空后，才发现红军主力并未东去，于是再掉头寻找主力决战，此时红军已在兴国休息了半个月。当敌笨拙地回头开至兴国北部时，毛泽东又率红军转移了。

敌数十万大军在山林中跟随红军逗了两次大圈，被拖得饥疲沮丧，兵无战力。无能为力之际，蒋介石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的宿敌乘其与红军决战时发动了又一次反蒋运动。两广军阀已攻入湖南，北方石友三部也在河北率部南下直指徐州、南京。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围剿”军总退却。

毛泽东率红军乘敌退却发动攻击，消灭了蒋鼎文一个旅，蒋德勤一个师，对蒋、蔡两师，则打成了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第一次正面较量。此战历时 3 个月之久，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和盘旋式打圈子战术，将十倍于己的强敌拖得疲惫不堪，歼敌 3 万余人。令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大败而归。它证明红军已成长起来，即使面对全国最强大的力量，也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在历经三次以弱克强的大战后，一种全新的毛泽东兵法终于成型了。

1931 年 9 月，在那秋风萧瑟的岁月里，中国历史舞台上诞生了一位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他的天才是由对军事的一无所知发展而来的，他将在中华大地上以剑刻下他的轨迹。

中央代表、实权者任弼时，见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反观项英行事犹豫不决，特别是领导战争能力较弱，遂以一贯的魄力，推举毛泽东取代项英。1931 年 10 月 11 日，他电告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被迫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泽东代理”。红军的电台还是在年初用缴获敌人的电台组建的，它结束了闹剧般传达过时圣旨的时代，同时也使红军被置于中央直接控制之下。

临时中央的幕后操纵者王明，这时即将前往莫斯科。在本年内，上海的

空气越来越紧张，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因此数次险遭覆灭，令王明感到继续呆在上海将有身家性命之忧。他通过老师米夫，为自己活动到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位置，把自己装进了“红色保险箱里”。他选择了他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原名秦邦宪）作自己的接班人。博古是年仅二十四岁，连中央侯补委员都不是，履历表的纪录是由学校到学校，居然在王明的主持下，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一跃则为中共中央负总负责的书记，这是夺权联盟威力的又一见证。在完成交接事务后，10月18日，王明携妻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临行前他叮嘱他的代理人：中央军政大事必须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作决定，更不能听信于他人。在他那踌躇满志的脑海里，一地浮现着他至为推崇的久居国外遥控国内的列宁的幻影。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出现了全新的形势，参加围剿的各路蒋军退出中央苏区仅数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了我国东北，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各派政治力量发生大变动。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可以判断，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了。

在红军即将获得大发展的时候，它的创始人毛泽东却被上司拉下了战马。这猝然来临的打击起先来自于王明，他在临走前，以中央名义数次写信和发电指示，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1月1—5日的赣南会议上，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等人结束了与毛泽东的“蜜月”，面对面地对毛泽东展开了“无情打击”。毛泽东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被批评为“富农路线”，任弼时激切地指责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狭隘的经验论”，阻止了红军技术进步。王稼祥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有沉默。会议撤销了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重新担任，这时距毛泽东挂职之日仅20天。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比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临时中央的安排，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相当于元首兼总理的角色。从此，毛泽东名扬四海，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象征。

但在实际上，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失去了战争年代至关重要的军权，成了荣誉和名望的空壳。当地带着贺子珍前往主席官邸走马上任时，推门进去，只见房子里除了几个盛谷用的空箩筐外，一无所有，在战场上，毛泽东可以与中国最强有力的军阀蒋介石对手较量，将他打得落落大败，然而，在党内，他却无法和一群二十来岁的书生相斗。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苏区，就任了为他空缺已久的中央局书记一席，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停止肃反，结束了这场疯狂的自相残杀。对于刚受打击的毛泽东，周恩来表现得谦和而尊敬，人们初步领略到他那圆通灵活、冷静务实风格的魅力。

然而，上海那些执掌了大权的年轻书生们却陷入了狂想之中。在“九一八”事件后的形势刺激下，这些靠反对李立三起家的人们，重新走上了李立三式的冒险道路。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乘胜攻打中心城市。

周恩来当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命令，大多数人主张攻打赣州，唯有毛泽东和朱德持反对意见。双方僵持不下，毛泽东提议：还是听听前线指挥宫的意见吧！看来，毛泽东是想重演去年4月间那一幕。彭德怀从前线赶回瑞金，一听之下，即拍着胸脯说：打赣州包在我身上，保证在20

天内拿下来！经表决，大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几乎气结。1932年1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叶坪会议讨论全国局势，毛泽东首先主持会议，他分析说，“九一八”事变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将发生变化，必须研究对策。任弼时等人反驳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做“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听到这样的高论，毛泽东当即一声不吭，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在山顶寺庙里，他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当年春节。3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风雨将至，项英骑马上山来找毛泽东。他带着周恩来的电报前来请毛泽东赶赴赣州前线决策的。原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反而遭到敌人援军偷袭，损失数千人，还被包围了一个师。毛泽东闻讯后当即冒雨下山，淋了个透湿，到了瑞金总部，他即致电前线，建议大胆启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解围。当晚，他打着火把上路，三日后，当他赶到了赣州前线时，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

在随后召开的江口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赣战的错误，力主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中央局领导者们坚持认为，这次攻赣州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提出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必须执行。会议决定主力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其它城市，毛泽东再次陷入孤立。

按照会议决定，红军主力一分为二，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两军夹江而阵，向北进军。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行军途中，毛泽东说服了林彪、聂荣臻改变行军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向东发展。他们电告中央局，获周恩来批准。这样一来，中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率军向东挺进，攻克了闽西重镇漳州，歼敌张贞部四个团，筹款100多万元。

漳州大捷没有象毛泽东预想那样说服冒险者们接受务实路线，反而大大激怒了他们，他们见无法约束独立不羁的毛泽东，便借助于中央的权威。从4月到5月，临时中央连续来电，点名批评毛泽东，指责“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毛泽东在漳州前线阅信后，愤怒地复电周恩来宣言：“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染做不驯直让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着慌。他们召开会议，批评了毛泽东的抗辩，表示服从中央指示，承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毛泽东远在漳州被缺席审判，且不许上诉，悬剑君临他的头顶。

周恩来试图居间调和。7月，他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上前线，亲自掌握作战行动，一到，便积极为毛泽东谋求“总政委”一职，遭到了后方中央局任弼时的拒绝，周恩来解释说：不能“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在他的坚持下，任弼时等被迫同意毛泽东恢复原职。毛泽东重掌兵权。

局势的发展很快证明了，毛泽东与冒险者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有临时中央作靠山，任弼时一再督促毛泽东等“积极进攻”，并对前线具体军事行动直接干预，遭到毛泽东的软拒硬顶，双方迭生纠葛。

1932年8月，终于喘过气来的蒋介石发动了对全国红军的第四次“围

剿”。9月，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急电告知，蒋介石即将倾全力进攻苏区，望红军乘敌未合围之前，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主动出击，击破敌之一面。毛、周、朱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判断，中央关于出击的设想是不现实的。9月底，毛泽东、朱德未经中央局许可，发布了备战《训令》，令红军就地分兵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这一训令引起了任弼时等人的强烈反对，为解决双方巨大的分歧，10月上旬，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

由于周恩来未赶到，任弼时主持会议并引导了会议方向。他历数毛泽东“不尊重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毛对中央“进攻路线”“消极怠工”，毛最近作出的《训令》是等待主义，“专门等待敌人进攻”，将破坏大好形势。毛泽东据实抗辩，一一指出过去7个月来中央局的指导错误。双方敞开争论。任弼时自知军事知识不多，为增强说服力，他拉来了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助阵。刘伯承是党内有名的军事专家，刚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数年，颇推崇正规战，不赞成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他从战术角度起而支持任弼时的观点。任弼时的老搭档王稼祥却倒向了毛泽东一边。在半年前的江口会议上，他还起草文件，要给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打击”。然而，随军半年后，他从实战中认识到毛泽东战略的务实性，恍悟了以前的轻率，他主动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

会议陷入僵局。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了。他再次居间调和，先是口头上批评了毛泽东，承认前方的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但是，他坚持保留毛泽东的军权，反对调他回后方，建议毛泽东或在前方助理，或负主持战争责任，两者选择其一。中央局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固执己见，承认与改正错误不够，由他主持战争易犯错误，最后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方案，同时撤除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然而毛泽东受不了了！他表态，既然中央局不信任他，他很难在前线“助理”。他要求回后方养病，众人同意了。

临行前，周恩来前来探病安慰，毛泽东向他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拖着病体被警卫员扶上马背，周恩来和王稼祥把他一直送到城外。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他不知道，这次被人从威武雄壮的战争舞台上拉下来后，历史将在何时何地何种状态下再次给他机会。他的心境苍凉而悲愤。

被剪羽翼跌入谷底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接替了总政委一职。他与朱德接中央指令主动出击，未能取得有效战果。在次年春天的反围剿战争中，他们抵制了任弼时等人的干预，沿用过去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因而在短短 20 天内，围歼了陈诚 3 个主力师，俘敌万条人枪，大气磅礴地结束了这次战争，红军胜利的主战场，是数月前毛泽东在《训令》中所选定的。

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这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张闻天）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 1933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他们是一年来毛泽东挨整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的到来、不会使毛泽东的日子更好过。

二十六岁的博古为自己领导着千军万马而心潮激荡。他在资历、战功和威望上还是一片空白，为了掩饰这一点，他总是板着面孔，作出严厉无情状，来镇慑部下。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曾有过为斯大林做翻译的荣耀，他在众人甚至群众集会上的风度之做岸，口舌之纵横，据说是无以伦比的。从他那副瓶底似的眼镜片背后射出的目光坚硬而紧凑，细看之下，眼珠有些外凸。如果没有权力的光环笼罩着，这副形象对于一位青年人来说难免有几分滑稽。他的内心与外表一样拙于变化，他一直相信，他听拥有的来自十月革命圣地的书本理论，远比游击主义者狭隘的经验要高明得多。他是有资格、有能力领导后者的，并且乐于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这种领导。

两年来的掌权经验证明，毛泽东已成为他们实现最高领导意志的主要阻力。早在 1931 年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前找博古交待工作时，两人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两年来，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严重干扰了他的夺取中心城市的宏伟计划，他曾多次指示对毛进行说服帮助，无奈此人桀傲不驯、屡抗上命，看来只有施以“无情打击了”。

当博古进入中央苏区经过福建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望一下在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傲慢地反问：为什么去看他？此时，他已拿定了对付毛泽东的主意。

由于中央总负责人的驾临，苏区中央局自动解体了。威震一时的任弼时被降级使用，派遣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尽管他主持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仍被博古批评为贯彻中央进攻路线不力，而且，对毛泽东不够“无情”。到达苏区不久，博古已发现，毛泽东在红军和地方干部中影响深远，仅仅剥夺他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

博古虽然年轻，在权力斗争中却老谋深算。他不会愚蠢到一到苏区便对它的名扬四海的创建人进行正面直接打击的地步。他具有狐狸般的狡猾，他巧妙地运用迂回战术，首先把铁拳碾向毛泽东的跟随者。

1933 年 2 日，距博古等人到达苏区不满一月，江西省委书记罗明被揪了出来，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大加讨伐。此人被指为“迷信毛泽东的游击主义”，执行其右倾路线，更无知地行文，在“毛主席”一词前面用了“我们最好的领袖”的衔头！他受到了博古、洛甫两巨头的面斥和众人的连番批斗，彻底垮了下去，福建省的主要干部大多被撤换。几乎没有一个区、一个连以上干部未遭到斗争。

紧接着，2 月下旬，博古放了第二把火，烧的是“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占（柏）”。

谢维俊时任地方军分区司令，古柏是中央粮食部长，他们过去部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罪状是在信件往来中把中央负责人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还颇具嫌疑地与毛泽东通信。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也犯了同样的过失，他给大哥毛泽东的一封信受到了组织追查。他们为此遭受到严厉的报复，被中央打成“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被撤消了全部职务，还遭到软禁邓小平被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他是年二十九岁，担任着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的罪状是在强敌来攻时，率地方武装撤退，被批为“退却逃跑”的“单纯防御主义”。由于他的倔强性格和抗辩中表现的理论水平，他被树为“毛派的头子”。对他的斗争绝不是温和的，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对他的攻击尤为激烈，且有不甘罢休之势。在邓小平落难的日子里，罗迈已和邓美丽的妻子阿金相爱了。阿金果断地与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

博古把反“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遭到撤换。在博古看来，毛泽东在地方的基础已被抽空。

毛泽东被无形孤立起来了，没有人敢来探望他，一连数星期，他不同外人讲一句话。他的命运和心情都跌到了最低谷。

毛泽东终于在极度痛苦中再次挺起身来，单枪匹马地向整个中央挑战。1933年6月上旬，在临时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在上次宁都会议中受到的不公平批评提出申诉，认为当时中央提出的主动出击计划并未实现，第四次围剿胜利采用的还是他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胆量和韧性，令许多在场人折服。博古勉强地把毛泽东的申诉压了下去，他强辞夺理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事先应该知道这一结局，他的申诉也许是有深意的。

毛泽东似乎已找到了平衡术。他作出服从中央决议的姿态，去完成博古布置的“查田运动”。为了补缺“狭隘经验论”之憾，他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搜尽了高级领导人其中包括博古的书库。他把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转给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在书皮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他又把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去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他的做法到此为止。

毛泽东从他谙熟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厚的力量，所有历史创造者们都遭到过落难的命运，问题在于落难中奋斗的方式。针锋相对的个人抗辩已被证明于事无补，拉起旗帜，进行派别斗争，将会使中央陷入内斗和分裂，更是他下愿见到的。他已经找到了合法斗争的策略。他等待着历史按其内在需要把他接上舞台的时候。

远在南京的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不知道他的主要对手已经失去了与他交手的权柄，他把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也记在毛泽东的帐上，对于这位曾经共过事的手，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充满了仇恨，畏惧，还有几分尊敬。四次围剿的惨败，使他从中原逐鹿胜利的骄狂中清醒下来。他发誓拿出最大的精力割去这块向着他的心脏蔓延的“异物”。他对过去深入苏区狼奔豕突处处被动被红军所乘导致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省，从德国——这个近百年来军事学术最发达的国家——请来了七十多人的顾问团为他出谋划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陆军总参谋氏赛克特一度领衔做了他的首席顾问。一套中西合

壁的“堡垒战术”被顾问团完善地贡献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认为，它将是红军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的究星，他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把全军中级以上军官转调上山，请顾问团和意、美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在集中了中外“智囊”的建议后，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战和持久战的围剿战略，辅以保甲团练政策，在苏区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断绝苏区物资来源，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地盘，拼耗红军实力、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急危。为平息部下的抗日呼声，蒋介石扬言：日本人只是“皮肤小病”，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攘外必先安内”。“要把听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如果不计亡国危险，这时蒋介石的确已达到他的力量顶峰。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战争，他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他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他居然搜集到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的空前的战略力量，其中 50 万精说将分为东、西、南、北四路用来直接进攻中央苏区。

1933 年 9 月下旬，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重镇黎川，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此之前，博古还在贯彻他的“进攻路线”，企图实现他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梦想。这时红军已扩展至 8 万余人，集中兵力应当能形成相当的打击力，博古却听信他尊崇的洋权成、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建议，不顾前线指挥官周恩来、朱德的一再反对，将一、三军团分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令他们冒着酷暑远征赣北和闽西北，他企望着“两个拳头打入”。首先夺取江西全省。事实再次令他失望了，红军远征三个月，未能取得较大战术，当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时，红军远道回师，陷入仓猝应战的不利地位。

敌人的进攻使博古紧张之极，这毕竟是他平生第一次为如此严峻的外压负全责。临在此时，上海的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破获。他的洋顾问弗雷德仓皇逃回莫斯科。正在他空落张惶之际，救星从天而降。

救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他于 10 月初由上海秘密潜至苏区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原籍德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内战，20 年代他作为德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那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共产国际派他到中国来帮助红军训练骑兵，他没有料到，中共总负责人会把军事大权拱手交给他。他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身高 6 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中如鹤立鸡群。他举止呆板、僵硬而迂腐，在这些推崇洋顾问的中共要员面前，他的日耳曼人的傲慢自然放纵地流露出来，他果断甚至粗暴地运用了到手的大权。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为红军制定了一套打常规战争和阵地战的“新战术”，这是崇拜正规化的博古梦寐以求的东西。大战爆发，年轻的总负责人把军事决策的依据全部寄托在洋顾问身上。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命令鼓德怀

率红三军团兼程北上，消灭上述地区的敌军。10月6日，红三军团在洵口与敌第6师18旅遭遇，全歼该敌，接着冒险深入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资溪，连攻多日未能攻克。11月初，又在浒湾、八角亭的攻坚战中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杭州以东的中央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在采取“进攻路线”对付敌堡垒主义碰壁后，李德乃改变思路，采取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抗堡垒的方针。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袖珍式的歼敌战术：先以阵地防御抵住敌人的攻势，待敌完全脱离堡垒距我碉堡200~300米时，施以“短促突击”歼灭之。他下令全军学习使用短促突击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就在这时，国民党阵营发生了分裂。1933年11月20日，红军的老对手、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全国为之震撼。事变发生前，十九路军曾秘密派遣代表来到江西，与中共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东部战线顷刻崩坍，其主攻苏区的北路军侧翼亦受到威胁。蒋介石还担心十九路军的造反行动，会引起他在各地一些久抑求伸的老对手们的响应。他从北路军中抽调出8个主力师，东入福建镇压叛乱，心中最害怕的还是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

远在沙洲坝的毛泽东得知消息后非常振奋。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秘密来访时，他被中央负责人接到瑞金，会见了他们，同外界一样，全权代表以为朱德和毛泽东还担任着朱毛红军的首脑，协议出自于朱毛口中，才能相信其诚意和权威。这是令博古既忌妒又颇为幸灾乐祸的事情。就在那次到瑞金时，毛泽东参加了中央讨论本次反围剿计划的会议。会上，他详细阐述了一贯的主张，建议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对付敌人的“堡垒主义”。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带着威严而冷峻的表情听取了博古的严厉反击，最后把目光投向默默无语的与会者们。他坚信他的努力不会是无效的。当然，他不可能听到博古和李德会后对他的嘲笑，他们说，他的一切建议都是根据一些过时的情报，他们早已让他远离于保持战局秘密的圈子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毛泽东参与了与十九路军结盟的上层运作，他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是有心理准备的。最后发生的事变规模之宏大，使他立即意识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良机，可谓千载难逢，必须在军事上利用它。他谨慎地放下一切杂务，思考了数日，然后提笔给博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提出两点建议：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宁沪杭沿线的8个师和第88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地地区兵力十分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卫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

后世的史书将会说：这是千古奇计，如果它被采用，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样子。然而，在当时，毛泽东把它贡献给博古时，居然很久没有得到回音。毛泽东按捺不住，跑到中央所在地叶坪去向博古查询，两人话不投机，不欢

而散。历史按照它的固有源流流动着。

大约与此同时，彭德怀也从前线向博古发来电报，提出几乎雷同但不大完整的建议。博古通过周恩来转电曰：这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

还在前线视察的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亲眼目睹了入闽蒋军在山下公路上一队队地移动，他们向上级朱德、周恩来要求出击。12月13日，朱、周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与入闽蒋军主力决战，博古回电，不准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主力西调去进攻堡垒。在具体布署上，24小时内命令变更了4次。朱、周对中央屡变号令提出批评，并且要求“在相当范围内”获得全权。博古的回答是：撤回“前方总部”，由中央直接指挥各军团、师、团作战。

1934年1月4日，朱、周被召回瑞金，恰在此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发来紧急求援的电报，周、朱见到博古，力陈出击援蔡的必要：如果蔡廷锴垮了，蒋介石马上会把抽走的主力重新投入江西战场。博古摇头，他在等待共产国际的答复，这样已有十几日之久了，恰巧共产国际的答复也在这时候到了。内容是：中共在军事上可以独立作出决定。博古这才同意出兵，但动作迟缓。等到10天后红三军团入闽时，蔡廷锴等事变领导人已逃往香港，他们军队此前已倒入蒋介石的麾下。

博古在猜疑、犹疑、幻想、等待中度过了两个月的光阴，他那在蒋介石与反叛者两败俱伤而后由红军收拾残局的计划，被残酷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共产党和红军高层人物已经目睹，当考验到来时、这位二十七岁的书生不知如何驾驭全局。

然而，博古们仍在云里雾中勇猛地向前冲撞。1934年1月中旬，他在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冒险路线发展到它的顶峰。会议决议宣称：中国已存在决定性的“革命形势”，本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对于持不同政见的毛泽东，博古没有忘记重念了一番“紧箍咒”。要求党内继续“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于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维埃大会中，毛泽东虽然继续当选为国家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卸下转给了张闻天。事后某日，身居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罗迈曾亲耳听见博古对张闻天说：“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当时苏联国家的元首，属“总理”斯大林的“傀儡”）

正面抗争屡次碰壁

福建“乱局”平息后，蒋介石曾对他的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最耽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现在一切担忧已成为过去，他将入闽军组成东路军，令其调头向西进攻苏区。1月下旬至2月初，蒋军相继发动攻势，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地带进逼，南面则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负责防堵。

博古和李德四面分兵御敌，用堡垒战术对抗堡垒战术，从1月下旬至3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对步步进逼之敌实施“短促突击”，却迭遭失利，根据地越缩越小。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广昌是红都瑞金的北大门，如果它失守，瑞金将被置于强敌的兵锋之下。李德和博古仿佛每根神经都抖动起来了，他们把保护广昌看成是决战成败的关键。决定死守广昌。为此，李德一改分兵御敌的战法，急调红一、三军团和地方红军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以北构筑碉堡，与敌“决战”。博古发挥他的鼓动天才，喊出了发烫的战斗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拒敌于国门之外！”“胜利或者死亡！”为了便于指挥，两人亲临前线督战。周恩来留守瑞金，朱德随行，代签作战命令。

李德热衷于扮演大无畏的统帅形象，他时常亲临前沿阵地视察，甚至指挥具体战斗。一次，他傲岸伫立在阵地上，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了很久，当他若有所思地回首环顾时，我们未来的开国元帅，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罗荣桓同志不幸落入了他的视线中。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信手一指，命令罗荣桓带一个工兵排前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地雷后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改变了主意，下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军已行进到离地雷不远的地方，罗荣桓不愿做无谓的牺牲，拒绝服从命令。李德大发雷霆，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吼道：“你不去，杀你的头！”就在这时，沉闷的雷声从远方传来，作为回报，敌人的炮弹很快在李德所在的阵地上炸响。李德匆忙率众人躲避，这件事不了了之。

许多军官的运气没有罗荣桓这样好，不知是为了表现“统帅”的魄力，还是为了舒缓首次出任“统帅”的紧张，李德常发雷霆之怒，许多人由于办事与他的心意小有不合而被撤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他的责任心是很强的，他没有辜负所享用的高级食物、住房等特殊待遇，常彻夜工作，伏在地图上指挥作战。

实际发生的战斗异常残酷，三万红军与数倍于己的强敌进行了激烈的阵地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下，广昌城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民房几乎全被摧毁。两军阵前，尸积如山，散发出地狱般的恶臭。李德的新战术在实践中很快就破产了。红军的堡垒完全是由石块和木头搭成的，承受不了敌人的炮火。由于广昌没有城墙，李德精心设计了一个“永久性工事”，在那里，他放置了一个营的兵力，企图把它作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支点。敌人总攻时只发一炮便将它掀翻了，里面一个营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而每当红军跳出战壕对敌人进行“短促突击”时，敌人总是迅速缩回碉堡，用交叉火力射杀红军。

从4月10日至27日，敌我双方激战17天，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占

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敌人的伤亡仅为红军的一半。最后，红军不得不放弃广昌。

曾经气冲斗牛的博古和李德黯然离开部队，返回瑞金，临行前召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新任军团政委杨尚昆议事。见面时，李德布置任务，仍是大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彭德怀胸中郁积已久的愤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连珠炮似地质问李德：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人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没一次能成功，以后还能这样搞吗？他越说越气，决定毫不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换取上峰的醒悟。他说：你们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硝石之战三军团差点被敌人吃掉，二攻南丰，几乎造成全军覆灭！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作战，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哪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这次广昌战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到现在快六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多么不容易，现在却要被你们葬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啊！”

李德的脸上现出木然的表情，这使彭德怀感到惊异，他心知这是翻译伍修权缓和了措辞，就请杨尚昆重翻一遍。李德果然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你是因为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

彭德怀回骂：“你无耻！”

博古带着尴尬之色把两人劝住。

事后彭德怀多少有些后怕。他回到驻地，收拾好行装，准备接受撤职、公审甚至杀头的命运。然而，很久过去了，上面没有动静。

博古和李德感受到怨言似乎无声地包围着他们。战前，林彪、聂荣臻曾数次写信要求中央改打运动战，自然碰到了钉子。当初曾支持过“正规战法”的刘伯承，也围反对李德意见，年初即被撤消了总参谋长一职。连博古的老搭档、中央二号人物张闻天也加入了批评阵营。在瑞金召开的军事总结会上，张闻天指出：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应加以检讨，改变战术。博古不屑地回击：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他的书本用语臊得张闻天顿时面红耳赤，两人争吵起来。与会者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这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核心分解的起点。为了弥补这一点，博古有一次恍若无意地向张闻天转述了李德的“忠告”：“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赖于莫斯科归来的同志”。对于这般重要的“派别呼吁”，张闻天当时没有反应。博古的心阴沉下来。不久，张闻天被派到闽赣苏区“巡视工作”去了。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博古、李德彻底丧失了打破围剿的信心。他们秘密决定将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转移到湘鄂西贺龙根据地，这件事至关重要，必须由共产国际王明等上报斯大林才能拍板。5月间，他们向莫斯科发出了申请战略转移的电报，同时开始了繁重而秘密的准备。

当初博古还在广昌前线督战时，留守瑞金的周恩来自行主张，把毛泽东请出，派往南线战场巡视军政工作，至今一直没有返回。即便如此，毛仍被博古认定为最有可能“乘势”危及自己最高权力的主要对手。为了一劳永逸地排除隐患，博古希望能在战略转移之前把毛送到苏联“养病”，为

了掩饰用意，还拉上周恩来做陪衬。他向莫斯科发电请示，共产国际回电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是留在国内为好。博古的妙计落空了。

6月25日，共产国际终于来电，同意中央红军转移。为了独断地处置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中，博古负责政治领导，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落实。三人团立即隐秘展开了转移前的先头行动。7月初，寻淮洲、粟裕率领红七军团东入闽浙赣，编入了方志敏率领的第十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8月初，任弼时、肖克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界出发西征，他们领取的任务是，奔赴湘西与贺龙会师。

接“三人团”的计划，第一路出动的目的是“调敌”，第二路出动的目的是“探路”，然而两军主将对中央的战略意图居然一无所知！

7月初，毛泽东奉中央之命，从会昌前线赶回瑞金。从周恩来那里，他得知了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的消息。他所受到的震惊之大，远远超过了无缘参与这一决策引起的失落。他隐隐预感到，即将发生决定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

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自7月上旬起，蒋军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三人团的命令下，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拼消耗。与此同时，“三人团”加紧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一项特别的“扩红”运动是它的主要部分，罗迈主持的这项工作效率很高，短期内征得了数万人参军。看来博古和李德对下级的顶撞颇感头痛，他们认为老部队“风气不好”，拿定主意创建更听话的新部队，于是成立了几乎全由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未来的事实将证明，他们又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在这炎热的夏季，苏区的人力物力被全面动员起来。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捐献粮食。同时，开展了借债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还做好了棉衣。农家妇女们被号召多织几双草鞋，它必须织得厚厚的。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印刷厂的设备开始拆卸打包。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暗示，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

人员的去与留是个难题，主力一走，将有几十万蒋军扑来，留守者生死难卜。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是博古。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身兼政治局常委、政府副主席、军事副主席三职，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他对博古亦趋亦从，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得知这一任命后，表示坚决服从。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后来被选为项的军事助手，8月底，他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粉碎，他将统率两万无法带走的红军伤兵保卫主力走后的中央苏区。

犯了“右倾”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古柏被留下。刘伯承因激烈反对过李德，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

已公开倾向毛泽东的意见的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飞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博古曾想把他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伤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周恩来等也提出同样建议，博古网开一面。

3年前被王明集团拉下台的瞿秋白，从上海来到苏区已有两年了，当时

挂着中央教育部长的职务，当他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表示异议，博古声称，留下的理由是瞿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

张闻天已从闽赣苏区被召回。在他走后的日子里，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回来后张发现身为政治局常委的他已被排斥在最高决策圈外，心情变化颇大。瞿秋白与他私交不错，瞿自忖以他多病之身留下打游击，难免落入敌手，要求随主力行动，张表示同情，向博古提出，博古依旧拒绝了。

毛泽东与瞿秋白平时相交甚欢。两人都处在落难受压的困境中，同病相怜，又同为中共元老，长于文学和理论，共同话题很多，他向博古提出，不能把一位党的多年主要负责人丢给敌人。博古依旧拒绝，毛泽东坚持己见，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博古动了最后拍板权，毛泽东无可奈何，怒气腾腾地离去。

毛泽东的老师、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的徐特立不明就里，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处，他向这位“国家元首”高声质问：秋白有病，为什么不带他走？毛泽东不回一句话，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他独自出门走了，把高大、微驼、孤独的背影留给众人。

小弟毛泽覃被留下来，毛泽东没有为他讲一句话。妻子贺子珍是走是留，尚未最后确定，毛泽东没有为此提出任何建议。他们的儿子毛毛不可能随军带走，毛泽东为此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自古为大事者不惜身，领袖人物以身作则是绝对必须的。他与瞿秋白的交情虽重，不会重于亲情。血肉相连生离死别，岂是人情能容忍的事。保瞿秋白，是为了革命，不能让党的前任首脑落入敌手，对于军心的意义，连一般人都能明白。为什么要置瞿秋白于危境？这不能仅用报复昔日之仇来解释，恐怕更多的原因还在于：瞿有长期担任中央负责人的历史，与上层众多人物交游深厚，还存在着“乘隙”东山再起制造麻烦的可能。丢下他，就丢下了一道隐患。这是一种无法掩饰的阴险权术。触类伤情，毛泽东隐隐感到自身的危境，这时，他已经从王稼祥、张闻天那里得知了博古曾企图把他送往苏联养病的消息，他平静地对人说：“我哪也不去，我不会离开中国，不会离开苏区”。内心里，这事激起了他的警觉，看来掌权集团没有满足于把他拉下台，整得“人见人畏”，成为孤家寡人，成为了无实权的摆设。从这时起直到生命终结，他都把这件事作为博古意欲把他置入死地的征兆！

更可怕的，还是红军的处境。广昌失守以后，红军连吃败仗，步步被动，失败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地笼罩在苏区的上空。毛泽东从南线赶回后，得知反围剿形势已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焦急中多次站出来，对中央提出批评。他详细地分析了李德所犯的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战术，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作出决战决定的错误，指出广昌之战对于红军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只有彻底改变战略战术，重打运动战，才能挽救危局。他对博古说，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它的特殊性，而这些是一个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的，不能把军事大权交给一个生疏的外国人。这一整套有根有据、言之成理、咄咄逼人的主张几乎令博古难以招架，内心里，他感到沮丧和空虚，他几乎每次都靠强辞夺理把它压下去。眼见得进谏屡次碰壁，中央战术依旧，形势江河日下，毛泽东无能为力，心中悲愤莫名！

实施战略转移，是打破目前重围的唯一出路。这是共产国际最后拍板的大事。毛泽东表示组织服从。但是究竟怎样转移？转移到何处去？转移后是

否杀回中央苏区？毛泽东有着不同于三人团的独立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抛弃六年来殊死奋战用血汗和生命浇筑的根据地，脱离跟随共产党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与红军同呼吸共命运的数百万起义农民，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他反对转移是为了异地求生的主张，力主转移应该成为打破敌人围剿的手段，有十万红军在手，只要采取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跳到外线，纵横驰骋，避实就虚，围魏救赵，歼敌数路，打开一面，把战争引向更大规模的战场，完全存在着转败为胜、打破本次围剿之可能，完全可以重回苏区建立横跨数省的更大的根据地。如果仅以逃脱求生为目的，固守已被残酷的战争失败证明是愚蠢的“正规战术”，率领缺弹少药、物资匮乏的红军千里奔命，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

毛泽东的战略阐述在总负责人那里没有摆脱传统的命运。博古和李德认为，老毛在失败的压力下，又由保守主义一端跳到了冒险主义一端，他对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的实施计划的怀疑，实质上是对三人团的战略能力和权威的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心知正面进谏希望不大，乃重新拾起往日常用的迂回策略，建议中央召集前线指挥官开会集体讨论战略转移的大事。被博古以军事保密的需要轻率地拒绝了。

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毛泽东绝望了。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中，不再直言，进谏，建议，开始沉默起来，参加军事会议也越来越少，最后几乎自动引退了。

博古的心思没有随着毛泽东的淡出而平静。此人仗着创业者的老资格，不改山大王桀傲不驯的脾气，战争的失败，又给他一次摆脱紧箍咒而向他的领袖权威挑战的机会。在高层中间，隐约产生了应和的人群；如果再与部队中不满者结合起来，后果难以逆料，必须密切注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者必须是残酷无情的，他在寻找着让老毛跌得更深的笼子。

至刚强者亦生脆弱

9月初，各路红军将领陆续返回瑞金，领取新的使命。

林彪、聂荣臻被周恩来找去单独谈话。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决定红军作战略转移，必须秘密作好准备，但目前不能向下透露。中央只要求转移之前，一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林、聂仍不能平息刚刚在心中产生的震惊。他们急于了解诸如转移的方向一类大事，对此周恩来连点暗示都没有。两人一起来到老上司毛泽东的住处，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见了他们表现得很高兴，当他们问起“我们要到何处去”的时候，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随即话峰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结束了这场谈话。毛泽东严守着他并不赞成的纪律，也在回避着嫌疑。自博古以“宗派主义”为由打击邓、毛、谢、古以来，他处处留心，不让有心人找到丝毫把柄。

然而博古仍旧按照他的强权逻辑路线推进下去。9月中旬，他找到了机会——把毛泽东派到于都，为在此集结的红军打前站。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毛泽东被完全排挤出中央决策圈，他将从事一个部长或者将领的业务，失去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的发言权，而把命运交付他人摆布。在他孤独、痛苦、绝望之际，一盆凉水把他淋了个透湿，他感到透骨透心的寒冷，至刚至伟的英雄也受不了了！

临去于都前，毛泽东召集中央政府各部要员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他向大家宣布和说明中央撤离苏区的决定，布置完善后工作，这才回家与妻子贺子珍、儿子毛岸红告别。岸红乳名小毛，是个男孩，他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下台后降临人世，稍长，天真、活泼、懂事，毛泽东非常喜爱他，在被排挤打击、心情郁闷的日子里，他给毛泽东带来了欢乐。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毛泽东心潮翻起无边的波澜，他把爱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爱子的头发，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伤感，发出重重的、深深的叹息。贺子珍觉察出丈夫神情的变化，问道，“你今天怎么啦？好象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唉——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贺子珍怔住了，眼泪顿时涌上眼眶。她是个刚烈女子，为了安慰丈夫，她强忍撕裂般的内心痛楚，轻柔而坚定地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奶奶家住一段时期，看情况再说。”毛泽东心情复杂地凝视着娇妻，叮嘱了一阵，又亲了亲小毛，把他交给妻子，满怀深情地看了最后一眼，转身由警卫员扶上战马，缓慢地上路了。他强打精神，高高地昂起头来，任秋风吹凉了眼眶里滚出的泪水。

到了于都，毛泽东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整日忙于开会、调查、分析敌情，他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头的忧虑，万般忧虑依旧涌上心头，耗干了他的体力和心力，一直没有断根的疟疾突然复发了，把他击倒在床。一夜时间，他的两眼就深陷下去，嘴唇也干裂了，脸饶得通红，卫生员小钟给他吃过奎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依然高烧不退，连续三天他吃不下食物，只勉强喝了几口米汤。他的秘书和警卫急电中央报告危情，第三天晚上，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驾着骡子赶到了。他直奔毛泽东的病榻，一测体温，41！经过观察，确诊为恶性疟疾。傅连璋下了重药，给毛服了双倍的奎宁，

还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

第2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到了第8天拂晓，体温回到37℃，尽管浑身软绵绵的，毛泽东仍强撑起床了，这一次疟疾的发作，几乎和1929年毛泽东落选后那次一样严重。它肯定让毛泽东意识到，至刚至强的他，总在特定的时刻暴露出他的脆弱。

毛泽东终于从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在他患病不起前后这段时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到9月下旬，敌各路大军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带，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组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三人团已完成了对战略转移的一切部署，一道道出发命令以及行动时间表迅速传到了各个军团部。正巧在这时候，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来电要求谈判，10月初，中央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秘密潜至粤军中，与陈济棠的参谋长签定了停战和借道的秘密协议，这对即将开始的转徙意义重大。与陈济棠的秘密往来是由毛泽东数月前巡视南线时首倡的，周恩来、朱德积极推动，博古吃不准，一直依赖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有关电文行事，在双方秘密谈判的关口，中共上海局机关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军统破获了，通过那台大功率的电台“中转”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完全中断，中共中央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被迫独立自主地处理军政大事。博古的身后，顿时失去了王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身影。

毛泽东大病初愈，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黑发乱蓬蓬地披在肩上，高大微驼的身子显得憔悴而清瘦，只有双眼炯炯，发出深邃的梦幻式的光芒。面对纷纷乱局，他心里腾起了奇异的感觉，它是那样的安祥、宁静，似乎与眼前血火战事格格不入，生死关头就要到来了，兴起的时机到了。

病后数日，毛泽东写好一封信，派警卫员火速赶到瑞金，交到博古手里。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由湖南到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路线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渡赣江、走井冈山南麓，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湘南，屯兵于永丰、兰田、宝庄一带，在这一带诱歼跟踪的围剿之敌后，重新返回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博古如看天书般翻完信，把它丢在文件箱里。

毛泽东早知如此，自有用意。他的状态已得到恢复，权智如素，外表仍不动声色。他已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便派警卫员前往送信告诉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让她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然后赶往于都与他会合，他将在于都随先头部队出发。

未来的征途中将发生些什么？红军的命运如何？毛泽东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已做好准备，准备在决定命运的关头掌握权柄，把握自己的命运。

他已进入了创造历史的起始状态。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一历史时刻正式开始的。

第一章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他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在于发动一场合法的集体反抗运动，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于都河畔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士兵身披背包和斗笠，踏上浮桥，向着暮色苍茫的南岸开进。余霞洒在人身上，宛如暗红的血色，秋风呜咽着，在深蓝色的河水中撩起层层清冷的涟漪。

毛泽东站在旧岸堤上，久久凝视着河畔的场景，神情悠悠，恍若出世。他头戴八角红帽，身着灰布军装，打着绑带，穿着草鞋，背着斗笠，秋风不时地撩起他的衣角。他的身旁跟着二十0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红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个特制担架也跟在后面。

毛泽东的妻子未赶上与他会合，她走在身后不远的中央纵队里。两天前——10月16日傍晚，中央总部和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踏过于都桥，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还叫战略转移，就从这天开始了。

于都河上，工兵营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城边，河面不过百米宽，红军动员了数百余渔船搭起这些临时浮桥。为了防止敌机侦察到红军的大规模行动，渡河按总部的规定，从每晚6点起，至每日凌晨7点止。一队队衣着单薄的红军士兵在瑟瑟秋风中迈上浮桥，走向扑朔迷离的对岸。印刷厂的复印机，兵工厂的机器，造币厂的主机，一袋袋纸张、大米、电话线，都压在数千名挑夫肩上，吱吱呀呀地上了浮桥。仿佛大搬家一样，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他们武装的子弟送行。老人们、妇女和孩子们，未上前线的男人们拥在路旁，把煮熟的鸡蛋、热气腾腾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甚至一把炒米装进战士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追问着，希冀的神色中饱含着隐忧。大军走后，数十万国军将随后而至，北边苏区已经传来了军队和还乡团血腥屠杀的噩耗。他们不能想象，工农红军会长久远离这片起义的土地。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战士们参差不齐地回答着，坚定中不无兴奋和轻快。由于军事行动的高度保密，自师长以下的红军官兵，无人知道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何在，他们谨守着服从命令的天职，向着上级指定的方向意气昂扬地开进。尽管行前每人颇为希罕地领到十数发子弹，甚至还发了过冬的棉衣，但是他们无法想象这中间会蕴藏巨变。过往反围剿的经验，令他们本能地猜测，私下窃议，这可能是一次大的以退为进的军事机动。一种临战前的紧张和亢奋压倒了离别的情愫，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压根没有想到，上级秘密实施着一项千里转移的战略计划！

瑟瑟秋风下伫望着送别的情景，毛泽东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太多的思绪在内心的海洋中冲撞，他比眼前的众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幕的深意。他终于移步走上浮桥。这时，乡亲们又一阵悲怆的呼唤令他双肩微震，他停下身子，问身边战士们听见了没有，大家答道：“听见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了这句话，向着告别的人群，向着清冷的河水，向着高顶而昏暗的天空投去深深的一瞥。他在内心发出了誓言，然而，他没有料到，未

来时势把他引向了不可逆料的远方。

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这静谧的夜，这如水的月光，这河水拍击堤岸的声音，激发了年轻的红军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许多人轻轻地哼着流行的红军歌曲。当大地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行进的队形变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火把长龙，从前到后，望不到边际。

统一中国狂想曲

蒋介石瞩望南天那一轮明月，月华清冷如水倾泻在浩渺的虚空。已是午夜时分，秋露浸衣，蒋介石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数十年的梦幻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自清亡以来，中华大陆陷入战乱二十余年，按照一乱一治的节律，总得由一位真命天子一统河山——不管这位真命天子被称为“开国皇帝”，还是“大总统”，抑或叫做“委员长”，它的实质只有一点：用军事实力削平群雄大权一统唯我独尊的最后胜利者。孙先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难道就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之人吗？孟轲的话是对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青年时代，蒋介石是一位不羁的浪子和冒险家。他生逢乱世，却如鱼得水，自认为是天赋雄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匆忙从日本士官军校赶回，以二十六岁之龄率一团人马袭取了杭州。在上海，他与流氓革命家陈其美结为兄弟，曾受其指令，亲自动手暗杀了孙中山的党内反对派陶成章。他混迹于青红帮大佬门下，投机于上海股票交易所之间，喜纵酒，爱美色，挥洒千金，意气杀人，何其狂放不羁。然而，这不是他的全部，内骨子里，他有很深沉的野心。

他是孙中山先生长期的无名的追随者。义兄陈其美死难后，他才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目。早在1917年，他即向孙先生献上了五路北伐的战略计划，这与9年后的大革命历史几乎完全吻合，惜乎孙先生为时局所制不能用之。

从辛亥革命后算起，大约有十年时间，蒋介石扮演着一位怀才不遇饱受压抑的千里马的角色。他听从孙先生的将令，却与先生保持着距离，在奉命任职于粤军参谋部门期间，饱受军官帮派的排挤、藐视，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创伤，时不时闹意气挂冠而去，幸赖孙先生巨人海量涵纳之优容之。直到时势的演变使得他的干才显露时为止。

1922年中，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渐凸，蒋介石力主回师讨伐陈炯明，他说：“自古以来，决无奸臣在朝，大将可以立功于外之事。先生如若北伐，必须除陈安内，方可对外行军。”他多次进谏，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先安后方而后出征，但孙中山急于进行多年筹划的北伐而未采纳。

蒋介石坚持自己是对的。他来到广州，准备离职回乡。孙中山闻讯到蒋住处挽留，蒋还是在当晚乘船挂冠而去。不久，陈炯明果然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设在越秀山上的总统府，孙中山匆忙转移至停在珠江上的永丰舰。

6月18日，蒋介石接汪精卫报告陈炯明叛变的电报，证明了他识人之深、判断之正确。同日，孙中山发来急电：“事紧急，盼速来。”11天后，蒋介石由上海赶至广州，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孙中山授他以海上指挥全权。

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有谋有勇而能与他共生死的人。广州集中有那么多人才，唯对蒋介石多次连电召请，不惜求远水救近火，可见他对蒋的倚重。所以八个月后（1923年2月18日），委任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就是必然的了。

从此，蒋介石跃升为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军事助手。1923—24年，孙中山反思四十年失败教训，以巨魄力幡然改制，主要措施有二：一为联共联俄，改造国民党；二为创建黄埔军校，改造旧军队。他把第二项使命交付给了蒋介石，1924年5月，蒋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年仅三十七岁。

近代以来，似乎有着这么一个规律：凡欲左右中国局势者，必亲自练出

一支军队才能成大气象。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而后才能扑灭太平天国。袁世凯花十数年心血精心培育北洋六镇，靠着它纵横捭阖僭夺了民国大权，暴死后他的部下仍依仗北洋实力盘踞大半个中国。蒋介石深羨曾国藩、袁世凯之所为，他把办黄埔军校视为培植个人势力建立现代军队的天赐良机，在这方面，他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才学。

三年后，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已掩有长江流域，不需要多大的预见性，就足以知道：以国共合作的政治军事实力，中国的统一指日可待。

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病逝两年。

蒋介石露出了凭实力为所欲为的枭雄本色。他拉拢了在北伐战争中势力迅速扩张的一批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使国民党新生的盟友——中国共产党人施下了屠刀。随后，为争夺天下，蒋氏与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展开了四年的大混战，待其历经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把主要争雄者击溃、分化、削弱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乘军阀混战之乱成长起来，这时，他才碰到了真正的对手。

蒋介石的起家是迅烈的，他的战略才能是卓越的，他的权术手腕多变狠辣。精悍的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全盛时统有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和广西之地，论军事才能，李、白过于蒋氏，蒋氏略费银两，几乎兵不血刃就使新桂系主力溃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历经北洋军阀时代近二十年的风云，硕果仅存，或被分化打压，或联合对抗，三年归于失败。至于中小军阀，党内各派，蒋氏或诱或囚，官禄名色，投其所好，玩其于股掌之中。

一种成王败寇的哲学被蒋氏奉为信条。为了胜利，他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残忍，已超过曾国藩、袁世凯，自近代以来无人能出其右。同他相比，北洋军阀段琪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仿佛成了善人，他们在杀人的规模、数量、爱好上与蒋氏要差几个等级，象征性大于实效性。在蒋介石那里，历史向极端推进。阶级仇恨和嗜血的残忍经他的推动而泛滥，他自觉地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华大陆军阀、政客、恶霸、贪官、流氓等一切蔑视法律、正义、人性依仗实力为所欲为的势力的总代表。他可能也追求一个他统治的仁爱和平的社会，但是他却悍然向盟友施下杀手，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被残杀。他宁可错杀，不可错漏，他的一个批条，即处死数百个狱中“共匪”。一怒而杀人，是他最常见的“英雄之怒”，他以此为美！

他内心里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摆出领袖姿志，许诺可让“共党分子”在他的领导下划出一块地区作“共产主义实验”，他也反对贪污、腐败行为，反对欺压人民、草菅人命的恶霸，然而，他却长期把肆无忌惮的军官、权棍、乡绅、财主及一整套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基础，无法挽救社会剥削、贪官恶霸横行、水旱灾、兵匪猖獗等危机泛滥！

统一中国，做中华民族的主宰，做历史“英雄”的狂想仿佛使蒋介石高尚起来了。30年代初，他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佐之以麾下智囊的建议，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拯救堕落了国魂党魂军魂民魂，提高全民的素质。他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总会长，那时，他宣称“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用《管子·牧民》篇的“礼、义、廉、耻”为治国之纲。他的教导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古典式的：“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

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可以用来铲除“赤匪共逆”，实现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预想。

他也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他那放荡的个人生活早已收敛。作为“英雄”，他毅然抛弃几位旧式妻妾，迎娶了有着西方学历和江浙财阀背景的宋美龄为妻。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敌。她急切地希望他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十六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的女士便是名副其实的永久的第一夫人！

在公开场合，蒋介石是中华儒家孔孟之道的崇拜者，尽管他笃信佛教，与宋美龄结婚后，为讨娇妻和丈母娘欢心，又改信基督教，世上美好的说教他都信奉，乃是他自认的政治家的本色。当然这并不排斥他在政治需要时谈笑杀人，只要最后成功，放下屠杀立地成佛是可能的。

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把孙中山奉为传说中的中华道统的接力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韩、程、朱、王，最近一代圣人非孙先生莫属。蒋介石把自己塑为孙中山先生道统的继承人。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孔、孟之道为人心之本。孔言仁，孟主义，他自言：“吾二十年日读《孟子·尽心章》未尝间断”。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养聚于英雄之内，至大中正，合和刚武，处逆可依而独善其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移。处顺则足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兼济万众，飞扬四海，逞其风雷磅礴横扫列强一统山河之伟业。数十年来，他不是未曾经历艰险困厄的，对孔孟之道笃信仰使他自以为拥有大本大源，今日能雄视天下，除了“英雄”权谋战略才华方面的成就外，他还有一种人格境界的升腾感受。当然，英雄的道德与凡人自然不同。踏着血泊和鲜花前进乃“英雄本色”。

为了天下一统，总得有人承担罪孽嘛。成王败寇，胜利者不受历史的嘲弄。

然而，日本帝国动摇了他的自我感觉。中日国势的巨大差距，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凭中国之力单打独斗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吞并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它迟早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然而，中原逐鹿列强竞雄之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唉——不得不拉下英雄的面具，选择了对远比自己强大的势力妥协、回避、委屈求全的策略。他发誓，先安内，后攘外，统一中国后必将顺应民心，全力抗日。统一中国之前，只有“忍”。北伐中途，日寇在济南屠杀军民，割了中国公使的鼻子，以污辱他，他认为，日寇是在寻机挑衅，插手中国内战，阻挠他的统一大业，他不会上当，忍了——与日寇签订“友好”协议。九一八事变，日军吞并东北四省，他忍了——密令张学良放弃抵抗，率三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内，以免让他陷入两线作战境地。1933年日军在华北热、冀、察施行蚕食之术，他忍了——令何应钦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公开场合，他宣扬忍让为国攘外必先安内。内心里，他自认，他的忍是“英雄之忍”。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他密令他的主力第五军打着十九路军旗号秘密参战。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傅作义组织长城一线抗战，他亦暗中助以军火。这些实际行动，足以使他向国民党内、军内解释他的诚意，内心里也足以证实“英雄之忍”，弥补人格压抑扭曲痛苦引起的空虚。自圆其说、自给自足、自我美化的他公然把全国民众抗日舆论贬为愚民短见和共匪煽动。然而，公道自在

人心，历史的逻辑昭然若揭，委曲求全的“英雄之忍”，与成仁取义养浩然之气的人格理想，犹如水、油不相容。在现实的力量场上，蒋介石的自保行动，使他自然地与宋高宗、慈禧太后、李鸿章之流归为一类。他的人格和他治下的国土一样，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可以“暂时”妥协、割让、出卖的。他太有弹性了，太策略了，太富于权略了，他的英雄的面具下，依旧一副“对强者一忍再忍，对弱者残忍至极”的好雄本色。

正当盛年，蒋氏的才华还未走向尽头，他不满足仅为中原霸主、名义上的统治者，统一中国的狂想推动着他，他又表现出大枭雄的奋斗精神。历经四次围剿的惨败，他终于吸取教训，缓慢而稳重地组织起第五次围剿。他终于找到了共匪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的克星——堡垒战术。机缘巧合加实力使然，他步步得手。

1934年9月，蒋介石曾对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加紧包围，还写了许多亲笔信给高级将领勉以雪历次“围剿”失败之耻。这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能突围长征。

9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他每和幕僚谈论形势时，洋洋得意地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作抗日时，他总是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第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不抗日专反共的搞法早已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对“围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围歼之功，约在1934年10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幕僚杨永泰和晏道刚随行，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他那“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理论，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10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等幕僚商谈对策，议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1934年10月18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湘粤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

蒋氏遂下令：西路军何键部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该路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陈诚，而陈诚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力策应各方面的需要。迫11月上旬，红军先头到达粤湘边，蒋认为何键原是西路军总司令，红军进入西路作战地境，一面明令发表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一面电告何键指明薛岳所部入湘后悉归何统一指挥。但蒋并未把这样做可将何键部调离湖南而使何键更易受控制的企图明确告知薛岳。这件事曾引起狂妄自大的薛岳不服。

11月间，追堵部署初步完毕，蒋介石即调整留在江西各“围剿”部队的部署，分区清乡，划定好几个“绥靖区”，订立各种清乡规章，采用所谓“剿抚”兼施手法。并亲自拟定了口号：

“对苏维埃人员一律不杀！”

“凡投诚者一律优待！”

“实行耕者有其田！”

“国军也主张分田地！”

他的意图并得不到贯彻，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4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以后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名义上何键是“追剿”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内，它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薛岳所率嫡系3个军）三四十万兵力大规模的行动。经周密策划，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了四道封锁线。

突破三道封锁线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桫椤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色并不枯燥。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在长征初期，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往，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时，无论是队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那火把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呀——

有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

这样的夜行军，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走着走着，这条火龙有时候突然不翼而飞。

“往后传，把火熄灭，不准打电筒，不准大声讲话！”

这是离敌人近了。

这时，指战员在地行进中虽然失去了照明，但敌情犹如兴奋剂，使他们一扫疲惫，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快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 86859 人，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的编制序列及领导人为：

第一军团（代号南京）：19880 人，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十五师。

第三军团（代号福州）：17805 人，刘少奇为中共中央代表，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

第五军团（代号长安）：12168 人，陈云为中共中央代表，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后陈伯钧）任参谋长，曾日三（后罗荣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师。

第八军团（代号济南）：10922 人，凯丰（何克全）为中共中央代表，周子昆任军团长，黄苏任政治委员，张云逸（后毕占云）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

第九军团（代号汉口）：11538 人，凯丰为中共中央代表，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师、第二十二师。

军委纵队（1934年10月初成立）：4693人，下辖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叶剑英任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罗迈任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张宗逊（后张经武）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一个保卫团。

全军共有步枪29153支，轻、重机枪651挺，迫击炮38门，刺刀17552把，梭镖6101支，马338匹，马刀882把，各种枪弹173万余发，手榴弹76000多个、迫击炮弹2473发，冬衣83000件，盐34000多斤，钱202万元。

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十几个独立团以及伤兵共2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在江西省于都地区南渡贡水。

21日晚，中央红军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未经大的战斗，于25日全都渡过了信丰河（桃江）。

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从政治上说，是因为突围西征前夕的10月上旬，红军与陈济棠的代表经谈判已达成协议。

陈氏身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辖有强大的海、空军，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霸天”。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陈济棠虽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职务，但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

红军向南突围时，陈氏令粤军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实行堵截，所以红军能在短时间里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10月22日红军歼粤敌一个团，引起了陈济棠的很大不满。10月26日，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电告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但是，由于战斗已经开始，后来粤敌在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我激战近两日。

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等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这一仗以前，蒋介石南昌行营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找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

这时期，在后面追击的国民党薛岳部队正在行进途中。从古陂圩突围的时候，敌人有一个错觉，以为红军会从赣江左岸攻打吉安，所以周、薛纵队赶快从苏区撤出来，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冈山一线布了防，并且等了一个礼拜。发觉红军南进后才掉头赶来。当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通过第一道防线，正向湘粤边境西进时，薛岳不得不放弃他从赣南出击迫使红军退入广东的计划，而寄希望于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二道及第三道封锁线。薛岳命令麾下的第四军及第五军经遂川向汝城前进，一部经桂东向资兴前进，将主力部队集结于汝城附近。

西征初期的行动隐密，为红军赢得5—8天的路程。红军只要保持每日50里路程，即可以赶在追敌之前，抢占湘粤边的要地，立于主动地位。

然而，红军纵队却如一副八抬大轿，向前作缓慢移动：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队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五军团担任殿后。每一个军团拥有庞大的后勤部，有的有1000副担子，

有的有 800 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就连尿盆、尿盆都带上。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军总部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红军主力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

有时候，一个夜晚从小山这边翻到小山那边，总共不到 10 里路。坐一下，走两步。

敌军主力在后乘车猛追不舍，与红军大队的距离越来越近……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未能赶上。红 2 师 6 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口。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 6 团 1 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11 月 2 日晚，1 营到达距桥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 1 营停止前进，1 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2 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 100 多人。军团部转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湘敌 62 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

从 5 日晚到 8 日晨，红军大部队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中央红军随即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粤边湘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

当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公路上汽车来往也很方便，这有利于敌人调动部队。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紧追在红军之后的嫡系部队。与此同时，粤军也利用铁路和公路的有利条件调遣兵力，堵截红军。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军团将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并派部队占领九峰山要点，以掩护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

九峰山是粤汉路东面约 10 多公里的一个制高点，它对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关系重大。红一军团在通过九峰山时，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发生了激烈争吵。

林彪时年二十九岁，是红军中最卓越的战地指挥官之一，他以善打运动战和埋伏著称。很早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独立阴沉的个性。值此关键时刻，他自以为敌军未到乐昌，欲令部队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老成持重的聂荣臻说，那可不行！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他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两人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

争吵，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聂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林彪以不言默许。不久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没有图侥幸。11月6日下午3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团长告诉林彪，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1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林彪才着了急，赶紧派2师4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慢。

时适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山炮营好不容易上了九峰山，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这一堵，跟在后面的教导营和卫生部、医院都过不去了。开始后面以为前头部队稍休息一会再走，没料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军官们等急了，传话催促前面部队快走，队伍就是动不了。有人急忙赶到前面察看，才知道是山炮营睡觉挡了道。连拉带拽地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可是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躺了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部队只好原地休息。半夜里，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队伍就在雨中站着、蹲着熬了一夜。天亮后，部队继续赶路，山顶的部队派人下来报告，昨晚有三个同志冻死在山上。

自11月上旬经过湘粤边阻截之后，蒋介石自认为对红军情况已经比较明了。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虽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11月中旬红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蒋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以在湘江以东布防“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进行了五大部署：

（一）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四个师，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
（二）以吴奇伟率四、五两军主力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师尾追红军，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

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温珩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5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蒋介石是很用了一番心机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锡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通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可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西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自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歼灭之机已至。

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的部属不认真贯彻执行，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电令中。他希望部下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好好打一个歼灭战。

红不进入湘粤边时，蒋只命白崇禧在桂北防堵；当红军进据湘南后，蒋即电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并要白崇禧至灌阳指挥。这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桂军，特别发了一笔相当大的军费，幕僚晏道刚鉴于两广是半独立状态，不如湖南那样基本上能控制得住，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蒋军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曾在蒋电令陈济棠、李宗仁全力防堵时，为他建议道：“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说：“你不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我的命令是第二步。”晏道刚恍悟蒋的深意。

一举解决广西、云贵川的地方军阀，完成全国统一的“伟业”，是蒋心中久已酝酿的战略宏图。走一步看三步，蒋介石所谋深远，行迹诡秘，他的智力在围追红军中得到了激发。

最有威胁的敌人还是红军。蒋介石周密地为它设计了一个大陷阱，即就是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蒋介石的企图，何键决定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一带，包围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为此，敌人共投入兵力约26个师，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我决战，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我军歼灭。

一个巨大的网即将搭成，8万红军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笨重缓慢地向它游去。前赶后追的国共军队，正比着速度……

毛泽东峥嵘岁月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家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瑜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濛濛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些。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1934 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莫斯科的、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当时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去求学很盛行，他没有像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当他把新民学会的好友都送往法国勤工俭学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国，他说：我对中国研究得很不够。

1893 年，毛泽东出生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六十五公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六十五公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

同父亲的争吵构成了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的一项重大内容，这时他就表现了桀傲不驯的反抗性格。他挣脱了父亲的羁绊，走出乡关闯荡，在表叔的支持下，他进入了东山小学堂求学。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更加开阔起来。同学肖三借给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雄豪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毛泽东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时，毛泽东已转到长沙一间中学。他当时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一分子。为支援武昌的革命军队，他同许多同学一道参加了新军。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

校，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他一头扎进书海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这是他博览群书的时代。

此后，毛泽东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是促使毛泽东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教授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特立、王季范、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周世钊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革命运动。

近代以来，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居然成了全国重要的人才中心之一。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成了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谭嗣同是戊戌变法著名的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他死难于京城。黄兴是同盟会主要的军事首脑，领导了全国十次反清起义，是赫赫的辛亥元勋。蔡锷带着病亲领不足 2000 的云南兵，和 10 万袁军决战，终于掀翻袁世凯的皇帝梦。统而观之，可谓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梦有材，于斯为盛。

毛泽东在这一小环境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的精华浇灌着他。自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注重追求人生和宇宙的大本大源，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脑中回荡着“豪杰”、“圣贤”的激情，“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正如陈独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从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使湖南在中国近 100 多年的历史，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自从南宋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力行，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的影响。

当时社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军事危机。对外，军事积弱，屡受列强侵略。对内，军阀混战，枪杆子拥有最大的发言权。重实践，首先要重军事。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务实的军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历史传统，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器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嗣同全集》第 194 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

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卓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的散文，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也进行着大量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光芒四射的文采。

个人奋斗力弱，集体奋斗最强。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是在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参政意识。他们平时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力量。

在长沙求学的岁月里，毛泽东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毛泽东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毛泽东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他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他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

1918年中，毛泽东送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那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19年初，他由北京来到上海，由于失去了生活依托，他只有靠洗衣为生。这时，一位老师借助其军阀朋友的支持，担任了湖南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把毛泽东带回了湖南，任命为一师附小校长，毛泽东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不久，他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了婚。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是湖南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在学运的激流中，毛主席编辑了《湘江评论》，他第一次发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口号。

约在此同时，在附小兼职的毛泽东给他的小学生作文题目是：“内忧如此，外患如此，如何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证明，此时他已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在于行动。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他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尽管在湖南发动的历次反军阀运动都没有取得实效，但毛泽东的领导下的湖南共产党支部仍是全国发动工农运动最多、组织力最强、人员最众的一个。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在20年代共产党内即是无与伦比的。

1924年，毛泽东来到广州，进入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领导层，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1926年，当北伐军挺进到两湖时，他的家乡湖南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全省农民都动起来了，国民党右派对业已爆发的农村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共产党内妥协派也骂农运为痞子运动，毛泽东站在了农民一边。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悍然向共产党人施下屠刀，在历史性的选择关头，毛泽东投身到军事斗争中。九死一生的六年后，毛泽东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战略家，然而，此时，他的大权被一批留苏生剥夺。在第五次围剿重压下，这批书生表现出军事上的无能，一败再败，只好实施战略转移。

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能眼见着书生们把他亲手创立的军队引向绝境，同1927年春夏之交一样，他又到了重大选择的关头。必须采取行动。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在于发动一场合法的集体反抗运动，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决定，要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含义深远。

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但他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大多数人为了生存，最终必然走向真理。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那时还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忧虑深深地埋在心间。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不是胜利就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

开始时毛泽东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担架上阳谋集团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跟着它，保护它。

二十九岁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他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是前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骨子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褛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1925年10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不久他成了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王明上台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一开始，他是冒险路线的积极鼓吹者，人们常说的“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这条路线的“四大金刚”。中央代表团是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主义”、“右倾”和“狭隘经验论”。王稼祥是会议主持人之一。

此后，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这当然专称毛泽东。这时已倒向毛泽东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当面站出来说：山沟里就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这是实践中的马列主义嘛！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根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

从此，王稼祥变得清醒了，在军事上，他日益依重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

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他小事有办法，大事不行！”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心里颇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每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罗！

这一段时间交谈给了王很大的启发，他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打仗的真理在老毛这一边！

长征路上，毛泽东的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并肩而行。毛泽东有意停留了多日。

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想法。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使王稼祥深受启发，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暗暗决心在时势来临时把老毛推上战马。

毛泽东看到王稼祥的转变，已与自己合拍，心中暗暗高兴。此处不必多费力气了，他向王告了别，向它处活动去了。

王稼祥经过考虑，坐在担架上找了张闻天，两位老同学作了数次长谈。

张闻天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0年他出生在上海近郊南汇一座临海的小镇。当北京学运的风潮席卷全国时，时读南京河海专科学校的他是市学联的主要笔杆子。

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就只有他一个。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他在中山大学学习了二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有一次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就中国“四·一二”政变引起的时局变化发表演讲，从上午九时一直讲到下午二时，张闻天、沈泽民和王稼祥轮流当翻译。

20年代末，中国学生中的托派被驱逐回国，托派校长被撤下来，米夫被斯大林钦定担任校长，他宠爱的学生王明乘势崛起。

张闻天毕业留校任教时过一年，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选送，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校学习深造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和郭绍棠。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张闻天等入学，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称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为“四大教授”。

1929年春，中山大学内发生了拥护支部派（米夫、王明一派）与反对支部派的斗争，那时张闻天的家还在中山大学内。他同苏联红军后勤部的一位办事员安娜·古尔宾斯卡娅相爱同居，还住在中山大学一间楼梯旁的小房间

内，并仍在中大兼代课程。由于他对两派之争公开表示不感兴趣，被认作“第三势力”的领袖。

正值此时，米夫由王明陪同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立即向米夫建议，要利用支持“支部派”的人，团结“第三势力”，从而搞垮对手。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

尽管王明与张闻天关系并非十分密切，但张闻天的学术名声和社会影响力，使得王明主动向张闻天示意友好，观念的一致，终于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后来，在斗争中落败的反支部派颇不服气地给对方骨干起了绰号，讥称他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般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肖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人，这二十八个人中，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说一两种外语，只有五个人是工人阶级成份。

回国后，张闻天加入了王明、博古的班子。身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宣传工作。三十年代初中共在白区和苏区所犯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有一份的。

本来，博古派张闻天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府日常工作，意在进一步排挤毛泽东对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一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波澜式前进的务实主张是不满意的，他参加了王明、博古对毛泽东的“右倾保守”路线的批判。但是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张闻天在就职后，动员毛泽东一起住进了瑞金下肖区沙洲坝的一个栽着棕树的院子。他与毛的办公室仅隔一堵墙。在共同的工作中，他十分尊重毛泽东。每次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张闻天总是亲自或派人去请毛泽东参加，有一次，张闻天看到毛泽东亲自在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深受感动，他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地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呵！”

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头部，很关切他的病情。每次前来探望，张闻天和毛泽东总是坐在一起，常常长谈至深夜。他钦佩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惊世之举。他发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有一套。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张闻天是不赞成博古拒绝出援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的愚蠢计划的。至广昌战役大失利后，他与博古发生了公开冲突，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从而把他排挤出最高决策圈。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他即使提出了意见，也不受尊重。他感受到失去的权力的空落。

张闻天对博古了解甚深。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张闻天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所以他反“左”，常常是胆怯的。他害怕被博古归入毛泽东的右倾路线去。对博古的忧惧阻止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近，毛泽东未敢象与王稼祥那样向他但露心曲。直到长征前数日，毛泽东似若无意地与他闲谈，他把心中对博古的不满意全部倾倒出来，毛泽东乘风

吹火，两人之间的距离从此拉近，成了交心的朋友。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根据他对中国国情不平衡、军阀混战、社会危机加深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务战略和运动战术，两人深为信服。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的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事谈，如朱德、刘泊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这使毛泽东心中有了数。

军事顾问李德机警地发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让李德担心自己地位不稳。

他向博古提议注意这一动向。博古没有反应。他是不重视此事的意义，还是无可奈何，一直是一个谜。

毛泽东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毛泽东主动发起了一场争论。11月6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旋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主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这时，红一军团长林彪命令红1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即命令1、2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抗击粤敌的进攻，他亲自带红3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全军的前面。

当李聚奎率红3团到达乐昌地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在路旁交谈。周恩来见李聚奎到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接着他详细交代任务和具体方法，并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

以担负两侧的警戒，他郑重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认真倾听周恩来的指示，并计算路上需要撤下多少部队，琢磨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他担心沿途撤下部队太多，战线太长，收拢困难。

毛泽东就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又听到毛泽东过去在交代战斗任务时常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以往很熟悉的指示，心里百感交激。

周恩来和朱德紧接着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在宜章南北的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一道最严密的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敌情非常严重。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间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步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这项建议又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有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他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仍以红军前途为重，不断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这次建议的命运与以前的没有两样。

红军只好继续按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前进。11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边境时，严重的敌情就在面前，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郑重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再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醴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无论毛泽东等怎样坚持提出正确的建议，红军还是被博古、李德等引入到敌人四十万重兵的包围圈。

第二章血战湘江

34 师师长陈树湘仿佛进入了一场险恶的梦境。巡视惨呼绝叫尸体狼藉的战地是需要勇气的。他看见无数目眦欲裂的眼，瞪着硝烟漫卷的苍穹。

整个红军主力全都过了湘江，他的 34 师被卡在湘江东岸！所有联络都已切断。

1934 年 11 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已到达道县附近，前锋迫近广西边境。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周浑元、薛岳等部，在红军后面跟踪而来。

蒋介石急令广西军阀白崇禧准备迎战。白崇禧派飞机侦察。见整个蒋军正以大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已有七天停止不前。正在纳闷，潜伏间在蒋军中央、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的王建平（白的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发来密电：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小诸葛走出走廊

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这样发展下去，既要抵御红军入境，又要防备蒋军的入侵，势必两面作战，颇为恐慌。因此李、白决定放弃堵截红军的计划。

白崇禧与蒋介石斗法多年，尽管常常败在蒋介石手下，但他一直认为，论政治外交他白崇禧不如老蒋，论军事才能相比于老蒋，他有一技之长。

白崇禧是民间妇孺皆知的小诸葛。他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丸岁时，他与六岁的弟弟一起上学。在同学中，有个十七岁的校内年龄最大的叫毛长林的学生，性情暴戾，品德极坏，经常欺侮他兄弟二人，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作“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小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某日放学在毛长林步下五级石阶时，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他让小弟先回家告知父亲说明原委，而自己则先匿藏村后山岸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九岁幼重做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20年代初，广西土匪多如乱毛，出身于土匪的都督陆荣廷主张实行招抚政策。那时，白崇禧虽然是个连长，却力主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二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余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长不敢作主，而去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

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用计。他待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假三日回乡去过中秋节，严令他们按期归营。八十余名惯匪如期归来后，他怒不可遏，诡称有人举报他们中间有人回乡为非作歹，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举报人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到学校去让举报旨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入校。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

生米做成熟饭，陆荣廷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的一件大事。匪首即除，匪帮散去。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十几年来，白崇禧就是运用这样的角诈狠辣的手法，攻战争雄，由保定军校出身的见习排长发迹为全国性的军阀巨头。26岁时，他即联合李宗仁、黄绍竑统一了广西。29岁时，他出任北伐军代总参谋长。30岁时，他成为南方人中率军进入北京城的第一人。全盛时代，李、白拥有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四处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后来虽遭蒋介石多次暗算，势力崩溃，李、白两次流亡海外，却能两次潜回恢复对广西的控制权，成为蒋介石争霸生涯中最难缠的对手。

李、白小本经营，考虑多多，对世事颇有洞见。他在八九月（1934年）间，见肖克部红军由湘南经桂北、湘西入黔时，就判断江西红军会转移根据地，他认为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对于没有攻坚武器的红军来说，确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预感到共军将来全部西移，届时广西就会受不了。

对于蒋介石一网打尽的毒计，李宗仁、白崇禧看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筹思应对之方。

白崇禧考虑堵击方案时，沉吟着对高级幕僚刘斐说：“你看，我们广西一共只有十八个团兵力，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刘斐思忖一会，才接口说：“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说来是会把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紧跟在后面。”

白崇禧说：“是呀！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依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

打才好呢？”

刘斐笑着说：“这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崇禧接口说：“是呀，我们十八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说：“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黄绍竑此时已投靠蒋介石）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罗！”

经过反复商讨，他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通道（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方针，专从红军后卫部队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白崇禧、刘斐经过实地考察，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此时，中央红军分三个纵队前进：红三、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三军团进占嘉禾城，一军团占领临武城，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在主力红军的前进方向上，横着两条大江：潇水和湘江。潇水西岸的道县是那一带的第一大县，也是第一大渡口。红军要渡过潇水，必须先抢占道县。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迅速向道县进逼。

11月20日，一军团2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2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决定，将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4团、5团。4团攻正面，5团迂回。

要占领道州，就必须先过潇水，道州城在滞水的西岸。如果红军不能迅速赶到，追、堵两敌则可能先我赶到道州。即使赶到而不能迅速占领，两敌也可很快支援道州，给红军造成被动局面，使战斗成胶着状态。问题十分严重地摆在红4团团长沙耿飏政委杨成武的面前。

他们率部队走了将近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坡，突然遇到一群百姓，耿团长与杨政委向他们做调查。他们似乎都有点害怕，耿团长扬扬手，请他们坐下，尔后递上纸烟，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他便问道：“从哪里来？”

一个穿长衫的人连忙站起来，弯弯腰说：“回长官话，从道州来。”

见他们毕恭毕敬的模样，真有些好笑，杨成武便说：“别这样，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你就坐下来讲。”

那人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他们就消失了惧怕心理，争先恐后地向红军介绍起情况来。

临走，当这群百姓得知红军是攻打道州的部队时，有两个挑担子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担子，又折回来，拉着耿团长的手说：

“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点，道县有一座浮桥，从这里去，进县城非得从桥上过不可。那桥是用船拼起来后用铁链子串起来的。你们要先抢得桥，才能够过去，他们（指敌人）要是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去的。那时，你们可以在晚上派人凫水过去，把桥放过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夕阳西下，黄昏时刻，红4团终于结束了100余里的急行军，赶到道县

城郊。

河面上，空空如也，船只全被敌人弄到河那边去了。一眼望去浪花翻滚，一处一处的旋涡飞快地转动。潇水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河流。老乡提供的情报多么可贵！

深夜 12 点，一切准备就绪，全团开始行动了。工兵排长率领着三个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跳入了潇水河，敌人噼噼啪啪地进行还击，但终于被红军火力压住了。战士顺利地夺得了船只。天放亮时，在当地船工和老百姓的帮助下，部队架好了 34 米宽的大浮桥。于是，突击部队开始过桥，迅速抢占东北两门，冲进城去，占领了天主教堂。这时，5 团由庸水上游过来。红军完全控制了道州。当后续友邻部队和师直属队开进道州城时，红军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原来，蒋介石还不明真相，派飞机前来道州侦察。就在他们忽高忽低地侦察时，红军战士用步枪打落了其中一架。两个猎人装束的飞行员，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请求饶命，惹得红军战士哈哈大笑。

红旗飘上了道州城头，群众欢天喜地欢迎红军。街头巷尾，人山人海。他们惊叹着红军的英勇、机智。这时，离杨成武不远有两个老人在议论。

一个摸着胡子有些不解地说：“子弹都不多，真奇怪，怎么总是打胜仗，真有本事！”

另一个很神气地说道：“他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还靠子弹打仗？”

湖南为昔日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的宣传影响很深，这次见红军回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都站在路旁，观者如堵。湘南各县在几年前，已有居民加入红军的。这次红军路过时，那些红军的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总卫生部管理科长即为宜章的文明司人，路过文明司时，他的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 15 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的主任参谋告假 2 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 11 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夫子，又携带家制极甜的白酒分给同事。

据由管理科长招来的桃夫介绍：“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 5 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 30 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 30 余家百余男女郎在离镇 20 余里的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前日上午 12 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 20 余枝。现在这 30 余家有 51 个人都当红军了。”红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上有修路工人 400 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红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了红军。中央红军占领了道县，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步计划，恰在此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防守空虚，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红军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 11 月 25 日中央军委才发布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渡江。11 月 27 日，一、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控制了界首至脚山渡之间 60 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于 27 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岸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 160 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

湘江。但是博古、李德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 40—50 里，足足走了 4 天，才到达湘江边。这四天时间的延误，使红军付出了血的代价。桂军的撤防，本来给红军带来绝好的抢占全州的机会。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先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

抢占全州的，是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此前何键得知桂军撤防后，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

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这样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

夺取全州未成，一军团只能将第一道阻击线选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距全州 16 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从全州，有一条公路，就是桂黄公路，正穿过脚山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阻击阵地。

军团召集干部看了地形，决定先将 2 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 1 师赶到，再将 1 师部署在公路两侧。

11 月 29 日，刘建绪得悉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段他所部署的正规桂军都撤掉了，只剩下民团，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即以其 4 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红 2 师脚山铺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攻到第二天拂晓，即 11 月 30 日凌晨，红 1 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刚刚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

桂军在 11 月 28 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

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于是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受到前后夹击。形势越来越危急！

杨成武死里逃生

天渐渐亮了。守卫脚山阵地的4团团长安飏，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十来架飞机俯冲而下，它们穿梭似地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4团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乃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

随后，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黑乎乎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待敌人完全进入了射击距离，“砰！”突然一声枪响，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拚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红军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红军对付的敌人，是何键的16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红军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红军也减员很大。

次日，敌人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红军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5团阵地施加压力。

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严重，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小山头上红军的战士全部阵亡。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脚山，封锁湘江。

伤亡在增多，一个个的伤员从阵地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5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4团压来，向红军背后迂回，4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4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红4团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

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脚山。

4团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

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

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红军战士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的意义。

红4团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红军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杨成武本来在公路右边2营指挥，但见1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2营火力支援1营。他率队从公路左侧横越公路，刚到路中

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他的右腿膝下，血流不止，他倒在公路上，动弹不得。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他，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

这时，敌人离杨成武很近，一窝蜂似地向杨成武拥来。他们疯狂地喊道：“抓活的！抓活的！”

5团5连指导员陈坊仁带了几个战士，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杨成武。

2营副营长兼6连连长黄霖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拚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3名同志向杨成武靠拢。

头一个战士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

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

看着战友们连续流血牺牲，杨成武一边挥着手，叫黄霖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爬。

可是，黄霖毫不迟疑，低身匍匐着向杨成武爬了过来。

他爬上了公路，猛地抓住杨的一支胳膊，把杨向外拖着。

当他把杨成武拖出公路时，已两眼血红。他把杨成武交给了杨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警卫员白玉林和团支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地架着杨成武，顺着公路边起伏的丘陵地，向后撤。杨成武的两条腿，在地上拖着。

两人一气拖了杨成武4—5里路，突然遇到了担架兵。小白向他们喊了一声，“担架兵！”

正在走着的担架兵站下了，见有伤员，便问道：“你们是哪个团的？”

小白说：“4团的，给我抬上！”

那些担架兵一听不是自己团的，忙说：“我们是5团的，另有任务。”

小白一下子火了，用手往腰里一插道：“不抬？不抬，我枪毙你！”

匡汉谋站在一旁指着杨成武，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团政委！”

担架兵迟疑了一下，过来看看，说：“是杨政委，快抬上！快走！”

原来杨成武过去在11师工作很久，与5团指战员很熟。

一军团总部被袭

1934年11月30日，湘江西岸阻击阵地。

林彪举着八倍望远镜，站在湘江西岸脚山铺前边的阵地上。他苍白虚弱，象个文雅精干的小学教师，不象是威震敌胆、叱咤风云的年轻将领。一军团，红军主力中的主力，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历来最艰难的任务常常落在这个军团的肩头。在战场上，他以他的机智敏捷果断和历来的赫赫战果，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声誉。

1928年春天耒阳战斗时还是一营二连连长的林彪，两年后一举成为红四军军长，三年后成为一军团军团长。

关键任务总是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林彪在二十四岁指挥他的一军团时，并不感到吃力。只觉得比他当团长、军长时，更加得心应手。就象一个游泳者，在深水里比在浅水里更省力，更能发挥技艺，他相信“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也相信“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格言。他并不显得少年气盛趾高气扬。他的特点在于有一种成熟得近乎冷酷的理智，这是政治家权谋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他跟容易发怒的李德、容易冲动的博古不同，与彭德怀的粗豪爽直的性格截然相反，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少展露他唯我独尊的锋芒，也很少流露他的顽强的自我意识。只相信自己的目光所见，只相信自己的头脑的思考，他只追求自己为自己规定的目标。他是一个有绝对主见的人，很难说这是长还是短。

突然，大地在他脚上颤动了一下，一颗炮弹在离他二十米的地方炸开，弹片带着猝发的狂欢噼里啪啦一声尖啸在他耳畔扇起一股热风飞了过去。他的身后一名警卫人员被弹片击倒，一名参谋被气浪抛到十米以外的山坡上。他向前踉跄了两步，被烟雾所笼罩。但他仍然举着望远镜察看着向侧翼暗自运动着的敌人。

他并不关心是否还有炮弹飞来，也不关心谁死谁伤，那是救护队的事情。战场上，他绝不婆婆妈妈。仁慈是战争中的泥潭，谁陷进去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他关心的是战场，战斗胜利那才是大局。

林彪从炮火的闪光里判断出隐在山后的炮兵阵地，他视察了好久。

拿破仑曾把大炮称作战争之神，林彪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吩咐作战部门派人到前沿部队去组成炸炮小组，趁夜间去把敌人的卜福式野炮炸掉。

“没有炸药包怎么办？”参谋问。

“那就不用集束手榴弹！”

这个平时慢声细语战时冷静决绝的军团长，即使吩咐这样一条计策，也是用命令的方式。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林彪的军事辞典里只有随机应变、百倍的胜利信心、准确的判断和斩钉截铁的决策，不存在“民主”二字。他认为三个高明的厨师同时在一口锅里炒一个菜，还不如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炒得好吃！他是红军将领，那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不会做诗，却相信战场上的灵感。他果断坚决，在于他自信只有他手中掌握着军事智慧的钥匙，用它可以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在战场上，即使是身体有病，他也是处在最佳的竞技状态。

湘军犹如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不顾血本，用孤注一掷的疯狂决心，倾尽

全力摧毁一军团的抵抗，刘建绪绝不相信还有砸不烂的铁核桃！

双方的暴烈的战斗本性都被疯狂的进攻和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了。这里既不是豹子对着饿狼，更不是猛虎对着绵羊，而是红色战神对着白色战神，红色雄狮对着白色雄狮。

在敌人有飞机、大炮和精良的步兵武器的情况下拼搏，就等于敌持长矛我持匕首。只有近战，才能发挥红军之长。林彪命令部队不要过早还击，把敌人放到阵地前沿，而后突然反击，他借用了通俗小说中一句尽人皆知的话：“让他们在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一军团是擅长打运动战的部队。这种阻击战打得这样出色，不能不归功于在五次反“围剿”中与敌人阵地对阵地拼杀时的短促突击的锻炼。错误的战略中可以有正确的战术。

飞机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战士们震昏，耳鼻出血。湘军也下都是孬种，他们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在后，好象着了枪刀不入的魔法、无知无觉地“哇哇”叫着，踏过他们自己弟兄的尸体，向对方阵地冲击。红军面对的是老虎，而不是老鼠！

这时候，阵地上，炮火已经不再轰击，只有拉锯般的反复争夺。

冲上来，打下去，打下去，冲上来。掩体，堑沟，雨冲沟，岩石，弹坑，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种拉锯战无止无休。白刃格斗显得异常严酷。

林彪转身走向更高的山崖。十几名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和医生跟随着他。他自行其事，并不跟任何人商量，他要看清敌人更大的纵深，判断敌人攻击的后续力，以便决定投入多少预备队的力量。

第一线的激战反衬出敌人后方的平静。这种“静”使人莫测高深，它隐藏着诡诈和危险，它会猝发出撼天动地的惊雷。敌方的许多师团长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在北伐战场上也都有过赫赫战绩。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分道扬镳，成为仇雠。并不因为他们是反动军人，就成了懦夫和笨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也打得英勇顽强吗？他们的成败，不在某个人的才能大小品格优劣，而是整个阶级的腐朽还是新生。

“如果我的手脚能够自由伸展的话，”林彪想道，“我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打垮他们。”

他放下望远镜，坐在一块岩石上。几发炮弹落在他身后五十米的地方。他的袭击敌人的计划是在几分钟之内形成的：如果就在这个晚上，他用少数部队坚守阵地，就象用一只左手揪住的敌人的前襟、尔后把主要力量绕向敌后，就象甲右拳去猛击敌人的脑袋……但是，不能，因为部队任务不是在运动中去歼敌，而是坚守阵地，保障渡口，他对此深深遗憾。

林彪对自己的部队充满信心，他知道他年轻，但他相信有志不在年高。此时，他望着激战的阵地沉思冥想。他想：如果由他来统帅这支大军，绝不会搞得如此乱糟。

林彪生性沉静而含蓄，几乎从不展露自己的心胸，他几乎没有披肝沥胆的亲朋好友。孤独、是他的外在表现，也是工于心计的内在特征。这种孤独，有时让人望而却步，给人一种阴沉感。但他的眼睛是锐利的，头脑是清醒的，思维是深刻的。他能够审时度势。他懂得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没有深山难出虎豹，没有大海难养蛟龙。

随从人员都在他身边，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却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都知道他谋虑深沉。对于决策，他很少跟别人商讨，绝对地相信自己。

林彪似乎谁也不看，裹裹披风，绕出堑壕，径自向前走去。一军团——大军西征开路先锋的重任，在这个年轻人瘦弱的肩上，竟然显不出分量。

军团政委聂荣臻见林彪回来，便把各部汇来的军情简略而快速地介绍了一番。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政治委员之一。1934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1920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法国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到达西岸之后，于11月26日也过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两个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

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

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1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1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1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红2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5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5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易荡平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易荡平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5团阵地失守，2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拚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1师撤出之后，2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1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阻击线。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林彪、聂荣臻夜间也无法入眠。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他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晚上，两位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

12月1日1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其中，“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在3时30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通道，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中央局军委总政11月30日晚上到12月1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飞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我进犯。在20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开始，敌人猛攻红3团阵地，红3团连续打了几次反冲锋。敌转而猛攻红1、2师的接合部，终于突进4—5里地，并迂回到3团背后，包围了3团2个营。1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1、2团会合。1个营突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回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从我接合部突破以后，红2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2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林、聂才放了心，令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1师经木皮口、鹞子江口，2师经庙山、梅于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资源的越城岭山区。

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在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聂说，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林聂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军团参谋长左权还在那里吃饭，被聂拉走。于是聂荣臻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的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刘辉山往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他们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

红一、三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霜风凄紧，冷雨飘零。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着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水激涛涌，浊浪排空。昔日清澈泛绿的江水，而今波涛滚滚，喧腾不已。

国民党军的迫击炮弹不断向红军的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密雨似的向红军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过来。国民党的飞机丢了炸弹，刚一飞走，红一方面军的工兵战士就冒着敌人的枪弹，迅速跳进透肌彻骨的水中，拼死拼活抢修浮桥。

桥刚架好，工兵战士们还没爬上岸来，敌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好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在汹涌的浪涛中随波浮沉，拥来挤去，混合着尸体，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由于敌人封锁了江面，飞机

又不断在湘江上空狂轰滥炸，军委纵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丘上停了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作糟的，到处都是，使人无处插足。骡马一停下来，仰天嘶鸣几声，管它地上有水还是没水，便困乏地卧在地上，缓缓地伸出干涩的舌头舔着焦燥的嘴鼻……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枪炮声交织一片。混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马匹、担架、野战医院的尿盆、尿盆以及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等，四散在江畔上。嘈杂的江滨，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以及地图、书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得七零八落，一页一页地飘散得满地都是。有的图书正在烧毁，红红的火舌随风舐着江边枯黄的野草。

渡江的红军指战员个个脸色发灰乃至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尘的破烂的便衣或军装，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背着斗笠，有的光着头。

许多人疲倦到了极点，一登上江岸便倒卧在河滩上喘息。

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马匹和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在弹坑近旁的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碎的带血的布条碎片。一个弹坑四周，竟躺着 30 多具尸体。

许多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直僵僵躺着不动，但是多数都在那里痉挛，在那里哼哼。到处都是血，都是肮脏的绷带，都是呻吟声。汗臭，血腥，烂肉臭，和着浓烈的硝烟味顺着风一阵阵扑过来。

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森林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而蒋介石的“铁三角”还在不断收紧，枪声还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又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

黄克诚自行撤军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34师的后卫任务。34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

12月1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12月2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来。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军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追敌进行激战。

11月27日，彭德怀命令红5师急速奔赴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进攻，掩护红军大队人马前趋湘江。28日，桂军两个师向红5师阵地发动猛攻，红5师仅有两个团，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10余里宽阔的阵地上，武器、弹药又不足，指战员知道，如果敌人攻占了新圩，红军将被拦腰斩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个个英勇地与敌拼杀肉搏。苦战两昼夜，伤亡惨重，师参谋长胡浚，14团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1月29日，红三军团又在渡江点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光华铺距界首只有几里路，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不利据守。为阻击由全州、灌阳出击之敌，保证红军大队人马继续渡江，彭德怀只得不惜一切，背水一战。他把红三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战斗。

翌日清晨，敌人正面进攻被红4师10团拼死顶住，便沿湘江西岸向界首逼进，对红军实施迂回。10团团团长沈述清指挥发起反击，中弹牺牲。彭德怀命杜中美接任10团团团长。当日，杜中美又壮烈捐躯。1日之内，牺牲两位团长，此战是何等激烈！在红军和革命的生死关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4师在界首光华铺血战3昼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18团被敌围于湘江东岸，全军覆没，指战员大部分牺牲。

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但红4师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师政委黄克诚对师长张宗逊说，我师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张宗逊说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撤。黄克诚坚定地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将会被敌人吃掉的。

黄克诚是个有主见的人。几年来，他在屡次进攻大城市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持重态度，被狂热的上司视为“老右倾机会主义”，为此多次丢了官职，幸有彭德怀赏识他的直言，免于打AB团时的误杀。

他是红军中较早对这次左倾路线有所反思的军官。记得红三军团从福建沙县回师黎川时，他曾对彭德怀说：“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局。”彭德怀也有同感。到广昌战斗后，

彭德怀真忍耐不下去了，对李德公开表示不满，多少是受了包括他在内的下级的影响。

黄克诚 1902 年 10 月 1 日出生于湖南水光县贫农之家，念过师塾，上过省第三师范，北伐时从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结业，在红军中，算是个正牌的知识分子。他的眼睛高度近视，作为有着经常率领红军战士冲锋的传统的政委角色，这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

那时红军行军打仗，经常要奔跑。在莲塘到良村的路上，敌人在前边逃跑，红军在后边紧紧追赶，敌机就在头顶上轰炸扫射。由于红军没有对空射击的武器，敌人的飞机疯狂得很，在离地面只有百多米的低空上盘旋，追逐杀伤红军。有时连飞行员的面孔都能看得清楚，即使部队伏在地面不动，敌机也很容易找见目标。因此，敌机投弹、扫射的命中率比较高，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往往可以毁掉红军一连人。这样，红军只好以快速奔跑来躲避敌机。有一次他眼见一颗炸弹在他的头顶上落下来，赶快向前奔跑躲避。谁知，当他跑出约四五十米远的时候，这颗炸弹就落地了，但不是落在他原先的位置上，而是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刚刚跑到的地方，就落在他的脚下。他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这一次可逃不掉了。事有凑巧，这颗炸弹落地之后竟没有爆炸，实属侥幸。

一次，他的搭档黄云桥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他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军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他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他逼近。由于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已沾满了汗水，视线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他便迎着这支部队走过去，心想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他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他作射击姿势，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道：“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他开了火。黄克诚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黄克诚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挎包已不见了。用手在周身上摸了一遍，没有中弹。警卫员在山顶上见他倒地滚下山去，以为他中弹牺牲，就跑回去报告了部队。

他一个人在山脚下，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他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便上了公路，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攻打建宁县城时，第 3 师指挥所抵进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师指挥所扫过来，由于视力不好，时任 3 师政委的黄克诚未能察觉。亏得师长彭邀眼疾手快，他见敌人机枪向他们扫来，猛地拉住黄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黄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他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他们一身。彭邀拉着黄滚向一处掩体后面，冲黄开玩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是想拣个大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邀反应得快，两人就在一块报销了。

多少红军军官，就是这样从生死一线过来的，本次阻击战中，黄克诚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好几次，敌人的子弹从他的身边擦过。他视若无睹。军人必须不怕死。而作为首长，则要求比士兵更高，他必须为数百、数千部下的性命负责，他肩上的责任和压力远超出了下级。

军令如山倒，上级既然没有下令撤退，下级即铁钉入木，不可动摇，违

者军法从事。听将令是最本职的事。然而，此时总部由于种种情况失去联络。非常时刻，若按常规行事，全师将有覆灭危险。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更何况危急时刻，黄克诚决心承担责任。

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黄对张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才勉强着张宗逊把部队撤走，使第4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

红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红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击未能得手。接着红4师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黄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余部队随后跟进。

黄克诚的果断挽救了一支部队的命运。

陈师长绞肠自尽

炮火已经把远近几个山头上的树丛剥光了。白天，五军团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和飞机炸弹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四面包围的敌军做拼死的搏斗。

12月2日这一天，在新圩文市之间的34师阵地淹没在敌人的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撼天动地的呐喊……鲜血和泥砂凝固在一起的褐紫色山地上，遍布支离破碎的肢体和横躺竖卧着敌对双方的濒临死亡的伤员。山崩地裂的搏斗持续了几十个小时。一团团黑色的碎云掠过阵地上空，犹如战神翅膀投下的暗影。

34师师长陈树湘站在中间的略高于其他阵地的山包上，举起望远镜四面看去，仿佛进入了一场险恶的梦境。巡视惨呼绝叫尸体狼藉的战地是需要勇气的。他看见无数目眦欲裂的眼，瞪着硝烟漫卷的苍穹。

整个红军主力全都过了湘江，他的34师被卡在湘江东岸！所有联络都已切断。周围几个起伏的山地成了淹没在血海中的孤岛。

他接到的最后指令是：“全力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追赶前行部队，如果不能渡江，就依据兴安以南山地发展游击战争！”

陈树湘两眼盯着电文，心情是苦涩的、悲壮的。电文指出了两个可能。但他清醒地知道，第一种可能已不存在，只有后一个可能——突出一部分部队，留在江东打游击。

34师来自于1932年宁都起义的26路军。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第一集团军，1926年夏天，冯玉祥与邓小平、刘伯坚等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带领部下在五原（绥远）誓师，参加了北伐战争。当时，不仅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刘志丹、刘伯坚等同志都在这支部队里担任政治工作，而且它所属的各部的政治工作也都由共产党员负责。部队中可以公开的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集会时还可以高唱《国际歌》。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失败后被迫下野。蒋介石便通过孙连仲把冯玉祥的第一集团军收编为26路军。1932年，26路军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阵前起义，起义后在石城秋溪进行了整编，一支新的红军部队——红五军团诞生了。在新军阀混战的年代，陈树湘曾纵马中原，冲锋陷阵。他在为谁而战？他的马砍杀的是谁？他在为谁争权夺势抢占地盘？在中原大地上，他路过一个被战火烧毁的村庄，火光里，他看到的是满面涕泪向苍天呼号的饥民。这就是他的父老！他跳下马，把自己薪饷的全部积蓄散发给他们，320元白花花的洋足以使这些饱受战争惨祸的饥民得到暂时的温饱，他却听到参谋长的不以为然的声言：“别做傻事吧！你能给千村万户都散发一份？”陈树湘的一腔如火的心骤然变冷了。我应该怎么办？每当想到把人民推向战争灾难的刀锋中，也有自己一只手时，他就感到刻骨的痛楚。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他萌发了解甲归田的念头，自知再也振作不起来了。直到他们被调到宁都来打共产党，更是流露出消沉绝望和颓然自弃，他那年轻的眼睛里竟弥漫着将死老人的灰冷无力。是隐藏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突然给他揭开了生活的新的篇章。起义之后，他又恢复了勃勃精力。变得焕然一新，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战到底。

阵地上红军士兵越来越少，入夜，陈树湘率剩余的兵力突围在渡一条小河时受阻，他端起重机枪参加了战斗。终于，在一阵炮火之后，他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汪里。

警卫员为他包扎，他要求警卫员给他一枪，解决痛苦，警卫员流着眼泪不忍下手。凌晨，敌人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他们被俘了。敌人用担架抬着陈师长，想回城献功。象陈树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担架上他想死去，没能找到别的办法。眼看天快亮了，他就悄悄解开衣服，撕开警卫员给他扎上的绷带，用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肠子扯断，咬断……长沙版的《大公报》数日后为此事作了报道，标题是《生前与死后原住本市小吴门外》：

伪师长陈树香在道县被我军击毙各节，已志前报。陈树香原名树春，长沙人，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卅，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年始充师长。此次自赣省兴国出发，全师步枪四千余枝，轻重机枪四十余挺，在后担任掩护部队。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故而回窜，所率百 一团，仅剩重机枪五挺，步枪三枝。昨在八都被击溃后，只剩重机枪一挺，步枪三枝。因该师长负伤甚重，于上午八时许行抵石马乡毙命。

另一则的标题是《陈树香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

追剿司令部……将伪三十四师长陈树香首级箴箴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之上示众。……并于其旁张贴布告云：为布告事，据湖南保安司令部呈，……俘获伪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自江西兴国出发，迭被国军击溃……经派员解至石马桥，伤重毙命……呈由衡阳本部行管饬收该匪陈树香尸体拍照，并割取该匪首级转解注明核办……合将该首级示众，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

白崇禧的恶作剧

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的时间将近两周（由1934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一周，使用兵力二三十个师。这个时期，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则函电交驰。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呆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由于薛岳唯陈诚之命是听，因此第六路军的行动多由陈直接秉承蒋的意旨行事。在11月下旬会战开始后，蒋介石曾亲笔写信给第六路军薛岳以下各军师长，认为这次“流寇”向西突围已“势穷力蹙”，规定该路军9个师以穷追为首要任务，信中且有“毋容红军再度生根”之言。

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认为红军牺牲、损耗很大。惟蒋介石意犹未尽，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

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击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战斗规模较大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

桂系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后队，彼此相距约二十公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当到达文市西侧时，桂军即与尾随红军追击而来的周浑元部先头营遭遇，为拒蒋介石中央军于广西境外，桂军即向中央军开火，经一小时战斗后，桂军先头团将周部先头营缴械，然后诈说是误会，经解释后将人枪退还了事。

这时证实红军已全部西去，先头已到湖南城步附近。广西方面希望中央军“毋劳入境”，蒋介石也感到“投鼠忌器”，周浑元部乃由文市经全州黄沙河入湖南境；原来由湘南拟出桂北之黄沙河向全州前进的薛岳部，得到消息后，也折回湖南东安，不便再向广西前进。李、白对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顾虑，到这时才缓了一口气。

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责备的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白崇禧把红军遣散的病员和落队的士兵，以及红军挑抬东西的民夫收容起来，又在当地用枪“请”来一些老百姓，让他们化装成“俘虏”，把他们全部上了镜头，又把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十多间房子都拍摄下来，精心拍成纪录片《七千俘虏》。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白崇禧命人把这部影片运到各地去放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目的无非是为了恐吓蒋介石不要轻于向广西进攻而已。

白崇禧每次演说时，夸耀桂军击溃红军的“战绩”，并且责备国民党中央军“剿共”不力。其中有两句最滑稽的讽刺话：“蒋介石叫他们（指国民党中央军）去‘剿共’，他们偏要‘抗日’（指晒太阳）。”

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纷纷报道攻击新桂系，说共军已和桂军妥协合作云云。李宗仁在红军撤走后，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

军西窜，桂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李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 CC 系的报纸俱有报道，因 CC 系报纸不知就里，再也不便多言了。

蒋介石闻知白崇禧这一狡猾措施，愤怒地急电责问：“共匪势蹙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也不客气，复电反驳，“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批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白崇禧还引了一段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有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接着说：“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挡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宇、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白崇禧越写越自由，一边夸大自己的战果，一边对蒋介石横加讥讽：“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子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谪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恶作剧式的电报把蒋介石气得要命，他解开使他窒息的军服领子，舔着焦燥的嘴唇，翕动着鼻孔，默默地坐着。数度逼蒋下台，使蒋记恨白崇禧已久，但因其拥兵自重而无奈。

第三章改变行军路线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首次遭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下台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

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召了5万兵员。李德估计，34师、三军团的18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3团有2800人。过了湘江后，只有1400人了。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竟损失了3.05万人！

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1934年1月28日到12月1日短短4天中，损失近2万人。

这时的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伤亡损失大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遭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一方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激烈进行着。

博古李德大规形

博古在一群警卫战士的簇拥之下骑马走了过来。他渡江时，举目四望：杂沓涉水的队伍，满江漂流的文件，花花绿绿的钞票，随处遗弃的机器，沙滩上横躺竖卧的尸体，遍地硝烟，一片惨红。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之初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那般潇洒。

1931年，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时，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了，资历太浅，难孚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

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

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说很富有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义于“博古通令”，其实俄文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之子”！他原名秦邦宪，乳名则名，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上海大学是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

翌年10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和奉鲁联军总司令部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打下了基础。

1930年5月，博古回国。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可以说他的最高权力几乎是白捡来的，在共产党历史上，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即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与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那时候，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主持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决议案，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苏区和上海不同，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仗，自己一介书生，怎么压住台，于是请来了国际顾问李德。这个蓝眼黄发的德国人，满腹经纶，说起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他们的军事理论和

指挥的战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仗总是没打好。湘江战役伏尸百里，造成这样大的伤亡，怎样向全党、全军交待呢？！博古感到肩上压力越来越重，抬不起头来，简直要把他压垮。

剪不断，理还乱。

他掏出了自卫手枪，那是缴获的小左轮，除了试射，没怎么用过，警卫员定期擦拭，保养得很好，有一种黑里透蓝的光泽“我丢掉了中央苏区，丢掉了几万红军，辜负了共产国际对我的信任和重托，不如一了百了，死是一种解脱……”他喃喃自语、慢慢地举起手枪，手微微颤抖着，又放下。又举起……“博古同志，你冷静一点。”随着声音，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策马扬鞭，到他跟前，勒住马头，翻身下马。由于博古思前想后的走了神儿，一军团司令部开过来他竟没有注意到。

“荣臻同志”，博古这才如梦方醒，羞愧地说：“仗打成这样子，牺牲这么大，我无颜见江东父老，真想一了百了。”

“你现在是党内的主要领导人，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万一走了火，怎么向大家解释，会给军心士气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也深悔自己的失态。岔开话题，问了问一军团的情况，回总司令部去了。

如果说博古还有良心的话，李德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无名烦闷中，他找到发泄心中怒火的对象。

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

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

李德骂了一大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34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

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担任红34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34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1934年2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34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

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

李德骂周子昆是逃兵，叫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可是警卫班的战士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出来解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李德瞅着博古，期望他支持自己，制止毛泽东横插一杠。博古仍然不吭声，不置可否。

在中国同事中，给李德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他给李德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他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毛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有意

的暗示。很长时间李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象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的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旨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红军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似乎毫不相干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他，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

李德认为，这暴露了毛泽东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李德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被李德认为很肤浅的。这是李对毛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他们认为，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毛泽东的理论是不纯正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如此。一到苏区，李德即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历次战斗中，李德尝试了他的正规战法，其结果众目所见，到了本次湘江之战，失败达到顶峰。难道真的是毛式不纯正的游击战法适合中国特有的情况？残酷的事实使李德感到疑惑，他再也没有了以前的自信。

李德的狂傲致使他从不曾言过——言过也就取消了自己的地位。他向人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中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战术分析是有几分道理的。

更有戏剧意味的是冯·赛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的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者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

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李德是正义的，他的行为可谓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传奇色彩，然而，他毕竟从士兵越级跳跃而来，未曾亲历战场控制范围的扩大导致指挥能力逐步

增强的过程，简言之，他缺乏大规模军事指挥经验。这是致命的缺陷。从某方面来说，司令毕竟是司令，士兵毕竟是士兵。

情绪不好，李德找了个借口，把妻子肖月华从休养连里找来，跟她度过一个难得的夜晚。

这个安排在当时来说并不容易。在长征途中，为了军纪和对部队的影响，随队的女同志大都集中在休养连，丈夫和妻子是不能在一起的，大家都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这在具有西方观念的李德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

李德是守不住自己的男人，他的眼睛令许多女性生畏。在瑞金时，他的邻居、当时共青团中央一位干部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眠共枕，他主动给她送礼。李德的攻势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负责人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挑选了一位强壮的农妇名叫肖月华，作为李德的“夫人”，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她没有多少文化，总是和李德吵架，他们之间语言上的障碍一直无法克服。

李德对生活要求很高，他的伙食很好，即使在红军缺粮的时候，他总吃肉食，还有特殊营养品。他嗜烟如命，长征路上，有勤务兵专门为他挑了一挑子美丽牌罐头烟，他一天一筒。他挑警卫员要高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作为外来者，他一直未能融进这支友爱互助的队伍里。

夕阳仍然血红，依然不肯骤然降沉到山后，好象对这弥漫着硝烟和焦土味的湘江还有许多的眷恋。

正受病魔折磨的毛泽东，就站在夕阳下，站在血腥中，站在硝烟弥漫的湘江边，目光深沉地注视着湘江。

江中涌动着一股又一股血涡血浪，在如血夕阳下蜿蜒曲折，一段淡似一段，不尽地流向东北，吸入山壑，隐没于云端。

血不能白流！毛泽东发自心底地呐喊。

他的脑海正在激剧起伏。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他身旁的王稼祥、张闻天说，也仿佛是对湘江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指挥权，但谁也无法剥夺他对这支他亲手创立的军队一败再败后正步入绝境的命运的关注；更无法剥夺他对如何才能使红军反败为胜，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深谋与远虑。

毛泽东有着极强的自信，而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自认是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

现在已到了非讨论失败原因不可的时刻。

此时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再不扭转航向，再不调换舵手，等待着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将是灭顶之灾。

毛泽东左手拄着一根树枝，将右手上拿着的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又像要吐出憋在心头的一股闷气似的将刚吸进的烟又重重地吐了出来，甩掉烟头，迈着大步远离湘江向大路走去。

快走到路上时，毛泽东停住了，望着西边将逝的残阳，沉思了片刻。然后又转过身来，对正跟上来的张闻天、王稼祥说：“不能这样了……要找人

们谈谈，要斗争啊！”

王稼祥与张闻天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
三人一起上了路。

毛泽东扭转乾坤

1934年11月。湘西。

秋风萧瑟，乌云沉沉。在这莽莽的崇山峻岭之中，渡过湘江的红一方面军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坎坷的山路上。

红军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的尾追甚急，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而那些沉重的印刷机、印钞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璋，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傅医生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象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

幸亏，傅连璋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踪无影。

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璋，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

80里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是资源和兴安两县的分界。其主峰名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高山之上，年平均气温只有九摄氏度，年降雨量高达2300毫米，雾浓风大，气候瞬息万变，人们被为畏途。

爬老山界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们只能排成单行前进。

红星纵队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红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红

军烧的，总卫生部在广田寨野外宿营后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立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的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2元，作用在一方面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面则引起居民对红军的仇恨。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市镇了。他们穿上红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冒充红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快气都没有了，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的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儿就有50—60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是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100多人连续写上名字参加了红军。

总司令部12月7日这一天的行军日记中记载：

“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过了老山界，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了红军的意图。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他立即调整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重新编组部队，把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在这一方向上部署了十五六个师的兵力，以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中央红军北去湘西途中，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布置好口袋，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广西方面，桂军以四个师组成两个追剿队，向湘黔边境前进，尾追红军，阻止红军重返广西。

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贵州当时有兵力一个军，但派系林立，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派。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所能调动的只有自己一派的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贵州方面是蒋介石围堵部署中最弱的一路。

这是中央红军面对的敌情。

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红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博古、李德不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三万多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拚，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他与王稼祥交换看法，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

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既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损失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泽东的真知的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交谈，说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的意见。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红军，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红军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向湘西进军路上的困难，竭力说服博古、李德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他提出，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并在贵州创建新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博古因部队受损，自己苦无良策，只得同意西进，改道贵州北上。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首次遭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但他很关心会议的最后决定。会后他去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了。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泽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对李德的第一次公开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三人团名存实亡

贵州，是古夜郎国的故土。当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对手，阻挡不了红军前进，又认为蒋介石总想排除异己，攫取贵州，但又不便也不能拒绝中央军尾追入黔。经过苦思焦虑，他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调兵至黔东防堵。至12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两个营和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防线很长，兵力薄弱。

12月11日，国民党粤、桂两省的军阀经过秘密商议，联合向蒋介石发出了请缨入黔追剿的《真电》，提出由两省抽调劲旅，组编“追剿”部队，入黔穷追。原来，桂系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集结湘南，黔东南极为空虚，但蒋介石又限制桂军入黔。而桂、粤、黔3省，在鸦片烟的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如落入蒋介石之手，不仅使广西失去主要的财源，而且在军事上对广西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于是立即命令其嫡系薛岳部兼程进入贵州，待薛岳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即任命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他棋先一着，使两广无可奈何。

敌人内部对贵州的争夺，使他们在贵州不能集中全力对付红军，造成黔东南的空虚状态，这对红军入黔是十分有利的。

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开始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进行休整。

博古、李德还未放弃寻机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2月14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湘西北活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上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建议放弃北进计划，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李德。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

12月19日，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行动部署，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

军委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20日，中央红军按军委部署向黔北进发。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被李德撤职的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

在离开黎平后向黔北进军途中，一天，红1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他们来到红1师师部来看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来了。他们听取了红1师师长李聚奎等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中，毛泽东说话最多，询问最多，他仔细地询问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为战争指挥员在部署部队行动时，是必须考虑战士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步走过来的等等实际问题的。

这一天，恰逢红1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中央领导听取汇报后就在红1师吃饭，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几盆肉，在长征路上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兴地喊道：“嗨，还有这么多肉呢！”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如此兴高采烈，是战士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队却传成“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红1师领导觉得这样说不好，就进行纠正，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部队对李德的作风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

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途中，黔军“双枪兵”（每个士兵除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杆鸦片烟枪）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行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就相继攻克了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由于博古、李德对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李德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领导者的主张。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名存实亡，使黎平会议开始的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蒋介石得悉红一方面军进至贵州黎平，就担心中央红军会同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命令湘军刘建绪的部队沿清水江西进，赶到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一带布防，堵截中央红军北上；命令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派兵到西阳、秀山一带，同刘建绪联防。蒋介石还特别命令嫡系薛岳将所属的8个师编为两个纵队，分别由吴奇伟、周浑元任第1、第2纵队的总指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

贵州军阀王家烈惧怕红军进入贵阳，亲自赶到马草坪，调整部署，把主力部队集中在南嘉堡、新柳、南寨、柳寨、南哨等地。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

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毛、朱红军。红军分路进军，而入镇远占领直通贵阳的汽车线。侯之担部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下。

贵州人民之贫穷令人难以想象，即使来自江西山区的红军战士们，也从没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走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月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顺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的狗时断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都堆成圆锥形，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

民谣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生活在这样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部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

1934年，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朱德离开瑞金时是1934年那个冬天，已经48岁了，但他经常不骑马，同年轻的指战员们一起徒步行军。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为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

当陈云与卫生部的队伍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一个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小儿子，身穿单衣，倒在地上，气息尚存。询问后，才知是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的谷米，尽交地租，家中了无食粮，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为今天气候骤寒，早起没有吃饭，所以倒卧路旁。正询问间，毛泽东率队赶到了，人们向他讲述了老妇的情况，毛泽东未发一言，立即从身上脱下了那件毛线衣裹在农妇身上，又令警卫员从行李马上取出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送给了那位农妇。农妇携子高兴地离去。

毛泽东率队开路了。战士们议论纷纷，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默默无语，没有参加大家的讨论。四年前，他也经历了类似的一幕，那一次，是他躺倒在地。

那是4年前农历大年三十，做了一年长工，吴吉清想和地主龙存发算清一年的工钱，好和母亲、弟、妹过个饱年。谁知地主一文不给，反而把他撵了出来。他又气又累，又饿又寒，不敢回家，在野滩上转了大半夜。天快亮时，他找到父亲的坟头，痛哭了一场，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去找地主算帐，谁知刚走到木桥上，两眼一黑，脚一滑，栽到桥下，晕了过去。

一支过路的红军队伍救了他，领头的“高个子”给了他一件衣服和一块毯子，他就跟着高个子参加了红军，后来他才知道，高个子是红军总政委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不久，他做了毛泽东的警卫员。

看到眼前这位农妇的遭遇，吴吉清自然想起他那老母亲及幼小的弟弟，红军远征后，她们失去了依靠，靠什么过活？他好象看见了母亲，她怀里抱着棍子，也象那位老妈妈一样，又在挨门挨户讨吃了！心中一酸，他猛咬牙关，忍住泪，不再想下去。

他庆幸有生地加入这支洋溢着阶级友爱的队伍。

他更庆幸自己能长处在这支队伍领袖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于他有救命之恩。长征前夕，吴吉清万万没有想到，他被疟疾给缠磨倒了！

这种病，说多讨厌有多讨厌。要是热起来，一时三刻就发烧到四十度，使人喘气都非常困难，喝多少水也不解渴，把身上的衣服脱光，还是热得要命。可是要冷起来，浑身又不住地发抖，盖上十床被子也不抵寒，总想抱上个火炉子。等热过、冷过之后，虽然轻松一些，但周身上下又没有一点力气，好象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似的。

在病中，为了不使主席分散精力，少给同志们增加麻烦，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请求，请求把他留在老乡家，待病好后回老苏区当游击战士，参加敌后斗争。

毛泽东知道后，把吴吉清狠批了一通，下令用他的担架抬着吴吉清走。

从此，无论是在夜行军途中，还是到了驻地，毛泽东每天总要在百忙中的时间来看他几趟。他的病，在同志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给以热心的照顾下，

渐渐好了！

吴吉清同他的同事一样，为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愿意完全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神炮三发渡乌江

猴场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按计划要迅速进占遵义。但是，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有一条必须跨越的大江——乌江。

乌江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为了抵抗红军，贵州军阀王家烈命令部队在思南县的塘头到遵义的老君关这 100 多公里之间的 10 多个渡口抓紧修筑防御工事。国民党第 25 军副军长兼指导师师长侯之担也在乌江以北增加兵力。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经进展到施秉、黄平、三德、镇远一带。桂敌廖磊的一个军已进展到都匀、湄潭地区。

红 2 师 4 团接到抢渡乌江的军令后，立即出发，经过半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了乌江南边 100 多里的猴场。这里的群众听说他们是打王家烈、侯之担的部队，高兴极了，自动站在两边，喜笑颜开，夹道欢迎。这时传来消息：我 1 师 1 团已占领余庆，那里的敌人——一个团和伪区公所早已闻风逃窜。

夜晚，正是 1934 年 12 月 31 日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当地群众说，渡乌江必须具有三个条件，即：

- 第一、要有大木船；
- 第二、必须是大晴天；
- 第三、要有熟悉乌江水性的好船夫。

可是，红 2 师第 4 团来到渡口时，渡船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上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4 团团长沙耿飏和政委杨成武，亲自化装冒雪来到江边侦察。他俩看到的乌江真是险峻。乌江南岸要下 10 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 10 里地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正是在墨乌色的峡壁间流过。江面倒不算宽，只有 250 米左右，可是流速却每秒达 1.8 米。整个乌江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向东北奔腾；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难怪群众称它为乌龙江了。这一天，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他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为了搞清对岸敌人的兵力火力配系，4 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逗引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驻守北岸的敌人是军阀侯之担的 1 个旅。耿飏和杨成武根据敌人发出的火力，观察敌人的工事，再参照老百姓的介绍，对敌人的兵力布置都作出了判断。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

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 9 点钟，佯攻先行开始。红军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工事，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

就在这当儿，杨成武在渡口上游 500 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 8 位勇士。他们的任务是撺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祝你们成功！”说着，杨成武手一挥，警卫员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杨成武和耿飏给这 8 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

8 位勇士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8 位勇士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

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1公尺，2公尺……远了，更远了，眼看快到江心了。敌人忽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夹杂在中间的还有一发发迫击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白茫茫一片。纵然江水冰冷，头上炮弹呼啸而过，但是，8位勇士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泅渡。

突然，敌人的迫击炮弹打断了8位勇士拉着的那条缆绳。刹时间，江中的旋涡大显淫威。游到江中的同志只能折了回来，第一次试渡失败了。在岸边接回了泅渡的勇士。但是，一检查，少了1名，原来这位勇士，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又大浪又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强渡乌江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

红军接受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于是，部队又赶制双层竹筏。再次进行政治动员。各连纷纷再举“能人”。

入夜，江水汨汨，寒风凛凛，团首长在竹林里把担任偷渡的1营集合起来，作了战前动员。

突击赶扎的三个双层竹筏放在岸边。第一个竹筏下水了。5个勇士在毛振华连长的带领下，首先跳上筏子，他们除配备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之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

第一筏顺利地离开了江岸。

敌人没有发觉，第一筏继续向江心划去。

第二筏、第三筏相继下水了。

团首长看着他们的竹筏离岸而去，一瞬间即消失在夜色中。大家站在江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黯黑的山影，期待着胜利信号的出现。但是一分钟过去了，2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始终看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呢？他们正在前进吗？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为什么既不见亮光，又不见他们回来呢？等了又等，没有一点影子，真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法捉摸。大家为此焦急万分。直到30分钟后，才有一个通信号匆忙跑到江边报告，说：“第二筏到了江心后，被水流冲下5里，险些翻掉，现在已经返回来了。”团长正在追问详情，第三只竹筏上的同志也返回来了。原来他们的竹筏子也被水冲下了2里远，摸不到方向，几次险些冲翻。至于那第一只竹筏呢？始终不知下落。在此情况下，团首长不敢盲目地再发竹筏，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夜，漆黑的夜，乌江水咆哮着，天空又纷纷扬扬飘下大雪，冷雨湿透了军衣，通身冰凉，杨成武、耿飚怀着焦虑的心情，等待了整整一夜。

元月3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了。他带来了重要的情况。他说，追踪我们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军委催促我们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是越快越好，并派来了军委工兵营归4团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还一再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过江，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2日上午9时，4团紧急动员，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头，组织强渡，昨夜下的大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滚滚的江水哗哗作响，第一批三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赤着膊，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

敌人开始没有发现，而当竹筏距敌人约50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清

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竹筏离江心更近了，敌人更慌了，他们几乎乱了阵脚，枪不知往哪里放。正在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声音是从对岸石崖边传来。

敌人的火力突然一齐转向崖底。

竹筏乘隙加速前进，筏头激溅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

竹筏靠岸了，他们吹响了宏亮、激昂的冲锋号。

竹筏上的战士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像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

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纷纷向后逃窜。

红军冲上了敌人的阵地，战果在不断扩大。崖下这支奇兵是谁呢？

是第一筏的毛连长他们！

原来，毛连长与5个战士带着一挺机枪，乘坐第一个竹筏，在2日晚上摸黑靠上了对岸。他们上岸后，希望后续部队过来，但是久等不见来人。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在那里修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划火柴呢？在这困难情况下，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等待时机。

偏偏这时天空又飘起雪来，雪花落满了他们的肩头和一身。寒风呼啸着，江边分外的冷，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相互依偎，紧紧地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抗御着风寒。在敌人的工事下，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对话、议论。但是，谁也不咳嗽一声，谁也不说一句话。半夜，毛连长突然发现一个年轻的机枪手不见了，五个人到处摸黑寻找，仍不见踪影，有的战士开始怀疑了，这个战士是位刚从白军中过来的新战士，会不会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在这生死关头动摇了？有人建议立即转移，或是拚着性命冲上去，向敌人作最后一击。但是坚定、沉着的毛连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之后，说“不会”，并压低声音说服了大家——为了全局的利益，决不能冒然行动。他还说：“万一被敌人发觉，我们就等着敌人靠拢，然后用手榴弹对付他们，敲掉一些敌人后，再往山里撤！”过了一会儿，那位战士回来了。原来他拉肚子了。毛连长问他：“为什么不拉在旁边，走出去不怕敌人发觉？”那位战士笑笑说：“我怕拉在这里太臭！”就这样，结束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拂晓，当强渡的大队竹筏快接近岸边时，这6位勇士才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了出来。

团首长迅速组织1营过江，神速地占领了高地。3营这时在江边焦急地等待过江工具——竹筏。忽然，对岸枪炮声异常猛烈地吼叫起来，杨成武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的预备队开到了，一齐向一营压来。他们夺回了1营占领的阵地，1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了江边……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在团指挥所观战的陈光师长派人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一同赶来。

炮兵连是军团直属连，本来是炮兵营。那时，有4门82迫击炮，两门机关炮，编成3个连队。湘江脚山阻击战中，损失很重，只剩下两门82迫击炮，因此一个营缩编成炮兵连，原来的营长赵章成就当了连长。

赵章成可谓红军中炮兵的鼻祖。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在白军部队里当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训练，炮打得很准。他是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

赵章成和王东保很快来到指挥所，杨成武、耿飚向他们交代了具体的战斗任务。然后，师长陈光问道：“赵章成、王东保，还有几发炮弹？”

“还有5发。”赵章成如实报告。

陈光师长用力做了个推挡的手势：“非把敌人打回去不可！把敌人打回去！打不回去，拿着脑袋见我！”

“是！”赵章成、王东保二人坚定地回答。

他们接受了任务，转身就走，一路小跑，边跑边核计如何完成任务。

很快，已经到炮兵连预设阵地了。炮阵地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远，靠近江边，前面有一排稀稀拉拉的毛竹，地上已经预先挖好了安放炮盘的圆坑。

赵章成迅速地架起一门82迫击炮。

战士们从炮弹箱里拿出了五发炮弹。这全都是从苏区一步一步背来的。谁想到这每一发炮弹如今都联系着乌江战斗的成败！

头一发炮弹，传递到赵章成的手里。

这个老炮手一手托起炮弹，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拉成弓步，没有瞄准镜，而是闭上一只眼吊了吊线，把炮弹送进了炮膛。

“轰！”一声巨响。

炮弹在敌群背后爆炸了。敌人仍在碉堡前蠕动，指导员王东保有些沉不住气了，说道：“老赵，炮弹不多，这还行！”

“不要慌，重点在后面！”赵章成仔细地瞅了瞅弹着点，原来刚才他打出的这发，是试射。

说完，他又用手指头瞄了瞄，然后双手捧起一发炮弹，举过头顶，跪下一条腿，对着天空，像念咒似的喃喃说道：“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

原来，赵章成信佛，不忍开“杀戒”。

他说完，将一发炮弹滑进炮膛。

这时阵地上，鸦雀无声，可以听到炮弹在炮筒里下滑的丝丝声。

“轰！”又是一声巨响。

只见炮弹出膛，弹头弯曲飘忽而去，一个隐隐的黑点从高空骤下，少倾，火光一闪，“啜！”炮弹在敌群正中间爆炸了，顿时掀起一股浓烟。

“打得好！”大家不禁喊了起来。

接着第二发、第三发连续发射，向我滩头部队冲击的敌群顿时被浓烟覆盖了。

硝烟稍散，只见那品字形的三个炸点的前后左右，躺了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我滩头部队，乘势发起猛烈的进攻。

红军乘胜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起来的浮桥、跟着3营冲过了乌江。

4团全团过江了。

与此同时，1师1团在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

工兵营迅速架起了两座浮桥，一军团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

中央机关也踏着浮桥过来了。

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终于被红军突破。

当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经烧掉浮桥，跃马在乌江上游百里以外。他们只能望江兴叹，踟躅在江边追忆他们妄图妄图堵截红军的美梦。

伪装巧诈遵义城

红军突破乌江以后，迅速向贵州省北部的重要城市遵义前进。7日凌晨，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遵义。

遵义原由国民党军队侯之担指挥的部队防守。渡过乌江以后，6团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都做好，总参谋长刘伯承赶到了，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

1月6日，6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30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指示6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攻打遵义。当日下午3点，6团1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部队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决定借助俘虏诈城，诈城这出戏主要的角色由一营长曾宝堂来演。他带着3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30个司号员，个个都是一色的敌军打扮。另外，有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也派给了他们。其他部队都跟在后面，准备诈城不成，便强攻上去。

夜9点钟左右，部队冒着大雨出发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很滑，队列里不时地响起“噗通”、“啪唧”的声音，差不多每个人都摔过几跤，起来时就成了个泥人。有的草鞋被烂泥拔掉，要想拣起来，可那鞋就像用胶粘在地上似的，怎么拽也拽不出来。扔了吧，真舍不得；拣吧，就要耽搁老半天，影响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于是很多人干脆赤着脚、踏着碎石、烂泥、荆棘，继续前进。

急行了2个多小时以后，大雨停了，只是不时从天上落下几颗雨点点。透过夜幕看见一点灯光，吊在半空。俘虏们悄声地告诉红军：“到了，这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于是红军就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忙忙往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枪栓也拉得呱啦呱啦直响。

“自己人。”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

“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这时，俘虏的连长就按着事先安排的内容，悲悲切切地回话了：“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1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快快开开城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子他们是在研究情况。为了不让他们填密地思考，红军又组织了一次“攻势”，许多人乱嘈嘈地喊：“快开开门哪！”“麻烦麻烦哪！”“‘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吵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家伙朝下面大喝一声，听口气，估计是个当官的。

大家只好“服从”，都不吭声。突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他们身上照来照去，仿佛要照点可疑的东西出来。当他们确实认清这些戴大盖帽子的是“自己人”的时候，才说：“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大

家一听，都憋住笑，悄悄地上好刺刀，推上子弹，等着敌人开门来迎接“自己人”。

“哗啦”一声，城内卸下了门闩。随之，“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敌人恐慌地问红军侦察排的战士：“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侦察排的几个虎将把枪口指着那两个敌人的太阳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共匪’！”

那两个敌兵吓得“啊！”了一声，就像面条一样瘫在地上了。

红军大队人马便一下子涌进城去。割了电线，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20—30个司号员就一齐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后续部队像风一样向街上冲过去。霎时，遵义城热闹起来了，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哭叫。大多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当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窜了。1月6日早晨，遵义城宣告解放。

聂荣臻和刘伯承步入遵义城时，看到2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了，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2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任务还很艰巨！6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4团这个主力团还未使用。于是聂、刘与2师领导商定，使用4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4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思想工作的确难做。

聂荣臻对4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耿飏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令司号员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4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1935年1月10日，4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15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4团又向前伸。

1月9日，毛泽东、朱德在全城居民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

红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召开民众大会，毛泽东、朱德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

红军在这个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有几十个学生、工、农、商民当选并演讲，内有教育界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几日就成立了几百人的抗捐队，自动去清查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当场鸣锣聚众散发。贫民聚集在县公署（驻总政治部）天井中等发“土豪衣服”的人数以千计。

红军一面宣传，一面招募红军新兵。约有5000人加入红军。他们多系川黔滇籍的贫民或退伍军人，对于川黔滇的地方情形很熟悉。这对于红军有莫大作用。以后朱毛红军之能转战于黔北，这些新战士出力很大。

全城有男女中学校56所，红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

各校均未上课。但红军对于青年学生加以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红军之友社等等。红军进城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演说。在县立三中操场，该校学生得力球队与红军篮球队比赛。不少人乘闲逛了全城。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无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的杂志出售，这三家书店中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店，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店中颇多川菜滋味，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都是川味做法，且价格极廉，让红军官兵大享了一顿口福。

红军在遵义时，商店照常营业，因为红军的纸票每日都能兑现。红军没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价值几十万元，王家烈从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的白金龙香烟值5万元，准备旧历年节用来慰劳薛岳军队，却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全部出售。每红军钞洋1元要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时。

由于中央红军突然转向遵义，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一下子被甩在乌江以东。“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已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作战。摆在长江沿线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轻易冒进。贵州的敌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尽管行动比较积极，但由于被阻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接近遵义，这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以来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时机。

第四章毛泽东掌权

毛泽东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否则，他与张闻天等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毛泽东在红军上层做好准备并发动反对博古、李德的运动时，一直与王稼祥密议开会彻底解决。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渡湘江之后，聂荣臻行军路上磨破了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他开了刀。这样，他行军就得坐担架，对频繁作战的一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他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他思考问题的机会。他与同在担架队的王稼祥一道走，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两人一致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试探，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说完全赞成，他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王稼祥大喜。

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调和大师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关键。他是武装斗争以来指挥全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代表着中央的权威，在“三人团”中，他负责军事指挥。

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共的头号领袖，可他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三十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1930年，苏共举行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周恩来。这是斯大林指定的。其中自然包括一个明显的含意，表明周恩来将作为中共新的领导人接替李立三的工作。但是回国以后，在安排党的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却有意识地把瞿秋白摆在首要地位，让瞿秋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而自己只作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报告。结果也是瞿秋白接替了李立三成为党的领导人。瞿秋白下台以后，周恩来又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酷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生存并不是一件易事。他有很多机会获取中共的最高领导，他不但没有争取而且让给别人，就政治生涯的漫长来说，象昙花一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无法与他相比！

周恩来1895年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家庭，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喜爱现代文学！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作为学运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坐了一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1924年回国时，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他加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初，周恩来在上海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周恩来也被国民党一师长诱捕，幸有一位他的学生讲情才被放出。随后他去了武汉，又到南昌，领头组织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汕头失败后，他去了上海，直到他潜至中央苏区时，他一直负责着中央的军事工作，是全国红军的实际总指挥。

1931年11月，毛泽东被解除了中央分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12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从决定，于1933年5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示，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

在中央苏区大失利方面，周恩来也是有责任的。他在四次反“围剿”时，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中则变成为全线抵御。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不管在中央军委时期还是苏区中央局时期，别人，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是老毛、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而“四老”则叫他润之。周恩来除了会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尊敬有加的称呼给人以某种疏远感。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但是，他并没有再坚持。

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即使在毛泽东落难时节，他也一直对毛泽东表现出尊敬，而置中央总负责对毛泽东明显的排挤于不顾。博古也给他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咒，即“对右倾保守路线”的调和主义，周恩来对此没有多加在乎。广昌战役中，博古与李德去了前线，在瑞金留守的周恩来自作主张，把闲赋无事的毛泽东派到南线主持军务。博古回来后，对此也无可奈何。周恩来自有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

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对周恩来造成的刺激之大，不亚于其他人。再让那个书生和洋顾问瞎指挥下去，红军只有灭亡一途。他暗暗意识到自己服从他

们所承担的责任。他开始实际运用名义上分工来的军事决策权，借助多年来负责中央工作建立的威信，几乎全部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对于李德、那个他一直尊重的洋顾问，则明显地疏远了。

折入贵州以来的顺境，令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近来历次建议的高明。让红军的命运回到它的创始人掌握之中吧！这是时势的需要，也是全军的呼声。作为务实者，一直肯定、赏识、敬佩毛泽东的军事专长的周恩来，通过血的教训，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那些从苏联借鉴到的什么正规化的洋玩艺，统统远离于现实，中国的大地上，只有毛泽东的士兵法才适合国情。

他决定顺应形势和人心。

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的一票将是关键的一票。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以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群雄推举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他充分强调了失败的客观原因，避而不谈个人指挥上的责任。

第二位发言是周恩来，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执行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这些争论后，他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第三位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他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总结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说“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李德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六路分兵、全线出击；第三，“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四，在战略转移中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历数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建议，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在分析博古、李德所犯每条军事错误的同时，毛泽东都提出当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案。

他系统地介绍了他的运动战术：“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这是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最系统的一次阐述，他的发言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发言过程中众人一直静听，结束后半晌也无人表态，人们还在回味他的论断。这是三年来他的发言唯一没有被人中间打断和结束

后大加批评的一次。

半晌之后，王稼祥起而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他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议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为之一震。

周恩来再次发言：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推举毛泽东出来负责军事指挥。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儿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作为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敌深入，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他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毛泽东立即插话：这次会议只讨论军事，不讨论政治，当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彭德怀看了毛泽东一眼，不再言语。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中对李德提出猛烈的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李德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彭德怀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二军团第6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他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着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

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判。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凯丰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声称，这件大事只能由共产国际决定。聂荣臻认为他“相当狂妄自大”，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

凯丰的提议在众人的指责中偃旗息鼓，会议就组织问题达成了一致。

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时，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但没有进行表决，会议作出四条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权操在谁手，众人心照不宣。

遵义会议的重要文献之一，是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指出：我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还指出：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运动线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

原则让步意深远

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委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其他各种方法向部队指战员进行传达。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象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喜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

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找在一起开会，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都非常喜悦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

随后，原红 22 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 4 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全团，广大指战员兴奋异常。

聂荣臻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

在南线乌江边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五军团 37 团，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子里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由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军团长董振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时，会场上顿时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当时军事紧急，遵义会议精神还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一些人犹感不足，他们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长期以来紧缩的心情开始松弛了下来。可是，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

他们还不理解毛泽东的深意。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冒险主义政治路线的错误，这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否则，他与张闻天等人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

越到后来，人们将越感到毛泽东保持这一联盟的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决议也及时地传达到其他红军，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遵义会议后，中央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领导发去了几份电报。其中一份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高级将领参加，博古等负责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这是严重的错误，但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另一份电报是对中央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的电报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

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接到这几份电报后，中央军区的电报机于2月中旬毁坏了，从此隔绝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泽东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相信毛泽东一上台就有希望。毛泽东这人懂得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也给红四方面军发出了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的电报。张国焘对徐向前、陈昌浩叹息道，我早就说过，毛泽东是个实干家，博古那群书生，是干不出名堂的。

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1935年2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忧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泽东飘忽不定的运动战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

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第五章兵败土城

初掌军权，毛泽东被压抑了三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毛泽东首战失利。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红军3万多人仍然处在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东面有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有滇军参谋长孙渡的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的两个纵队，北面有四川军阀刘湘的12个旅。对于刚刚重新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来说，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如何才能粉碎强敌的进攻，变被动为主动？

遵义会议接受了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眼下，红军的目标是北渡长江、而敌人的设防重点正好是长江沿岸，一场恶战难以避免。

军委遭川军突袭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北上。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为中央纵队。

红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占赤水县城，为红军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造条件。当时，由于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好，红一军团主要由林彪和李德指挥。

1月20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还规定：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要求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中央纵队行进在桐梓、习水至土城的山路上，时值深冬，天上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路上泥泞而光滑。在桐梓西门外高山上，毛泽东滑了一跤，跌入污泥中，被警卫员拉起来时，已是两脚污泥及膝，满身斑斑，当时正在野外，无法换衣，只好蹣跚在身上，警卫员找来一根竹杖让他拄着。

这是一个关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日夜思虑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把中央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

初掌军权，毛泽东心情是兴奋的。被压抑了三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毛泽东首战失利。

在从习水向土城行军途中，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共商大计。他们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敌人。

1月27日下午，中革军委到达土城镇，红五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

快到土城时，毛泽东跟总部的工作人员说笑话：土城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吃醉了。大家进了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商店摆满了一缸缸的茅台酒。还有许多酿酒的作坊和厂家。有些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厂，大伙可乐坏了。这哪里是土城哟，这是“酒城”啊！

驻下后，后勤供应部门已经和店主、厂家办好了手续，把酒抬来了。大家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瓷缸，从酒坛里舀出喷着甘醇清香的老窖酒，也不用什么下酒菜了，脖子一仰，“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些同志席地而坐，有些同志干脆站着，划起拳来。行的拳令倒是现编的：“一定胜利呀毛主席”，“双枪兵倒大霉”，“三年整，见光天”，“红四方军，大会师”……大家都像过阴历年一样高兴，喜在眉梢乐在心！许多人的脸都泛起了一层红晕。不会喝酒人，也要凑凑热闹，打了点酒，倒在小木盆里洗洗脚。洗完，脚和腿都轻松多了，全身热烘烘的。酒很香，闻着闻着，身子觉得轻飘飘的，困乏都被赶跑了。

此时侦悉尾追之敌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扑来。红军总部召开了会议，研究敌情，部署战斗。

毛泽东兴奋中仍不失冷静，他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敌情，毛泽东下了决心：红一军团第二天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占领土城镇以东二至四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敌先头部队以迎头痛击。

1月28日拂晓，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土城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3、4个小时，虽予敌以重创，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与红军作战的是四川军阀刘湘的主力部队。刘湘深怕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号召全军官兵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他知道，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司令朱德是四川人，足智多谋，地形熟悉，如入川南之后，川局当不堪设想。

久经沙场的川军军官为守家门，也卖力参战，激战中，敌旅长郭勋祺亲自上前线参战，团营长们率队集团冲锋。由于川军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红军人数虽比敌众，但缺乏火炮威力，禁不住敌人的反冲锋，只好边战边退。川军着了魔似的冲得很猛。

敌人的冲锋队突破前线，向红军纵深挺进。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当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过了一会，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

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啊！要不是叶副司令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然而，包括贺子珍、邓颖超在内的休养连仍在敌人的包围中，毛泽东非常忧虑，派出警卫员吴吉清前去查看。

这时，前方道路被敌人的火力封锁着，子弹在身边横飞呼啸。吴吉清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山头上找到了休养连。总卫生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总卫生部贺诚部长的指挥下，已经一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冲锋，这是敌人的第六次冲锋了。吴吉清找到休养连李坚真指导员后，见她也握着手枪，正带着休养连的警卫员，护扶着休养连首长们从山上撤下来。吴吉清急忙拔出驳壳枪，和黄亚堂搀着贺子珍，哪知刚刚走到山坡下，被道路右侧另一个山包上的敌人发现。敌人用密集的火力阻止他们前进。后面敌人已从那个山包上向他们冲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干部团的一个营顺着大路从土城方向赶来，以密集的火力压住了敌人。这样才得以安全地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突围出来，赶上大部队。

毛泽东与朱德站在山坡上，兴奋地挥手迎接休养连的归来。两人对视一下，眉宇间透出忧虑。

毛泽东亲自审问了押下来的俘虏，从中发现对敌人兵力的判断有错误。原来以为敌人是4个团，约6000~7000人，这时发现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同时发现原来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原来以为川军的战斗力与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战斗力比黔军强得多。并且红一军团主力仍在赤水城方向，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敌人猛烈反扑，红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突进到镇东面白马山的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前有敌人猛攻，后有波涛滚滚的赤水河，若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集结在猿猴的红一军团主力跑步赶到土城。

朱德总司令决定亲临火线最紧张的地段指挥作战。

朱老总亲临火线

九朱老总要披甲亲征，震动了全体红军，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

1月28日上午，毛主席和总部其他首长决定为朱德总司令到作战第一线而举行欢送仪式。在土城街的集合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特立）老、林（伯渠）老等中央领导手中都拿着一面用小竹棍作旗杆的三角彩旗，上前线参战的干部团200多人在街道两旁刚排好队，朱德身着灰棉军衣，戴着红军帽，腰束牛皮腰带，别着一枝小橹子，身上背着一顶斗笠，满身豪气，走过来。毛泽东立即从欢送队伍排头走向排尾，迎着朱德走过去，一边走一边举着旗子领头呼喊口号。朱德与毛泽东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身着灰布棉军装的毛泽东，清瘦的脸上现出淡淡的红色。他和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等同朱德在小声地商讨着什么。而站在圈外的博古却阴沉着脸，

神情冷峻。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朱德退后两步，向毛泽东等行了一个军礼。转身跟着上了正在开进的队伍。

朱德于 1886 年出生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一个贫苦佃农家庭里。少年时代，他上过私塾，一边从事着农活。稍长，考过科举，做了小学体操老师。1909 年，他到云南省会昆明，考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有革命的倾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他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1911 年，朱德当时是个连长，他随有名的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

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1915 年，他从被软禁的北京城逃回云南，发动了反袁的“护国战争”，南方一片响应，朱德随蔡锷进军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打仗，袁世凯在做了 83 天皇帝后病死。这时他已升为旅长，统率着护国军的精锐部队。

1928 年，蔡锷病死，朱德顿感失去了导师和方向。

1921 年从朱德任云南省警察厅长时，敌对派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捕朱德二十天，朱德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 1935 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他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他的首级，却急于要给他一个师长的位置，他谢绝了。刘湘所以要朱德为他效劳，是因为朱德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它是朱德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少数民族部落和土匪作战时学来的机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和戒烟。由于对前途黑暗而苦闷，朱德染上吸鸦片的习惯，1921 年他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到了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烟瘾已完全戒绝。

在这以前，朱德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 1911 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他大失所望。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他去了北京，未能找到要实行俄式革命的共产党，又回到了上海，拜访了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朱德去打陈炯明，朱德没有答应。他决定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

在柏林，朱德碰到周恩来，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很快加入，这是 1922 年 10 月间的事。

朱德在柏林边学习法文，边进行革命活动。1925 年，他在柏林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而被捕，被逐出德国，他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进入伏尔加学院学习军事，到 1926 年才回国。

中央派朱德到四川万县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兼任国民党党代表，1927 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朱德离开万县去了江西。加入南昌朱培德的军队，被任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长，这两个职位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起义后他被举为新组成的新九军副军长。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一带被打败，起义领袖周恩来、张国焘、贺龙、叶挺去了香港。在这关键时刻，朱德的经验和抱负发挥了作用。在三河坝，他与陈毅聚集起义余部 1 千余人，转战粤赣边，隐伏在老友范石生的部队里。1928 年初，他率军发动有百万农民参加的湘南起义，随后率万余军队，上井

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在从井冈山初期游击战中，朱德起了带头作用。

朱德长期搞军事，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由下级军官升到旅长。他曾率部在云南蒙自一带用游击战术对付土匪；在苏联学习时，他研究军事，特别是游击战争，提出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他身边的警卫有五挺手机关枪。必要时，他直接指挥单个战士作战。如新七溪岭战斗，敌人从隘路猛攻，部队混乱，他令部队后撤整顿，却令几挺手机关枪兵隐伏隘路旁。他目标小而火力强，敌密集冲锋未能奏效，使部队得以整理，随即反攻获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吉潭遇险，朱德指挥手机关枪班和小分队冲出重围。朱德对战争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对部队训练也有创新。古田会议后，他参照苏军经验，把北伐军三个排横队重叠的连纵队，改为九个班纵队并列的连纵队；把班的一线散兵改为人字队形，使火力交叉。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朱军长在，大家就感到踏实。

毛泽东能够获得基础，从无到有学习军事，朱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起初两雄并立，并非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其间会有互相的欣赏，会有此消彼长的互相借鉴，但往往有更多的互相比照竞争。为此产生了著名的“朱毛”之争。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通过现实严酷的失败，朱德终于认识到，毛泽东掌握了真理。他服膺毛泽东的最后决策权。

民间把“朱毛”当作一个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山区站稳脚跟，成为一股不可扑灭的军事政治势力，朱毛的高度协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军事战略头脑，朱德则是它的骨骼，他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中央红军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从没有发生过军政势力之间的大冲突。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

在井冈山突围的路上，朱德的妻子任若兰被敌人抓去杀害了，他又娶了农家女康克清。在此之前，朱德结过两次婚。

朱德被公认为“红军之父”可谓得当，他是红军的创始人，也是军中长者，他性格诚实，心胸宽广，谦和而仁慈，极爱和官兵打成一片。他喜欢在营地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对于混乱和错误，他也有大发雷霆之怒时，然而过后从不偏心。忠厚长者之风掩盖着他品格的另一面——倔强豪放，临危不乱，遇敌不惊，一切处之泰然。这是他在长期的动荡和军事斗争中养成的。

毛泽东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并不是朱德乐意见到的，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据理力争过，可是没有效用。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大打阵地战，短促突击，朱德与周恩来多次联名反对，最后却被公然调离前线。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中革委主席，可是，在“三人团”的决策圈内就没有他。博古需要他的威名，博古、李德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作为军人，他以服从中央命令为天职，他与毛

泽东的激越豪迈、刚武深沉的性格不同。

长征之初，他对“三人团”拒绝扩编红军主力，反而让新兵组建新军团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不让老兵带熟新兵，实在迂腐不切实际。湘江之战，损失了3万余人，新兵占了大多数，直让朱德痛心不已。

当毛泽东、王稼祥四处活动反对博古阵线、寻求支持时，朱德表示赞同。在遵义会议上，他说出了分量很重的话：如果再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他还说，从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领导也是高明的。这有他切身林验为根据，代表了全军将士之心意，对会议形势影响很大。

扶老毛上马，仅仅是改变局势的第一步，蒋介石数十万军队围了上来，红军随时有覆亡的危险。在这初战不利之时，朱德决定同他与毛泽东亲密合作时代一样，承担战术上的主要责任，亲自上前线控制局势。这方面，他有一己之长。

下午，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动了连续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军子弹和手榴弹即将告罄，战士们拣起石头砸，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敌人发动了更猛烈的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红军阵地，被红军战士以刺刀、大刀砍了回去。第六次冲锋也被红军战士杀退。

朱德率干部团赶到了火线，干部团的成员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战术思想明确，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指挥下，干部团以猛虎下山之势，向山下之敌猛冲。

朱德站在山头，用望远镜久久地观察着敌我态势。

一声尖利的呼啸由远而近，离朱德不远处的王耀南猛地跑过来，想掩护总司令，可还没等他跑到朱德身边，炮弹就落了下来，斜插在他们两人之间。那是一片稻田，溅起的烂泥，落满了朱德的军衣。被震倒在地上的王耀南出了一身冷汗。

炸弹没有爆炸。一同上前线的康克清在离朱德不远处站着，此时上前帮朱德拍打身上的泥土。

“算了，不要打了。”朱德转过脸微微一笑，马上又转过去。形势还很危急。

干部团终于把敌人打退下去，一直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3个旅增援上来了，敌人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未等干部团歇息，又反扑过来，干部团的子弹和手榴弹消耗殆尽，又用上了石头和大刀，渐渐招架不住。朱德不听警卫员和陈团长、宋政委的劝阻，冒着敌人的炮火，紧紧伴随部队发动反冲锋。战斗越来越激烈，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红军和白军扭杀成一团，已经没有固定的、明显的作战阵线了。射击声、爆炸声连成一片，山鸣谷应，朱德的指挥所，也变成了独挡一面的战斗单位了。当朱德领着几个人，攀上一架小山梁的时候，突然，不知是从哪里冒出了二三十个敌人，一边嚎叫，一边打枪，冲了过来。朱德立即命令大家占领有利地形，嘱咐着说：别慌，等敌人靠近一点才开火。说完，顺手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枝二十响匣子枪。敌人窜进了小山梁。朱德喊一声：“打！”他的匣子枪一抡，“哒哒哒”一梭子弹打出去，当头的两个敌人栽倒在地上了。红军战士们的机关枪也吼叫起来了。正在紧急关头，干部团的十几个战士，从敌人的侧后拦腰杀了过来，这伙敌人终于招架不住、只剩下几个活着的逃跑了。朱德高兴地对来“救驾”的战士大声喊：“好样的，多谢罗！这

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战士们连汗也没有抹，齐声回答道：“好！”说完，一扭身，朝枪声最密的地方跑去了。

当部队翻过山梁继续往上攻时，朱德忽然传令叫来了干部团特科营的营长，指着山腰左侧一座用石头块砌成的房子，对营长说：“有股敌人钻进那座房子，想打我们的埋伏，你赶快锤他几下。”

营长听完吩咐，认真看准了目标后，马上跑回去。一会儿，“轰！”“轰！”几声炮响，炸得石头房子里的敌人死伤一大片。最后，丢弃阵地溃退下去。

当日下午2点多钟，跑步返回增援的红一军团第2师赶到了白马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红三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郭勋祺率部退守平川地带。

毛泽东果断撤兵

这一战，干部团立了功。毛主席在山头上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形势稳定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他及时掌握战场形势的变化，鉴于在战场上的敌人比原来侦察的要多，而且援军即将赶到，在战场阵地巩固以后，决心撤出战斗。他说：“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根据当时敌情，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了。毛泽东果断地指出：为了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与会者赞同这一决策。毛泽东当场指定未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命令各军团于29日拂晓前，按一军团，军委纵队，三、五军团的顺序，渡赤水河西进。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乌蒙山。沿贵州、四川交界处，蜿蜒向北，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宽处300—400米，窄处100—200米。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渡几万人的浮桥，谈何容易！周恩来迅速把各军团的工兵连干部召集一起，下达了架设浮桥的任务，自己则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上架设浮桥。

架设浮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水流平衡，河面不宽，两岸有疏开的道路和阻敌尾追地形的架桥点；二要有船只；三要有木板、门板、竹竿和绳索。周恩来命令工兵连赶到赤水河上下游，搜集船只。同时，向土城镇居民收买架桥器材。

这是一个使人焦灼、忧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前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河，波涛滚滚，关系全军安危的浮桥十分艰难地向对岸延长着。彻夜未眠的周恩来亲临架桥现场督促指导，工兵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收集到了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连接把各船绑牢，再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天还未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过的轻便浮桥出现在赤水河上。

陈云带领卫生、供给部队奋不顾身地把全部伤员抢运了下来，作了善后

安置；又把笨重物资抛投于赤水河中。他在早晨四点钟就向毛泽东报告完成了任务。

在周恩来、陈云进行渡河准备时，朱德又重返前线，他巡视部队、发现红三军团第4师的部队未做好战斗准备，当时4师张宗逊师长已住进卫生所，政委黄克诚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朱德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恼火，对黄克诚政委大发了一通脾气，训了一通。

凌晨，许多部队都集中到了土城附近，一时间，这里人嚷马叫，人员拥挤，各部队在忙着做渡河准备。红4团也做好了渡河准备。这时，上级突然传来命令，敌人又向土城方向追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安全渡过赤水河，命令4团迅速赶去阻击敌人。

从土城到青杠坡大约10多里路程。当4团经过1个多小时的急行军赶到青杠坡时，敌人已占领了这里的全部有利地形，控制了最高点。整个青杠坡是一个葫芦形的山沟，两边峭崖夹峙，高耸云天，树林茂密。山沟中唯一的一条小道从良村方向通往土城。

4团来到这里后，迅速组织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1营和2营队正面进攻，3营迂回敌后，前后夹击敌人。但由于地形险峻，迂回部队不能插到敌后去，1、2营轮番从正面向敌阵地展开强攻。经过近2小时的激烈战斗，夺下了山沟靠东南方向的几座矮山头，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队伍。敌人企图破坏我抢渡赤水河的计划，首先用迫击炮与轻、重机枪，猛烈轰击和扫射我方阵地。尔后，组织步兵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4团拼命抗击，顽强地坚守阵地，严密封锁着通路，把敌人的一次次反扑压了回去。

就在红4团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朱德不顾危险亲自来到了前沿阵地。他仔细观察敌情，见撤退时机已到，果断下令后撤。红4团以一个营坚守阵地，两个营相继后撤。

敌人子弹横飞，情况相当危险。肖华等人一再请求朱德先走一步，他的敏锐回答都是两个字：“不行！”部队全部从前沿撤下来了，朱德依然在阵上观察敌情。红4团团长达赖、政委杨成武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达赖和杨成武又带了20多个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4团阵地压来。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

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6团团长达赖、政委王集成都来了，大家都为朱德的安全担心，但是看看朱德，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

激战中杨成武的手指负了伤，他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德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背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

指战员们向朱德敬了个礼。杨成武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

朱德坚毅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说：“我不知道呀！”

王开湘和朱水秋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朱德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用从容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空城计呢！”

1月29日中午前，3万多红军将士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敌人追至赤水河，浮桥已被烧毁，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从容西去。

川军总指挥潘文华 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 3 份电报中说：“缴获步枪 2 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28 日电）。“往复冲锋数 10 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29 日电）。“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 2 千余，当夺获山炮 1 门，迫击炮 2 门，步枪无算。”刘湘向蒋介石报捷，蒋据报后认为郭氏“鏖战有功”，下令升任郭为中将师长。一时国民党报纸纷纷宣传“土城大捷”。红军初战不利，一路上有些人对毛泽东来了意见。有人说原来的中央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大家都有份；现在换了人指挥，土城战斗打不好，还是不行嘛。毛泽东得知后召集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讲明情况。在会上，毛泽东承认犯了情报不明的错误，但他毫不客气地说，原来的中央就是有错误，并指出，是博古等同志犯了错误。对原来中央的错误领导，我是没有责任的。在毛泽东义正辞严的态度面前，这些人相反没有什么话说了。毛泽东向张闻天通报了情况。张闻天提议，把遵义会议决策的领导改换明确下来。博古继续领导已无人听从了。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周恩来立即说，当然是毛主席，我们听毛主席的指挥。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有人对张闻天的能力表示怀疑，毛泽东说，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应该由共产国际决定这件事。”博古没有听他的，他对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进村时这副挑子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就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换了主人，就这样平静顺利地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换。

这样，博古结束了自 1931 年 9 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

时为 1935 年 2 月 5 日，事情发生在川、云、贵三省交界之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

在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

然而，众人心知肚明，最后拍板权仍在毛泽东之手。

放下包袱打圈子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即进入了四川南部。四川军阀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在他的命令下，“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 36 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中央红军在川南活动时，先后在三岔河、叙永城遭敌截击，而且援叙敌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适合于敌人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要求，因而毅然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省扎

西地区前进。

2月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2月9日，军委进驻扎西县城。

红军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扎西地区，大出敌人意外。蒋介石和川敌顿时失去目标，一时不明红军去向，不敢贸然动作。川敌潘文华2月9日电告所属各部：“刻下匪踪不甚明了。”严令各部“多派侦探侦察匪踪”，“并坚工严阵，勿稍勿延。”这样，使红军又赢得了一些休整时间。

2月9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随后，毛泽东分析了当前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应是当前的战略方针。

敌变我变，重回故地？朱德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与第三次反围剿时毛泽东面临困境使用的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术类似。

在初战失利后，面临数十万敌军的围困，毛泽东终于放下包袱，决心在贵州地区与蒋介石斗一斗。他的建议竟是杀回一个月前的旧地，而此时蒋介石已把数省军队集中起来了。有人害怕因此被蒋介石团团围住，红军无法突围。

毛泽东微笑道：“我们来到三省交界的山顶上，把国民党军也带到山下来了，国民党军敢不敢上山？他们是不敢的，他们上山吃什么？他们一定要在山脚下等我们。这样，有人就担心，我们能不能冲出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山连山，他们哪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冲出去，出去了还不让敌人知道。因此，这就要轻装，要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众人被说服了，一致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作出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回师东进，重返黔北的决策，还决定整编机构，加强基层连队的工作。

长征开始时的8、9万大军到贵州时只剩下3万来人，平时1个连队100多人这时才几十个人。各军团和师、团、营、连尽管番号依然存在，事实上是空架子。有的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到以前一个师，一个师的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团。面对十倍于我装备优良之敌的围追堵截，许多同志深感单位多，层次多，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严重影响了部队机动，不适应作战需要。

行军路上，三军团10团的部队紧跟在军委纵队和军团部的后面。7连长、8连长、9连长望着庞杂的军委机关和军团后方部组织，又看看自己缺编减员的连队，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7连长长叹一声：“唉，这样怎么打

仗呢？！”

在土城鏖战中，师指挥部受到敌人威胁，为了掩护师部，7 连长把预备队都调上去向敌人制高点冲锋，战斗结束后，7 连长成了光杆连长，5 尺高的汉子从没掉过泪，可看着牺牲的同志却嚎陶大哭……整编命令下达了。9 连长黄荣贤奉命前往团部领取指示，他的连队是全团人员损失最少的连队。老黄到了团部推门进去，见团政委杨勇正在低头看地图。他见老黄进来，站起身对老黄说：“9 连长，告诉你个事，根据上级整编命令，准备调你……”

“我知道，政委，要调谁你点名好了，我没意见……”没等政委说完，黄就抢着说起来。

“你们连编给 7 连一部分，8 连一部分，9 连重新组建，团部新建一个通信班，让你当班长，有意见吗？”

“什么！”杨政委的话一下子把老黄砸懵了，他跳了起来喊着：“让我抬担架（当时犯错误的人抬担架）也没意见，可 9 连不能这样编！”

“你喊什么！”杨政委一声怒喝。

“政委，你知道 9 连是……”话没说完，老黄的两颗泪珠滴了下来。

杨政委何尝不知道：9 连是彭德怀军团长领导平江起义的老底子。自打上井冈山以来，经过 5 次反“围剿”，东拚西杀，9 连的干部有的牺牲了，有的调走了，可连队始终保留着原来的架子，现在把 9 连编散，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啊。政委在沉思，许久没有说话。

老黄呆呆地坐在凳子上，嘴里念叨着：“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时候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全连百十来号人，只有几个蹭破了点皮；在嘉禾县打阻击，被敌人包围了 1 个班，为了这个班，连里的干部光着膀子拚上了刺刀，指导员牺牲了，临死还对我说，‘把咱们连带出去……’；在黄平到乌江的路上，连队吃肥肉喝凉水，有十几个战士拉肚子掉了队，让彭军团长碰上了，把我差点撤了职。他是为了连队不减员。现在把 9 连拆开重编，我想不通，不干了！”

“拆散 9 连，你想不通，不干了，那撤销 4 师，我想不通，也不干了，红军还能打胜仗吗？”随着话音，4 师政委黄克诚推门进来。

黄克诚告诉 9 连长，根据命令，各部队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成四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各缩编成三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张宗逊师长任你们团团长，我也到你们团当政委来。”说到这，黄克诚用手指了指杨勇风趣地说：“杨政委也只好当团政治处主任喽！”

杨勇接着说：“不出两个月，我给你一个连带，回去吧，向新营长张震同志交代一下工作，到团里来报到……”

老黄站起来，敬了个礼走了。

当老黄前往新建的通信班赴任时，见到班里的战士，他一下子明白了。原来 9 个战士都是各连的连长，有工兵连的，辎重连的，一连的侯连长，炮连的刘连长……连他正好 10 个。连长们见他来了，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情绪都很高，侯连长爱开玩笑，谄了几句顺口溜：“精减大整编，连长下到班，连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

过去在湘江战役之后，全军曾几次进行过轻装，但仍不彻底。这次湘西整编，总部决心进一步轻装，笨重物资坚决甩掉。总卫生部有台德国造的爱

克斯光机，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作了极大努力才搞到手，并想方设法于1933年运往中央苏区的。这台机器为治疗红军指战员的伤病曾经建立了不朽功勋。王稼祥遭敌机轰炸臂部受伤，是这部机器为他拍了片子，使医生得以取出弹片。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兴国战斗中受伤，住医院一个多月，因没有电，爱克斯光机发挥不了作用，拍不成片子也就开不了刀。长征前夕，1934年10月9日，周恩来到医院探望陈毅，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把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也重新打开，马上发电拍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医生们都把这台机器当作宝贝，长征以来一直抬着行军，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一直抬到云南扎西。这次，这台机器也在精简之列。总卫生部长贺诚对这台机器感情深厚，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它丢下。毛泽东亲自抓轻装中的思想工作，他来到了贺诚面前，恳切地说：“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爱克斯光机吗？蒋介石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经毛泽东耐心说服，贺诚才派医政局长陈志芳，忍痛把这台机器送到石坎杨家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掩藏起来。

扎西整编时，军委决定抽调红三军团6师政委徐策，干部团政治科长余泽鸿，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另抽红军指战员200余人及留下的伤病员，于2月17日，在离扎西四五十里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后又组成川南游击纵队，人数最多时达一千余人。他们在川南地区积极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

10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迅速脱离滇川敌侧击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向古蔺南部前进，准备东渡赤水河，消灭黔军王家烈主力。16日，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阐述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原因，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毛泽东决心以敌变我变的原则放开包袱大打运动战，找出一条求生之路。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战术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儿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一些红军战士甚至高级指挥员，只想打仗，不想走路，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它的正确性。

第六章四渡赤水

“辞职未遂”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 20 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是，成立了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

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

现在，毛泽东指挥的三万余红军与蒋介石统率的三四十万大军进行的四渡赤水之战已拉开了战幕。

这次战役，敌方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中央红军方面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二次直接较量。第一次是 1931 年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统帅 30 万大军向红军大举进攻，被毛泽东指挥的仅有 3 万人的弱小红军打得大败而归，损兵折将 3 万余人，蒋介石亲自品尝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厉害。

毛蒋第二次对阵

这次四渡赤水之战，蒋介石飞重庆，奔贵阳，自任统帅，亲督三四十万重兵，以又十倍的优势兵力运用第五次“围剿”中获胜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追堵而来。

蒋介石是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的人物。他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视军队如生命。

蒋介石的学习是广泛的，他读过《四书》、《春秋左传》、《尚书》、《易经》、《纲鉴》、《礼记》、学过周、秦诸子的学说和宋明理学，还研究了《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这为他打下了国学的基礎。他很关心时事，爱读报纸，学习过英文、日文、俄文。

蒋介石酷爱军事。他曾东渡扶桑，入振武学校学习，并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先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体会最深的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他认为一国军队如要做到精强和富于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他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的各种著作，他看过《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仑本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巴克尔战术》、《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大演习战况地图》、《世界大战史》、《统率学》等。其中，对《战争论》和《巴克尔战术》《德国人著》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对后一本书尤为重视，看过六遍以上。“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任团长。在三个月时间内，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苏联党政军机关进行考察了解，参加了第三国际的会议，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革命史和党建情况，尤其重视对苏联红军的考察，参观了苏联海军、步兵一一四团和各类军事技术学校。回国后，在建立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他又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指挥作战，对苏联军队的建制和战略战术有相当的了解。

尽管蒋介石留过洋，进过军事学校，熟读兵书战法，讲起军事来头头是道，在军阀混战中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军事韬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在四渡赤水的战场上，能否实现聚歼中央红军的梦想呢？在与毛泽东比军事韬略、比指挥艺术的交锋中能否致胜呢？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东去湘西与北渡长江道上。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

挥，负责对付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

蒋介石对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也重新作了划分：以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蒋介石追剿长征红军，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剿灭红军，又要排除异己。1934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对他的心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这一手是有警惕的。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时，蒋介石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当时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向龙云建议说：“我们只有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力量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对孙渡的这一建议，龙云深为赞赏，他即委任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官，率滇军6个旅，共二万四千人的兵力，出兵滇黔川边，防堵中央红军入滇境。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扎西地区，亲自作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国民党军事当局在2月13日公开宣布：13、14日将在扎西地区与红军“剧战”，“可一鼓荡平”。

13 团激战娄山关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路敌军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命令中央红军神速东返，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军委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指出川黔边为我们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

18日下午二时，红一军团前卫2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故，红2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

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12团和红13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搭浮桥。二郎滩东岸制高点有黔敌两个团把守。红军迅速渡过了一个营，又渡过了后续两个营，这是一个背水阵。红军向敌人发动了冲锋，两团敌人似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19日和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敌人企图在滇东北地区把中央红军“一鼓荡平”的计划落空了。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又一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判断中央红军有“东与贺（龙）、肖（克）谋取联络之趋势”，急令黔军速往松坎一带堵截。为防中央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王家烈急忙从贵阳到遵义坐镇指挥，蒋介石命令确保遵义，薛岳急令留守贵阳的吴奇伟率率59和93两个师速渡乌江，增援黔军，保住遵义，又令周浑元纵队向遵义靠拢，共同阻截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

滇军因与川军发生矛盾，一时无法参加“追剿”。川军潘文华，因怕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未敢集中全力“追剿”。毛泽东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决定把打击方向指向黔军和中央军。

毛泽东指挥战争，总是全局在胸，有一个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长时期的方针，既部署正兵，又部署奇兵，既考虑主攻方向，又考虑牵制方向，既慎重初战，又考虑第二仗、第三仗以致最后一仗的打法。中央红军重返黔北以后，毛泽东决心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变化，他果断地决定：以红五军团37团在北面良村、双龙场一带阻止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

红军各部队分头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红三军团在习水县回龙场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做动员报告，他说，敌人就象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这次战役、以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红五军团则以红37团为后卫。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来到37团，传达军委要他们停止前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北面来敌的指示。军委指示他们以运动防御的手段，把敌人顶住三天或更多的时间。

红37团巧施妙计，声东击西，诱敌牵敌，逐步把敌人引向温水方向，待敌人获知红军仅有一个团兵力，大呼“上当”时，红37团已经把川敌三个旅九个团的兵力牵制了六天之久，有力地保证了主力红军再度夺取桐梓、娄山关、遵义的胜利。

24日晚，红1军团1师1团抵达桐梓县城北郊，连夜攻城，战斗不到2小时，守敌两个连即弃城向松坎方向逃窜，红1团攻占桐梓，切断了黔军的南北联系。

当晚 24 时，毛泽东亲自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下达命令：速令 13 团务必于今日（2 月 25 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

彭德怀迅速向 13 团团长彭雪枫传达毛泽东的命令，要求他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彭雪枫亲自对部队进行简短有力的动员，随即率部冒着毛毛细雨向娄山关进发。

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门户还是娄山关。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是囊中之物。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脉中段，海拔 1400 多米，关口 1280 米。中间公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地势险要，周围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誉，娄山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王家烈很重视娄山关的防守。派其精锐部队第 6、第 15 等团防守，由其第一旅旅长杜肇华亲自指挥，杜的指挥部设在娄山关以南山脚下的黑神庙。

夺取娄山关，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着。这一仗，关系到红军能否歼灭黔军，再占遵义，也关系到能否歼灭援敌中央军。

当红 13 团先头部队 3 营在特派员欧致富的带领下，跑步来到娄山关脚下时，侦察员前来报告：“前方发现敌人！”

情况的确严重了，现在准备打遭遇战。3 营长立即命令部队：“不准说话，跑步前进！各连准备孤胆作战！”口令一传，全军马上肃静下来，奔袭前进。大约拐了十几个弯后，关口隐约可见，关左侧的点金山，清晰在目。一队队敌兵，在督战队驱赶下，跑步下关，发现红军，马上散开两边，抢构工事。

这时，3 营长命令部队暂停前进。

欧致富与营长陈新民和黄教导员，紧贴在一块石头上，想仔细观察地形。视野里，换个角度就是另一个形态，一会儿，尚能看见小路隐没于石林草丛之间；一会儿，就只见石头不见路了。进攻线路确实难选择。陈营长一急，干脆站起身，举起望远镜观望。忽听得他喊一声：“前面有敌人！”随着“砰”一声响，他已应声倒地，望远镜甩到一边，话也不能说了。欧致富急忙叫来卫生员，将他抢救下去。教导员流着眼泪，向他请求：“特派员，我代理营长，带部队上去，不夺下娄山关，不回头！”

欧致富苦苦思索，对教导员说：“好吧！你跟 9 连先上，叫廖连长来一下！”不一会儿，9 连长廖九凤挽着袖子下来，特派员只交代他十二个字：单兵跃进，班组收拢，勇猛攻击。教导员明确任务后，攻击就这样开始了。

9 连上了两个弯，还未跟敌人接上火，突然，关口上、点金山上，机枪声大作，子弹打在周围石头上，直冒白烟；9 连正面两侧的敌人，也钻出石缝、草丛，胡乱射击。机枪连黄连长来不及组织火力，急得直叫。不一会儿，9 连廖连长气急败坏地跑回来，要求改变进攻线路。他含着眼泪说：“教导员牺牲了！还伤了几个同志。”欧致富一听，脑子嗡地一响，要炸似的。关还没夺到手，3 营主官一伤一亡！原来，突击队要通过一条不长的石头“胡同”，前面有一块球场大的开阔地。廖连长已带一个组突了过去，随即“胡同”就被敌人机枪封锁。教导员带一个组想跟上去，刚到口子就被打倒了。廖连长怕后面部队不了解情况，遭更大牺牲，便冒着弹雨折回，将情况报告。于是，欧致富同意 9 连改变进攻线路，掩护部队再展开攻击。

左侧，9 连刚翻过山腰背，就响起密集枪声。这显然与增援之敌遭遇上了。8 连连长带上两个排，前去支援，专对付增援之敌。这时，关口正面之

敌，由军官督战，呼呼跑下，企图与我军迎战。我六挺重机枪同时开火，打得敌人五下奔逃，敌人三个机枪火力点，刚刚开火，即被打哑了。敌军官拼命呼叫火力支援，但机枪已难复活了。“双枪兵”心一虚，就都调过头跑上关去。于是，7连分小股全部突过“胡同”口，逼近关隘，待9连攻击点金山得手后，一举攻关。

十几分钟后，点金山上，已响起了枪声，9连侧攻成功。不一会儿，点金山上，已飘起了红旗。机枪连配合默契，点金山上刚响枪，即将枪口全调下关口，上下梳着打，打得敌人根本无还手之力。关上修工事之敌，大概预感到我军强攻将开始，就什么也不顾、连滚带爬地逃过沟。9连刚拿下主峰，便马不停蹄，居高临下往关口压去。

片刻，9连传来报告：娄山关口已夺下，请求指示。欧致富上得关口，刚令9连回去加强防守，敌人就反扑上来了。

点金山下、关口前，黑鸦鸦的人头，向我蠕动。敌人采用的战术，实属罕见：先上的不急于攻击，却拼命的挖坑（单兵掩体）；后上的到前面了，又接着挖坑。

红军几百勇士，跃下山关，端起白晃晃刺刀，杀入敌阵。刺刀捅，枪托打，子弹飞，逐坑扫去。“双枪兵”哪见过这场面，早已吓得丧魂落魄，后面的扭头跑，前面的吓瘫了，连缴枪动作也不会了。只顾埋头打哆嗦，等着当俘虏。

把敌人反击下去以后，欧致富便派通讯员向彭雪枫团长及军团报告：黄昏前，已夺下娄山关。但兵力嫌薄，难以追击敌人，现正对峙中。通讯员走后，欧致富随即带两挺重机枪上点金山。还没上到山顶，敌人的第二次反扑又上来了。王家烈军阀部队这种“顽强”，过去没有过，欧致富不禁诧异起来，就蹲在石头旁，观察其中奥妙。这时，只见一群群敌人，只埋头往上拱。等前面的被撩倒了，才愣了一下，回头看看山下，便像呆鹅一样站住不动了。便成了红军的活靶，也不敢往回跑。还闹不清怎么回事，正好，一个漏“点名”的家伙，送上门来。一问，原来敌旅长在向督战后退者枪毙，上来后回去的也要枪毙！

原来如此。欧致富叫机枪组快上山顶，架好枪先对付敌督战队，借此瓦解敌军。上了山顶，四周景物一览无余。关前几百米内的起伏地段，一群敌兵在抢构工事；山脚下小洼地里，一个带大圆帽的军官，在指手划脚，他的前面，是一队军官，端着清一色冲锋枪，还在不断往山腰上扫射。

欧致富叫过几名神枪手，配合机枪，直瞄准那家伙。然后，红军集体喊话：

“白军兄弟们，不要为你们长官卖命了！你们回头看看，他们怎样对待你们！”

这一喊，半山腰上的敌人，个个都回头看他们的督战队，整个阵地，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但下面督战队一打起枪，敌兵又不得不扭过头，向上面乱放枪。

“打！”这时，机枪、步枪同时开火，600—700米外的敌人督战长官，应声倒地，那威风凛凛的督战队，也倒下一排。

红军再一次集体喊话：

“白军兄弟们，你们的长官我们替你们打死了，快回去过烟瘾吧！”这一喊，比下令还整齐，半山腰的敌人，呼的一声，潮水般的往回退了。

天渐渐黑下来，枪声也随之疏落。

这时，彭雪枫团长带着2营支援上来了。他说：“打得好！军委、军团部通报表扬我们了！”原来，当面之敌不是一个团，而是4个团！他塞给欧致富一个热乎乎的饭盒，命令他们吃饭。连队的战士们，2营也包送了，一人一份。这时，大家才真感到饥肠咕咕叫。整个3营，整整一天粒米还未进肚呢。

当夜无事。天一亮，雾还未散尽，一场恶战又开始了。敌人下了血本。进攻队形，简直是搞分列式：一群兵后面，一支督战队用枪顶着屁股；接着又一群兵，一支督战队……。机枪先开火了，一下把敌人最后的梯队督战官们，打得七仰八翻。接着，步枪也开火了，把督战队一片一片地撩倒。这一打，整个敌阵乱成一窝蜂。但都左右散开，夺路逃跑，没敢往后退。

彭团长看了这场面，连声叫好。他又以商量口吻对欧致富说：“出击一下吧？”欧致富说，你来了你下令，我想去冲锋。他一声出击令下，两个营的战士呼呼地往下冲。在阵地前沿，一下消灭敌人好几百。把敌人反击下去后，战士们从容地回到阵地上。

这时，红12团团长沙嵩带着全团部队，前来接防。

欧致富莫名其妙，3营伤亡并不大，何苦换防？彭团长笑着说：“这是真的。但不是撤下去休息，而是去爬山、跑路，兜敌人屁股！谁叫13团跑路、爬山出名呢？这是彭军团长点名要的。”

出奇兵二占遵义

红军于26日占领娄山关之后，军委指示：估计遵义较空虚，薛岳的增援部队今日以前不能到达遵义。一、三军团由彭、杨指挥，应趁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增援遵义的敌军。

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遵义方向迅猛推进。在追击黔军南逃的追击战中，三军团的11团跑在最前面。他们在距遵义30里的石字铺歼灭了王家烈部署在这里的1个警戒营。

为迅速攻克遵义老城，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与红11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团政治处主任王平一起到阵地前沿侦察敌情，部署夜间战斗。正在观察时，敌人的冷枪击中了邓萍的头部，邓萍不幸牺牲。

28日凌晨，三军团开始对遵义老城发起总攻，11团进攻东门，12团进攻北门，13团绕道攻西门，经两小时战斗，于清晨4时将老城攻下。

此时，敌第1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率所属59师和93师逼近遵义，企图从红花岗方向攻击前进，夺回遵义城。

红军早已作好了歼灭援敌的部署：以红三军团10团、13团控制遵义附近的老鸦山、红花岗等制高点；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12团迂回包围敌人；以红一军团的3团和红三军团的11团分别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敌，将敌引到遵义城外，并拖住敌人。

红11团坚守红花岗，敌几个团的轮番猛攻都被击退，于是又转向进攻与红花岗相连的老鸦山主峰。敌韩汉英师对老鸦山10团阵地实施集团冲锋，一次比一次猛烈，并出动飞机狂轰烂炸，最后以优势兵力占领了老鸦山主峰。

敌人占据老鸦山主峰居高临下，不仅对11团占领的红花岗构成威胁，而且威胁着我驻城内和城东门外的首脑机关的安全。彭德怀令军委干部团从北向南进攻，红11团从左侧仰攻，配合红10团进行反击。经过激烈拼搏，红军终于又夺回了老鸦山主峰。

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10团当时有2500多人，善于打硬仗。指战员们个个都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战斗中英勇顽强，一往无前。趁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部队勇猛追击。

10团政委黄克诚自从在苗区木楼上被火烧毁了眼镜之后，就没有眼镜戴了，团长张宗逊看他没有眼镜，跑山路很困难，就让黄克诚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第10团主力向溃退之敌猛追而去。追了一阵子，敌人发现红军兵力并不很大，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又很猛烈，我追击部队顶不住，张宗逊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英勇牺牲。

这时黄克诚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山头阵地上。当他发现溃退的敌军突然像潮水般又压过来时，情知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军仍然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险！恰在这时，陈赓率干部团赶到了，接替了他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告诉黄克诚一个好消息：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军的后路，敌人很快将被打垮。不大一会儿，敌军的阵脚大乱，纷纷溃退。黄克诚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队。在山底

下见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他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黄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黄克诚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需动用大部队。

下午五时许，红军发动总攻。红12团、11团的迂回部队逼近了敌人的背后，红一、三军团同时向敌展开猛攻，锐不可当，敌人“兵败如山倒”、闻风而逃。

当天下午二时，吴奇伟察觉红军正迂回其忠庄铺指挥所，战局非常不利，心情十分焦虑。他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作为杂牌归正的中央军将领，他的处境是尴尬的。

无论是战争的角逐还是宦海的沉浮，都使他尝受了足够的艰辛。他出身自贫苦农家，在店铺里打过杂，受人资助才上了中学，以后进了保定军校。北伐时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一个团里任中校参谋，曾参加汀泗桥之役，不久即提升团长。那时他年少气盛，作战颇为勇猛，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曾经腿部受伤。南昌起义时，他驻防九江沙河镇，因感张发奎提拔之恩，遂稳住沙河，站在了反共阵营。不久又提拔为师长。从此他就卷进了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纷争里。他与张发奎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曾企图夺取广东，结果为广东陈济棠所败，损失惨重，将三个师合成了一个师，他不得不再当团长；后来他们又联合李宗仁、白崇禧进兵湖南，结果又大败，只剩下不到两个团。这都使他吃够了苦头。蒋介石势力的膨胀，使他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事实上，他在1928年第四军失利后，就第一次投降了，无奈那一次也不顺利。蒋介石先是把第四军降为师，把他这个师长降为旅长，以后又命令他这个师从宜昌乘船东下，企图在路经武汉时由嫡系部队予以缴械。幸亏消息走漏，才免于难。他由此脱离了蒋介石，又投向了张发奎。但蒋介石并不就此甘心，1931年，吴奇伟率部驻防柳州，蒋又以开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为名，诱使吴奇伟离开广西到湖南境内，密令何键解决。而这时的吴奇伟对于纵横捭阖之术已经是颇有经验的人了。他派了一个能舌善辩之士，至何键处晓以两败俱伤之害，此事竟一举成功。何键不仅未加害于他，反而赠他一万元“送行”。这是吴奇伟在个人奋斗史上的一件突出成就。然而，成就是成就，没有有力的主子作为依靠还是不行，于是他就决定再次投蒋。这次投蒋，立时得到五万元的军费，第四师恢复为第四军，他正式当了军长，而其代价则是全力投入剿共战争。

在这次战役中，他的指挥是卖力的，他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骤然来临的失败，令他难以接受，当得知红军包抄向他的指挥部时，他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即与王家烈商量，决定撤退。

临行前又忽然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妥善，于是就拿起耳机给薛岳打了一个电话。薛岳用粗鲁而严厉的声音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部队可以收缩一下，但决不能退过乌江南岸。

吴奇伟口中唯唯，却悻悻然放下电话，脸色异常难看。

他一路小跑上了汽车，向着乌江渡口急驰而去。

当他来到距乌江渡十五里的刀靶水时，撤退的部队与伙食担子搅在一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时，在部队后尾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衔尾而来的红军已经追上来了。部队顿时炸了营，人人夺路而逃，互相践踏，已经无法掌握。吴奇伟的汽车这时又正巧抛了锚，他只好下了汽车，由卫士们搀着在人丛里抢路逃命。

不知怎地，他老是想起在江西苏区 59 师被歼的可怕的一幕。那时几个红军的青年战士嗷嗷叫着在后面追他，几乎使他当了战俘。他越想这幅情景，就越是难以举步。幸亏几个卫士臂力过人，紧紧地挟着他，才勉强来到乌江渡口。那里有一条长长的浮桥搭在江面上，正是他们来时搭设的。只要过了这座桥，一切都会变得安全。刚才拼出老命寻求的不就是这个目标吗？可是，当吴奇伟面临滚滚的江水，看到这条到达安全之路的浮桥时，却颓然坐在地上哭起来了。弄得卫士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参谋走了上来，忙问：

“司令官，你怎么不走了哇？”

他哀伤地说：“好，我就死在这里吧！”

参谋和卫士挟着吴奇伟向乌江渡逃跑，逃过乌江后，见红军已逼近江边，害怕红军神速地占领浮桥后南渡乌江继续猛追，吴奇伟便命斩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被急流冲断，正在浮桥上的蒋军官兵，一齐栽入乌江。被丢在乌江北岸的 1800 余人，乖乖的缴枪当了俘虏。吴奇伟的两师兵马大部被歼。

3 月 1 日，遵义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战场广大，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红军 3 万余众，在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连续作战，猛打猛追，歼灭了吴奇伟纵队两个先遣师，打垮王家烈 8 个团，打死打伤敌 1000 多人，俘敌 7000 多人，缴枪 4000 多支。

从战术上看，这是一场中等规模胜利，但是对于湘江大败甚至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红军来说，他们太需要胜利来证实自己了。所以，从战略上看，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使红军官兵重新找回了胜利的感觉，士气和信心大增，毛泽东的地位得以稳固。

重入遵义城后，张闻天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所以，这次红军一到遵义，张闻天立即提议：在红军中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提议下，3 月 4 日，中央军委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显然，这一新的建置和任命，是张闻天要把前方机动灵活的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毛泽东。

为纪念遵义大捷，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了一首词。除了爱情的波澜，毛泽东大多只在心情畅快时才会写诗填词。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召集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在遵义老城三中礼堂，举行了祝捷大会。

红军官兵无不兴高采烈。入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邀请地方工作部的同志一起逛街，一群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上了街，刘英也是其中的一个。

邓小平是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在乎。长征这一路上，很是艰苦，只

要同小平在一起，就来劲。他态度随和，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高。遵义街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景象。正走着，迎面遇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跟大家点头打招呼。招呼刘英，刘英就过街走到张闻天跟前。他说：“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刘英说：“好啊！”就跟他到了中央队的住地。

张闻天招呼刘英进屋坐下。他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煮一点醪糟给刘英吃。

他们一向谈话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刘英预感到张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张闻天终于开口了，他表示他们互相都了解，他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表达得比较含蓄。当时刘英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她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两个字。她当时很生硬地直截了当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这么一说，这个话题只好搁到一边去了。两人谈到战争、工作，气氛又恢复了常态。

刘英的话虽然说得很绝，但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敬爱的感情确实已向恋爱转化。她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这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凯丰爱人）廖似光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博古爱人）刘群先说得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笑话，她说得很实在。刘英认准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她不能选择后者。

而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军事顾问职权的李德，仍然是郁郁不乐，这也难怪，在他大权独揽时，红军一直处于被动局面，而他一下台，红军就打了大胜仗。

前翻译伍修权二进遵义时，去他屋里，见他桌上摆着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他自己刚刚敲了吃的，伍修权也就随便敲了一个吃起来。谁知道李德正肚子里有气无处发泄，突然拿伍出气道：“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后来伍被调到三军团工作，有一回司令部得到一些炼乳、咖啡和香烟等，杨尚昆叫伍送些给李德，伍真的送了些给他，他一见又说伍真是个好心人，没有忘了他；他自己动辄训人，好象忘了。

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32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2月27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抬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安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

13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宪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

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起来，其中包括钟赤兵和孔宪权。钟赤兵听说要他离开部队就地寄养，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来劝说他都不听，并且拔出手枪来要拼命。这样，只好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随部队走。由于他年轻，身体强壮，体力恢复得很快。过了不久，他就可以骑马了，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跳跃自如。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部队用担架抬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 20 个月。

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必须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全程。孔仅是营级军官。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十至十五块银元。

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有好感。他迷信，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把财主和他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别忘了，”他们警告说，“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

毛泽东辞职事件

蒋介石不甘心在遵义的大败，决定亲自上阵，与毛泽东一决高低，彻底歼灭红军。1935年3月2日，他飞往重庆“督师”。第二天，他发布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蒋介石这个手令一出，立即束缚了其下属各级指挥官的手脚，把他下属的高级指挥官都变成了传令官。

蒋介石这个手令所体现的指挥方法与指挥作风和毛泽东的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是，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具体道路由前线指挥员决定，给予机动处置的权利，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

蒋介石到重庆后，立即了解红军情况，他判断红军将向东面转进，“其目的仍在乌江东岸，图与肖（克）贺（龙）合股”，即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他在兵力部署上仍然是四面防堵。

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

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命令各县严密构筑碉堡工事，构成江西一样的堡垒群。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这样，前敌司令部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

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另一方面又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于是他于3月9日发布命令，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敌情瞬息万变，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 20 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

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

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毛泽东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马灯又到周恩来那里，叫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

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掬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 20 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几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于是，在 3 月 11 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3 月 12 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取代了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

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首长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成为五常委之首，在党内、军内居领袖地位——虽说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

因此，毛泽东在红军、在中共的领袖地位确立的日子，应该是 1935 年 3 月 12 日。

兵锋直逼贵阳城

3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由于敌人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使红军难寻战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4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力量打击位于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15日晨，红军以一、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队，以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为左翼队，对鲁班场之敌发动了进攻。

当时从兵力上看，红军略占优势，从战场地形上看，对敌人有利。所以战斗异常激烈，也极为残酷。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红军牺牲480人，伤1000人，双方打成对峙。

在鲁班场战斗无进展，援敌又纷纷逼近的情况下，若继续战斗，极难很快解决敌人，一旦敌两个师援军赶到，我将受敌重兵东西夹击，后果不堪设想。军委权衡战局，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鲁班场北和东北之茅台、仁怀转移。

红军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3月16日进占茅台。茅台，位于赤水河东岸，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三四千居民、是个又脏又乱的小市镇，以出产茅台酒而闻名中外。这里有三家较大的酒厂和许多家庭酿酒作坊。茅台酒名不虚传，战士们在茅台镇外就闻到了扑鼻的醇香。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红军没收了土豪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下一些外，都分给了贫苦老百姓。会喝酒的指战员，大部品尝了茅台酒的美味、不会喝的也装上一壶，作舒筋活血之用。一些后到的部队，没有打到土豪，虽在资本家酒厂大库房旁休息，真想进去弄点茅台酒尝尝，但指战员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也没有去品尝。

在茅台渡口，原有一座铁索浮桥，被敌人破坏了。红军工兵部队迅速修好了这座浮桥，并在离茅台渡口不远的珠沙堡和观音寺渡口架设了两座浮桥。

3月16日18时，军委颁发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部队开始有秩序地渡河。中央领导来到了浮桥上。他们边走边谈，毛泽东赞扬说：“工兵连有办法。”又说：“好，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16日晚至17日中午，中央红军大摇大摆地、从从容容地渡过赤水河，再次来到川南。这次渡河是不怕敌人发现的，而敌人的飞机果然发现了，他们飞来侦察骚扰，并如获至宝地迅速向蒋介石报告红军西渡赤水河的情报。

三渡赤水可是一次非常奇妙的全军佯动。

军委首长走过浮桥后，进入一个小树林，在这里开了一个会。他们摊开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令刘伯承指挥工兵连，留一部分人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另派一部分人向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赶去检修浮桥。

红军西渡赤水河，进入古蔺县境后，立即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伪装主力西进，公开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给国民党的飞机看，以迷惑蒋介石的神经。而以大部队在附近山沟森林内隐蔽集结，待机

行动。

这一次，蒋介石又中计了。3月16日至18日，敌机把红军三渡赤水前后的情况向蒋介石连续作了报告，蒋介石据此判断红军必然西进“无疑”，他急调重兵向川南追击，妄图把红军聚歼于赤水河西的古蔺地区。

蒋介石急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严令各部加紧修筑碉堡工事，紧密封锁。3月20日晚蒋颁发电令给部属打气，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红军的全军佯动奏效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川南古蔺来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红军的行动；他的各路大军被调到川南、黔西北来了，并加强了长江和横江防线的防守，以阻截红军北渡长江。

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川南奔集而来，毛泽东却挥师四渡赤水，再向黔北杀去，红军于20日晚和21日上午夺取太平渡、林滩两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

当天17时，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的指示，指出，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是不怕敌人知道的；四渡赤水是秘密的，是不让敌人知道的。红军这次东渡，组织工作非常严密细致，真正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红军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与奔向川南的敌军相对而行。红军已到达遵义、仁怀中间地区，而敌人的辐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

红军已全部东渡赤水，进入黔北了，薛岳还在其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红军东渡赤水后已经三四天了，25日，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将红军歼灭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26日，薛岳还在判断红军从古蔺“续行西窜成份居多。”这充分说明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动是非常秘密、神速与奇妙的。

红军重返黔北后，毛泽东决定挥师南下，南渡乌江。3月24日，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伪装为红军主力，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

红九军团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的南下。

红九军团分兵诱敌，是军委和毛泽东派出的一支战略奇兵，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总是猜不着毛泽东规划的红军进军方向和路线。在红军主力急速南下，向乌江急进，即将到达沙土的时候，他判断红军在他的遵仁封锁线附近”，将向西南方向前进，蒋介石向黔西调兵，红军却向乌江前进。

一天，红军行军中途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前卫2师。路旁一

棵大树底下，暂时做了作战办公室，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毛泽东亲自向前卫2师首长面授机宜，说明战略意图，并在云贵川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毛泽东把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军意图说得明白透彻。

3月29日，红一军团先遣团第1师3团夺取了乌江渡口，消灭守敌一个连，在行进中又消灭援敌一个营的大部。红军主力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岸南渡乌江，进到了息烽西北。这样，红军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南渡乌江后，没有遇到强有力抵抗，即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于4月4日占领扎佐，逼近贵阳，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并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又派出部分兵力东进，佯攻瓮安、黄平，摆出要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示形”于东，迷惑敌人。

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调出了滇军，就为红军下面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扫除了障碍。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调动滇军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蒋介石的行辕设在贵阳。贵阳兵力薄弱，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军，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

飘忽无定诈裒雄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兵锋直逼贵阳。蒋介石企图把红军聚歼于黔北地区，现在毛泽东却指挥红军杀到他的统帅部门口来了。当时贵阳守军不足两个团，兵力薄弱，附近无兵可调，大军被甩在乌江北岸。蒋介石胆颤心惊，手忙脚乱。他深知毛泽东用兵奇妙，担心恶运降临。他不懂得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遵义失败后，蒋介石坐立不安，从汉口飞往重庆，直接指挥三省围堵红军战事。红军三渡赤水时，蒋介石认为，红军战略未定，徘徊不定，“歼灭红军于川、黔、滇间胜利有望”。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当时蒋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的决策是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他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以为红军再无回枪之力。但没有几天，薛岳转据周浑元来电：该军在仁怀以南之鲁班场、枫香坝附近防线被红军袭击，打鼓新场也发现红军。蒋还以为这是红军的战术行动。忽报在4月1日左右红军先头在安底坝将江防部队击破，巧渡乌江。红军这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战略行动，使蒋介石惊惶失措，手忙脚乱。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蒋介石对薛岳还算宽厚的，他竭力使人才为己所用。遵义失败后，薛岳在蒋介石的大将陈诚庇护下，没有受到蒋介石的惩处。蒋约在3月中旬，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薛岳的部下吴奇伟，勉吴“雪遵义失败之耻”，指示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极慎重。陈诚，这时正红得发紫。由于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使陈诚在他的权力奋斗史上，跨上了有决定意义的阶梯。他除了任预备兵团总司令，对中央苏区继续清剿外，还任命为陆军整理处长，负有整编全国陆军的重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是参谋总长了。

在国民党军人中，陈诚的精明强干，善观风色，善抓机会，善抓兵权、人权、财权，以及手段的辛辣果决，发展上的一帆风顺，都是令人景慕的。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区队长，某天晚间访友，归来时已近拂晓，不便再睡，遂挑灯夜读《三民主义》，正好为查夜蒋介石遇见，蒋立即大加奖饰，予以提升，这就成为他一生幸运的起点。也是事有凑巧，天假其便，国共分裂前夕，陈诚在21师当团长，该师师长严重站在著名的革命派邓演达一边，他唯恐蒋介石借口解散该师，遂将师长让陈诚代理。陈诚感激得五体投地，他含着眼泪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都被看作共产党，谁还敢于！”还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有法子干的！”这位“没有法子干的”师长，不久就投入蒋氏怀抱，屡建功勋，不到一年就升任了南京警备司令，一举跃居中将。此后，他又参与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大会战，率部抢先进入济南、郑州，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宠信，被提升为十八

军军长。从此他就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一名红人了。

可是，当他参与了剿共战争之后就不那么顺利了。1933 的第四次“围剿”前，他的十八军由两个师扩大为六个师，共八九万人。谁知刚刚开进，52、59 两个师就连续被歼，一个师长被打死了，一个师长被活捉了。这时作为总指挥，他坚持进攻不退，结果他赖以起家的 11 师也大部被歼，师长肖乾也被打伤。陈诚在接到这个噩耗时，几乎昏倒在地。战后他觉得无颜见人，径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这时国民党内部舆论哗然，对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壮派军人表现了极大地不敬。竟有人提出要撤消他的本兼各职，对他的十八军进行改编。但是，蒋介石环顾左右将领，或者优柔寡断，或者暮气沉沉，没有可与共产党较量者，思之再三，还是把这副剿共重担放在陈诚肩上。陈诚果然不负重托，在五次“围剿”中掏出了吃奶的力气，行军时穿草鞋，扎大皮带，吃大锅饭，背干粮袋，都是带着头干。五次“围剿”的成功，怎能不使这位少壮派以英雄自许，以进步军人自命，夸耀于人呢！

从蒋介石对陈诚的作派上，可见蒋在用人上的手腕。然而此时，空有大将在，兵卒却无多。红军将逼近，徒呼可奈何！蒋介石表面镇静，内心紧张。4 月 2 日，他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讨论红军行动的企图及应取的对策。他判断红军行动的企图可能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二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两者中间以后者可能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由于贵阳兵力很少，只有郭思演的 99 师所辖四个团兵力，但这四个团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为保证贵阳安全，蒋介石当即决定，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因当时滇军离贵阳较近，蒋介石从 3 月 31 日开始每天发“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的电报给孙渡，命令他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以保卫清镇机场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速率所部前来贵阳，保卫他的安全。

蒋介石紧急加强贵阳的防务。他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在三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

王天锡是蒋介石到贵阳后，破格由市警察局长提拔为警备司令的。蒋为笼络人心，对他表示十分亲热，除向他了解贵州的军政、社会情况外，并问其已去世的长兄（王天培）有无儿女。王把兄长死后的景况说了以后，他很关心对王天锡说，“好！只要有人就好。”他又说：“贵阳你很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们都是熟人，不要拘束。你可以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当时王天锡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麻醉，也就跟着他一道走了。

此时危急时刻，讲明了修碉堡任务的会后，蒋介石问王天锡：“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王天锡拍胸说：“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蒋说：“不能草率罗！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王天锡说：“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蒋点头。当日，王天锡强迫贵阳市民全力以赴，利用附近寺庙的砖、石、木板等，第二天午夜即将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去向蒋介石复命。

次日黎明，蒋与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亲到城上走了一遍，连声赞好。

同时，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蒋每当军情变化时总要表示其临危不惧以示其大将风度，蒋的侍从们只好写条子交宋美龄请她规劝。

蒋介石并不怕死，他只是感到紧张而已。北伐至武昌，正当前线战况最激时，蒋介石忽然约第7军军长李宗仁一道赴城廓视察，李宗仁因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上感到畏葸胆怯。他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他们左右簌簌横飞，他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的确，蒋介石的胆量许多人有目共睹。

巡查转来后，蒋把王天锡带到他的办公室，又极力给他灌了一阵“米汤”。正在谈话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帽子也忘却取下了。他说：“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王问道：“水田坑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王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30华里。”蒋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想了一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王正在计算里程时，陈诚也跑进来了，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25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蒋介石默不作答，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住王，问：“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王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60多里了。”蒋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王出了蒋的办公室后，心里在想，老蒋准备逃跑了。

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是夜蒋泻肚子，遗屎床上，宋美龄伤风发烧。次晨一早侍从副官蒋孝镇挨蒋大骂，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对他说：“你受惊了怪房子。”

红军加紧“示形”活动。军委命令红一军团2师6团伪装红军主力东进，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命令红三军团佯攻龙里，以“催促”蒋介石继续调动滇军东进。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蒋介石通过一个个手令，终于把滇军调到贵阳来了。。

4月6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3、4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薛岳马上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长去见蒋介石。当时这些所谓“勤王之师”、“救驾部队”的来到，令蒋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对该纵队各旅长均有犒赏。

孙渡在黔北围剿红军，吃尽了苦头。因为蒋的指挥，多凭飞机报告，而飞机又每每为红军所愚弄，报告多不确实。只要红军方面略施一点小小的佯动，就可调动蒋军整个阵营动荡不已。

红军渡过乌江后，孙部奉令火速赶赴贵阳。3纵队的第7旅有一天未及赶到指定地点即行宿营时，蒋知道后，曾亲自打电话问该旅旅长龚顺壁为什么不按命令开到指定地点。要龚旅长火速完成此项任务。龚对浙江话听不清，老是反问，弄得蒋大发脾气。

孙渡这次路过黔西，会见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一见孙即眉飞色舞地说：“你老哥看共军这回渡过乌江南岸，究竟是什么意思？”跟着，他又迫不及

待地自己回答：“我看硬是要将老师的军哟！你说是不是？”态度表现得十分高兴。当时蒋介石派在该部的“督剿专员”就在王的身旁，口里虽未说什么，但其表情显有不悦之色，难保他不将王的所言所行转报蒋介石。

孙渡率部刚到清镇，蒋介石立即用汽车把他接来贵阳，并立即召见，嘉奖滇军行动迅速，作战勇敢，犒赏孙渡纵队部二万元，其到贵阳的各旅各一万元。

蒋介石问了孙一些家庭状况及平素喜欢看些什么书等生活细节问题。最后，还对孙说川军在土城“打得很好”，说了不少称许之语。孙见蒋后，在贵阳与前第43军的师长张廷光（贵州安顺人，当时在薛岳部任参议）相晤。张对孙说：“你们到了贵阳，这里的人心才算安定，尤其是委员长对你们云南的部队印象最好。他看到你们的部队能够照他的命令按期赶到，不禁高兴得以拳击桌说：“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孙也笑向张说：“我见过委员长，他盛赞川军打得不错，现在你又说他极道我们滇军之好，我觉得这种间接的鼓舞办法，比之直接嘉奖还要高明得多。”

这时，蒋介石获悉红军已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前进的消息，他才松了一口气，几天的愁容上才露出了喜色。他判断红军“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他令刚到贵阳的孙渡立即率部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孙渡乘车赴龙里经过黄泥哨附近谷脚时，被红军游击队在山上伏击，打了一阵，几乎丧命；由于蒋介石赏他2万元、升中将见疑于龙云，几乎被龙撤差。

蒋介石还命令吴奇伟纵队向红军尾追，湘军到黔东、桂军到平越线防堵。

兵不厌诈。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于4月7日晚给各军团发出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然后长驱西进，直插云南。8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南移，红三军团以一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蒋介石听到炮声隆隆，立即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并亲自派飞机侦察轰炸。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30里宽的地段上迅速南移，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过湘黔公路，红军就甩开了敌人，象长了翅膀似地每天以120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是一场出色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不断地调动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奇谋迭出，精彩纷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国民党中颇具战略眼光的高级将领评论说，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战略上的“一大转变”，从此，“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倘佯，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又说：红军盘旋于川黔边境，“大有徘徊不去之势，其用意是在吸引国军及滇、川、黔军主力渡过乌江北岸，而后乘机乘隙，窜渡乌江，径扑贵阳”；“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蒋介石统一贵州

四渡赤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进行的第二次直接的军事较量，在这次较量中，蒋介石再次失败。虽然蒋介石以他卓越的战略才能和雄厚的实力，给朱毛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他还没有真正赢过毛泽东，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他不能把毛消灭，便给自己留下了一颗克星。

蒋介石的生活充满了传奇，可是他的事业却缺乏传奇。他没有经历由见习排长逐级升至将军的职业军事生涯，也没有经历军队由数千至数万至数十万的艰辛积累史。他是政治军事上的冒险家和暴发户。

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一个团或是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战胜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即是他成功的例证。

红军西逸，蒋介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因利乘便，解决了贵州地方势力。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使这个贫穷偏僻的山国，处在九级风暴的震撼之中。处在这个冲击中心的，自然是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这是一位无论智力、勇气都在水平线以上的将军。他体貌魁伟，举止粗犷有力，使人一见颇生敬畏之心。

他生于黔北桐梓，自幼就熟读圣贤之书，长大了还教过几天私塾，他自然可以成为读书人，但是，“大丈夫”生于乱世，当投笔从戎，他同周西城等几个桐梓人结为至交，开始耍枪杆子。那是武运亨通的年代，等周西城升为旅长，就提王家烈当了营长，周西城当了师长，就提王家烈当了旅长。这就是贵州军阀中的桐梓系。为什么周西城这样重视他呢？就因为王家烈颇有些胆略，而且善于出谋划策。

周西城被蒋介石暗杀后，王家烈接管了遗下的势力，继任贵州省主席兼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所部在西南四省军阀中力量比较薄弱，虽号称五个师，其中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三个师均割据一方，名义上归第二十五军，实际上王指挥不了。王所能掌握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第一、二两师十多个团。

虽遥在西南，王家烈也意识到蒋氏统一天下的计划对他的威胁，为了自保，他暗中与蒋氏宿敌新桂系军阀李、白集团签下了秘密合作协议，这协议被人向蒋告发，令他心悸不安。

搞垮王家烈，纳贵州于中央势力范围内，是蒋介石布置围追红军的时候就便收拾川、滇、黔的计谋之一。在贵州地区围剿红军的战役过程中，在他的设计下，中央军已成功地使当时黔军非王嫡系的各师完全脱离王的指挥，薛岳部吞并了侯之担师。犹国才的吴剑平师得力于龙云的支援，蒋在珍师得到刘湘的支援，都保存了番号。削平枝节后，蒋介石向核心下手。他命令何、柏两师并入中央建制，给以第102、第103师的番号，将14个团缩为6个团，由南京军政部直接发饷。

蒋介石并不性急，事情分步走总让人觉得缓和易于接受些，同时也会显得理由充足。第一步，他决定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3月15日，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由黔

西赶赴贵州，让他的代表李仲公对王家烈征询意见，王家烈回答说：“政治非我所长，我专搞军事。”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即明令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兼职，另派吴忠信接替。同时，发表王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蒋介石任用吴忠信是有考虑的。王家烈与桂系军阀长期勾结，蒋去王当然会引起桂系反感，特别是在经济上切断了广西对贵州鸦片烟过境的税收。蒋知吴与李、白有交情，所以起用吴忠信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

王家烈回大定整编军队。蒋介石不满足于此，筹划再削计划。

适逢川军部队在黔西同黔军因军队驻扎房子的问题，发生冲突。蒋介石闻讯，遂借调查为名，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赴黔西、大定，明里调解川黔矛盾，暗里则从事收买分化王家烈部下的工作。

晏道刚秘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之所在，说明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可以领十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克扣。后来他还分别对两人宣布，蒋委员长将一次赏给何知重5万元大洋，柏辉章3万元大洋。两人大喜。

在晏道刚的策划操纵下，何、柏两部下级官兵发起闹饷运动，事件高峰期，柏辉章师周相魁团一营长率该营士兵涌入司令部，当着客人晏道刚的面，向王家烈闹饷，令王难堪不已。

晏道刚对王说：“你控制不住军队，军氏怎么当呢？”王说：“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要晏对他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他。晏当然拒绝了。

何、柏两人，加紧对王软攻硬逼，公然劝王辞去军职。二人又说将来决不负王，待时机成熟时接王回军，再掌大印。见王动心，便请王到城隍庙发誓，表明他们二人的心迹。

王家烈处在内外交困中，当时各旅、团长分驻各县，要整编吗？薛岳以军情为借口，不准许王随意调动部队，部队不集中，人事不好安排；不整编吧，蒋介石又坚持部队未经点验不发伙饷。眼看就临到“一日无粮千兵散”的边缘，处境异常危险。

晏道刚劝王暂时下野，他转弯抹角地作比喻说：“杨虎城在某个时期，转不过弯子，就自动让开一下。可是后来，蒋先生还是请他回西安了。”

王家烈终于明白，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即愤然由大定到贵阳向蒋介石面请辞职。此时，红军已分两路西进云南，贵州境内无战事了。他向蒋介石说：“我要求解除兵柄，出外考察。”蒋介石假惺惺地说：“辜负你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得了。”次日，蒋就在报上公布：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蒋介石又疑王久在贵州，恐生枝节。凑巧，行营主任张学良，由汉口乘飞机到贵阳向蒋汇报剿匪大事，蒋就告诉张学良，约搭他的飞机，1935年5月3日，王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临行前，蒋送王五千元旅费，随又特许免考与陆大肆业。

晏道刚从大定赶回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晏笑嘻嘻地说：“恭喜委员长，贵州总算统一了。”

蒋介石鼻子里哼了一声，把目光投向了军用地图上的云南。

第七章巧渡金沙江

董老说，“我们来向主席请罪了，贺子珍同志生了孩子，孩子留在……”毛泽东沉默了数秒平静地说：

“你们处理得好，我要感谢你们，行军路上一律不准带孩子，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这样做还应该奖励。”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之后，红军迅速西进。蒋介石判断红军一定从清镇与安顺之间平坝附近通过，“再窜织金、黔西、大定一带”；“或是由织金直趋威宁，再窜云南东北边境”；再不然就是向西南窜到盘江”。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他决定：“以后不必在清镇、安顺之线以南的地区来围剿它，我们的主力应当配备于清镇安顺之线以北，镇西卫、织金等一带地区，等其主力出隘口，再一节一节的突击它。”他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滇军和湘军 15 师、63 师迅速西进，在清镇、安顺以北地区夹击红军。

然而蒋介石又一次打错了算盘。红军没有走蒋介石安排的道路，而是迅速渡过北盘江，直插云南。在西进道路上，红军连克定番（今惠水）、长寨（长顺）、紫云和广顺，安龙、兴义、兴仁和安姑，来到了云南的大门口。

一路上，红军先锋打着“青天白日”旗帜，队伍成双行前进，围观百姓欢呼“中央军”，红军向他们解释是“中央红军”，但群众毫无一点畏意。

在离定番城还有 20 里的地点，便望着定番城附近成千成万、成山成海的人群，不整齐地集聚着，瞻望过路大军。县政府及国民党部要人，也在围观者之列，以为是他们国民党的“中央军”。红军到了城墙脚桥边，靖卫团哨兵向他们打了一枪，大概已被发觉是伪装的，大群的县官乡绅拚命乱跑，靖卫团警察手忙脚乱地关闭城门，登城抵抗。红军乃以坚决手段强攻。只打了十几枪，就英勇地爬上了城墙，将守城团匪当场击毙两名，全部敌军便落花流水似地逃走了。

红军大队向北盘江进发。北盘江一带是彝民居住区，当地土司、民团王司令早几日接到围剿军总指挥周浑元的代表，他要求王司令堵截红军，王司令没有答复。当发现红军秋毫无犯时，王司令派人与红军先头部队交涉谈判，结局甚为圆满。

王司令派了一个副官带路作向导，沿途与各隘卡交涉，对红军后续部队也不加以任何阻拦，并慰劳红军许多白米与猪肉。结果，部队夜间在各关卡“通行无阻”。

经过一个整天与一夜的急行军，先头部队终于赶到了北盘江。北盘江是珠江的上游，北盘江水的流速不大，宽不过二百米，河的对岸矗立着绵延十里的大山，由此向下游走五里便是白层河比较热闹的一个渡口。从此地去白层河的中间五里处，有名叫孔明坟的地方，相传当年诸葛亮死后埋葬此处。

在一位当地彝族老人的带路上，先头部队从一处浅滩徒步涉过江，随即抢占江岸边制高点，敌人一个营正好也爬向这座山头，企图阻击红军渡河，红军抢先登上山顶，一个猛冲把敌人打垮了。

敌军另一个营同时赶到，从白层渡阻击红军渡江。

奉命从白层强渡的第 1 营，无船可寻。他们一面积极准备架桥，一面用重机枪向敌人猛射，配合展开政治攻势。由于红军一部已从白层上游渡过了江，驻守白层渡口的敌军营长，晚上便派他的副官过来和红军营谈判。他们

愿意撤出白层镇，让出渡口，但要求红军假打一下，使他们好向上司“交差”。

谈判成功了。对岸放过两只渡船，我1营战士乘上船，架起机枪，像实弹演习似的，打了一阵。至此，红军从两处渡过了江，全部控制了渡口，1营乘胜夺取了贞丰城。

红军主力部队随后过江。

毛泽东婚恋波澜

红军日夜兼程西进，30多名妇女干部也历尽艰辛。她们不仅要照顾伤员、做思想工作，而且要背东西，帮民工抬伤员，有的还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搭挡张闻天对刘英那不可遏止的激情。为了成就一番美事，他调刘英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的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负责警卫队的思想工作、中央负责人的吃住，还有在中央开会时做记录。

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更多了，张闻天处处呵护着刘英。他没有给她另外配警卫员，就在他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她。行军时两人常常走到一起，骑着马并辔而行。

毛泽东生活随便，爱说笑，头发长得老长，刘英叫他理发不他不理，说要打了胜仗才理呢。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刘英说：“打下了城市再发一条给你，这样多不卫生啊！”他说：“你以为上面比下面干净吗？你看，鼻子和嘴这才脏呢！”他的生活习惯是地道的中国方式。长征中有一次在一个教堂里搞到炼乳、可可、白糖，张闻天、王稼祥和刘英都高兴得什么似的，赶快煮了喝。刘英端了一茶缸子到毛泽东面前，他闻到味儿就皱眉头，赶忙推开，连说：“我不喝洋茶，不喝洋茶！要喝，还是中国的土茶好。”他对中国的历史、小说熟极了，闲扯起来滔滔不绝，津津有味。《红楼梦》尤其读得熟。有一回他问刘英：“你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刘英说：“黛玉的‘葬花词’我背得，这句话那个知道。”他得意地说：“就是这位苏州姑娘说的啊！”他又问刘英：“《红楼梦》里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当然是林妹妹了。”他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刘英到了中央队以后，她同张闻天就成了毛泽东经常打趣的材料。毛泽东在她面前念过一首打油诗，说洛甫四脚朝天滚下山。原来经过湖南时，有一次张闻天骑在马上打瞌睡，从山上跌下来，马没有跌死，人没有受伤。毛泽东念给刘英听，讲张闻天当时狼狈的样子。有时随口念几句诗词开他们玩笑。

刘英默默地感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不能结婚。她同张闻天保持着距离。虽然，从心里说，那时候已经由敬他而变为爱他了。

毛泽东的计谋得逞，为红军撮合了一段婚缘。然而，就在这时候，他的家庭又一次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的妻子贺子珍在盘江境内为掩护伤员，被敌机炸成了重伤。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也可说是第三次。在20世纪上半叶动乱的年代里，毛泽东的婚姻迭起波澜。

14岁的时候，父亲给毛泽东娶了一位20岁的罗氏女子，当时正与父亲屡起冲突、酝酿出门闯世界的毛泽东并不接受这一婚姻，他拒绝和罗氏过夫妻生活，以后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在长沙就读第一师范时，正值青春火热的岁月，毛泽东和他那群奋发的朋友们，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学业、学潮和革命活动，他致力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以言钱和女人为耻。毛泽东与朋友们互相起誓终身不娶。他的好友蔡和森与向警予曾组成了“向蔡同盟”，以表示蔑视礼教和世俗婚姻，一时为大

家传颂。但是，毛泽东的意念到了他的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那儿失效了，1918年春桃花盛开的季节，在北京的公园里，他与杨开慧互相道出了心中久已滋生的爱情。

毛泽东在与杨开慧结婚前，曾有一位女友和他关系密切，那女子长得秀美，颇有才华，但两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杨开慧后来知道了这一点，心中很难过。但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杨开慧。

用“崇拜”这个词形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信服程度也不为过。杨开慧在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提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处在共产党孕育过程中，杨开慧信服毛的主张，不仅包括他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包括他的体育锻炼方式等生活习惯，始终都是他的最热心的追随者。

但是，作为大家闺秀，文才满腹，接二连三地为他生孩子，做他的家属，又岂是杨开慧所真正心甘情愿的？对杨来说，她做到的是泪眼相向，欲言又止，不是大哭大闹，而默默地把它埋在心底。

杨开慧不愿长期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她要求跟随毛泽东闯出来，一起干革命，不管会遭到任何风险。这一要求屡被毛泽东拒绝。

毛泽东立志做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物，当时他的事业初有眉目，却无根基实力，正在转圜之时，岂能为家事所拘？

杨开慧对他过分的依恋曾使他产生厌烦，他写了元稹的《菟丝》赠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使杨开慧产生了误解，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毛泽东数次写信解释也难以消除。杨开慧耿耿于怀，久久不与他和解。

1923年秋，毛泽东去上海，再去广州，杨开慧想跟着去，毛泽东没同意。当时杨开慧快要生岸青，毛泽东又顾不上她，杨开慧不愿意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这就出现了常人（那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家中经常出现的争吵的局面……以至于毛泽东离家出发之时，杨开慧竟然不去送行。

毛泽东站在清水塘边等待杨开慧心回意转，结果，他没有等到。当火车汽笛长鸣，站台上仍不见杨开慧送行的身影，他是多么伤心，又是多么孤单啊！在火车上，他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在初稿中，最后四句为：“我自欲为江海客，不愿作呢呢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这实际道出了毛泽东的大丈夫的情怀。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风度。

后来误会解除，两人 1924 年在上海“重比翼，和云翥”，后同下广州，又随北伐大军北上武汉。

“四·一二”大屠杀后，湖北、湖南局势危急，毛泽东决心脱下长袍，上山搞武装，得到了杨开慧的坚持支持，她是带着崇敬和悲壮的心情送走丈夫的。

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坚守在长沙城外板仓，度过了数年艰辛和危险岁月，毛泽东从堂弟杨开明那里得知了妻儿消息，曾派人送去了生活费和问候。

1930 年秋，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入长沙城，遭何湘部反击后退出。地下党劝杨开慧离开板仓，杨开慧说：“我不能离开，因为润之没有这个指示。”不久，她被捕了。

在监狱里，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她没有屈服。后来军阀何键声称只要杨开慧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放她出狱，而杨开慧却选择了死。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井冈山遭遇激情

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1千余败兵上了井冈山，在他收编的井冈山土匪袁文才的队伍里，竟然有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已开放一切，很快与她熟悉起来。

当时的贺子珍只有18岁，她的两眼就象两颗水晶，身体洋溢着青春女性的气息，她的口才很好，讲话清晰又有分寸，举止英武又不失女性的妩媚。

一次，贺子珍帮助毛泽东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毛泽东向同事宣布，他们相爱了。

这件事突如其来，它是青春爱情之火的激发，它似乎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找到了新的力量之源。

贺子珍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自幼随哥哥闯荡，泼辣豪迈，1927年加入共产党。

贺子珍不是那种软弱的、依赖性强的。在大革命的年代，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时期，在与毛泽东成为夫妇之前，她曾经显示过她的才能。在1927年永新暴动时，她配合三县的农民武装，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的南门，凭着三支枪和赶造出来的梭标，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那时她才17岁。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初下赣南，由于人地生疏，遭到优势敌军的突然袭击。前面一个团象潮涌般败退下来，团长林彪也往后跑。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立在桥头，一面鸣枪，一面吆喊部队就地抵抗。这时贺子珍手持短枪，和毛泽东一起制止退却，不肯离开毛泽东一步。另一次，贺子珍乘马突围，有两个敌兵紧紧追她，都被她击下马来。毛泽东见她脱险归来，那份高兴劲自不待言。

在未遇见毛泽东之前，贺子珍是有心上人的，这个人永新县的欧阳洛，他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发展她入团、入党。欧阳长得一表人才，后来在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贺子珍迷恋于毛泽东指挥全局挥洒自如的英雄气，毛泽东则从贺子珍身上发现一种英武刚强的女杰光彩，又不夫女性温柔，她仿佛古书中的传奇女性，而有着为杨开慧这样的大家闺秀所缺乏的某种魅力。

毛泽东的情感激越而浪漫，他在与贺子珍的恋情中度过了那些艰难寒冷的岁月。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痴迷，出外散步时，在村民面前，他们一前一后。出了村子，两人便手拉手一起走。

他们情深意笃竟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检查工作，贺子珍为他整理了行装，在他临走时，竟忽然望着贺子珍说，“子珍，你能送送我吗？”这样，饲养员在前面牵着马，他们俩沿着枫树下的溪流又走了一程。还有一次，贺子珍回到久别的娘家去了，事先说好了要住几天，哪知隔了半天毛泽东就跑去了，贺子珍的父母好好地款待了毛泽东一番，当晚将女儿放回。

如果说，杨开慧之于毛泽东，是青年时代的纯真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

毛泽东在与好友的信中曾写道：我绝不是爱情上的人道主义者。下笔的时候，他心中可能想到的是罗氏女子，父母为他娶的、他一直不肯承认的妻子。

当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在风险浪恶危机四伏的湘江两岸为革命奔波时，

他在井冈山就和贺子珍同居了。无论他如何排遣，某种负疚感总是无形地伴随在他和贺子珍的生活中。

在和贺子珍同居之前，毛泽东就对贺子珍讲过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贺子珍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了毛泽东很多的慰藉。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贺子珍清醒地认识到，在她同毛泽东之间，还有一个杨开慧。她始终认定。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只是偶然的、暂时的，是出自于对毛泽东的挚爱而无保留的献身。她认定毛泽东同杨开慧一定会重相聚首，他们才是应白头偕老的夫妻。

井冈山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贺子珍总是把她自己的衣物用一个旧包袱皮包好，放在另一处，从不同他的衣服混放。

毛泽东打开一看，里面是贺子珍的一身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刀子。在那个极其艰苦的岁月，这就是贺子珍的全部行装。

毛泽东大惑不解地问：

“你准备你的行装干吗？”

“准备走呀，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她带着三个孩子，多不容易，我还年轻，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生活。

毛泽东听罢，半天没有说话。

贺子珍的态度从1927年1月她不肯随红四军下山这件事就能看出来。当时贺子珍认为红军下山后，毛泽东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遇，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而自己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但最后在人们的劝说下，她还是随部队行动。1930年底，当贺子珍从报纸上读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她流下了眼泪。毛泽东的神情也非常沉痛，不断喃喃地说：“真可惜了，她是个女中英豪呀！”

毛泽东的性格中也有刚强、专断、说一不二的一面。他对待自己的家人，有时是家长式的命令作风，发起脾气来真有雷霆万钧之势。

贺子珍亲眼目睹了一次毛泽东与他的弟弟毛泽覃的争吵，两个人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意见不一致，争执起来。毛泽东一时火起，拿起一根鞭子就要打他的弟弟。毛泽覃身子灵活，老早跑开了。他跑到毛泽东够不着的地方，然后说：“我问你，这是毛家宗祠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你为什么打我？”问得毛泽东无言以对。

毛泽东有时也用这种家长式的命令作风对待贺子珍。这是在瑞金中央苏区的事。总前委的秘书长古柏扭了脚，痛得好厉害。他的爱人曾碧漪看护着他。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过问他的医疗，请来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药。毛泽东拿着草药喊贺子珍，要她给古柏熬药去。贺子珍正在看书，她答应了一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叫贺子珍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脚，贺子珍仍然没有动。毛泽东发火了，说：“你不象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贺子珍也生气了，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共产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她解释说：“我正在看书，这些事情负责照管他的曾碧漪可以干，警卫员也可以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象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他们吵过了，没事了。和好如初。

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30年代经受了来自教条主义的打击和排挤，历经沉浮，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斗争性。这种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中，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时非常温存，但另一方面就有这种农民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然而，正是在30年代初毛泽东落难岁月里，有一位温柔秀丽的女子陪伴着他，与他互解寂寞，倾诉心声。在江西他与她共生过三个孩子。除其中一个因不足月夭折以外，两个孩子都是托寄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是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继续前进，贺子珍不得不把女儿托寄给当地群众。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啼哭着被抱走时，她背过脸流下不少的眼泪。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毛毛，生下后一直带在身边。毛毛长到三岁，十分活泼可爱，一天他随着几个警卫员去放鹅放鸭，同时采杨梅。采的多了就用小帽子盛起来，还高高举着说：“妈妈喜欢吃杨梅，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

毛泽东也非常喜爱小毛毛，常与他玩耍，舒缓了心中的烦闷。

每当毛泽东出发到外地工作时，贺子珍总是抱着三岁的毛毛缘着山径为他送行。毛泽东也总是在山下抱着毛毛亲了又亲才肯跃身上马。可是马刚刚走出几步，小毛毛就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迈开小腿儿跑着追上去，一连声叫：“爸爸，慢点走，我要骑马，我要跟爸爸一起走！”

贺子珍多喜欢她的小毛毛啊，可是一声令下，要离开根据地了。从通知到出发只不过一天多的时间。当时毛泽东不在瑞金，到于都去了，把小毛毛托给谁呢？贺子珍思前想后，只有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自己的妹妹贺怡（他们是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毛泽覃、贺怡闻讯连夜骑马赶来。贺子珍就连哄带劝把小毛毛送到贺怡怀里，自己的话没有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小毛毛也从贺怡怀里使劲挣脱出来，哭着说：“妈妈，不嘛，我要跟你去，我要找爸爸去！”贺子珍经过许多离别，但这次离开毛毛却有一种摧肝裂腑的苦痛。

贺子珍两罹灾难

长征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编在不同的单位，毛泽东随军委总部行动，贺子珍被安排在干部休养连，毛泽东经常随部队走在前面，贺子珍随休养连在后面行进。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很多。在一段时间里，贺子珍的身体不好，长征前已怀了孕。毛泽东便要吴吉清留下照顾她。她也常常牵挂毛泽东，到了宿营地，只要有机会，她就放弃自己的休息，到毛泽东那里去，帮助毛泽东拆洗缝补衣服，或是帮助抄写材料，整理文件。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或是送给伤病员吃，或是装进饭盒里，送给毛泽东吃。有时在军情紧急时，毛泽东几天几夜不睡，她便跑来为毛泽东守电话，让毛泽东在电话铃响前小睡一会儿。

毛泽东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他同中央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从不同贺子珍讲。但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生活多年，她是毛泽东倾诉心声的主要对象，他与她之间也就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过交谈。所以贺子珍对毛泽东与博古之间的争执是熟知的。

长征初期，贺子珍到宿营地后，有时去看望毛泽东，她的来到，都使毛泽东精神上得到安慰。比较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同志们告诉她：主席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后来，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博古李德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

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遵义，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在遵义时，毛泽东忙于开会，早出晚归。

毛泽东爱吃鱼，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到遵义街上买了新鲜的鱼，回来精心烹调，加上辣椒，做得辛辣味美，等着毛泽东回来一起吃。从傍晚一直等到深夜，毛泽东回来时，贺子珍趴在桌上睡得正香。

毛泽东吃饭时，贺子珍关切地问：“会开得可好？”毛泽东颇为高兴地说：“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会上都讨论了什么？”“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遵义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回到家里，兴奋地对贺子珍说：“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他对贺子珍感叹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以后的日子里，贺子珍为丈夫感到高兴，贺子珍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

这一天，下着毛毛雨，休养连行军到贵州白苗村寨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临产了。这时，大部队已开走，中央干部团走到前面去了，后边护卫的军委警卫营还没有跟上。天刚蒙蒙亮，休养连与敌军遭遇了，枪声一响，没有经过战斗的民夫就乱了营。情况紧急，这时邓颖超不顾一切从担架上跳下来说：“连长统一指挥。”并要战士顽强阻击敌人。遭遇战中，连队战士将贺子珍抬到北山腰一户人家的草棚歇脚。这户人家的主人不在家，进去后面火坑还烧着火，房子里挺暖和。战士们将贺子珍抬到火坑炉子边上，用架子上的铜壶烧了开水。外面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跟踪、轰炸。九军团罗炳辉军团长闻讯，马上派了一个营接应掩护。敌人很狡猾，是隐蔽着从山岗的树

林里过来的，红军部队也从山岗上接敌战斗。战斗打了两个小时，这期间，贺子珍就在这个草棚里生下了个白胖的女孩。邓颖超特意给孩子取名叫“双凤”，因为当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爱人也生了一个女儿。那时，部队行军打仗，规定不能带孩子走，贺子珍知道带不走孩子，眼里淌着泪。在场的董必武用毛笔写了一个条子。条子是这样写的：“老乡，我们是干人（穷人）的军队，是为了解放穷人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行军，生了孩子不能带走，把她寄托在这里了，拜托你们把她抚养成人，培养成革命的后代。”

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休养连连长侯政把13元现洋和两包鸦片土（当时鸦片土可抵钱用）及董老写的条子一并放在孩子枕头旁边。

连队走的时候，孩子就孤零零地躺在火炉旁边。贺子珍表现很坚强。当时没有找到一个乡亲，也不清楚后来有没有人收养。

连队战士抬着贺子珍上路，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10公里路光景，太阳快下山了，大家发现已赶上了前面的部队。只见太阳影子里有一个人站在路边张望，旁边有许多荒草，那人是站在一块空地上的。走近一看，才知是毛泽东，毛泽东只知道贺子珍在担架上快要生孩子了，但不知有没有生下来。连长连忙上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董老和连长说：“你们两个都来了。”董老说，“我们来向主席请罪了，贺子珍同志生了孩子，孩子留在……”他们把写条子给老乡的事也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沉默了数秒平静地说：“你们处理得好，我要感谢你们，行军路上一律不准带孩子，这是中央的决定，要执行好，带着孩子还能打仗吗？你们这样做还应该奖励。”

当贺子珍的担架抬过来时，毛泽东揭开她脸上的白毛巾，看了一会，很关切地询问了情况。贺子珍当时昏昏沉沉，脸上都是虚汗，没有什么话。毛泽东特地把他江西苏区打土豪时带出来的担架员老耿叫来，请他抬贺子珍的担架。

怀孕是最苦的。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作为母亲心中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描述……但是，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忙于指挥全军行动，鉴于贺子珍生孩子不久身体虚弱，便派他警卫员吴吉清去照料她。

尽管产后虚弱，贺子珍仍坚持步行，她经常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咬着牙跟着大部队走。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有时，她连仅有的一碗炒米也尽先让给伤病员。现在，她正在病中，总卫生部医生要给她开点药，她却拒绝了，要他们把这些药用在伤病员身上。

部队行军到了贵州盘县，刚吃过午饭，大家正在休息，天边忽然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敌机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随着这声音，只见数架轰炸机接连从云缝中钻了出来。敌机发现目标后，向地下俯冲过来。人们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

昏迷半日后，贺子珍苏醒过来，毛泽东的大弟、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赶来了，他们与同志们一起照料大嫂，贺子珍吃力地睁开双眼，要求他们暂时不要把她负伤的事告诉毛泽东，以免肩负全军重任的他分心，毛泽民点头同意。

贺子珍的伤属于重伤，由于她的级别不够，休养连领导决定把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贺子珍还没有得到通知。毛泽民急忙电告中央，向毛泽东通知贺子珍的消息。

毛泽东骑马赶来了。休养连领导上前迎接。毛泽东向他们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他们第一次发现，毛泽东的眼中流下了泪水，在谈到贺子珍的走留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毛泽东没有直接去见妻子。他从队伍之首开始，一个一个地依次察看担架上伤员的伤势，一一慰问，终于轮到了贺子珍。

毛泽东先简单地向医生询问了伤势，又向警卫员吴吉清询问了她负伤的经过。

他慢慢地走到担架边，重新给贺子珍把被子掖好。贺子珍看到毛泽东来了，十分激动，要坐起来，但毛泽东阻止了她。贺子珍流出了眼泪。这是她负伤苏醒来的第一次流泪。她向毛泽东要求留下。毛泽东沉痛地对她说。

“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毛泽东又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毛泽东又把自己的担架派来给贺子珍使用，以减轻休养连的负担。

贺子珍在担架上躺了两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和军委首长一道指挥行军作战，到宿营地后，只要有可能，他总要来探望贺子珍，并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给她吃。毛泽东的关怀，战友们的情谊，医生的精心治疗，自己的顽强意志、终于使贺子珍的伤势逐渐好转了，她坚毅地走下担架，迈开自己的双腿继续长征了。

国民党的飞机象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七八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

4 团巧扮中央军

毛泽东为渡过金沙江向北突围，极为小心地做了一切准备。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数十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泽东令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百里的马龙前进时，空中出现了一中队国民党飞机。这些飞机没有扔炸弹，在东边消失了。红军指挥官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国民党没有料到红军正深入云南腹地。不久，周恩来及其警卫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一直开到红军队伍面前。直到周恩来命令部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惊慌失措，停了下来。车队是云南军阀龙云派往国民党将军薛岳驻地去的。应薛岳的要求，车队给他送去云南地形图。龙云本来想派飞机送，但是驾驶员正好病了，于是他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了食品——云腿，它被视为中国最好的火腿，此处还有医药用品，都是给薛将军的礼物。现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当天，宿营时，毛泽东获悉了这一胜利消息，表扬先遣分队“机动行事，处置得当。”并且特别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当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在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陈云、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等人。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研究了当前行动方针。新缴获的云南详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面清楚地显示了金沙江的各个渡口。参谋吕黎平奉命在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 200 公里，最远 230 公里）。会上各人都发表了意见。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说：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大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象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

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会后，军委下令兵分三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军委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直插皎平渡口。

为防止龙云部烧毁各渡口船只，务必限定四天之内赶到金沙江边。五军团为后卫。

左纵队1军团从昆明东北绕过，并担负佯攻昆明、掩护红军主力向金沙江开进的任务。

4月29日，1军团1师1团3营攻占嵩明城，造成威逼昆明之势。嵩明离昆明仅100里，守敌是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又没有料到红军会来，所以，第3营在营长尹国赤指挥下，很顺利地全歼了守敌，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崭新的军装。1团团部抵达嵩明城内时，3营大部分同志把刚缴获的军服都穿上了，一个个神气得很。刚住下，敌人的飞机来了。但是没有轰炸，也没有发射机关枪，转了几个圈，投下些传单便走了。飞机丢下来的不是传单，而是要嵩明敌人死守待援的命令。这时红军进城已经三、四个小时。

这身国军服装发挥了伪装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二天，3营完成任务回撤下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周恩来、刘伯承和中央机关供给部及卫生部，沿着山下的一条大路行进。因为3营穿的是敌人军装，掩护中央机关的部队误认为3营是敌人，便开了枪。他们一开枪，3营便摆开了阵势，机关枪一架，冲锋号吹响了。供给部、卫生部老干部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山上撤。3营营长尹国赤看出对方不像敌人，中央机关从3营的号声中也听出了是自己的部队，便连发信号，这才避免了被消灭的厄运。

在1师攻占嵩明的当天，2师夺占了杨林，大造进攻昆明的舆论，到处书写“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打倒云南军阀龙云！”的标语。他们还利用敌有线电话与昆明通话，扬言我军要打进昆明，并派先头部队到距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活动，沿途留言红军要攻城。

龙云当时因滇军仅有的6个旅主力早已外调，坐守昆明空城，只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担任守备，十分恐慌。他急令孙渡回昆明防守，滇军其他部队也纷纷被调往昆明守城，就在云南敌人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时，我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向西北转进，直奔金沙江。

左路一军团以红4团为前锋，向龙街渡口挺进。途中要经过禄劝、武定、无谋三个县。

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为了避免与敌地方杂牌军实战拖延大军行进时间，决定智取三城。前不久，攻占遵义时，红4团缴获了大批国民党军服可作一用，团首长命令三个连穿上了中央军的服装，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扮演先头连连长。

快到禄劝城门时，吊桥高吊，4个民团团丁上前查问，王友才一个箭步冲到那伙民团的前面，声色俱厉地反问：

“怎么，你们的上司没有交代？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在城门口拦阻我们‘中央军’，放肆！”

一听说“中央军”，前面的团丁双脚“啪”的一声来了个立正，后面三个也连忙歪歪扭扭挺起了胸。

“请问长官官阶？”那领头的战战兢兢地问。

王友才一听火了，伸过手去就是一个巴掌，厉声吼道：“你眼睛瞎了，老子是上尉连长，我们团长还等在那里呢！”

就这样，这4个团丁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引着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到了县政府。

一会儿，禄劝县的县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大大小小的绅士、地主都来了，有的还带着太太，他们齐聚在县府大厅里。在王友才这个机灵的“上尉连长”的主演下，政委杨成武扮演团长出场了。

“中央军”首次光临禄劝，自然非同小可，县长立即下令悬挂国旗，而且办了丰盛的午餐，好烟好酒摆得满满的。杨成武悄悄交代王友才，为了赶路，放开肚皮吃饭，但酒只能喝少量，以免耽误任务。自然，其他部队也好好地吃了一顿。

县府大厅的宴会上假戏真做，谈笑风生，上了三道菜，杨成武向县长打听龙街情况，县长不知，忙接通了武定县长的电话。

这时杨成武估计，王团长带的那一路，该到武定了，便怒气冲冲说道：“都是饭桶，耽误军机，谁负责任？告诉武定县，我们的部队马上去！”

胖县长如释重负，连忙应是，跑到电话机房，用公鸭般的嗓音，吼道：“……‘中央军’马上去武定，请开门迎接！”

杨成武起身离座，大大小小的绅士列队相送，丰盛的宴席就这样进行了一半而中止了。

由于禄劝县长的那个电话，武定县欢迎“中央军”的场面更加隆重，工团长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像武定县一样，由于事先打了招呼，当杨成武带着部队到达元谋时，元谋县大小官员和民团已经集合好，昼夜迎接。

杨成武当即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在场的大小官绅都愣住了。他们全做了俘虏。

红4团由于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红一军团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

三路云集皎平渡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特指自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全长 2308 公里。它沿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到云南石鼓急转北流，来了个 110 多度的急转弯，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削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虎跳峡 16 公里长，60—80 米宽，至元谋、禄劝一带后，江面较宽，在元谋县一段，有龙街渡口，历来是川滇间一个重要渡口。禄劝县的皎平渡，也是一个较大的渡口。在皎平渡上面有鲁车渡，下游有小渡口洪门渡。在会泽县（今属东川市）有树桔渡口。

金沙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江涛汹涌，水深流急，自古称为天险。蒋介石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挡红军北进。

在红军即将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才猜测到红军的意图不在于攻占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据此，他急忙部署新的围堵计划，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堵截，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4 月 28 日，他密电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万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严令渡河点附近要进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晚即下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收集和毁坏所有渡船。蒋介石和龙云企图把红军压迫至金沙江边“聚而歼之”。

红一军团向龙街前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蒋介石和龙云均断定龙街渡口是红军的主要渡口，薛岳从 5 月 3 日至 8 日，一再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急进”，“向元谋兜剿”，乘红军渡江之际“歼剿”。而此时，中央纵队正在从干部团夺取的皎平渡源源不断地北渡金沙江。

毛泽东把天险皎平渡选为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把抢占皎平渡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四个单位编组而成的。团长陈赓原来是彭杨步兵学校校长，政委宋任穷原来在红军大学任职。当时，干部团是第一纵队的第四梯队。这个团除基干队以外，多数成员是从部队抽来的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他们在土城战斗、遵义战役和老鸦山战斗中，都打得十分英勇顽强。西进云南以来，他们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这时，中央军委又决定由他们组成渡江先遣队，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率领，还派国家保卫局负责人李克农带领工作组一同前去执行任务。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

自从红军进入云南后，蒋介石已确知红军将走金沙江路线，下令调遣军队驻守了金沙江对岸几百里防线，不但控制了所有大小渡，而且把所有的船只都掳过河去断绝了，两岸交通。当刘伯承率干部团赶至金沙江边时，只见河上空空如也。

刘伯承决定 3 营 1 个连为先遣队。他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

当时深夜，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 12 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 1 个排送到江北岸。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里

面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红军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无一伤亡。

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宋任穷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他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他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160里。”

第二天，战士们在渡口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7条船和36位艄公。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

渡口两岸都是高耸的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四五公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80米处有一块3米高的圆石（现在还在那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指挥长。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俯冲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便燃起大堆大堆的篝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为保证全军胜利渡江，后卫任务极为重要。这个任务落在了红五军团肩上。

毛泽东在赴皎平渡途中，经过禄劝县石板河时，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是追敌必经之地，即决定红五军团在这里布防，阻击迟滞追敌，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

从石板河村下山约百里，就是皎平渡。红五军团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部队，具有打掩护战的丰富经验，他们在这里依据地形，严密布防，严阵以待，准备打击追敌。

蒋介石获悉红军已分头到达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一带后，一面命令飞机天天侦察轰炸，一面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纵队尾追，命令已到团街的万耀煌第十三师全力向皎平渡急追。

万耀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他力图保存实力，既怕蒋以追击不力吞并他的部队，又怕孤军深入被红军收拾。其先头部队遭到红五军团后卫37团痛击后，他便构筑工事在团街固守。5月4日，蒋介石严令各纵队加速追堵，“否则以纵匪论罪。”当晚，万耀煌致电蒋介石谎报军情：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后，再尾击而“剿”之。5日晚，万又继续向蒋谎报：经过一天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6日拂晓前如无新的训示，将率部队从团街以南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它方向“围剿”共军。发报后，他即命令部队后撤。蒋接电后恼怒异常，向万发出“限即刻到”手令，声称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皎平渡到了北岸，命令他仍从团街向皎平渡口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这样，万耀煌重新向团街推进，尾追红军。在石板河一带，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红五军团指战员凭借有利地形，英勇还击，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5月14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九十公里。岸边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接力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

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按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夺取洪门渡。这里没有守敌，红三军团迅速进占洪门渡，并找到了一只船。因水流太急，浮桥没有架成。红 13 团凭这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这时，军委命令红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军团首长立即率部队向皎平渡前进。

下半夜雨过天晴。三军团刚到达鲁车渡，忽然望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犹如一条火龙，摇头摆尾，顺江而来。大家断定是一军团的部队，于是便集合几个司号员一同吹起联络号。对岸火把霎时熄灭了，大家知道他们误会了，经司号员再吹红三军团的号牌子，对岸才回答是一军团第 1 师的部队。部队遂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命令一军团火速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传过去。对岸又点起了火把，火速向东而去。这边也燃起火把，两条火龙在夹江两岸，来了个空前壮观的火炬大游行。

原来，一军团抢渡也失败了。

一军团夺取龙街渡口后，立即找船，船已全部被国民党军拉到对岸或烧掉。先头部队红 1 师只得设法架设浮桥。由于水急江宽，架桥不到 1/3，即被冲走，连续两日了无进展。

师长李聚奎召开了“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出主意。这时，1 团团团长杨得志提出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

大家觉得可以试试，杨得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的一头拴在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但无奈江水湍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当李师长正准备向军团司令部报告情况时，恰接到林彪从 15 里的地方打来电报，他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时，林彪就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师长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

“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林彪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军委得讯后，立即命令红一军团从龙街渡撤往皎平渡。

继敌十三师之后，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的兵力从 5 月 8 日起陆续向石板河蜂拥而来，敌我兵力异常悬殊，但五军团指战员勇气百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顽强战斗，始终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一直在他的山洞里了望渡江部队，在皎平渡等到 5 月 8 日红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

军委纵队渡过了金沙江。

红三军团渡过了金沙江。

红一军团从龙街渡折向皎平渡时，在一条建筑在急流上的路上行进，一夜过了 48 次急流，赶了 120 里路，终于赶到了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红五军团在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脱离追敌，于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5月7日在树桔渡也顺利渡过了金沙江。追敌姗姗来迟。5月9日，敌人赶到了树桔渡江边，5月10日，他们来到了皎平渡口，红军早已全部渡到了金沙江北岸，他们只好望江兴叹了！

临走前，红军后卫部队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赶，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1934年10月16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泽东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第八章林彪发难

张闻天觉得毛泽东对林彪、彭德怀的批评有些过分，便派刘英去请林彪、彭德怀到瓦房来往，只听见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红军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还在中央红军向金沙江挺进的时候，蒋介石就电令四川军阀刘文辉市防堵截。刘文辉所部的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共有 12 个团的兵力。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马上要攻打会理。

打圈子群议鼎沸

为了保证红军在会理休整，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担任围攻会理的任务。会理几乎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四周有一条很宽的护城河，已有300年历史，另外还有两道又高又厚的城墙，一道内墙，一道外墙。

会理城由刘文辉的第7师占领。师长刘元塘为防红军逼近城墙、对城外周围的建筑物，特别是北门外繁华的街道，用煤油、棉花点燃，把城外的民房全部烧光。这种大逆不道引起城外居民的极大愤怒，在红军宣传鼓动下，数千居民协同红军攻城，后来这些人大部参加了红军。

开始，彭德怀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这座县城，但没有成功。国民党军队1千人把红军打退了。在第一次攻击时，11团攻进了东门，12团攻进了西门，但无法登上第二道城墙。

两道城墙之间是参差不齐的房舍。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撤走居民，放火烧房，红军被迫退回到第一道城墙。国民党军让城里居民烧好一锅锅滚烫的稀粥，倒到正在攀登云梯的三军团战士的头上。许多人被严重烫伤，从梯子上栽下去。第二次进攻在5月10日又被击退。

11日至13日，红三军团派工兵在会理城的东关、西关两处挖坑道准备爆破。14日晚，攻城的部队首先把指挥阵地作为钳制的方向，开始对敌人佯攻，用迫击炮、步枪、轻机枪对着城墙上的目标和城内有火燃烧着的广大目标射击。然后，两处坑道炸药都先后爆炸了，城西北角炸开了少量缺口，红军趁势发起冲锋，敌师长刘元塘亲自率部堵击。他面部受伤，但敌人很快堵住了缺口。接着红军又爆炸东北角，因敌人已经察觉，往坑道灌水，爆炸没有成功。

至此，会理城虽经7天围攻，但都未成功。毛泽东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息时间，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政治问题亟待解决，并在会理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未能攻破，便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一个铁厂村（今会理县红旗区老街乡铁厂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八个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张闻天、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自四渡赤水到飞渡金沙江，被毛泽东认作是自己生平得意之笔。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他彻底放开，拿出平生才学，终于使红军从数十万敌军天井似的围困中解脱出来，这无疑是一件扭转命运的成就。

然而，他哪里知道，部下对中央积蓄太多的怨言，身为实权者，他首当其冲。

在四渡赤水中，为了摆脱国民党军，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奔西突，南转北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的红军将士都十分辛苦。有些红军战士不理解在当时情况下，走是摆脱国民党追兵；保持主动的唯一办法，牢骚怪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和扩散开来。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累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他们全无所知。那时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即使是军团首长一级，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毛泽东经常讲，没什么可说的，走就是了，哪里要说清楚才走呀。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疾病、饥寒的确是部队减员的“三把刀”，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

当红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红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就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即使在平川上稻米和蔬菜也很少，目光所及之处，罌粟地比比皆是，却很少有庄稼地。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有一天夜里，当红军穿过一片平原时，军事顾问李德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他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他，他才醒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的，损失与日俱增。

林彪煽动换领导

红军队伍中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上层领导中的一些人，新的分歧产生，而且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

忽然流传说毛泽东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他公开称：“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军团政委聂荣臻表示异议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未吱声，但心中在谋划。他那长期被军事才华遮盖的政治手腕此时略露峥嵘。

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再等一军团领导也在旁边。

林彪选择了一个多么有说服力，而又“正大光明”的场合！从林彪的表情里显见他的意见得到了应和，但他的“由彭领导”的提议被彭德怀回绝了。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反驳：“我代表着下面的呼声！紧急时刻我们得听群众的！他们最了解情况！”聂荣臻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肯听。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还要求聂在信上签个名，被聂严词拒绝了。聂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机。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林彪单独签字上送了。

自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有多大损失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挥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

打彭新场的建议被拒绝，土城失利、龙街渡口渡乌江未遂，使他心中的鸟气越蓄越足。这次他首倡向中央提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响应。

攻占遵义时，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

委另行分配工作。彭德怀表示欢迎。四渡赤水后，彭和刘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红二、六军团，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觉得与他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电报就以刘、杨名义发了。

彭德怀历来以直言著称。他汇集了部下的呼声，也以他坦诚直露的个性直接影响了上下的情绪。

彭德怀是三军团创始人，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他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彭德怀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

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人们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一个离长沙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农村里。他6岁那年死了母亲，后母憎嫌彭德怀，经常虐待他。少年时他在私塾念书，在那里又常挨老师打骂，彭德怀的反抗精神就在那时练就了，一次挨打时，他举起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

中国农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艰难困苦，彭德怀都经历过。他的祖母七十岁了，还要在过年时拖着一双小脚带彭德怀的三个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乌石坪沿街乞讨。他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饿死了。彭德怀只讨过一次饭，后来再也不于了。他宁肯上山光着脚在雪地里砍柴，也不低头向人乞求。

贫困中的祖母仍不改抽鸦片烟的恶习。终于有一日，彭德怀再也忍受不住，一脚踢翻了烟盘。祖母大发脾气，召集全族人要求把这不孝之子处死，继母和父亲已经同意，幸亏舅父站出来，他的命得救。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的风箱。当鞋匠学徒，到烧碱矿做工。他去修水渠，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在那里，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依。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有一

天有二百多个农民拥到当地一个有钱人的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一个大米店主。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闭上了大门。彭德怀正好走过他家，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他奉孙中山的一个将领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他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他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他，要他招供，他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他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他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他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他。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他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他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马日事变爆发时，彭德怀正驻防岳州，许克祥团在长沙大肆屠杀工农，夏斗寅叛军又向武昌进逼，彭德怀向师长周磐建议，北进配合叶挺消灭夏部，被上司拒绝，从此他对军阀彻底失望。1928年初，彭德怀在军中秘密加入共产党，这时他身任湘军团长，他曾组织过地下救贫会，以处死大恶霸、发动士兵为事。当年9月，他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把余部拉上了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朱毛下山后，彭德怀留守，在重重围困中突围而出，转战湘赣边。

两年以后，彭德怀集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三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遭何健援军反击后退出。不久即与朱毛的红一军团会合，两军组成了中央红军。

阴郁的红军之鹰

林彪看上去不象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

林彪时年二十八岁，面貌稍显清瘦，双眉浓黑，两眼炯炯有神。他一向多思寡言，含威不露，举止文静，但却内涵很深。他在自己领导的部队中经常倡导“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养成部队一种勇敢善战、一往无前的作风。再加上他颇擅长搞大兵团伏击战，实力红军将领中风头最盛的军事奇才之一。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1907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学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在叶挺的独立团充当北伐先锋的岁月里，林彪从实战中学习到了最新鲜活跃的战术。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随朱德、陈毅一道转战湘南，参加了湘南起义，后来又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在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到有一个人的发言头头是道，就问陈毅，这人是谁？陈毅说，他叫林彪，是个连长。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干部。毛泽东发现林彪是个人才后，就经常找他谈话。到红四军“七大”前后，在朱毛之争中，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在秋收起义部队中有伍中豪这样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而在朱德的队伍中也有林彪这样深受毛泽东器重赞赏而积极向毛泽东靠拢的。彼此交叉，互相做工作。

在毛泽东的提拔下，林彪二十二岁时即升任主力红四军军长，二十四岁做了红一军团军团长，这即使在不拘一格任英才的红军中，也是罕见的。

盛名下的林彪在军事上确有一套。他是从见习排长逐级提拔上来的，平时注意训练，管理也严格，临阵有决心而且灵活。他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他欣赏黄埔军校的一套，对军校的教程和条令部较熟。红军打下龙岩，缴到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从中选一部分印发给大家看。他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操演。当李德把苏军战术经验运用到红军中时，他是少有的认真钻研的一个。

长期以来，林彪是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意图的战术执行旨，他那善于奇袭和兵团作战的盛名毕竟有攀龙附凤的成分。然而，实际上，林彪的战略才华也因此无用武之地。在毛泽东下台后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敌陈诚嫡系师贪功冒进，林彪在未得总部命令的情况下临时自作主张，设下了大埋伏，一举歼灭两个师中央军。私下里，林彪把它当作他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战功。

长期的战争生涯造就了林彪的才华，他的胆量、冷静、决心、善用奇兵、多变心思等，在军中却是颇突出的，有一系列战果为证。

林彪长久有毛派的声名，他是从反对上司朱德的争议中得到这一评价的，这在一开始，不是什么权术，而是意见分合的结果。林彪外表含蓄，但内里是有个性的，这个性的正负当然很复杂。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时，林彪悲观失望，在大庾曾经逃跑过，由于跑不出去才回头的。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讨论红军主力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

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山之后，红军利用新军阀混战，在赣南及闽西展开广泛游击战，毛泽东提出一年内夺取江西的计划，但林彪相信流动游击政策，不满意这个计划。他有一次从军部开会回来，对人说毛对时局的估量太乐观，从东江回闽西后还这样说，他对毛并不盲从。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更切近现实。上级指令拨枪给地方，他常有怨言，说主力越刮越瘦。有时甚至拒不拨枪，他说江西人“会拿算盘，不肯拿枪”。

林彪的性格孤僻，不聊天，极少开玩笑，给人以高深莫测和凛然难犯的样子。他过分自尊，红四军时代同党代表熊寿祺为了一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他几次提出去上海或去苏联学习。前委曾开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批评他俩都是“英雄主义”。林彪个人生活也自行其是，曾染淋病，有时缴获不归公，1928年打郴州就这样于过。他在一次闲谈中露出，打大庾时丢了一个箱子，里面有七个金戒指，一百多块光洋。那时红四军官兵只有少量的零用钱，下面的干部早就议论，说他手脚不太干净。

多年来，林彪用自己手造的墙，和别人帮造的墙，深闭固拒，把自己的劣根性保护起来。不让外人测其深浅。中央与毛泽东爱其才华，不计小节，当然，可能并未把他军事才华以外的素质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林彪一开始是反感的，他曾与聂荣臻致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不搞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1934年4月3日，林彪以《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直言批评了“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的阵地战思想，主张运动战。

林彪的这封信，没有引起中央军委的注意。博古、李德、发挥了政治手腕对他进行了争取，在形势最危急的6、7月，林彪突然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他一反在4月3日给中央军委的信件的观点，又肯定了他曾认为是“零敲碎打”的短促突击，有造成战役胜利的可能。他受到了李德的赞扬。

林彪的这种两面派作风当时曾引起聂荣臻等同事的怀疑。

在遵义会议上，林彪与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

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打仗极为勇猛，他指挥的部队以打猛仗、恶战、敢拼敢斗而著称。在攻打长沙、娄山关等著名战役中，曾取得显赫战绩。游击战和设埋伏也是彭德怀的拿手好戏。彭、林堪称红军中的双星。比较之下，一位是独创天地的传奇英雄，一位是历经沙场的军事奇才，双方在战斗中多次紧密协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两人的意见一致是很自然的。彭、林的批评意见也得到了中央上层的响应。在三人小组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王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张闻天到三军团去，彭德怀把部队的情绪向张闻天说了。张闻天作风是很民主的，他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张闻天有一天和李德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军事形势时，他说，这种形势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打圈子的战略和战术造成的，北部作战的失败，虽然由紧接着的遵义战役的胜利部分地得到了弥补，但是目前西部进军有可能导致部队的灭亡。同时，他还列举了太平天国石达开时期，在金沙江流域曾有全军覆灭的前车之鉴。他在表达这些意见时，并不那么直截了当，而是相当隐晦和谨慎。他还在犹豫之中。

毛泽东大发雷霆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一写信，毛泽东就敏锐地感到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性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再认识，是关于党内军内领导权和军事路线问题，是毛泽东地位尚不巩固的表现，毛泽东下决心开会来统一认识。

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刘英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先请王稼祥讲，王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张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他在会上发言中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对林彪、彭德怀等都提出了严厉批评。

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毛泽东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说，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会上林彪、彭德怀不服，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彭德怀觉得很委屈。在会议上他看了林彪的公开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军打败的。

彭德怀当时听了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他的话，很有些难过，这封信并不是他鼓动起来的，而是林彪鼓动他在先，他没有劝、更没要想到林彪会写这样一封信，他决不是这次事件的发起人。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他心想误会总是有的，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彭德怀错了，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留下的印象之深，他仿佛改变了对彭德怀的看法，认定此人有权欲。而对于林彪，毛泽东显然小觑他了。毛泽东对这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部下含有明显的轻视之意，没能看出这位做事貌似光明正大的反对者有着很深的心机。

张闻天在报告中收回了他以前的大部分批评，尤其是不再要求变换军事领导了。他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他当时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他认为，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毛泽东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张闻天和毛泽东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张闻天觉得毛泽东对林彪、彭德怀的批评有些过分，便派刘英去草棚子请林彪、彭德怀到瓦房来往，想把双方关系搞协调一些。

刘英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只听见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

刘英说，“洛甫请两位司令员住到那边去。”

他们连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在这里挺自在的。”

刘英回去对张闻天说他们不愿搬过来，也就算了。

张闻天当时是书记。按照他的作风，听到各种意见都向毛泽东反映、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经过讨论、甚至争论，他再做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泽东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张闻天总是支持毛泽东。会理会议也是如此。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他，则更不妥当。

会议指出，休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

倒霉的黄克诚也卷进了这一事件之中。二进遵义城后，黄克诚找到了一些报纸看，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被俘，牺牲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时，他才知道留在中央办区的红军部队损失严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他当即找到一位领导谈心，讲了看法：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由于他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这次同领导谈话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怀疑他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他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不久，任命他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由于视力太差，又没了眼镜，黄克诚搞侦察工作困难很大，曾几次遇到险情，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干下去。

在赴乌江的路上，黄克诚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观点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北上计划。当部队进至会理以北的德昌县时，红三军团召开会议，会上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便把黄克诚拉出来狠批了一通。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

第九章大渡河

毛泽东对石达开的失败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或者再住下走……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下一步行动，是向北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计划，这个计划，被蒋介石猜了个正着。5月10日，蒋介石发出电令：“‘匪’既渡江（金沙江），我第一第二两纵队与李师（李韞珩），即由薛总指挥亲率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他判断中央红军要向大渡河前进，深入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制定了一个“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的“聚歼”计划。

独眼将军刘伯承

5月12日，蒋介石急急忙忙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实施“聚歼”红军的新计划。熟知历史典故的龙云向他献计：像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十分高兴，他急电四川军阀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全部及21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24军大渡河以南的部队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于是，在那样一个蛮荒之地，竟投入总兵力15万至20万人，其中中央军10多万人，川军五六万人，蒋介石决心把大渡河变成第二个金沙江。发完一通函电，他又坐上飞机，两次飞到川康过境前线视察，望着蓝天白云下的险山恶水，仿佛他已圆了自己的“聚歼梦”。

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今汉源），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第一条路，因而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一军团第1师1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先遣队由一军团第2师5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两支先遣队均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红军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1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路程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1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日凌晨，红1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1团和红军主力改道，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走冕宁、安顺小路，就要通过彝民区。彝族，旧称“倮倮”（带有贬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他们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

当时彝族处于奴隶社会，分为“黑骨头”（贵族）和“白骨头”（奴隶）。白骨头一般不是彝族人，而是战俘——汉人、苗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他们之间等级界限和禁忌可畏。同男白骨头发生性关系的女黑骨头要被处死。男黑骨头违犯同样禁忌要受重罚。男人出去总要带武器——刀、弓、箭、旧式步枪或新式半自动步枪。抢劫被看作体面的事，特别是抢汉人的东西。仪式、符咒、誓言和血祭是彝族社会的组成部分。

要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最重要的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彝民对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军队极端仇恨，国民党军通过彝族区时，必须大队人马，一团以下人员通过，即被缴械。彝汉民族隔阂很深。

先遣队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又请到一位通司（翻译），准备和彝民的首领谈判。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先遣队于5月22日早晨开始进入彝民区。一路上只见山峰。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先遣队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红军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消息：跟在主力后面的工兵连，因为没有武器，刚掉到主力后面100多米远，就被彝民把他们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具一搜而光，可是彝民并不伤害红军。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工作团首长肖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兵”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

正在混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山谷人口的地方，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驰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高大的彝人，年约50多岁，脸色微褐，身披麻布。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通司认出这人是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当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的时候，他欣然地同意了，并随即下马，挥退了集聚的人群。

肖华首先对他表明了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族人十分重视“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的首领结为兄弟。

听了解释以后，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并不像国民党“官兵”那样抢掠饶杀，特别是听说率领大军的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因而对他们的提议也就欣然答应了。当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便是“沽基”家的领袖。他所以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与小叶丹结盟，则是为了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

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当肖华把这个情况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的时候，他俩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焦虑。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令人喜出望外。刘伯承当即毫不踌躇地上了马，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同胞，为了红军主力的顺利通过，他准备去担任这次拜盟的主角。

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对四川是很熟悉的，同朱德一样，他们都是四川人，而且都在参加共产党以前有过十年战争经验。有趣的是，两人还分别在敌对的阵营里交过手。那一仗，由于朱德军队久战力疲，刘伯承取了胜。刘伯承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军人，这一切，在长征路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刘伯承于1892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11年，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对乡里人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而毅然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1915年，蔡愕在云南揭起了护

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就以四川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丰都一战，他的头部连中二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自右边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令人惊异的是，在重庆一家私人诊所手术时，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局部麻醉，那个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尽管每一刀都可以使平常人疼得大叫起来，而他却神态安然，端坐不动，仿佛是在给别人施行手术似的。这个手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不用说麻醉药的作用早已消失。最后这个德国医生给他包扎时，见椅子的两个扶手上都是汗水，就问：“你疼得很吧？”刘伯承竟坦然一笑说，“不多，不多，你才割了七十几刀。”德国医生惊导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记下数的。”从此事情传开，人们都说，刘伯承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将，而简直是一位战神。

这位青年最后以军事才干而名震全川。可惜他纵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在军阀混战中也难有所作为。他在熊克武手下长期担任主力旅参谋长的角色，为军队的实际指挥者与灵魂。然而，熊克武对他用而不信，长期不让他担任独当一面的正职，更拒绝了他的改革军队的要求。由于对熊氏彻底失望，他终于称病不起，退出军阀战争。

尽管党龄不长，但在党内他大名鼎鼎。刘伯承是建军初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他对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指挥和在南昌起义中的谋划筹策，赢得了共产党领导层内的一致赞许和佩服，曾被人称为无产阶级的孙武。在未与刘伯承接触之前，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曾提到，如果调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必须让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替换才行。可见刘伯承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位置是很高的，认为只有他才能指挥红四军，才能代替朱德。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候，1929年春，刘伯承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听了国内来人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的介绍后，由衷地对毛泽东肃然起敬，当即对同学屈武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搞出了这么个好的局面，真了不起。中国的武装斗争总算有了基础，只要坚持下去，胜利是毫无疑问的。我真希望现在就能回国，与毛泽东、朱德一道战斗。

然而，当刘伯承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起初一段时间。与毛泽东并非很切合。

刘伯承在中央红军起先担任红军学校校长。他曾努力把苏联学到的先进军事知识灌输到中国革命中，他主张把从事游击战的中央红军加以整训提高建设成为正规化的现代军队，他的观点与当时不满足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任弼时一致。在1932年的赣南会议上，对军事知识不多的任弼时，为了驳倒毛泽东，拉出了这位有名的军事家作证。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丢了兵权。不久。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参谋长。

1933年9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在李德等的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红军陷入严重的被动。当时刘伯承逐步看出李德等人推行的消极防御方针完全脱离了斗争实际，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多次向李德等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反而遭到李德的不满，指责他不会当参谋长。他看不惯李德闭门造车式的指挥方法和骄横跋扈的军阀作风，善意提出批评，更引起李德的忌恨，不让他参与重大的指挥活动。

有一次，李德竟当面申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

学习了几年。”当时，年轻的翻译怕双方闹僵，就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听了哈哈一笑说：“老弟，你可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刘伯承是很有耐力的，但是有一次他却实在忍不住了。这一天，几个机要员在院子里做饭，李德认为挡住了他的去路，就大发雷霆，一脚把饭锅踢了个底朝天。刘伯承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用俄语严正指责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说国际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这可不是小事，不久，博古就撤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去刘伯承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抓紧时间致力于总结和宣传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以期使上层领导改弦更张。1934年5月至9月，他接连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和《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专论，明确提出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据重地，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设想，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突进到蒋介石的后方去的战略方针，可谓不谋而合。

长征之切，毛泽东在军中活动时，发现刘伯承与他的观点已趋一致，心中大喜。在通道转兵前后几次会议上，刘伯承以他的缜密严谨的阐述支持了毛泽东。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初步扭转了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因消极退却造成的严重不利局势。会上毛泽东等力主重新起用刘伯承当总参谋长，得到会议通过。刘伯承一扫忧虑压抑的沉闷情绪，心情舒畅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长征中，刘伯承是毛泽东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他根据毛泽东等的意图严密计划，精心部署，保证了红军的胜利进军。四渡赤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积极提出带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供毛泽东等参考。

此后他被毛泽东任命为先遣司令，率部先遣，迭克强敌，屡闯险关，为红军前进开辟通路。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这一连串光辉的胜利中，充分显示了刘伯承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谋略。这也是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结果。毛泽东多次当面赞扬刘伯承的功绩。

为借路彝海结盟

工兵连边行军边砍树架桥，边修整道路。渐渐从行军队伍的前面落到了后面。

刚刚登上一个小山岗，他们看见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赤身裸体，这伙人走近后，对他们说：“我们是外埠商人，路过‘倮倮’区被‘蛮人’抢了东西，剥了衣服……”后来才知道，这群家伙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为了逃避红军的追击，冒险进入彝民区。他们过去后，战士们议论纷纷。连长王耀南和指学员罗荣分头向战士做解释工作，反复强调必须坚决执行总部的命令，无论如何不准开枪，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

刚走进离巴马房不远的一个山谷里，山上顿时响起了号角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许多彝民。他们手里拿着大刀、长矛，呐喊着蜂拥而来。工兵连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被围在中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兵连虽然不停地向他们解释，可他们好像一句也没听懂，嘴里还是“呜呼！呜呼！”一个劲地叫喊，彝民也越集越多。战士们又急又气，束手无策，进退两难。

不一会儿，彝民的几个人开始动手抢夺红军的武器和工具。当几个彝民挤到王耀南身边时，通信员小刘立刻上前挡住他们，可又高又大的彝民没费什么劲，就把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连枪带衣服抢了个精光。王耀南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待红军，一气之下，拔出了枪，打开了枪机。这时，周围的战士也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王耀南看到战士们的眼睛都一个个紧紧盯着他，像是在对他说：连长，打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保证把他们……这时指导员罗荣虽然被扒得精光，但他赤着身子还在大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王连长马上收回了枪，向周围战士命令道：“不准开枪！谁开枪就违犯党的政策……”还没说完，就被几个大个子彝民拧着王的胳膊把枪抢走了。接着，衣服也被抢走了。

侦察连的同志带着小叶丹的代表去见总部首长时，工兵连也跟着退出了彝民区。

工兵连刚退出彝民区不远，就看到路边坐满了红军战士。他们一看工兵连这副模样，便捧腹大笑起来：“工兵连真凉快呀！”“喂！你们到哪儿洗澡去了……”

他们一面笑着一面给工兵连凑衣服。当时虽然大家都很难，可是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工兵连穿。这时，军官曾保堂传令凡有3件衣服的（包括身上穿的）拿出1件，凡有两套衣服的拿出1套，马上集中交给工兵连。当晚，按照上级指示，工兵连返回大桥镇宿营。

刘伯承已经在彝寨边等来了主人小叶丹，他是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头散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一见小叶丹，刘伯承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双方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一位彝民拿来鸡，

因为没有带酒，用碗在海子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准备工作做好了。

结盟仪式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小山谷间，谷麻子附近的海子边上举行。这里是一个海拔 2000 多米，以生长细鳞鲤鱼而闻名的“鱼海子”的高山淡水湖，许多人又把它称为“彝海”。

刘伯承和小叶丹叔侄来到海子边上，他们面前摆着滴过鸡血的水碗。

办事人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军小战士看着有趣，不禁发出了笑声。又见刘伯承面色庄重，忙忍住不敢笑。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他水，刘伯承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这时夕阳西下，刘伯承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人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但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口气的意思。刘伯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刘伯承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伯承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六连走在前头，直到终点。刘伯承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刘伯承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 4 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 20 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簿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 10 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

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许多寨子，通过彝人交涉，都得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

在通过非小叶丹的寨子时，一些后续部队的情况并不那么好。一直担任后卫的五军团有许多人死于彝族人手。他们掉队了，彝族人突然袭击他们。彝族人不愿浪费子弹，他们只是拿走红军的枪，抢走粮食和背包，剥下衣服，把他们赶到树林里，这些赤身裸体的士兵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有的冻死，有的饿死在山上。

大渡河十七勇士

还在5月21日，当刘伯承、聂荣臻在冕宁城的时候，朱德就曾指示刘、聂，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5月24日黎明前，刘伯承、聂荣臻来到大渡河边的高地，透过浓雾看到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安顺场是河边一个有100户人家的村子。

红军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

下一步该是渡河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泯江，当地人又叫铜河。

大渡河以险要著称，江面虽不很宽，但是水流湍急。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船横渡时，要先拉牵到上游2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级，如对不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

72年前，太平天国农民军曾发生内部分裂，翼王石达开率部五六万人，到达安顺场准备渡过大渡河，适逢石达开妻生儿子，第二天，又传令休军三日庆祝，没有过河。就在休军庆祝生子的当夜，大渡河和松林小河水陡涨数丈。到第三天，清军已赶到大渡河北岸，布置了防务，强渡未成功。于是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军，且已拆断小河上的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比现在人数多得多，石达开全军被困47天。当时军心不稳，石达开本人亦动摇，他自缚入清营，全军均成俘虏，被血腥屠灭。

72年后的1935年5月，中央红军也来到了这个历史上出名的地方。

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5团，一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勇敢机智的斗争，胜利地到达大树堡。在这里，红5团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敌人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富林一线，为红1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约15里的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察。了解到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守敌有两个连，只有一条船，其余船只均被毁坏或抢走。渡口对岸有敌人一个团，团主力在下游15里处，该团一营驻在紧对岸，负责安顺场渡口的防务。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正向大渡河前进，大喜过望。因为他相信石达开失败的历史必会重演，红军一定会做“石达开第二”。为了“确保河防，困厄红军”，他严令大渡河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渡口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利用来掩护接近河岸的民房，以扫清射界。蒋介石确信大渡河河防是万无一失的。

军委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为此，军委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红1团立即进行动员和部署。

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1

团第1营是主攻部队，第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3营为预备队。孙继先刚到，聂荣臻就劈头盖脑地问：“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向他讲述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刘伯承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请总参谋长交待任务！”孙继先代表全营请战。刘伯承命令孙继先率领1营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迅速找船，再点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明白了。”孙继先知道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当晚，天下着小雨，部队踏着泥污小路偷袭安顺场，不到30分钟即打垮了敌人两个连。

在河边，红军战士发现了一只小船。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去。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推船，一推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不知下觉到了25日凌晨3点多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于是，他们亲自赶到了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孙继先听见叫他，赶紧答：“我在这里。”刘伯承说：“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这才省悟过来：光顾推船了，忘了点火报信。

杨得志团长来到大渡河边观察水势，他考虑了各种渡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泅水。可是大渡河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咆哮奔腾，有三百米宽，还有无数漩涡，人一下水就会被激流卷走。第二种方案是架桥。可是水流湍急，河面又被敌人火力封锁，又恰逢洪水季节，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棍也不容易办到。想来想去，只有靠部队夺得的那条木船强渡。他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在指挥员们研究战斗方案的时候，孙营长怎么也不能入睡。他组织部队把还在负隅顽抗的敌人消灭后，利用拂晓前仅有的宝贵时间，组织营连干部对水情和对岸的敌情、地形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

他们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水汹涌澎湃，每秒钟流速大约有四至五米。水中到处是急转的漩涡。那些礁石猛兽般地冒出水面，急浪打上，激起几丈高的浪花，惊心动魄。对岸是几十米高的峭壁，石壁劈开处，用石块砌成一条陡峭的台阶直通上去，这便是渡口。石阶共有四十多级，每一级有一尺多高、一尺宽，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石阶的顶端是敌人的工事，有三个独立的堡垒，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还有四个碉堡虎视眈眈地对着河面和石阶，碉堡周围布满着散兵壕，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就扼守在那里。离北岸渡口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坝，敌军团部就设在那里，如果双方一接火，敌人定会立即派来援兵。从地形和敌情上看，渡河夺取渡口实在是一场艰险无比的战斗。刘伯承、聂荣臻决定组织一支极其精悍的奋勇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穿过激流，用火力掩护，保证船能靠上码头，使勇士们冲上石阶，夺取敌人工事。同时，还要严密地封锁从安庆坝来增援的敌人。团长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

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怎么解释都不行。孙继先决定从2连里选派。2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会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肖桂兰等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他们都是2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仔细一看，原来是2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杨团长，杨团长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他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16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17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为队长。

由于船大小，一次容不下17位勇士，上级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掌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跳上了那只唯一的渡船。

杨得志说：“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对岸敌人，向渡船开火。

“打！”杨得志向炮兵下达了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成章的炮口，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随着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了半空。红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掩护着划船的乡亲们一桨一桨地拼命向前划去。

这时，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继续吹！”肖华马上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面去。此时，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红军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也继续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奋进。四周飞溅着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船边，掀起一个巨浪，小船剧烈地晃动起来。

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了下来。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了船上。杨得志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位战士急忙捂住了自己的手臂。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大礁石上，顿时溅起了一个高大的水柱。

几位船工奋力地用手撑着岩石，渡船却像转盘似地猛烈地旋转起来。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就有翻的危险了。

“撑住啊！”杨得志禁不住大声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几个船工，他们在难以停留的急流中，靠健壮的

体魄、熟练的游水技术，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的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协作，经过一阵紧张的搏斗，渡船终于脱离了险境。

渡船靠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这真是意志的考验，生命的搏击！

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同一股敌人，涌向了渡口。很明显，敌人企图把勇士们消灭在岸边。

“轰！轰！”两声巨响。赵成章射击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不偏不斜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一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也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打，狠狠地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

敌人溃迟了，慌乱地四处逃窜。

“打！打！延伸射击！”

“轰！轰！轰！”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渡船靠上了彼岸。这时，勇士们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打向岸边的敌人。勇士们终于占领了敌人设在渡口的工事，为第二船的战友们杀开了一条通路，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

第二船的勇士们和第一船的战友们会合后，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

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往对岸。红军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又缴获了敌人两只船。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由于三只船每次最多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卫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8根二号铁丝绳，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他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毛泽东分兵两路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来了。

5月25日深夜，住在一个小镇中药铺的毛泽东从李富春嘴里得知当地有个清朝末年的老秀才，名叫宋大顺，83岁了，石达开灭亡时已11岁，耳闻目睹当年那一幕石达开部万人被杀，眷属于人跳江的悲剧。虽已夜半时分，毛泽东睡意顿消，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老秀才。老秀才一进门，他亲自为他倒开水，嘘寒问暖，然后言归正题：“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

这位老秀才是位民间诗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答毛泽东：“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擂木蔽天。”

老秀才临出门时，真诚进言：“此地凶险，勿停留！”

在接到4团成功抢渡的消息后，毛泽东和总部首长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执行命令一贯是全军的表率。他事先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战士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急进，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

前方进入一片山林，半夜天上忽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忙把巨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油雨伞。毛泽东不时地随着风向的转变，一会儿把雨伞打在这个战士头上，一会儿又把雨伞打在那个战士身上，而把雨伞的破处，对在自己头上。

最后，他的衣服，象是刚从水盆里捞出来一般，帽沿上，袖口上，裤腿上，都在不断地往下滴水。在接下的路上，他用体温把衣服烘干了。

部队来到离安顺场约五六里的一个山脚下休息。附近有一块石碑。战士们围着观看碑文，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们中间，他看完了碑文，对大家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大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接着，毛泽东对石达开的失败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一到安顺场，立即赶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牛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

毛泽东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回答后，毛泽东紧接着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刘伯承回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兴致勃勃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见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了，周恩来赶紧为刘伯承解围，岔开了话题：“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接着表扬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这时，刘伯承摆出了面临的困难：“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刘、聂汇报了架桥和寻找渡船的情况，说明在短时间内全军渡河存在的困难。毛泽东深知石达开覆亡的历史，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1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2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毛泽东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固然是毛泽东深知必须两岸配合才更有把握夺取泸定桥，但主要是毛泽东遇事总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设想，一旦红军主力过不了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带红1师及干部团仍可坚持斗争。

一日急行两百四

泸定桥，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他令其第四旅在这里防守。该旅旅长袁国瑞以旅部驻于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以团长李金山率 38 团（缺一营）防守泸定铁索桥，以团长杨开诚率领 11 团布防于海子山、冷碛一带；以团长谢洪康率 10 团驻于飞越岭，作总预备队。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敌人甚为震惊，立即把防御重点转到泸定桥上。刘文辉命令第四旅死守泸定铁索桥，蒋介石急忙调兵向泸定桥增防和“追剿”。

兵贵神速。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必须在敌人增防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先头团红 4 团加速向泸定桥前进。

27 日清晨，4 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 320 里，命令规定 3 天赶到。他们行军的道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大概走了 30 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红军射击。为了避免无谓伤亡，红军只得绕路爬山，绕出 10 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约 60 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士们好像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1 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红军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坳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红军的去路。政委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团首长立即命令 3 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红军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 200 多人。

第二天，4 团首长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5 点钟就出发了。刚走出村子一二里，一个通信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 29 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

“29 号！”29 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 240 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 4 团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

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1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红军隔河齐头前进。如果红军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必须要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4团首长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要求部队在明天6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样从他们身边刮过去。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他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他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任务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红军，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红军前进方向乱放枪。红军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团首长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敌人向后溃逃了。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4团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4团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他们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红军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10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7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110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红军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他们并肩前进。

团首长下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红军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但是，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这边联络。暴露了这边是红军，如何是好？

4团决定利用今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3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10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团首长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政委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杨成武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杨成武骑着马走。杨成武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红军联络了。红军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战士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他们糊里糊涂地同红军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 12 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官兵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4 团在第二天早晨 6 点多钟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 240 里路。

奇兵飞夺泸定桥

红4团占领了泸定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杨政委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泸定桥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9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名：“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之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红军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红军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看完地形以后，4团首长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接着，团首长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4团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杨成武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急性子的3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嘴巴像打机关枪：“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团领导上指定了。团首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2连任突击队。接着杨成武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得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3连的任务也不轻，”杨成武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首长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

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3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3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突击英雄们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碉堡开火，子弹都飞进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近到桥中央，桥上的木板对这些敢死队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敌人的大部分子弹都迸了开去，或者落在对岸的悬崖上。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红军挡在桥上，用火力加以消灭。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南岸红军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冲进去呀！不怕火呀！冲啊！”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3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政委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

在4团夺占泸定桥时，还有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危险——敌人已做好了炸桥的准备。

这一危险被从安顺场赶至的红军部队排除了。

原来在红4团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的同时，已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红2、3团也奉命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直奔泸定桥。他们的任务是协同红4团夺取泸定桥。

安顺场离泸定桥200多里路，而且是崎岖的山路，天下着雨，红3团昼夜兼程。第二天中午时，在路上打垮了敌人南援的一个团，红军意图已被敌人发觉。所以当时上级命令3团1营为先锋营，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疾进，务必抢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

先锋营1营已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困倦的干部战士边走边打盹，有时后面的碰到前面的人摔一跤才醒过来。1营在距泸定桥四五里路的安乐坎与敌人一个营遭遇。他们迅速将这一营敌人全部击溃。从被俘敌兵口中得知，该营是敌38江防团2营，口令是“庐山”，特别口令是“雅安”。这时是5月29日凌晨时分，天还不亮。2、3团也都赶到了泸定桥附近，立即向泸定桥东侧敌人第四旅残部和20团的两个营展开攻击。先锋营1营2连同江防团溃敌一起混进泸定城。2排长程章云用“雅安”特别口令，带领2排混进了东岸桥边，夺了敌人4个碉堡，摧毁了一些临时工事。

2连指战员趁敌人晕头转向之机，又一鼓作气，夺取了两个暗堡，与敌人在桥头展开了混战。

这时率领先锋营的总支书记肖锋突然发现桥边有3根导火索“嘶嘶”地冒着火星。他心想：敌人要炸桥！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那么西岸的红4团夺取泸定桥就成了泡影，后果不堪设想。“跟我来！”肖锋大喊一声，扑

了上去，同4班长徐有林等3个同志冒着桥毁人亡的危险，用铁镐三下五除二把导火索砸断了，保住了铁索桥。奉命炸桥的敌28团2营营长徐涌泉，双手捂着耳朵听爆炸声，结果没听到爆炸声，却做了红军的俘虏。大渡河上的铁索桥有200多米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横架在河面上空。铁索桥上的木板，由于红军突然出现，敌人没来得及全部抽掉。

敌人想炸桥不成，就改为烧桥。霎时间，烈火熊熊，一片火海，桥东十几米的桥板被烧毁。一营干部战士兵分两路，一路在桥头烈火中与顽敌拼刺，另一路在桥头灭火，并寻找木板、门板铺桥。就在这个时候，西岸红4团的22名突击队员在廖大珠的带领下，攀援着碗口粗的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迎着熊熊烈火冲到桥东来。

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红军全部占领泸定桥，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然而，红3团与红4团会师时，却发生了误会。

夺取泸定桥后，4团立即派出配属4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康定）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

晚上10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他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1师3团的同志，这才知道1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两军会师，兴奋异常。

当聂荣臻和刘伯承带着3团冒雨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时，已是后半夜2时了。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他们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在他们又回到桥中间的时候，刘伯承心中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没有赶到泸定桥去向杨成武和4团的英雄们祝贺。三天之后他才露面、比前来向自己部下祝贺的林彪晚了48小时。

在数千名红军走完了突击队匆匆开辟的小路之后，毛泽东才沿着大渡河西岸从容不迫地北上。他一路上大多是缓步而行。他有时停下来，让工兵拓宽道路，或让红军部队先通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桥梁。他在日落之前便早早宿营了，第二天晚上住在摩西面，第三天很晚才到达泸定桥。周恩来和朱德都比他先到。

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并护送他们过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对岸迎接。

朱德来到泸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正走着，朱德突然停下来，

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德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

周恩来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亲自换下几块断裂的桥板，等着毛泽东的到来。黄昏前不久，毛泽东终于到了。毛泽东走过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时，脚下大渡河水白浪翻滚，但他毫不在意。毛泽东在河对岸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他说：“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又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朱德也一再表扬红4团夺取泸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

夺占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是渡过大渡河的两大重要行动，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红军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但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5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1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1师渡江，与2师4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4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当时夺不到泸定桥，红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

红军主力全部渡地大渡河后，长途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就完全被甩掉了。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和他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就宣告彻底破产了。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于6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所谓大渡河会战计划，就草草收场了。

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伟大胜利，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5月31日，刘文辉在成都为红军渡过大渡河专门发表谈话，他哀叹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已过了大渡河。”刘文辉并为自己推脱责任说：“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令刘文辉对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敌人有的高级将领对红军能胜利渡过大渡河也加以称赞：“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丰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第十章大雪山

蔡畅掩埋了“红桃”，走了不远，看见周恩来、朱德站在前面低着头默默站立着。他们的面前有一小堆雪，显然是刚刚堆起来的一座雪坟。

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曾计划在川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寻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岷江边的理番、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他们为迎接中央红军已向懋功前进，已到达夹金山北麓。当红军主力掉头南下、扼阻薛岳部北渡大渡河时，在汉源地区与敌进行了激战。毛泽东等认为不能在此与已有准备的守敌纠缠，立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尽快北上与红四方面军靠拢。为此，红军须尽快占领天全、芦山。

6月8日红一军团4团袭占天全，1团击溃川军的一个团占领芦山。

在天全、芦山，红一军团接到军委发布的指示，要全军迅速北上，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今小金）。中央军委把先锋任务交给了一军团。一军团4团充当全军前卫团走，他们必须在12日赶到懋功。

杨成武再打头阵

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4500米。山上白雪皑皑，雪光耀眼。

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红4团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访问。年长的老乡告诉他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这时，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蔽天日。要通过，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

红4团据此作了充足准备。

6月12日9时许，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麓进发。到达山下，脚下的路冻得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队伍一鼓作气爬上山腰。

4团2营为前卫营，6连为前卫连，战士们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他们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战士沿着前面闯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爬。队伍越拉越长，红旗的燃似火，战马喷着雾气，衔尾相随。宣传队站在队伍旁，前呼后应。喊声，歌声，说话声，马嘶声，震荡着白雪皑皑的山谷，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快的回声。

左面是松软的雪岩，右边是陡立的雪壁，中间是漫漫积雪，险峻情景，使人怵目惊心。

越往上走，路就越窄越陡，空气也越来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骤然下降。

明晃晃的阳光把白雪照得格外晶莹透亮。雪的反光刺得人们睁不开眼。每走一步，都要花很大力气。有的不慎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不等他喊，就有人送上木棍，绑腿，拽的拽，拉的拉。被救的人爬上来拍去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

路越来越陡，小道几乎笔立起来了。弯弯曲曲的山路，虽然经过前卫的一番修补，但是，骡、马行走，还是十分困难。这时，寒风吼叫，乌云蔽天，倾刻间阳光就不见了。那山峰上千年的积雪，瞬息变作腐朽疏松的土墙，一堆堆、一块块往下倾斜、倒塌。雪流翻卷，一泻千丈。它撞到坚硬的冰山上，又溅起无数冰团、雪屑，犹如银蛇狂舞，玉粉飞扬，凛冽的大风夹卷着它直打在指战员的脸上、手上，就像刀割似的。红军只能用手捂住脸，忍着痛，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地行进，透气都十分困难。虽然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也还是觉得冷。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人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

队伍刚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红军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

冰雹过后却是万里晴空。到后山顶，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到处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琼玉世界划成两半。

全团人马沿着山顶上的一条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又与风雪搏斗了四五个小时，安全地翻过了山顶。这时，团长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下山时，已不像以前那样吃力，战士们的歌声此起彼伏，荡漾在重重的山谷里。

刚到山脚，一道深沟切断去路，红军只得沿着沟边绕道而下。

这时，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团长和政委研究后，立即派出3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甲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4团是前卫团，怎么前面还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四方面军？正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与此同时，山下传来了清晰的“我们是四方面军”的喊声。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震得山谷抖动。4团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200多天，一万多里的征战，终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欣喜若狂！红1团在红4团之后跟进。在山脚下，团领导制定了翻越大雪山的四条措施：一是伤病员提前一小时出发，准备他们掉队；二是挑选一些身体较好的同志，组成担架队，在后边负责收容；三是炊事班要先行，下山后立即烧开水、做饭，保证部队一到能吃上饭；四是提倡阶级友爱，开展体力互助。党员和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翻山前一天傍晚，全团到雪山下“村落露营”。离山越近，天气越冷，战士们身上一点棉絮都没有，冻得睡不着。不少连队班以上干部围成一个圆圈，为战士们挡风御寒。有的干部待战士睡着后，把他们的头、手、脚揽到自己的怀里（睡着前战士们不肯），为他们取暖。战士们则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偎在一起，露宿在冰天野地里。炊事班的同志更辛苦。第二天一早，同志们还睡着，炊事员就起来做早饭了。因为各连要求这顿早饭要尽全力做好，让同志们愿意吃，吃得饱。不然下顿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团长杨得志很担心团政委黎林的身体。他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劝他休息很难，所以，他每天和他一块睡，想借此督促他休息，等他睡着了自已再起来到连队去。哪知，杨得志下半夜回来的时候，他那个铺上已经没有人了。他把夹被和油布铺展在杨得志的铺上，还给杨得志留了一张纸条，上面正正规规地写着：你这个同志又骗了我。睡一会吧，多盖些东西……6月的太阳挂在万里晴空，但它给人的感觉不再是炽热的火球，仿佛那的人的热力已被雪山吸尽，使它变得苍白无力。山底下雪不深；道路没有了，面对白茫茫的雪地，深浅莫测，红军只能靠手中的拐棍探索。但有时候拐棍“告诉”人冰层很厚，人一踏上去冰却破裂甚至塌陷，一旦掉进雪窝里就好长时间也爬不上来，甚至有牺牲生命的危险。

红1团过雪山没有遇上特大的风暴。杨得志小时候当长工，下煤矿，修公路，什么苦都受过，体质很好。当红军后，一天行军百十里，紧接着打仗，也都不感到特别累。可是，来到雪山上却感到很吃力。最大的问题是气短。腿发软，没有劲。腿肚子里像灌满了铅水似的，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手里的拐棍不由自主地老是颤抖。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似的。有的战士见他行走困难，一边来帮助，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团长，咱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少了一条：应该多吃些盐。听说吃了盐就有劲，可我们多少日子都没有吃上盐了，哪能有劲呢！”杨得志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边走边笑着说：“好，接受你的意见，下山后每人发一斤盐！”

翻山的时候，团里的几个干部作了分工。黎林政委在前，负责伤病员和

炊事班的队伍；杨得志团长居中照顾部队；胡发坚参谋长带担架队在后面收容。机关干部也部分到了连队。这时，杨得志非常担心黎林的身体，几次想追到前面去看看他。两人出发时间虽然只差一个钟头，但在雪山上要赶上这一段路程却很困难。

直到翻过山顶，下到山底，他才见到早到的黎林。黎林斜躺在团部炊事班灶旁边，见杨得志急步走来，便想起身。杨得志立即俯下身去问：“怎么样？”

黎林笑了笑，揉搓着自己的右胸，说：“还好，还好。就是胸部有点疼。不要紧，一会儿就好了。”

黎林很少说自己有什么不舒服，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杨得志看他此时脸色发黄，声音微弱，心里有些紧张。他只好让炊事员先给他盛一碗白开水。在雪山上，他只能做到这一点照顾了。

毛泽东拄杖步行

翻山之前，毛泽东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毛泽东身负全军的安危、敌人的枪弹、飞机并不是对毛泽东就格外开恩，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就在他身边被炸死。

那天，军委纵队翻越一座大山，因为山高路个人多，行进非常缓慢。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随着马达的一阵轰鸣声，天空中出现了几架敌机，大家还没来得及隐蔽，敌机扔下的炸弹便呼啸而来，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立即飞向毛泽东身边，把毛泽东推到了一边。顿时，“轰”的一声巨响，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倒，毛泽东和胡昌保被爆炸的烟雾笼罩，烟雾散去，陈昌奉等看到毛泽东满身是土地蹲着，下面躺着受伤的胡昌保，只听毛泽东喊着卫生员钟福昌：“快，给他上药！”

“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们继续前进吧！”胡昌保忍着剧烈疼痛说道。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一边安慰胡昌保，一边与钟福昌一起为他包扎伤口，然后，用双手把胡昌保抱住，安慰说：“胡昌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昌保深情地望着毛泽东，非常吃力地说：“主席，我知道，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牵挂，最可惜的是不能跟您向前走了……我不行了。您要……多多保重！”停了一会，又说：“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转告他们：我为革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叫他们不要难过，要跟着毛主席建设新中国！”

胡昌保的目光逐渐转向泪痕满面的班里同志，缓慢地、吃力他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啊！”

胡昌保停止了呼吸。班里的同志全哭了，毛泽东也哭了。毛泽东缓缓地从胡昌保脖子底下抽出手来，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把一条毯子打开盖在他的身上，然后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自己警卫班长的身边，很久，很久。

后来，毛泽东沉痛地说：“胡昌保，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战友们饱含泪水，掩埋好胡昌保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已经走到队伍前边的毛泽东还舍不得离开，他又折了回来，从战士手中接过工兵锹，再一次为警卫班长的坟头培土，培了一锹又一锹。

毛泽东与他身边人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非常关心爱护他们，他们也非常尊敬和保护他。

一次，黄昏时从茅台出发渡赤水河。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走路困难，他偷偷地告诉班长胡昌保，请允许他在后面走。胡昌保同意了。

毛泽东在很多时候兼负管理员的职责。在茅台河边等候渡船时，他照例要查问人数，而且是一个一个地查问，决不笼统含糊。他点与名问黄泽九，没有人答应。他便问胡昌保，胡昌保说：“黄泽九肚子痛，走在后面，马上就能赶上来。”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央求着说：“担架还是留你坐吧，把马给他就行了！”毛泽东说：“肚子痛怎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担架留下了，毛泽东命令上船出发。

这天夜里行军走了一百里山路，毛泽东坚持和战士们一起走路，不肯骑马。他尽管很疲劳，还是不断给大家讲笑话，鼓舞大家的情绪。

中央纵队来到雪山底下，即将爬雪山了。机要秘书黄有凤突然得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担忧怎样才能爬过雪山。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找卫生员给他服药治疗，又把自己的担架叫来，硬是让他躺上去。而毛泽东却拄着拐棍，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几滑地向着雪山高峰走去。

这是6月14日早晨的事。此前，毛泽东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身上穿着夹衣夹裤，脚上穿着黑色布鞋，却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他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

路上，有的战士陷入了过膝没腰的深雪里，毛泽东看见了，伸出有力的大手给拉了上来。警卫员吴吉清脚下一滑掉进了路边齐腰深的雪坑里，戴天福把他拉了起来，他发牢骚了：“这叫什么鬼山？我宁肯翻十座山岭，也不愿走这么一座雪山！”毛泽东听见了，笑着问：“吴吉清，你没见过雪山吧？”吴吉清说：“没有。”毛泽东鼓励他：“那你应该走走。这艰苦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很有趣嘛！”

突然间，狂风骤起，浓云密布，震耳欲聋的雷声，鸡蛋大小的冰雹的呼啸声汇合在一起，铺天盖地般狂扑而来。毛泽东和战士们手拉着手前进，他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过了一会，暴风冰雹骤然停止。毛泽东问：“这一场战斗怎么样？有负伤的没有？”饲养员老余诉苦说：“雹子把我的手打肿了。”毛泽东叫卫生员钟福昌给老余上药，老余说“不上不上”，拉着马前进了。

越来越接近山顶，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戴天福实在走不动了，他说：“我想坐一会儿。”说着，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回到了戴天福的身边，对他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吴吉清动作敏捷，抢在毛泽东的前面把小戴背到自己的背上，用尽最大的力气，在毛泽东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走去。

毛泽东迈步登上了雪山顶端，极目四望，容光焕发。他向正在登山的战士们招手，打招呼，鼓励他们向上攀登。

战士们太累了。攀登上雪山顶后，战士或三人或五人一伙地坐在雪地上休息，也有的躺在雪地上闭目养神。毛泽东来到坐着休息的战士们中间，说：“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

战士们听到毛泽东的话，都起来向山下走去，有许多人是“坐汽车”——坐在雪山坡上滑下去的。

毛泽东也加入了“坐汽车”行列。

林彪昏迷雪山顶

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

红三军团进至雪山脚下，彭德怀下令暂憩，亲自检查部队过山准备。大家吃着各自携带的干粮，彭德怀忽然发现军团教导队队长孙毅没有东西吃，马上把孙毅叫过来，从自己的干粮袋里倒出一半给他。孙毅不肯要，彭德怀笑笑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

红三军团警卫通讯班班长邱荣辉拖着沉重的步履往山上爬，当走到半山腰时，两眼一黑倒了下去。这时，军团长彭德怀和战士们一样，面色苍白，喘着气大声喊：“快，骑上骡子走！”邱荣辉站起来说：“能走。”可没走几步，又摔倒了。这个疲劳得奄奄一息的战士死活不肯骑上驮着文件的军团长的骡子，彭德怀急叫饲养员把骡子牵过来，又大声喊：“抓住尾巴！”邱荣辉就紧紧抓住骡子尾巴过了雪山。

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

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怕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不能休息，可实在是太糟了！肌肉麻木得好象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下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

部队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逐渐恢复。

对妇女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过雪山后，许多妇女不来月经。

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和炊事员。

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七十斤，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

长征之初，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有9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皮肤黝黑，平时不大说话，是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爱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他们江西老乡。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六七十斤。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之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炊事班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谷子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磨，就花钱向老乡买了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轻装，他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些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

雪山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自己却倒下了，不论大伙怎么喊，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再也起不来了。

军委纵队里有一个女同志，艰难地扶着一个小鬼往上走，三步一停，两步一站。那个小鬼像患了重病，步子歪歪斜斜，像快要跌倒似的。这位女同志是蔡畅。那个小鬼是蔡畅的警卫员，因为他长得秀丽，两颊总是那样绯红，大家都叫他“红桃”。“红桃”病了好几天了，刚才浇了一场雨雪，挨了一顿冰雹，病更加重了。脸像一块白纸，连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蔡大姐搀着他吃力地往山上拖。

山愈高，风愈寒。一阵阵寒风吹来，“红桃”浑身打颤，那一口白牙哒哒地响个不停。蔡畅立刻停住脚步，将自己的紫红色的毛衣脱了下来，穿在“红桃”的身上。“红桃”身上暖和了一些，但毕竟身体太弱，刚走出100多米，他的两腿忽地一软，就坐在雪坡上了。蔡畅连声叫：“‘红桃’，不行呀！不能坐下呀！”说着就拼命地拉他，刚拉起一点又坐下了。只见“红桃”眼泪汪汪地说：“蔡大姐，我实在不行了，我没照顾好你……你给我娘写封信吧！”说完，身子一仰，就倒在厚厚的雪地上了。

蔡畅守着“红桃”掩面而泣，竟像是母亲一般不愿离去。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红桃”掩埋在雪坑里，“红桃”就穿着蔡畅那件紫红色毛衣，睡在了雪山上。

蔡畅默默地向上走着。走了不远，看见远处站着一群人，周恩来、朱德也站在那里低着头默默站立着。他们的面前有一小堆雪，显然是刚刚堆起来的一座雪坟。

也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在长征途中他是卫生员。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

翻越雪山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

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在山腰他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他和红军战士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喊：“上来，上来呀！”

飞行员应该向蒋介石汇报了红军的消息。毛泽东指挥红军翻越夹金山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的。

当初，红军过了大渡河，甩掉了国民党十几万追兵，使蒋介石“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遭到惨败。蒋为此大为恼怒。5月31日命令薛岳及川军孙震、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各部合力围堵红军。6月2日，蒋介石在《劝告四川绅耆服务桑梓，协助剿匪，拯救民众书）中说：“朱毛溃奔川南，徐匪倾巢西窜，察其企图，实欲会股川西，另创苏区。”6月5日，他在成都召集川军高级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围堵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雅安地区，将红四方面军阻击在川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分别加以“围歼”。但是，红军过了夹金山，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雅安地区，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企图。

第十一章毛张会师

张国焘当时很想弄清中央红军的实力，他向周恩来、朱德试探……毛儿盖会议的气氛，使张国焘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他故作轻松地表示：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

两河口。1935年6月25日下午5时。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天公却不作美。

大雨滂沱，一匹白色骏马穿越雨雾，向两河口驰来。这是赶来会面的张国焘，他的身后有三十余骑护卫。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冒着瓢泼大雨，提前步行到抚边，在油布帐篷里等待张国焘的大驾光临。

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急忙从暗褐色的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等候。不一会儿，骑马的人们到来了，张国焘跳下了马。他身材高大，他那白晰的脸色同毛泽东的饱经风霜的面容大不相同。

部队在欢呼，几千名群众在欢呼。这些人走向平台，雨水从他们的军装上往下淌。毛泽东致了欢迎词，张国焘作了答词。然后，他们走进镇内，走向大喇嘛寺院，到那里举行宴会。

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在懋功已经休息了34天，急待他来共同商定今后的军事方针和战略决策。张国焘也说了一番渴慕的话语，然后告诉毛泽东，他看到6月14日的国民党报纸，有条消息断言毛泽东已被“倮倮”杀死。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第三次报道他的死讯了。张国焘也咧嘴笑着说：“你是一个很难被杀死的人。”周围的人听了都开怀大笑。这两位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现又各自率领方面军的要人，十几年来从来都互无好感，但毕竟是阔别重逢，都暂时把过去的嫌隙一笔勾销，按照礼仪之邦的规矩，互相客气着，在历史性会面的瞬间显得很亲热。

接下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人与张国焘、黄超等人相互敬酒。一时间杯盏叮咚，流觞交错，开怀畅饮，欢喜连声。

毛泽东照例用他的辣椒幽默活跃气氛。他一连吃了几只油炸的红辣椒，也不就菜，使得周围的同仁唏嘘不已。

毛泽东调侃道：“如果你不能吃辣子，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祖籍江西的博古当即表示异议，他反驳道，“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你湖南的辣子。”

张国焘勉强地笑了笑，没有作答。他觉得对于能不能吃辣子的争论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席间毛泽东等人既不讲当前的战略方针，不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以及年初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细节，也不盛赞他领导的四方面军所取得的成就。他隐隐发现他与诸位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相隔绝着。

张国焘两探虚实

在表面的欢乐气氛掩盖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暗流：怨愤、猜疑。张国焘当时很想弄清中央红军的实力，当天晚上，张国焘找周恩来了解情况：“恩来兄，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

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几下，笑着反问：“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

“我们还有 10 万人。”张国焘回答，并马上追问：“你们呢？”

周恩来想了想，说，“一方面军伤亡大，恐怕不到 3 万人了。”

双方部有些夸张，周夸张的程度要比张大得多。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作战部队大约有 5 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 8 万多人。一方面军的作战部队只剩 1 万余人，加上非战斗人员近两万，双方比例是 4：1。显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兵强马壮，张国焘感到有了实力资本，便滋长了野心。

周恩来走后，朱德来看望张国焘。张国焘与朱德剪烛话旧，谈了一个通宵。

朱德一坐下，找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朱德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惜着向张国焘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 8 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为 9 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达懋功时只剩 1 万多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 3500 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 3000 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 2000 人，罗炳辉的第 12 军只剩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 1 多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 5 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 10 颗罢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 8 年前南昌暴动他们在三河坝分手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 28 个人，甚至这 28 个人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

他又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又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作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1931 年 8 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指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取

何种军事行动。

朱德以极兴奋的心情，描述他对第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到在他没有看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

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一方面军的战士，满口说的都是称赞中央红军，高叫“欢迎中央红军”、“拥护中共中央”、“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因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张国焘也向朱德介绍了红四方面军转战情况和现状。

朱德通知张国焘，当天上午9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

实际上，在共产党内最有资历的莫过于张国焘了。1935年，他38岁。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上栗一个乡绅地主家庭。这是一个世代书香宦官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就是他的父亲张嘉铭，也是一位孝廉公；是当地最大的拥有近于顷土地和山林的客籍地主。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才使他受到充分的教育，在江西中学毕业后，便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从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以滔滔不绝的口才纵横一时，当时他已认识毛泽东，毛泽东那时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位暂聘的助理管理员。

张国焘既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又有很强的领袖欲。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那时，他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门徒，来沪之后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的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独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

他喜欢独立行动。他曾为自己起了不少的笔名和化名，如“特立”、“凯音”、“特”、“天师”等，以此表达他的超凡脱俗的个性和他的不同凡响的见解。

建党之初，他在北京组织起以他为核心的党内小集团，企图操纵共产党中央政策。在国共合作前夕，张国焘是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少数派之一，为此，1924年1月，张国焘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落选了中央委员，心情抑郁地离开党中央机关，调到北京从事铁路工人运动。2月初，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京秘密召开，张国焘担任总干事。

当年5月，张国焘被捕入狱。他在京嵌卫戍司令部的监牢里住了四个多月。是年10月下旬，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赶跑了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从狱中救出张国焘夫妻。

张国焘出狱以后，即不与家中通音讯，他的父亲颇为焦急，亲自至京访寻。遍觅一星期之久，才将住址找到，按址往访。当时张国焘正在寓中起草文件，见父亲突然到来，颇为惊导，怒喝道：“嘉铭，你来干什么？”叱父以名，在旧道中人视之，实为大逆不道，他父亲怒极，用手打去，张国焘起而还击，父子打起架来。幸亏旁人拉劝才解开。他的父亲出去后，即登报驱逐其子。申明脱离家庭关系。

南昌起义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自作主张，企图阻止周恩来等发起起义，或使起义延期，他认为这次武装起义是一次准备仓促的冒险活动，为此，张国焘受到了中央批评，他被派往苏联，在那里坐了四年的冷板凳。

在苏联，张国焘对后来王明那伙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物不屑一顾，他认为他们只学了些马列主义的皮毛，骨子里还流淌着中国穷秀才封建、清高而又僵化的血性。他一直用一种轻蔑的俯视的日光看待他们。但是，他并没有公开表明个人意见。作为中共元老，他受到了共产国际尊重和礼遇。

1931年，他被在上海的王明中央派去领导极其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与他同行的还有陈昌浩等人。他们是幸运的，一路护送他们到汉口的中央特科首脑顾顺章，在他们走后不久就被捕了，立即叛变，几乎使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全军覆灭。

在鄂豫皖，张国焘独掌大权，很快显示出了他的政治和战略才能。

他一直在作战。他的经历同毛泽东在江西的经历相似。他同蒋介石打仗，而且打赢了重要战役。他的根据地迁移了两次——第一次从鄂豫皖边区迁移到陕西——四川边界。

张国焘表现出他有独立行动的才干，这一点常使他（像毛一样）同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论。1932年，他从鄂豫皖迁移到陕西——四川边区，因为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遭到了批评。但是这次转移是成功的，批评声逐渐消失了。迁往四川省西北部之举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当时正在长征，几乎无法进行通信联络，张国焘不可能受到过分严厉的指责。

张国焘在大权在握时，对鄂豫皖进行了个人控制。他任用年轻的陈昌浩担任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重用周纯全、李特等形成一个小圈子，另一方面，他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徐向前这位军事奇才得以跃升为主要军事领袖，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都因战功得到了迅速升迁，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下手狠辣，逮捕兼处死了许多人，包括前军长许继慎等一大批革命元勋，还包括徐向前的第一位妻子。

在按自己意志办事方面，张国焘是无所顾忌的，在他看来，他在进行政治探索。

张国焘进入四川之后，没有进行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为此批评了他。过了大约两个月，大概是他决定留在这个地区之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就在会师之前，张又闹了一次独立。

1935年5月30日，在毛泽东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国焘宣布建立了他所谓的西北联邦。他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苏维埃组织，但成立了同少数民族（在这里占多数）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情况相适应的混合政权。

当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时，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而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

两河口初起纷争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王首道也参加了会议的秘密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向北还是向南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继起阐述：我们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此处南可防守，北可向蒙古靠近。

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张国焘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强调应迅速北出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以现在占领的地区为起点，用主力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消灭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向川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这个计划可名之为“川康计划”。如果我们北进，必须打通松潘，

进占甘南，估计胡宗南至少有 20 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 20 个团在松潘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亏。松潘以北是茫茫草地，一片泽国，我们将被地势所限而入困境。

从他的发言中不难听出，他的言辞非常巧妙，既不反对“北上”方针，也不放弃自己的“南下”方针。

毛泽东不赞成张国焘的川康计划，他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红军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也同意上述周和毛的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不同意向南发展，他说：“不能向成都去。”

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 万”之众。这时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不到两万人的情况后，顿时变了脸色，野心膨胀。在这次会议上，他明里不好反对攻打松潘，心中不愿攻打松潘，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他意在保存实力，不愿同胡宗南部战斗。他讲话不紧不慢，不阴不阳，绕圈子，不直接了当，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摆出各种困难、反对北上，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 20 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他讲道理，说得他理屈词穷，最后也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强调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战略方针是大家一致意志，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他还强调一、四方面军应统一领导，“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一、四方面军需调整和组织，办法再具体商量。

散会后，张国焘回到住处。午餐时，他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他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方。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张国焘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他的政治主张在两军会师立即被公开批评，令他震怒，他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黄超又告诉张国焘，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听了黄超这些话，张国焘心中更为不安，疑虑丛生。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张国焘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张闻天避免答复这个问题。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在两河口会议双方的意见交锋中，博古曾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引起了张国焘极大反感。会后，毛泽东劝博古说，不要讲这种刺激性的话。

不久，博古找张国焘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张国焘说话时多少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博古有些不顺耳，他一见面即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意识极不相称。

张国焘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只得向他解释一番。他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现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牛不相及的。

博古放下这个话头，说明了来意。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伙夫马夫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夫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张国焘：“难道援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博古指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他继续挑战，指出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张国焘对此表示抗议。他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他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大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他说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他决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两人不欢而散。

借肃反残杀无勋

两河口会议以后，张国焘重新翻过红桥山，回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杂谷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则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一座座大雪山，继续北上，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的第二高峰，高达 4300 多米。数日后，毛泽东等来到了川西北的卓克基。沿途藏民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宣传，已逃走一空、红军到处找不到粮食，只有继续前进。

7 月 1 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至毛儿盖地区。

毛儿盖是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 45 公里的一个藏民聚居的大村落，约有近 400 户人家，房子多数是用石头砌成的平顶藏族农舍。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青稞。7 月间，已是收割季节，这时青稞已经黄熟，等待收割。红一方面军部队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要北上去甘肃，部队需要休整，补充粮草，做好准备。一到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并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周恩来在草拟这具作战计划之后就病倒了。

毛儿盖休整期间，张国焘那里出了问题。

原来，张国焘根本不同意两河口会议决议。他认为这个决议是毛泽东等事先早已商定，如今压他服从而已。

中共中央派出了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人组成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张国焘也赶忙去迎接慰问团。实际上，他是去限制慰问团的。他对慰问团表面上很客气，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陪同，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他还背着慰问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大肆散布他反对北上的主张，攻击中央领导人“右倾逃跑”。他还把他所领导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不接受中央派去的干部。汗始，张闻天与李维汉谈话，要他参加慰问团后，就留在那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然而张国焘不欢迎，他派人陪着李维汉，实际上把李维汉留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李维汉因了解到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底细，感到无法担任这一职务，即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中央明白他的处境不妙，立即回电要他回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就这样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刘伯承、李富春等人在慰问期间，曾向张国焘询问曾中生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早在 1931 年曾中生任鄂豫皖军委主席时与一起“反革命颠覆案”有牵连，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下令革职审查，由张国焘取而代之，但究其内情并不详知。张国焘说，此人虽有领导错误和最大嫌疑，念其苦创鄂豫皖根据地有功，仍给以重用。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任其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现在正在下面整训部队准备北上。这使刘伯承、李富春等人感到满意，他们说对曾中生一案要提请中央尽快作出决断，张国焘满口答应。

慰问团的好心拯救行为，反而使张国焘惊恐，他采取了非常行动。

1931 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自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原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则退居军委会委员兼红四军政委，从此，张国焘便操握了鄂豫皖苏区的生杀大权。

曾中生、徐向前、邝继勋、许继慎、余笃山这些开创了鄂豫皖苏区，锻

造了红四军的元老们当然不会服服帖帖地任人摆布，于是张国焘等人借肃反为名来消除异己的清洗运动便接踵而来。打击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开创苏区的元老派，曾中生首当其冲。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后投入北伐，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10月调往鄂豫皖苏区。

在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前，曾中生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师长许继慎等将领已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红军发展到2万余人。

张国焘与曾中生矛盾的引发，是1931年夏天红四军主力南下之争：曾中生、徐向前等主张南下攻克英山、罗田、广济等城，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张国焘、陈昌浩等则认为这是冒险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主张肃整部队，原地扩大战果双方发生争执，被张国焘认为是对他的权威挑战。

不久，他借国民党特务的诬陷离间信，在苏区发起大规模肃反运动。他派陈昌浩率保卫局人员赶到四军，将许继慎逮捕。接着宣布撤销曾中生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担任。

1931年10月，张国焘在白雀园亲自主持“肃反”。仅一个月的大肃反、不列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被整肃的对象就有2000多人。被判处各种徒刑者300余人，有60多名师团干部被处决，红四军成了大清洗的重灾区。

张国焘在向中央写的《鄂豫皖苏区发展及肃反胜利原因）的报告中，曾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

……“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除贵族反革命的热浪，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

张国焘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当作成功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

红军早期领导人许继慎被处死。因为许平时总爱骑马作战，打手们将他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的后腿上，将他活活拖死在河滩上。

张国焘在“肃反”总结大会上说：“这就是政治。现在这个时候杀掉一两万个改组派、第三党分子也不奇怪！革命不要怕死人，今后红军要发展，要把整肃当作手段，不断地纯洁革命的队伍。”

张国焘胜利了。他借助于“肃反”把对立分子的铲除，取得了这块版土的绝对领导权，成了这块红色土地上唯我独尊的主人。

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被降职调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不久便被杀害于通江洪口场——那是在一个漆黑之夜，他被绳子勒死，弃尸郊外。相继，余笃山等20多名指挥员也惨遭杀害；被“重用”面任川陕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其实是个空衔）的曾中生遭到逮捕，长期监禁。原因是他们在陕南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撤离鄂豫皖进入川陕的得与失，并对张国焘独断的家长制作风提出了批评。

曾中生在1933年秋突遭监禁，在“带罪”走上征途的日子里，他忍受着严刑拷打和疾病的折磨，以“孙子臆足，《兵法》修列”而自勉，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论著，连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册。”并批准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部队。得知两军会师的消息，曾中生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自己的经历、遭遇和对党的一片赤诚，

希望中央明镜高悬，认真查处他的“问题”，洗雪他的“罪愆”。但他的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却被保卫局扣下，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心知，此“国土”终不为己所用，决定采取极端措施。

在李维汉返回中央后数日，一个朦胧的月色之夜，四方面军保卫局特工，骑马将脚戴铁镣的曾中生带到了一片森林，用一条绳子把曾中生活勒死。

恩来出让总政委

张国焘表面执行中央决定，暗中寻找着扩张权势的机会。

按中央军委下达的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由岷江两岸地区向北开进。

从整个作战部署上看，左、中路军向北迂回和右路军由南进攻，对胡宗南部形成夹击之势。若三路大军配合有力，一举夺取松潘即成定局。

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率领下，由懋功地区出发，在卓克基稍事休整后便日夜兼程，于7月6日到达毛儿盖地区的芦花镇。彭德怀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速率三军团一部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迎接徐向前的中路军抢渡黑水河。途中遇中路军先锋部队与驻守该地的胡宗甫一部展开激战，彭德怀遂令两个主力团投入战斗。两路军合股夹击，歼敌500余人，迫敌向马尔康一带撤退。

徐向前得知是彭德怀亲率部队前来接应，甚是兴奋，便与彭德怀约好在维谷河（黑水河的一条支流）渡口会面。

此时维谷河渡口的铁索桥已遭敌人破坏，两军只能隔河相望。于是相互喊话，但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谁也听不到对方的喊话声。

徐向前看见对岸那个身材粗壮的身影，断定是彭德怀，便迅速招手致意。彭德怀也频频挥手。

徐向前忽见对面掷过来一块小石头，石头上用绳子捆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在此迎接你！彭德怀。

徐向前也匆匆写了一张纸条，用绳子拴在一块小石头上掷过去：

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

于是两个人各自举着纸条向对方招手致意，都恨不得一步跨河去。后来，终于在另一个地点，发现了一条贯穿河面的溜索，溜索上悬吊有一只用藤条编的筐子。徐向前坐在筐子里，用力攀扯着滑到对岸。

彭德怀高兴地跑了上去。

两人紧紧地握手，拥抱——两位红军著名将领在沙场上纵横驰骋，神交已久，但从未晤面，而今在长征途中第一次相会了。

张国焘把手探向了一方面军。

两河口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政客手腕，在背后进行拉人活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的手首先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就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去吃饭，对聂、彭二人表示关怀，说他俩“很疲劳”，“干劲很大”，并说他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张国焘的“关心”，引起了两人的警惕。

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也要。往下两人再没有说下去，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这时，张国焘已从一方面军某人处得知了会理会议上林彪。彭德怀与毛泽东争吵的消息，便特别在彭德怀身上下功夫。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到彭德怀的住地活动，住在那里。黄超对彭德怀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

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彭德怀收下了。黄超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心中思索，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他本人干什么？黄超又说，张（国焘）主席很知道你。张主席筹划当前的战略方针，乃是“欲北伐必先南征”。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法子，你们在模仿吗？黄超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彭德怀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超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彭德怀很高的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只能是从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彭德怀对此思考了很久。

张国焘为了夺取领导权，取代中央，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军一些主要将领，另一方面鼓动四方面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改组中央，向中央要权。

7月9日，张国焘策动一些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司令部。

7月18日，张国焘的主要助手陈昌浩向中央发电称：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毛泽东和中央在毛儿盖休整，久等张国焘不至，对他着意拖延洞若观火。

对于张国焘到两河口以来的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同志非常气愤，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泽东进行了慎重的缜密的考虑，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毛泽东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决定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6月29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他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他受用了这次提升，继续增添砝码要价。

当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政治路线”，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在毛儿盖一带，中央同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之间，电报和人员往来频繁，北上还是西进、南下的争论，一直继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

在与张闻天商量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周恩来发着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

自从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痰里带有血脓。这

次他病得很重，体温升到 40 以上，神智昏迷，不时囁嚅说胡话。

经医生戴胡子诊断，周恩来得的是急性肝炎，又叫阿米巴肝脓肿。

遵照医嘱，警卫员们轮流从附近山上取雪化水，泡毛巾做冷敷给周恩来降温。三天后，体温逐渐下降，但身体虚弱得无法走动。

毛泽东一天来几次看望周恩来，并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此事：部队一旦行动，必须用担架抬着走。

彭德怀决定把仍拖着行军的两门迫击炮扔掉（一方面军当时共有 8 门这样的炮），腾出了 40 名战士，并把照顾周恩来、王稼祥的任务交给了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

32 岁的陈赓，曾任四方面军第 12 师师长，四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等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脸膛红润，看似腼腆，却很机警、潇洒、风流倜傥。他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一期生，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初战广东军阀时，他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介石拔出手枪要自杀，说：“我必须死在这里，我已无脸面见人……”说着正要扣动扳机，突然被陈赓一把夺下，不由分说，陈赓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后来陈赓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四方面军作战时被国民党抓住，蒋介石试图诱使他归顺国民党。尽管陈赓嗤之以鼻，蒋介石念他有救命之恩，还是把他放眼下，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仍不无幽默地对陈赓说：“你当年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要救我的命了。”

陈赓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反复讨论了对付张国焘的各种办法。对于张国焘公开讨要的军委主席一职，毛泽东坚决不让，在战争年代，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不能让于野心家。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当副主席，与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跟毛泽东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这样，中革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毛儿盖毛张斗智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为统一对四方面军的认识而召开的。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向前发言后，陈昌浩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他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第二天的会议未参加。

第二天的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

那时，经过遵义会议后，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较浓，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国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为了统一指挥，7月21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五军；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立即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及一、三军团和军委、毛泽东通讯的密电本，从此，一、三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络隔断了，与中央也不能直接通报了。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后，蒋介石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

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风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根据这一判断，他决定：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8月，上述各部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

张国焘自担任总政委以后，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他发现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他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大权仍在毛泽东之手。于是，要求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程序设计背后，蕴藏着他对全军军事指挥权的渴求。

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不得不同意他的要求。

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带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二人早就相识，但并不投机。毛泽东想把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亲切些，所以与张国焘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女）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噢，《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也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想摸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实意图，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敲张国焘讲话。但是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很不痛快。他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他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的提拔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增加他的人马，但是他不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

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问题。一次，张闻天对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因沙窝在毛儿盖以南40里，且属毛儿盖管辖，因此这次会议也叫毛儿盖会议。会议的议程有

两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组织问题。

沙窝四周皆山，山上树木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张国焘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他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说：“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于是陈昌浩只得暂驻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散会后和张国焘一同返回原驻地。

二张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张国焘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给张国焘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草案提出：

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必须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完成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军面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展对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张国焘心惊肉跳地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它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人发言。当晚会场外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张国焘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语调故作轻松。他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

他惋惜没有在抚边（两河口）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他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他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暗示使张国焘面色涨红了，他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

个中央。张国焘说，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最后，张国焘提出，中央应遴选一些四方面军的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他张某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什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中央拒绝，无异于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张国焘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去信心。而且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张国焘的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

毛泽东等为了团结，决定选拔部分四方面军干部到中央。会议期间，王稼祥、张闻天居间作了调解。在人选问题上，张国焘和张闻天讨价还价，磨了一阵、双方达成一致。重新开会时，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名单，是提升四方面军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3人候补中央委员，两人进政治局。

张国焘不满意，阴阳怪气他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他又反悔了，或者叫得寸进尺。

毛主席把他软顶回去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企图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七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因此，他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发怒了，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他向中央要权。继而又耐下性子耐心他说，红四方面军中的这些好同志，可以接受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挑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前

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向甘南进军。

沙窝会议前，徐向前见一方面军保存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从四方面军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中央同意从四方面军抽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第32团，三十军第270团，三十三军第294团，共3800人。沙窝会议前后，这三个团陆续补充到一、三军。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非常不满，他一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的明确规定，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还强调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应即开始出动。”

徐向前也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赶快向北出动，他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我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已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机关的粮食也将告罄，徐向前着急得很。他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

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北上。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

他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桃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他还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并强调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

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挺高兴，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最后，会议通过了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而形成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8月20日和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新决定，要求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敌，速出甘南。在第二次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条出敌不意的进军路线，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出乎蒋介石和“追剿”军司令薛岳的意料。蒋介石曾判断红军可能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动。如出西北，他认为松潘西北草地是不能行动的：“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薛岳也曾说过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因此，横跨草地，北出甘南，是毛泽东布下的一着险棋，也是一着妙棋。

第十二章大草地

起初，红军没有经验，当发现一名战士掉入泥潭的时候，身旁的战友，便急忙去拉，不仅没能救起，反而连自己也深陷进去，接着第三名战士也……就这样，在沼泽、泥潭上匆匆留下一顶顶嵌着红五星的八角帽。

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向大草原进军。

8月21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先行，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军。红军长征经过的这块草地，是一块纵横数百里，人迹罕至，没有房屋，没有牧民，没有羊群的一片大沼泽地，被深草覆盖着。

魔毯茫茫风雨稠

毛泽东对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大军经历过草地行军。他亲自抓右路军草地行军中的重大问题。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

毛泽东亲自向过草地先遣团——第一军第4团政委杨成武交代任务。他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4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毛泽东说：“北上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杨成武汇报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八名战士用担架抬他带路时，毛泽东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又嘱咐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泽东要杨成武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从徐向前和周恩来处回到毛泽东那里，中央保卫局长邓发问杨成武吃饭没有，杨成武回答没吃。

邓发听了，回到了毛泽东房里，不一会儿便端出来了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6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一边递给他，一边说：

“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杨成武心中一热，吃了其中的两个。

杨成武率领的先遣团是8月21日开始进入草地的。

杨成武骑在马上，举目远望，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林，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不知能否拔出脚来？60多岁的藏族通司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往北，只能走这条路！”“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过去，我就是这样，几天几夜走出了草地！”老通司呐呐地补充道。

同时，老通司又告诉大家：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使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稍作停顿，部队便按照通司的要求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踏着密集的草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由于天阴又有浓雾，根本分不清方向，好在可以靠通司和手中的指北针。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黑，中午突然一阵狂风，吹开了天上的积云，于是，天空忽然晴朗，从轻云里射下柔弱的阳光；可是，到了午后，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时，狂风四起，大雨滂沱；黄昏时，

由于被这一阵莫名其妙的暴雨袭击，河水挡住了去路，部队只能在一个稍高的小坡上露营。

团首长与战士们一起，把背包当作凳子，相互背靠着背，以对方的体温取暖，可这怎能抗冻呢？得烧点火烤烤才行啊！可是，带来的柴禾大都给淋湿了，好在宣传队有个叫郑金煜的小鬼，虽然只有17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他们就用这几根柴禾当引火柴，好不容易地点燃了。大家烤火时，又烧了一脸盆开水，每人分着喝了一小杯。有的还就这水拌着青稞麦面吃了一点。

吃过饭，大家正想睡上一觉。骤然间又下起倾盆大雨，雨中还夹杂有冰雹。油布、树棚、油纸伞都不顶用了。天漆黑，部队只能硬挺挺地坐着，忍受着，雨水直往身上淋，衣服都湿透了，全身冻得直发抖，但是谁也没有做声。就这样，背靠着背，半醒不睡地坐着，给雨淋着，度过了茫茫草地的第一个长夜。

第二天，拂晓时分，团首长命令吹响集合号，大家抬起又酸又重的两腿，又继续上路了。

耿飚、杨成武率领的先遣团走进草地后，紧随其后的是红一军主力部队，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军、三十军是另一条路，毛泽东和刚刚病愈的周恩来率红三军殿后。

进草地前，毛泽东抓了部队的粮食和衣服的准备。

一天，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以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吃，牛肉每人分一块，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毛泽东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分好后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因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他很为难的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张闻天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放了心。

进入藏族区后，藏族同胞因受欺骗胁迫都躲起来了，红军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战士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青稞、包谷，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每顿只能吃半饱，把两天的粮食分做三天吃。这是红军部队为求生存而斗争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与战士们吃同样的伙食。在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在路边的沟壕里发现了一些别人扔下的羊下水（羊肠、羊肚、羊肺等），他就让炊事员拣回来，收拾收拾，烹调好后，他与身边人员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算是长征路上的一次打牙祭。

毛泽东的伙食太差了。他的身边人员总想找点有营养的东西给他吃。在梭磨的一个喇嘛庙里，警卫员王七九找到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毛泽东知道后，厉声命令王七九把东西送回原地。

草地行军，是长征中最困难的行军之一。在草地中没有村庄，没有房屋，

只是偶而碰到几棵小树，一片沼泽，走路非常困难。第一无风雨交加，大家身上都淋得湿透。当天在一条小河边的一棵小树旁宿营，战士们为了让毛泽东能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绑在小树上，没有成功。正在战士们为睡觉发愁的时候，毛泽东过来了，他要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拿下，支起来。支好后，他笑着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战士们你瞧我，我瞧你，毛泽东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亲切地问：“是怕影响我睡觉吗？”“是！”有的战士回答说。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是大家好好的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说完，他让陈昌奉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急了，满脸涨得通红说：“不能因为我，使主席传染上……”他哽咽了，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只得慢慢地走向担架。这一夜，战士们和毛泽东挤在一起睡得很香甜。

白发苍苍四英雄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前方要渡过一条宽四十多米，深一米多的河，当地人叫它后河。这时，正赶上刚下过暴雨，只见上游的洪水顺着大河，白茫茫一片流下来，好象一直接到天边。滔滔的河水越涨越高、激浪滚浪，奔腾咆哮，因为河深水急，部队被阻挡住了这时，毛泽东看见童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位老人也赶上来了，便向这几位革命老人问寒问暖。当发现这些老人手里虽牵着马，但马身上都驮着沉甸甸的包袱、行李时，毛泽东就问道：

“你们怎么不骑上马走呢？”

徐老说：“我们红军大学的三个学生病了，我就给这头骡子找到了工作，让它驮着包袱、行李，不就给学生们减少了负担吗？我走走，不要紧！”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1876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一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学费。

在大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他早想当共产党，但是没有人要求他参加。他年已五十、他想共产党大概认为他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头高兴之极，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瞿秋白主持的教育部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遇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

参加长征的“四老”，徐老乐观，林老健谈，董老幽默，谢老斯文。可别看谢老斯斯文文的，又沉默寡言，却非常喜欢给战士们讲故事。

谢觉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在参加长征的几位革命老人中，他的身体是最差的。毛泽东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在长征途中曾设想把几位老人设法转移到上海等地工作。谢老知道后，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说：“越是艰难越锻炼人嘛！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还坚决表示：“宁可拖垮，也不愿离开中央一步。”

在撤离中央苏区时，谢老销毁和处理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却唯独保留了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就是红色政权的象征，绝不能丢失。在长征路上，这枚印章他总是随身携带，其他都精

简掉了，这枚印章他却舍不得精简。经过危险地区时，他总是把印章用绸子包好，系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这样一直带到了终点。

董必武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长征中受命于中央的安排，担任了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

董必武领导的干部休养连，是由老、弱、病、伤、妇女和首长的警卫人员组成的一个人数众多、任务繁杂、战斗力差的连队。要带好这个连队，其困难之大，超过正常的战斗连队。

董必武领导的干部休养连这种非战斗性的连队，往往是敌机空袭的目标。他们曾多次遭到敌机的袭击，几乎每次都有伤亡。这给董必武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长征之初，董必武自己也“中了弹”，当时他们正在开会，一架敌机突袭过来，扔下一颗炸弹，不偏不歪，恰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圆圈中间，不过它是一个哑弹，没有爆炸，落地后溅起来的泥土噼里啪啦地砸向他们。董必武的头上脸上都沾满了土，女红军危秀英和邓六金的脚被泥土埋没了，另一个女红军战士李坚真的身上也盖满了泥土。

那位须发斑白，戴着深度近观眼镜，身着戎装，腰系皮带，打着绑腿，拄着手杖，提着马灯的老英雄，就是民主革命的老战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近半百。担负着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和没收江发委员会主任的重担。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要筹粮筹款，保障长征部队的后勤供应。尽管情况复杂、时间紧迫，林老总是向执行征发没收工作的人员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强调一定要把情况切实摸清，该打（指打土豪）哪家，不打哪家，千万不能搞错，一定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有一次，他们连走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经过掩埋的坑里发现了200多斤粮食。筹粮人员正要往口袋里灌，林老却强调一定要弄清楚粮食主人的身份，如果是地主，将粮食全部没收，将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告示放在这里；如果是一般百姓，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老的指示，将钱和信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近10万大军云集在川西。这一带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隐藏了粮食，逃避一空，这就使红军的筹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部队屡屡断炊，为了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林老亲自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这里指藏民）麦子事的通令》，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成熟的麦子。（二）首先收割土司头子的麦子，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写在木板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木板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四）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严禁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五）收割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下，部队很快开始过河。因河中的水流很急，加上河水冰冷刺骨，使过河的速度很缓慢，后续部队汇集到这里的更多了。

不知是谁带的头，战士们竟趁在河岸等候过河的时候，热烈地要求蔡畅唱首《马赛曲》。蔡大姐为了鼓舞士气，也不推辞。只见她身穿军装，腰扎皮带，佩着手枪，站在队伍中，放开喉咙，以高昂的音调，用法语唱了起来。

那婉转激昂、振奋人心的歌声在空中回荡，很多伤病员从担架上抬起头来，周恩来牵着马，还随着旋律点着头轻声哼着，并用右手轻轻地打着拍子。毛泽东左手叉着腰，昂首望着茫茫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水，和大家一起静静地听着。歌罢，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徒步涉过河。警卫连的官兵手拉手地站在激流里筑成了一条水上长城，阻挡着汹涌的河水冲击，让伤病员、老同志和妇女们从身边安全地过河。

贺子珍身上还有敌人的弹片，她的伤还没有完全好。邓颖超因患肺病身体很虚弱。她们觉得同志们抬担架过河太艰难，说什么也不听劝阻，毅然决然地从担架上下来，跨入寒冷刺骨的河水，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迎着滔滔的急流，向对岸走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岸注视着她们，直到她们上岸为止。

那天晚上，在全体人员渡过河之后，生起了一大堆篝火。河岸是干燥的，而且有干柴，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火烤衣服取暖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来消除一天行军的疲劳。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下，坐下了。这是一场领袖与士兵的同乐晚会。彭德怀首先开口了：“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指战员们听得兴高采烈。毛泽东讲完后，他点将了，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

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了创造社，曾任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欧洲学习。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编辑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党》。1931年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军委干部团政治教员等职，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大知识分子。经毛泽东一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成仿吾起来发言了。他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讲了他从学习机械工程开始，转而学习创作小说、诗歌，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这一场高水平的文武聚会，是在千古荒原上进行的。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充满着阶级友爱和斗争激情，火光照耀着他们。

毛泽东痛别警卫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他总是一边行军一边工作，不是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嘱咐医务人员加强医疗护理工作。进入草地以后，他的工作更是繁忙，一旦发现伤病员缺粮，就立即指示副官处，在中途休息时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则坚持吃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提出给他马肉。但调查了他的粮袋，发现只有很少一点青稞麦了，就硬给警卫班留下二指宽一条马肉，警卫班瞒着毛泽东收下了。到宿营地后，炊事员准备把马肉混着野菜、野葱煮汤吃。毛泽东发现了，责备说：“你们又打埋伏了！”吩咐道：“马肉不能完全吃完，要给戴天福同志留下一些！”

警卫员戴天福年龄较小，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长征到大渡河时，他患了疟疾。进草地后，病势越来越重了，毛泽东一直非常照顾他。当有的战士说小戴是重病号，马肉一定能分到一份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下一些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正说着，只见警卫员钟福昌气喘吁吁地走来了，紧跟在他背后的担架员扛着担架。毛泽东一看担架员空手走来，就顶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但他还是不相信地向钟福昌问道：

“小钟，戴天福呢？”

钟福昌的嗓子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他语音沉痛地说：

“他在中途休息后，刚走了一里多路，就……牺牲了！”说着，掉下了眼泪，顺手交给主席一个纸包。

毛泽东打开那纸包一看，是二指宽的一条马肉，他的手禁不住微微地颤抖起来。小钟擦着眼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一席话，说得几个都哭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看得出，他是抑制着内心的悲痛。他拿着戴天福转给他的那一条马肉，翻过来，调过去，看了老半天，才慢慢地把马肉原样包起来。他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对胜利的信心。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说完，毛泽东遥望着南边，慢慢地摘下军帽。大家也都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致哀。毛泽东见大家含着眼泪，继续做饭了，他才将那包马肉装进衣袋里，夹起他那个小包袱，又象往常一样，去各连巡视去了，他难受得既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

彭德怀和战士们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到队伍的前头去指挥排除险情。有一次他几个干部把陷入淤泥中的战士用绳子捆住腰部往外拉，就这样连续救出了七八个人。

这时，红军指战员不仅要与大自然作殊死的搏斗，同时，还要与饥荒缺粮作斗争。虽然在过草地前，大家都尽力筹备干粮，可是因当地贫穷，不能满足数万红军的筹粮要求，走不到一半，许多人便告断炊。茫茫草原，不见人烟，要想补充粮食简直比登天还难。前卫部队就靠树皮、野菜充饥，可是

就连这一点树皮野菜也是有限的，后续部队连这一点点东西都找不到了。进入草地第5天，三军断了饮。

彭德怀焦急万分，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解决饥饿问题，要争取大家都能走出草地去。可是，到哪里去找粮食呢？

彭德怀一个人沉吟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立即叫人把老饲养员找来。

老饲养员一来，彭德怀就问他：“咱们一共还有几匹牲口了？”

老饲养员不知道军长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如实地说：“没多少了，连军长的那头大黑骡子算上，一共才有6匹。”

彭德怀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头来注视着老饲养员，把手往下一劈，断然地说：“全部杀掉！”

大黑骡子杀了，6匹牲口全都杀了。彭德怀命令军部只留下一点杂碎，其余的肉全部分给部队。就是靠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使他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在过草地时，红三军那个在雪山上牺牲了两名炊事员的炊事班又牺牲了三名成员。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老钱又向司务长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司务长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在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司务长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他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队伍的前面走，忽然，他身子一歪，倒了下去，一声不响地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跑过去，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来走。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儿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儿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得更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一个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第五天晚上宿营时，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在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话也有道理。那时候，他们连经过几次战斗，100多人只剩下30多个，也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长征路上，老钱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却把活儿抢过去自己干。长此下去，他瘦得皮包骨头，大家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说：“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倒。”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这天后半夜，老钱又偷偷爬起来为战友们烧开水。司务长知道他昨天还发高烧，就劝他赶快回去休息，可他怎么也不肯。司务长忽然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正要问他，只听到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司务长，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司务长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身后“噗通”一声，

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灶膛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却在渐渐变冷。有的人战死在战场上，有的人牺牲到酷刑下，而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默默地淌着泪水。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口铜锅担在司务长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了，流出了眼泪。司务长呢？眼泪早就干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连里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他们的连里。

谢益先让粮妇儿

普普通通的木棍，在草地上成了生命的拐杖，没有它，许多红军战士的经历会更艰难。为防雨，部队往往用棍子来搭帐篷。把棍子集中起来，以班为单位，根据棍子的长短、被单的大小，固定为几人一组。这样，每到宿营地，就可以迅速搭好帐篷，挖好排水沟，接着，找来草枝铺好地铺。

搭帐篷的时候，战士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制造了各式各样的搭法。如有用3根棍子、1个被单搭成三角形的；有用4根棍子作架、1根作梁、再用1个大被单搭成菱形的；也有的把一根棍子直埋在土里，用另1根作横梁，将被单一边系着上面，另一边系在地面，这叫条形帐篷。

棍子，还被战士们用来制作雨伞。当时，除了部分红军有斗笠、雨伞外，大部分是没有什么雨具的。这时，战士们就在一根根棍子上绑上两根小棍子，扎成“十字架”，再用一块儿包袱皮贴在“十字架”上，一把“雨伞”就成了。草地行军中，这样的“雨伞”可为不少人遮挡过雨雪。

草地上，经常是一些草沟、水潭、泥沼被绿草覆盖着，很难分辨得清，这时，棍子就“义不容辞”地发挥着作用，战士们通过用它试探其虚实，既避免了危险，又减轻些疲劳。

行军中，当暴雨夹着雹向红军倾泄时，战士们很难睁眼看清前面的路。于是，他们摸出一根根长棍，几个，十几个人默默地牵着，一个连着一个，一步跟着一步，艰难而顽强地前进着……多日的行军，使许多战士认识到棍子的重要性，而且把它们当成其生命的一部分。

红军的草地行军之难，恐怕除了饥饿的困扰、多变气候的折磨，就当属沼泽的“陷害”了。那稍稍高出地面的、一个个大小锅盖般的草墩儿，星罗棋布，让人一步一惊心。因为这里从来就没有坚实的土地。草墩儿之间，到处都是酱黄色的臭水，陈年烂草腐败其中，淤泥、污水搅混一潭。稍不留神儿，则后果不敢想象。

有的骡马不幸陷入泥潭。结果，拚命的挣扎，更加快了深陷的速度，很快就不见了。真可谓“马陷不见颈，人陷不见头”。

魔窟似的沼泽、泥潭，像一头凶残的野兽，不知吞噬了多少被饥寒、疲乏、伤病折磨到生命极限的红军战士。

起初，红军没有经验，不了解泥潭、沼泽的特性。当发现一名战士掉入泥潭的时候，身旁的战友，便急忙去拉，不仅没能救起，反而连自己也深陷进去，接着第三名战士也……就这样，急中生乱，在沼泽、泥潭上匆匆留下一顶顶嵌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后来，不知是谁先提出用棍子营救陷入泥潭战友的办法。一实践，果然灵验。让陷入泥潭的战士不要慌、不要动，大家站在较坚固的地方，向失足同志递去长棍子，然后，一齐使劲儿把他拉出来，就这样，使用此方法（照此法，还可用绳子、枪托），不知挽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

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向妇儿让粮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草地上，它将万占流传。

谢益先参军前是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恶霸打死了他的母亲，他含泪葬母，将弟弟寄养在亲戚家里，自己参加了红军。他平常言语不多，打起仗来却生龙活虎，恨不得一下把所有敌人消灭光。

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下令筹粮，准备过草地。由于部队多，粮食少，

每人只分到三四斤麦子。谢益先和所有红军战士一样，把它看成宝贝，用小布袋装起来了，走路背着，睡觉枕着，有的还在上面绣上自己的名字。谁心里都明白，这是保命粮，缺了它，就很难走出草地。

一天，大家正艰难地在没膝的水草中走着，忽听前面有孩子的哭声。走近前一看，原来是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坐在那里。母亲正安慰着怀里饿得直哭的孩子：“好孩子，别哭，明天妈妈给你买烧饼吃。”身旁那大一点的孩子听说烧饼，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问：“妈妈，能买到烧饼吗？”母亲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见此情景，红军战士的心像被什么击打着，有的抓出一把炒面送过去……部队又继续前进，但队列却不见了谢益先。大家正在着急，他从后面赶上来了。

有人问他：“你怎么掉队啦，病了吗？”

“没有，看那两个孩子来着！”他沉重地说。

“你认识他们吗？”

“我怎么认识他们呢！那个妇女说，她是川陕根据地的，亲人都被国民党杀了，她和一些老乡们在红军掩护下，才带着孩子逃出了虎口。如今她们断粮了，大人还好说，可是孩子怎么受得了？”

听了他的话，大家心里沉甸甸的。

此后，细心的同志发现，谢益先有了不寻常的变化：以前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为大家拾柴、烧水；现在呢，只要放下背包，他就一个人走开，等大家吃完东西才露面。问他“吃了没？”他就拍拍肚子说：“吃饱了！”次数多了，大家不相信了，后来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他是有意避开大家，去找野菜吃；在没有野菜的地方，就干脆喝点凉水了事。

班长对他说：“你还是吃点粮食吧，不够，大家凑点！”

他却坦然地说：“日子长着呢，能省点就省点。班长，你放心，我还有呢！”

话是这么说，但他的身体却越来越不顶事，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临牺牲前，他嘴里还喃喃地叨咕：“那两个孩子不知怎么样了？”

大约是走出草地那天，同班红军战士又见到了那位妇女。她一见面就问：“喂，同志，姓谢的同志在吗？”说着拿出一个写着“谢”字的粮袋。当她得知谢益先已经牺牲时，楞住了，紧接着流出了悲伤的泪水，对孩子说：“孩子，可要记住呀，我们是红军叔叔用生命救出来的啊！……”

聂荣臻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过草地前，杨尚昆调往军委机关，李富春接任三军政委）打了一个电报，把他们沿途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其中有一段是：“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10天以后，聂荣臻得到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上面说：“据三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以上……”

三军自己落伍与牺牲的人数却无法统计。

经过六七天极为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魔毯”，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巴西，两地距离很近。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

南部扼守。胡宗南得悉红军北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 49 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8 月 26 日，徐向前因一、三军长征中减员较多，向党中央建议由三十军、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前敌总指挥部致电红三十军首长：“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 49 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 49 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 49 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立即命令以 89 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然后他二人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了情况。

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在徐向前的亲自部署指挥下，从 8 月 29 日至 31 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奋勇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 4000 余人，俘敌 8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500 余支，轻重机枪 70 余挺，电台一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

包座之战，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在徐向前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打开了红军北出甘南的通道。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为红军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贺子珍弟被处死

在经过藏族地区时，贺子珍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长到十二三岁便跟着哥哥姐姐上了井冈山。1930年10月，贺敏仁在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中当小号手，黄公略把他当作自己的“干伢子”。1931年10月，黄公略在吉安东固与敌作战中遭敌机轰炸而不幸殉难，贺敏仁调到某团当司号兵。由于他年龄小，又长得机灵，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戏谑地称他是“红军小舅子”。

正由于姐姐与毛泽东这层关系，贺敏仁平时便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瞧不起周围的干部战士，以致渐渐与周围的同志相处得不太友好了。部队北上途中，进驻藏族地区，在经过一座喇嘛庙时，发现了藏民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元和铜板，战士们看见了没人敢动，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拣起些银元和铜板跑了出来，想以后可以用来买些吃的。但此事很快便捅到团部，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并有人告发说，他窃取了一千多块大洋。

团部将这一严重违纪事件报告师部，师部下令将贺敏仁绑了看押起来。贺敏仁不服，说这完全是有人诬告，自己只拿了百十块铜板和银元，而不是一千多块。有人说，拿一百块和拿一千块性质同样恶劣，必须执行铁的纪律，不论是谁，都应严惩不贷。团领导为此事颇伤脑筋，考虑到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建议师部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再作处置。与此同时，贺敏仁也恳求一位永新老乡，替他想办法转告姐姐贺子珍，希望姐姐干预此事，救小弟一命。

师部根据团部的建议，决定给毛泽东发个电报。电报一拖再拖，误了不少时间，但还是终于发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接到电报。是中央其他领导处理的，意见是，调查核实，缓期执行。

当师部接到中央的电报时，贺敏仁已被处决了……弟弟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屈喊，贺子珍没有听到。红军铁的纪律她是知道的：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江西苏区，红军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是因为它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记得有一位营长摘了农民一筐南瓜，忘了付钱，当被同伴们检举出来后，这位营长除向农户付钱赔情外，又被革职审查，开除党籍。在一天夜里，营长用腰带将自己勒死了……贺敏仁的行为违犯了纪律，必须执行纪律，决不能徇私情，不然就难以服众。在红军铁的纪律面前，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但是，一个才16岁的娃子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他背也背不动啊！在井冈山建军之初，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即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

- 第一，行动听指挥；
- 第二，不拿贫农一点东西；
-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总结出八项注意：

- 一、上门板；
- 二、捆铺草；
-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 四、借东西要还；
- 五、损坏东西要赔；

-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 七、买东西要付钱；
-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

这些军纪推广到全军，成了工农红军的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

长征之初，红军政治部门时时处处抓紧部队的纪律检查。

如三军团某上士袁子何，行军中故意逗留在后面，枪杀群众的鸡鸭，乱拿群众的东西。领导发觉后纠正，袁子何不服从命令，仍旧自由行动。后经上级机关批准，执行枪决。“红星”直属队工兵连指导员李新贵，私自拿土豪的谷子，用来换鞋子，还自行没收土豪的财产，经上级批准撤职，并罚做苦工。

买卖公平是一个难题。由于革命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在白区不能通用，而红军战士所得薪饷，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他们用这些纸币向白区群众买东西，就容易发生纠纷，而且容易损害群众利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红军领导机关决定部队每到一地，就以师为单位，由供给机关设立临时兑换处，专门兑换群众手中持有的苏维埃纸币。为此，一方面张贴布告，使群众知道苏维埃纸币可以兑换成通用的货币；另一方面教育全体红军指战员，在使用苏维埃纸币时，要向群众作解释工作，告诉他们兑换的地点，严格制止强行苏维埃纸币的行为。

行军途中，战士随地大便，会影响到部队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领导机关的注意，专门在《红星》报上提出：战士不要到处屙屎，要实行挖厕所如厕的办法。指出：到处屙屎，不仅有碍卫生，而且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同时提议采取下面的办法来消灭随地大便的现象，特别要求连队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来执行：

一、每到一处，以排或班为单位挖厕所，出发时将厕所土埋好。

二、对原有的厕所，出发前打扫一次。

三、注意对运输员和什务员的教育，发动全体战士来与这种（随地大便的）坏现象作斗争。

对于红军的严明纪律，蒋介石是十分恐慌的，蒋介石曾专门以红军的有纪律来训导其部下。1935年3月6日，蒋介石在致刘湘、潘文华的电报中说：

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均实遵照上月养已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第十三章脱险北上

彭德怀低声问毛泽东：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或者挟持中央南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想了很久，才吐出两个字：不可。

毛泽东显得很沉重的样子、站在院子里，对徐向前说，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你看怎么办啊！毛泽东是在试探徐向前。如果他认为徐向前和张国焘一样，就不会去找他；如果他完全信任徐向前，就会把话挑明。

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取得包座大捷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里，蒋顿时大怒，立即下令把 49 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并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 14 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这时敌人在甘南兵力比较空虚，利于红军出击。

至此，毛泽东等率领的右路军完全走出了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草地，再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魔毯”般的草地没有成为红军的陷阱，上下包座也没有成为红军的生存障碍。

红军的陷阱是张国焘，红军的生存障碍是张国焘。

陈昌浩同意南下

当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向阿坝一带活动。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付南前进。

但是，张国焘到阿坝后，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8月24日，党中央还在草地行军途中，就发电报给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徐、陈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指出：“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对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不为所动。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左路军开始向草地前进，前卫红五军到达了墨洼附近。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称：“（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这份电报的实质是主张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所提的两个“理由”，实际上是两个借口。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当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何况，红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渡过河去。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现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他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严辞拒绝后，他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包座大捷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一军向俄界地区探路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利用有利时机早日北进，并反复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为

此，党中央几乎每天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多次与陈昌浩谈话，做工作，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是颇费一番苦心的。首先，电报说明右路军，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向北突击的有利条件。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的一军已向甘南的俄界探进，是否继续前进占领罗达，让三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速请总政委“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其次，表明中央也十分尊重张国焘的南进主张，“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内部争端。因为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又极有个性，颇不好斗，且对张闻天、毛泽东的印象又不是那么好，“所以对其不能大过于锋芒毕露”。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只好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意北进更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5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所以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又接着，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呼吁团结的重要，左右两路军“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并直言不讳地讲明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同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大概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时势的发展，已到了决断的时刻，张国焘终于作出了决断——不是同意北上，而是凭借实力解决南下问题。

当天，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同日（即9月8日），他又向左路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詹才芳发出电令：“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徐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他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他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恩来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来了。会前，毛泽东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

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接着，中央即以与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木（？）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固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致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9月8日22时9日，张国焘电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终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洋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两人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彭德怀密议扣人

在激烈争论中，中央和一方面军领导人越来越觉察到气氛的异常。

8月底，聂荣臻对同事和部下打招呼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他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他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荣臻反驳道，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林彪不以为然：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动了怒，一拍桌子，一个盘子打翻在地，他说道：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时左权、朱瑞都在场，他俩都未表态。争吵之后，林彪似有所悟。

彭德怀曾见识到张国焘的手下表现，对张国焘的一套当时已起警惕之意。

这次北进，三军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的激烈争论使他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至20里。

彭德怀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他只是为了到毛泽东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往在三军军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彭每天都去前总，他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彭德怀得知一军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

这时彭德怀已失去了与他的老战友红一军的联系，因为张国焘在“整编”总司令部时已把红一、三军的密电码收走，只有他和陈昌浩才能和所有各部队直接联系。在这动静愈来愈不妙的关头，彭德怀果断决定改变这一僵局。他令部下另准备一部电台，新编了密本，公开理由是要与一军联络，而未说为了防止突然事变。他派武亭（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9月9日午前彭德怀又到前总，与陈、徐商议北进事宜。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彭德怀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

私下他判断，肯定是张国焘又来电报，令陈昌浩改变了主意。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必须报告中央。出了前指的门，彭德怀即向毛泽东住处奔去。

从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得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把昨日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这才把他暗中的警觉向毛泽东讲述。毛泽东认为有理。

彭德怀低声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已前走了两

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或者挟持中央南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很久，才吐出两个字：不可。

彭德怀听了，心中顿感很难过：如强制三军南进，一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毛泽东是否缺乏足够警惕性？

扣押人质的意见，彭德怀未向第三人讲起，只是在处境危急时刻，向统帅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建议，一切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

两人按下此事不提。彭德怀有事出门。

叶剑英偷送密电

彭德怀走后约个把小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匆匆忙忙地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递上一个条子，毛泽东接过一看，大吃一惊——

张国焘决定向中央下手！

叶剑英平日风流儒雅，擅长诗词，性格宽厚温和颇似一位干练的师爷。他已有从事革命事业近 17 年的丰富阅历，仿佛中国历史上的“福将”，每在关键时之处于关键之位做出非常之事。

1897 年 4 月 28 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梅县，早年从云南讲武学堂毕业后，即投奔于孙中山的部队中，追随中山先生革命。

陈炯明叛变时，他是陈炯明下面一个营长，毅然保护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与叛军作战。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很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当了二师师长，他本可平步青云，可是当他看到蒋介石残杀工人群众，毅然弃职出走，声明反蒋，蒋介石听说后还不肯相信。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等人企图利用开会之机，诱杀叶挺、贺龙，也是他事先侦知了消息，告知了叶、贺，才幸免于难。

1927 年 12 月，他利用军阀张发奎对他的信任，掌握了教导团、警卫团的军权。共产党人凭借这两支部队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上海辗转至苏联学习。30 年代回国后，叶剑英潜至中央苏区，曾任总参谋长一职。在指挥一个师参战失利后，李德把他撤职，调任军委第四局局长。

长征前夕，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 A、B、C 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剑英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儿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后，获得解放，重新安置工作，成了部队的骨干之一。

叶剑英长期从事军事参谋事务，精干管理，他有个特点，服从上级领导的观念、组织纪律性观念比较强。所以，当时他和朱德、周恩来的关系都很好，和项英也不错，就是和李德搞得不好。

早在江西，他就暗服毛泽东的战略才干，始终认为毛泽东还是了不起。尤其李德来了之后，更认为李德的这一套不行，很留恋毛泽东的指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掌权，他是非常欢迎的，会议结束当晚，他就下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进进出出兜圈子。一天路过一个小山谷，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那时毛、朱、周都在伏袭圈里，敌军喊着活捉“朱毛”，就冲下山来，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叶剑英带领通讯排从后面赶来，很快占领对面山头，从上面往下打，赶跑了敌人。事后人们说，这次没有叶副司令来，我们的命就没了。

还有一次，1935 年 3 月在打鼓新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军委会，讨论成立

指挥小组问题。会议期间蒋介石的飞机突然来了，当时他什么都顾不得了，眼疾手快，大喊“主席跟我来！”拉着毛泽东就跑，跑到一个山沟，和毛泽东藏在草丛中，直到敌机离去，才安全走出。这一次虽然算不上是救毛泽东，但通过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很看重和爱护毛泽东，觉得中国革命是少不了他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被任命为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当时，张国焘给中央的电报，党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和指令，一般均同时告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叶剑英对双方的激烈争执了如指掌。凭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早已看出张国焘和陈昌浩有异心，心中暗作打算。

9日这天中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陈昌浩正在作长篇讲话时，译电员拿了一份新电报进来，见总政治部主任正讲得兴起，便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顺手一看，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徐的：

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若违，坚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吓了一跳，脸上却不露声色，他沉着地装出随意样子，把电报如往常一样塞进衣袋。呆了一会儿，他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拐弯后飞跑着直奔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看，顿时毛发直竖，从口袋中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叶剑英赶紧跑了回去，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把电文转交给陈昌浩的秘书。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忙找到张闻天、博古和在附近办事的彭德怀，把抄件传给他们看，众人大惊失色，此时，离彭德怀与毛泽东密议不到两小时。

众人合议，当晚中央要员赶至彭德怀和三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离开这一是非之地。

临行前，毛泽东决定对陈、徐二人作最后的争取。当毛泽东来到离他住处仅数百米之距的前指总部时，已是黄昏，陈昌浩在读到张国焘的电文后，心中掀起怎样的波澜，不得而知。当毛泽东来到时，他把电文中张国焘坚决要求一、四方面军一道南下的意思转述了一遍，却省去了关键字眼。

毛泽东明确地问他：“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带着无奈的口气答道：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一军调回来哪。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军部，我和洛甫与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好，就这么办吧！”陈昌浩同意了。

陈昌浩没想到，这是毛泽东巧施的“金蝉脱壳”之计。

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所住的院子，他也不进门，就在院子中喊出徐向前，心情沉重地问他：“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

毛泽东听出了徐向前的意思，就嘱咐他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彭德怀临行前，找到叶剑英，两人密议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二

局（军委直属队），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军部北进，叶剑英同意想办法。

博占和张闻天临走前找到叶剑英，对他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他对两人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当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在三军军部会合，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西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如果中央和红三军当时被裹胁南下，很难避免与张国焘火并的命运。当时张国焘已基本操纵了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拥有8万兵力，而红三军当时不到4千兵力。即使寻机再度北上，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红军将被局于大西南荒凉之地。毛泽东率一、三军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党中央连夜北上

准备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而迅速地进行。究竟怎样带走军委直属队？叶剑英颇动了番脑筋。猛然，他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这电报作文章。

他先找到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徐向前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叶剑英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叶剑英拿给陈昌浩看，陈昌浩认为很好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叶剑英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叶剑英把真相讲了出来，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他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叶剑英回到喇嘛庙，叶剑英和徐、陈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大家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叶剑英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他九点钟上了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他预先曾派了一个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把它藏在床底下的藤箱子里。起床后，他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叶剑英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叶剑英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交地图给萧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叶剑英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叶剑英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叶剑英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叶怕惊动旁人就走了。他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作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他来不及通知其他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

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人也不觉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两人躲过巡逻队，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大家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笑道：“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与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博古会合了。他们着急地说：“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一样走嘛！”叶剑英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军委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20多里路足足摸索了6个小时，拂晓时到达。在阿西见到毛泽东，王稼祥等，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

俄界前进，与一军会合。

中央机关的出发工作，由组织部长李维汉负责。博古亲自向李维汉交代任务，他说：“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见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要李维汉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同北上，并叮嘱他对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立即分别通知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与曹菊如共同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叫他们明天凌晨组织部队行动，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当天晚上，李维汉到街上走了两趟，观察动静，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中央机关北上意图，他见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丝毫察觉，才放心了。

9月10日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等候、指挥，党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都出发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有走出来，他立即跑到政府机关驻地督促，告诉他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这样，政府机关也很快出发了。

半夜三更，凯丰来到中央机关住处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中央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又对大家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这时，有几个人骑着马向他们这边跑过来。大家定睛看时，是张闻天来了，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大家高兴地招呼他。

张闻天跟他们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前指副参谋长李特带了队伍来追，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走吧。说完，就同他们分开了。

那是9月10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红军大学情况比较复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委干部团一部与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党总支部书记莫文骅，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军委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团政委宋任穷曾对李富春和刘少奇提出：“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9月10日凌晨，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莫文骅床边，把他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莫文骅意识到这是军委示意他通知的，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并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处，通知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北进。

凌晨3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韦国清、宋任穷立即集合全团干部、学员出发北上了。红军大学全部都出发了。何畏一接到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北进中，李德与科特团同行。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在单独北上行动中，毛泽东要求红三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

彭德怀决定以红 10 团担负这一任务，彭德怀亲自向红 10 团政委杨勇交代任务，杨勇小心地说：“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彭德怀说：“那也没得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要走到一块儿。”杨勇又担心地问：“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打我们？”彭德怀说：“有可能，要作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杨勇接受了任务，连夜作了妥善布置，并到各营逐一仔细检查。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 10 团在后尾前进。在行进中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向前一言避火并

9月10日，天亮后，徐向前刚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为吃惊。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到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他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陈昌浩立即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大屋里气氛紧张异常。在这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多数领导忧心忡忡，担心会给革命和两支红军造成严重的恶果。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愣了神，他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这时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打，还是不打？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1924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一个曾在太原街头带领学生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小学教员，忽一日竟出现在革命中心的五羊城——他千里迢迢，投笔从戎，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参加了国民党。那时徐向前24岁，已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但是为了寻求革命，他不得不瞒着家庭去了广州。不久他的妻子便病故了。

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是校长，每期学生入学后他都要逐个单独接见谈话。轮到徐向前时，他进去后站着，蒋介石坐着。蒋介石问：“你叫什么名字？”徐向前答：“徐象谦（这是徐向前以前的名字）。”“哪里人？”“山西人。”“在家干过什么？”“教过书。”当时军校学生见到蒋校长都要自我推荐一下，给校长印象深些，日后图个提升什么的。蒋介石也很希望听听学生的谈话。但对于徐向前是蒋问一句，他答一句，不肯多说一句话。蒋介石立刻挥挥手，徐向前出去了。

蒋介石哪曾想到，就是这位不善言辞和交际的学生，日后成长为统兵数万令他头痛的“悍匪”？

东征时，徐向前任学生军排长，毕业后分回河南国民革命军二军，北伐军占领武汉，他在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任少校队长。他参加南昌起义未成，赶上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了东江游击战争。

1929年，徐向前被中央派往鄂豫皖，作为军事干部，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在艰苦的游击运动中，他探索了一套出奇制胜的战法，如游击战术7原则、围点打援等，创造了系列辉煌的军事胜利。

张国焘到了鄂豫皖后，撤换了主要的创业元老，把徐向前提升为军长，后升任新成立的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四方面军由分散的游击部队成长为全国主力红军之一，在军事上，徐向前立下了第一位的功劳。

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60多万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主持下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徐向前率主力西征，几经奋战，辗转入川，与张国焘等人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

命根据地。尔后他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闯关夺隘，抢险飞渡，并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

尽管受到张国焘的重用，心中不无感念，但徐向前对张国焘总觉得不相融洽，共处多年，许多问题说不到一块。徐向前自身个性的拘谨是一种原因，但并非实质性因素。在万源保卫战抗击川军六路进攻的战役中，徐向前设计了一种“收紧阵地”的战术，诱敌深入、攻坚、疲乏，最后是收获的时节，徐向前主张向敌后实施大纵深迂回，张国焘来电反对，要搞浅迂回，徐向前表示异议，指出那样仅会追着敌人屁股打，张国焘不听，电话中讲来讲去，张国焘不耐烦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啪”地放下了电话，徐向前在李先念的建议下，坚持自己的主张，包抄吃掉了川军 10 余个团。

在关键时刻，张国焘没能表现出政治家的团结与控制能力。相反，许多与他有意见之争的同事，被他打成了 AB 团、改组派，惨遭杀害。他的心胸其实很窄，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对于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他才勉强忍耐，但仍用而不信。在鄂豫皖时，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在肃反中被冤杀。保卫局长周纯全把她抓去，使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企图把徐向前牵入“改组派”，程训宣始终没有承认，只有一死。

中央红军的到来，在徐向前心中点燃了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包括张国焘对毛泽东都是比较赞赏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讲课，当讲到王明一伙上台后的中央时，他摇头，说这些娃娃能搞什么名堂。私下里和徐向前谈到中央领导人时，张国焘认为毛泽东还是比王明等人高明的。徐向前对毛泽东是敬仰的。见面之后，毛泽东的安洋大度，中共领袖们的多才博能，令他心折。

与杀害自己妻子的人共事，与那些靠杀害异己来树威风、拉圈子的人共事，是一件个人难受的事。内心里徐向前希望能够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去，在他敬仰的毛泽东的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他曾向陈昌浩谈过这个想法，让刘伯承来接替他，他到中央去。陈昌浩感到很突然，劝他先别考虑此事。

在欢迎中央红军一事上，徐向前做了应作的一切，他令部下向红一、三军团送去大批粮食、衣物、枪弹，还拨去了三四千的队伍补充久经消耗的部队，作战时，他提议由四方面军部队主攻，以保存一方面军实力。毛泽东对此是很欣赏的，早在芦花镇，还为他颁发了一枚红星奖章。

然而，徐向前不能理解，不知为什么，博古、凯丰，甚至张闻天在两军会师之初，即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说退出鄂豫皖，退出南通巴是逃跑主义，又说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

公平地讲，一方面军自古田会议以后，纪律比较严明，政治工作开展得也好。相比之下，四方面军差一些，纪律比较涣散，存在着打人骂人、枪毙逃兵等等。但不论怎么说，他们毕竟发展了 8 万红军的队伍，创造了除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根据地。尤其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等等，徐向前听了也反感。红一方面军丢掉了中央苏区，把十万人打得只剩下两万人，西征万里，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围攻堵截，诚为形势所迫。对此负主责的人没有权利说另一支在转移中发展起 8 万军队的方面军是逃跑主义。

因为有了这些指责，又无法看出毛泽东、周恩来与另一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分歧，令徐向前对他所向往的中央产生了距离。而许多军官在张国焘的挑拨下，对中央产生了怨愤情绪。在张国焘与中央的争执中，徐向前本来是赞成中央北上的意见——这在军事战略上仅属于常识。但是当张国焘一

意孤行坚决要求南下时，他退却了，他不愿见到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不愿见到红军分为两半，他心想，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见面开会解决？

昨天晚上，毛泽东曾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徐向前看到毛泽东来了，心里还是高兴呀，虽然这时领导层有分歧，对毛泽东他是敬仰的，他立即吩咐卫兵搞点吃的，还给毛泽东找来香烟。毛泽东显得很沉重的样子，站在院子里，对徐向前说，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今天看来，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试探徐向前。

毛泽东没有把话挑明，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与徐向前毕竟相知未久，对徐向前没有把握。如果他认为徐向前和张国焘一样，就不会去代他；如果他完全信任徐向前，就会把话挑明。

徐向前的性格就是那样，不大爱多讲话，他也没弄懂毛泽东的意思，他只是想左路军如北上，我是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队分成两半怎么行呢？所以徐向前就说部队分开不好，内心想法还是说服张国焘一块走好吧！毛泽东没有说更多的话，可能徐向前不了解实际发生事件的惊险性，也不知道徐向前内心究竟如何考虑。他不能再讲多的话。当时的毛泽东也作难，因为两支部队有隔膜，也不可能把话挑明，他只能试探徐向前，试探的结果徐向前的态度不很明确，毛泽东也没有吃饭就走了。

多少年以后徐向前每当向人讲起这件事时就叹口气，说，唉！我这个人很笨，当时毛主席的意思就是不要管他们了，我们一块走吧！我呢，和毛主席一起走就算了，可是我总是想着整个部队怎么办，没想到他们当夜就走了。

没想到毛泽东当夜就率军单独北上了！两支主力红军历尽艰险会师不久又分开了！他多年来敬仰的真英雄、真统帅毛泽东在向他作出试探后，丢下他走了！他的希望破灭了！

红军的前途堪忧！

怎么搞的呀，毛主席，你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准备呀，难道红军就象过去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一样，自相争斗，不能象亲兄弟一样扭到一块？

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大脑象受到了巨大的刺激，麻木不仁，两眼呆滞，不发一语。

对面，他的搭档陈昌浩，又是另一番样子。他的个性容易冲动，是年他才29岁，出生于湖北汉阳，继承了武汉佬那种大大咧咧、吵吵嚷嚷的性格。他说话好带脏话，一次打电话时，他的脏话得罪了对方，对方回了一句更脏的话啪地甩了电话，陈昌浩怒怒冲冲地带了几个警卫员飞马过去，从人丛中揪出甩电话的（副军级干部）给了他一顿耳光，又飞马回程。

多日来，陈昌浩一直在两种力量拉扯的中心摇摆不已：一头是中央的决定要北上，一头是张国焘的指令要南下，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他一生中从未遇到如此为难的选择。

但就个人感情而言，陈昌浩对张国焘有一种知遇之恩。

陈昌浩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他被张国焘看中，一起到鄂豫皖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和重用，任红四方面军政委。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到达川陕地区，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苏

区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便成为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

本时代是年轻的人时代，陈昌浩就是其中的健儿，在张国焘的治下，他如鱼得水，虽然年轻没有经历，但指挥起千军万马，挥斥万众欢腾的场面，他毫不胆怯。他口才卓绝，做事好表现魄力，还有几许年轻人敢于冒险的激情。在鄂豫皖、红军曾缴获了一架敌机，围攻黄安时，陈昌浩亲自带了一把小手枪，和飞行员一起上了飞机，飞到城中敌军头顶撒了一大堆传单，使敌人军心动摇。他那把小手枪是为了防止飞行员临阵动摇的，他预先警告说，如果那样，他将和飞行员同归于尽。

在肃反处决异己一事上，陈昌浩作为直接负责人，也从不手软。

就陈昌浩个人发展的历程来看，除了本人的才能外，都与张国焘的栽培与重用分不开的。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才能在两军会师后在中央政治局给他争得一席之地，才能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上了政委。几年来，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亲密无间，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同时他十分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和驾驭诸事的谋略与练达，他深感两军会合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跟着张国焘干一番事业。中央决定分成左右路军时，他并不乐意到右路军，但张国焘执意要他去，他不得不去。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中，他深感夹在中间挨“夹板气”的滋味不好受：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于心不忍；依了张国焘，中央不答应，他也不好办。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非要一直坚持北上的方针不变？

在标着“南下”和“北上”这个命运的“天平”上，陈昌浩终于将情感与理智的砝码抛向了张国焘托出的“南下”的盘子里。

毕竟，他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没有张国焘，哪有他的今天，为什么不张总政委的意志得以舒展？

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率队单独北上，就在昨晚！他那去三军军部开政治局会商讨南下事宜的话，原来是金蝉脱壳之计！叶剑英也欺骗了我们！

骗子！军阀！自私自利的奸雄！他们执行右倾逃跑主义，把中央苏区丢了，又要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川北根据地丢掉！你们欺骗了我们，欺骗了四方面军全体将士！

打还是不打！

陈昌浩拿不准主意，他一再催问那位坐在床边发呆的徐向前，尽管他身任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但是在军事上，他一贯依赖于眼前这位卓越的军事家。

徐向前抬头看了他一眼，低沉而又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听了，就按这个口径向前卫发了指令：

“既然如此，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人员进进出出，吵吵嚷嚷，乱哄哄的，徐向前心情极坏，干脆躲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一句话也不说。陈昌浩一连几个小时坐不住，激动地走来走去，大骂毛泽东的逃跑主义。

不久，毛泽东派人送来了指令，要右路军一道北上，陈昌浩写了复信，让来人带了回去。随后，又给张国焘写了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

李特飞骑追红大

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执行很坚决。会后，他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辞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来给他，后会有期。”

红军大学的学员在宿营地的草坪集合，整装待发，忽然，附近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见几个人骑着马奔跑而来，领头的是个矮胖子。他们来回跑着，冲着部队叫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这喊声就像空中投下了一颗炸弹，在部队中炸开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些四方面军的学员附和着喊叫，“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一方面军学员听到他们骂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前面已经出发的部队也停下了脚步。刹那间，部队骚乱了。这时，人们看清了，领头的那个人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他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这个大个子，就是李德。

两个人激烈地争吵着，在一旁的几个干部不由自主地围了上去。李特的几个随行人员也下了马，在几步之外，持械相望。只听到李德讲一口外国话，叽哩咕嘟，不知说些啥，李特除了高声重复那几句喊话外，其它就是“不去！不去！”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武。

原来，李德要拉李特去见毛泽东，他说，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李特不敢去。

正当二李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只见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从西南边不远的的一个茅棚里走出来。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向毛泽东走去，一路推推操揉，吵个不停。

茅棚外，在毛泽东面前，李德松了手。李特的警卫员跟在后面，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表情凶狠而紧张。

李特斥问毛泽东：“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在李特的无礼举止面前，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对李特晓以大义，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他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主义”和丢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毛泽东令李德松手，然后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就走在后面，

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彭德怀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特有所顾忌，未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又非常诚挚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重复讲了三遍，使当时在场的人几十年后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李特叫道：“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答复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当即令韦国清、宋任穷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对他们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上午8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

杨尚昆处于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有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泽东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同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

当天，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并深入分析了南下方针的错误：“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北上以后，在通过敌军封锁线时，敌机又来轰炸了。他们不顾一切继续前进，克服了难以忍受的饥饿，翻越了两个20—30里的大山，急行军80里，到一个小小的村庄宿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实在太累了，多么希望能好好睡一觉啊！可是，晚上又下起了滂沱大雨，不仅不能睡，连坐的地方也都有水，大家的衣服被子全湿透了。11日，部队继续行军，又走了60里路，到达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会合了。

毛泽东拒绝极端

俄界是个藏族地区，由一个姓杨的土司控制。这位土司是杨家第十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以及采冶出来的粗糙的金银。他保持中立，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不怀敌意。他把粮食向红军敞开，也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自己的武装。过去国民党也是这样做的。人困马乏的红军可在此得到极为难得的休整和给养补充的机会。好在队伍并不十分庞大，总共不过六七千人，住上三日五日粮秣不成问题。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但是，张国焘再次抗拒中央命令。9月12日22日，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攻击“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诱令一、三军“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一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共二十一人。

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强调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条绝路。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

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众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邓发和李富春历数张因焘的罪过，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王稼祥认为，张国焘这人没有政治信誉，说了也不算数。王稼祥的发言结语是：“张国焘回到党的立场是困难的，但组织结论是有步骤的。”

王稼祥的意见表达了会场上多数人的认识。也是所有出席者感情与理智反复交战所得出的结果。彭德怀说：“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他北上可以不做，过早的结论没有好处。”聂荣臻也同意这一点。但他在发言中特别表示不赞成个别同志的说法，认为这次的分歧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争权。事实证明张国焘的确叫胡宗南吓怕了，他企图跑到安全地方去。

林彪、博古、洛甫相继发言。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林彪对张国焘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表示不满，张国焘竟说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的队伍，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的队伍。他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下面的认识。博古认为对张国焘过去太客气了。对张的组织结论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的时候。张闻天以他的一向的理论家的思维，对张国焘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还指出，张国焘发展下去必然要组织第二党，应当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解这种前途。他认为，争取工作现在还有一线可能，组织结论应当等到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

会议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

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忍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对于当时

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期内脱离中央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彭德怀作了关于军队组织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根据目前实际状况和战略任务，军队的编制需要改变，因为战斗人员减少，团下不能设营，只能直辖4个步兵连。在进攻战术上，1个团必须绝对能对付敌人1个营；在战略防御上，1个团必须保证对付敌人1个团，有这两个特点，既能使政治工作加强，也能保存团的基础。他还指出：为了加强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缩编上层机关人员，以充实基层战斗单位，继续战斗。

会议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这场来自高层领导之间由于政治路线分歧而形成的分离，对于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当时是无法了解真情的。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半夜神秘的出发，李特等人的大吵大嚷，部队的迅速北进等。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中央命令，指战员中议论纷纷。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部队中担心力量削弱了。为了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部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

毛泽东最后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雄红军的！”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电张国焘，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

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朱德度量大如海

9月10日，张国焘接到陈昌浩的急电报告时，勃然大怒，整个四方面军上层也沸腾起来！

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

张国焘立即召开了左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就此事作了详细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朱德站了出来，解释这中间必存在误会，望请四方面军同志顾全大局，寻求团结之道，他的话被众人愤怒的斥责声所淹没。

第二天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北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险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而未派兵前往。

第三天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开后所接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央的电报。

张国焘针对中央要他北上的命令，回复说：“一、三军速回，受徐陈指挥共同南下！”

9月12日，张国焘率左路军由葛曲折回阿坝。约在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的同时，张国焘也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在一座喇嘛寺（格尔底寺）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员、师以上干部、工青妇负责人约200多人。

会场上挂着一幅横标，上面赫然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

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北上“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四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

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路的！”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来，一些人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他们的声音又被一阵口号声所淹没。

会议连续开了三天，通过了张国焘亲自起草的决议，决议严厉指责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

决议警告说：“对那些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人，要坚决斗争，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这句话是指向朱、刘和来自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的。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私下找到朱德，说：“老五和老九提出与他们分开，向北走。”

朱德判断：走，张国焘必追，双方火并，对红军不利。

朱德叮嘱刘伯承，要“老五”和“老九”必须克制和忍耐，队长计议，待时机成熟另谋他图。

刘伯承也要总司令时时多加防范，“随遇而安”。

就在阿坝结束的当天夜里，总司令部的骡马全部被警戒部队牵走了，并且首先把朱德骑的那匹心爱的枣红马杀掉。

紧接着，黄超把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和司令部的勤杂人员全部调走，连门岗也都撤掉，说是要他们参加学习班，“换换脑筋”。

对此，张国焘向朱德作了这样一种解释：为防止类似毛泽东等从事偷跑事件的发生，保卫局的同志万不得已才采取这种令人不太愉快的措施。但他向朱德表明：待部队行动，保证总司令有自己的坐骑。朱德始终保持沉默。

国焘成立伪中央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令左路军、右路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于10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一线。

徐向前、陈昌浩率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草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40—50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此人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态。朱德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

就发展到了高峰。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无一失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

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弘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把他陷害死了。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

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错误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第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因打听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动向，被扣上“阴谋叛乱”的罪名，要将其处决，幸被朱德出面干预，才免遭杀害，被调到红军大学教育科当教员。

百丈关南下失利

张国焘下令向成都进军。

此时虽已秋风萧瑟，部队还穿着夏装和草鞋，粮食也不充足，颇有几分饥寒之意，但广大指战员已被鼓动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要攻取成都，就必须打开南下通道。

当时，敌人发现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乃沿大小金川地区，布阵封堵。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在逆境中他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为便于部队行动和展开，朱德、徐向前决定分为左右两个纵队，以五军、九军 25 师、三十一军 93 师组成左纵队，由王树声同志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和九军 27 师一部组成右纵队，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率领，沿大金川左岸前进，直取崇化、懋功。

战役开始，我右纵队九军 25 师，首先向绥靖河以北观音铁桥发起强攻，左纵队隔岸进攻配合，因守敌刘文辉凭坚固守而受阻。四军奉命从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成功，然后沿右岸向前疾进，从 10 月 12 日开始，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与此同时，左岸我三十军、九军 27 师，攻占崇化，继克抚边，再占达维，后取懋功。红军以溃敌 6 个旅、毙俘敌人 3000 余人的战绩，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战役。

继“绥崇丹懋战役”之后，红军又乘胜组织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以期打开进入川西的大门。

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南作战，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包藏着“一箭双雕”的企图：一方面，彻底消灭红军，扼杀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形成蒋家的一统天下。四川一地，正如诸葛亮所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蒋介石早就垂涎三尺。他借着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派大批嫡系部队入川，进而控制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势力，正力图把“天府之土”变成他的战略大本营。10 月间，蒋介石确定结束其“剿共”指挥中心“武汉行营”的工作，正式成立“重庆行营”，宣布“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即移于重庆”。他鼓吹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建设四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的川军，紧缩约三分之一的名额，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有所增强。这时，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红四方面军：胡宗南部北向甘南，对付中央红军；吴奇伟部南下，对付红二、六军团；李抱冰部则扼守西康一带。红四方面军首长估计，我军趁势南攻，打击川敌，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地区，有较大把握，遂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军的具体作战部署是：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 93 师及 91 师之两个团、九军 25 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 27 师为左纵队，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

这一部署，以主力夺取天、芦、名、雅、邛、大等县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

红四方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11月16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

11月21日，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发出《告剿共官兵书》，并对各将领发出手令严辞切责，对军队过去积习痛下针砭。规定：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由连长枪决，连长得由营长枪决，营长得由团长枪决，团长得由旅长枪决，旅长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倘有瞻徇隐匿者，由总司令查照依法严办。如有努力作战，不顾牺牲者，无论各级官兵、均由总指挥随时注意考查，从优奖叙。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红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红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红军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红军的攻势。事后检讨，红军这次300余名伤亡中，竟有近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红四方面军。

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红军百丈决战失利，原因在于：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四方面军的老对手，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战斗力有较大的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红军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四方面军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红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一带集结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红军只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进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命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

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部队撤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断，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

被张国焘罢了总参谋长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的刘伯承（实际是一个教员），以让总司令修改文章为由，来到朱德住处报告情况：鉴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已经公开，被发落到红大当教员的原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儿位指挥员再次提出要拉“老五”、“老九”打出去，甚至提出把张国焘扣起来，敦请总司令定夺。

朱德听罢，内心深处被强抑的情感风暴使他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陈伯钧他们，万万不可感情行事！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告诉他们一定要冷静、我们要做粘粘糖，粘住张国焘。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出此下策。我们要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负责，这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

刘伯承默然。他深谙总司令的良苦用心。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第十四章 奠基西北

毛泽东说：我们目前只有 8000 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俄界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率领由北上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向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国民党在此设置重兵扼守，企图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陕甘地区。于是，在中国西北部的这一险关隘口，爆发了一场红军长征中上颇为著名的战斗。

苗族少年破天险

打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性的一仗。腊子口是通往岷县的一个奇峻的隘口。这一仗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打的，并以毛泽东、聂荣臻、林彪联合署名，在9月16日发了一个电报给彭德怀。电报开头就说：“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迟，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随后，一军团林聂，即根据毛泽东下达的决心冒雨赶到2师去，请师长陈光政委肖华连同4团干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党中央和毛泽东则驻在朵里寺（距腊子口300米）等待消息。

4月王团长与杨政委策马急驰。待到达腊子口时，1营正和敌人打得不可开交，后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和那下冰雹似的手榴弹挡了回来。

团首长回来后又立即领着全团的营、连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

他们来到前沿，用望远镜抬头一看，这里地形果然险峻极了。沿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30来米宽，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它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对着红军进攻必须经过的30—40米宽、100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

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

经过反复缜密的侦察和我1营攻击时敌人暴露的火力，他们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

他们又把望远镜对向敌人石堡旁边的悬崖峭壁：

这一面石壁，从山脚到顶端，几乎成仰角80—90度，石壁既直又陡，连猴子也难爬上去，石缝里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古松。敌人似乎没有设防，可能因为它太陡太险。他们边观察边研究，觉得倘若能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这里翻越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可这面绝壁看着叫人眼晕，如何上得去？

现场观察回来，团首长召集连队的士兵开了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打下腊子口，要大家献计献策。一个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来了个“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惊奇地望着他。

事关大局，团首长专门和这个苗族小战士谈了话。原来，他是从贵州苗区入伍的，从小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很深，反抗性很强，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战士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云贵川”。他只有16—17岁，但看上去却俨然是个大孩子了，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他说，他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于是，团首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试验。

腊子沟水流大急，难以徒涉。他们就用一匹高头大马把苗族小战士送过去。绝壁紧贴着腊子沟，他们站在这边的小树林里，看着他用竹竿攀援陡壁。这里离敌人虽然只有 200 来米，但向外突出的山形成了死角，敌人看不到红军。

那小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根，拉了拉，一看很牢固，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噌噌噌，到了竿头的顶头。他像猴子似的伏在那里稍喘了口气，又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石嘴……他终于上去了！他在上面待了一会儿，又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来了，团首长当即把情况和偷袭计划向师、军团首长报告。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师长陈光等来到了前沿指挥所。首长们询问了情况，又观察了一下地形、敌情，最后，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按计划，团长王开湘率迂回部队爬崖，团政委杨成武指挥正面进攻。

黄昏前，迂回部队已动员完毕，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之用。勇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十多颗手榴弹，在王团长的率领下，开始渡腊子河。

他们砍倒沿河的两棵大树，叫它倒向对岸，一下子就添了两根独木桥。

几百人渡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

还是苗族小战士“云贵川”捷足先登，将随身带着的长绳，从上面放下来，后面的同志一个一个顺着长绳爬上去。

天已经擦黑了。他们往上不停地爬着。渐渐地看不到人影了，只是偶尔传来小石子滚落下来的响声。

迂回部队上去了。于是，按照计划，为了麻痹敌人，杨成武指挥红 6 连从正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有 20 个突击队员在 6 连连长杨信义、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狡猾的敌人，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进攻失败了。

毛泽东和军团首长这时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问突击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6 连便重新组织火力与突击力量，再次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可是，接连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 30 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起一层了。杨成武命令 6 连不要再继续猛攻，只进行牵制性的战斗，等待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齐给敌人来一个总攻击。

3 点前，全团饭后进入总攻位置，遥望河对岸山那边，急切地盼着王团长发来信号，为了万无一失，参谋长李英华指定三个通信员专门了望右岸悬崖上空。

怀表上的指针指向 3 点，右岸高峰上面突然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

“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

战士们顿时欢腾起来。

“通、通、通！”正面接连三发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3颗信号弹仿佛3颗红星，在拂晓前的茫茫晨雾中闪耀着光辉，与那一红一绿的信号弹交相辉映。

这时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

只见6连的同志，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人中间飞舞、猛击。右面悬崖上的部队在王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所有的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射击。

晨曦中，总攻部队开始过河了，全团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隘口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6连指战员冲过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两个炮楼。

敌人退至峡谷后第二道险要阵地，集结兵力，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乘胜攻击，经1小时连续冲锋，敌军全线溃败，红军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哈达铺三军欢宴

1935年9月21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区，终于问到了汉族地区。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象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二十个鸡蛋，五毛钱买七八十斤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1935年9月21日，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哈达铺的男人十分高兴，他们说：“真是好战士！”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4团夺取腊子口后，红一军团首长派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立即出发到哈达铺，执行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的任务。当时在场的毛泽东说：“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要搞几份来。”

接受任务后，侦察连干部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正巧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等物品。曹德连从少校副官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登载着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被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聂荣臻看到报纸后非常高兴，立

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了报纸，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群众领袖、脚踏实地的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英勇善战的二十五军和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此时，五、九两军团大概约6000—7000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约6000人；中央直属队约2000人，共1.4万人。下一步是去陕北刘志丹根据地，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余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彭德怀认为，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他提议取消三军，编入一军。他的提议得到军委毛泽东的同意。彭德怀召集三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番号的理由。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讨论。

为了解释长征的意义，9月27日，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党中央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当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时，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2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激动人心的讲话，使会场上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伪甘肃省主席）、毛炳文、王钧等部左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派把30—40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毛泽东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他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讲到张国焘闹分裂对抗中央时，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

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听到这里，同志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又挥挥手，要大家安静，并且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此时掌声雷动，毛泽东又笑笑说：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顿时，大家都静了下来。

毛泽东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于是在掌声中，毛泽东宣布陕甘支队编成三个纵队，即第一纵队由红一军改编、第二纵队由红三军改编，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毛泽东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 8000 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完，举起一个指头，笑着说：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最后号召：经过 2 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 700 到 800 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到陕甘根据地去！”

“前进！前进！”

“和 25 军、27 军会师！”

一时间口号阵阵，此起彼伏。

咬辣椒吟唱史诗

9月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和彭德怀随一纵队司令部前进，亲自了解敌情，掌握行军路线。

渭河沿岸，从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到天水一线，是蒋介石构筑的封锁线，驻扎着国民党第三军五王部、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9月26日，陕甘支队顺利渡过渭河。突然，左右两侧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响起来了。这时，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邓发等来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敌情，彭德怀问：“主席，你看怎么样？”毛泽东笑着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判断，派出了小部队，放了几枪，敌人真被吓跑了，红军又从容前进了。

就这样，红军胜利通过了渭河封锁线。

自从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苏区的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就找贾拓夫谈情况。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在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从哈达铺北上后，毛泽东每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获得了对陕北苏区较具体的了解。

9月26日，前卫一纵队到达通渭的榜罗镇。27日，后续部队进入榜罗镇。在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报纸提供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很多材料，也登载了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的具体情况。根据获得的新材料，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根据报上提供的材料和贾拓夫所说的情况，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

政治局常委会后，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他说：“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数百公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红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但一年来，他们南北征战，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这样，他们把万里长征转变为胜利的开端。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

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他们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9月29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进占通渭，歼敌300余人。在这里，红军休息了两三天，作好通过西（安）兰（州）大道的准备工作，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并抓紧军事方面的准备。在通渭城召开干部会时，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在讲话中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折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长征诗。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一齐骑马来到通渭纵队1大队大队部。大队长杨得志拉上政委耿飚去见中央领导，一见面，大家纷纷问好，都说“瘦了，瘦了！”

通渭城内有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耿飚找到老板，让他给办两桌价值10块光洋的酒席。

当时，一块钱可以买5只鸡或1头羊。耿飚说：“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解得，解得。”老板保证说。

由于人比较多、本来安排了两桌；到吃饭时，毛泽东连说：“合兵！合兵！”于是将两桌合在一起。大家连连碰碗，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起酒来。

酒有两坛，碗又大，毛泽东兴致很高，和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干了一次，微微有些醉了。于是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一见有西瓜吃，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尝一口。

张闻天咬了一口、连叫“大辣！”

毛泽东哈哈大笑：“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都被这句话逗笑了。

当晚，中央领导就宿在部队驻地。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月4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暴躁恼怒，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迫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10月7日下午，一纵队在青石嘴发现了敌情。毛泽东决定消灭面前的敌人。他立即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下达战斗任务说：“隘日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毛主席这时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

毛泽东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将饼子分给大家。

在场每人从毛泽东手里接过一小块，吃了起来。

毛泽东一边嚼着饼子，一边说：“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这时毛泽东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倒了一点水在壶盖里，递给大家，说：“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吧，喝完了，就去打！”

“是！”他们接过壶盖，仰起脖子，将盖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待一个个喝完，杨成武望望林彪，问：“首长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林彪摇摇头，说：“没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泽东痛快地说：“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大家辞别毛泽东，骑马驰去。三个大队似猛虎下山，迅速包围并解决了敌人，缴获战马一百多匹，还有十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和布匹，敌骑兵团 500 多人，除击毙外全部当了俘虏。根据毛泽东和一纵队首长的指示，红军用缴获的马装备了一个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红军继续前进，一彭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在望。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哼成了《清平乐·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10月15日，正当中央红军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他们自称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泽东会见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胜利结束。

屈指行程二万五

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敌东北军骑兵军第三师和第六师、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等部一直紧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对支队领导说：“要想办法打它一下。”他让聂荣臻到前面阵地上实地观察一下。了解一下敌情。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当即定下了打击敌人的决心，并召开指挥员进行部署。他在会上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号召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毛泽东、彭德怀决定，以一纵队在正面，二纵队在左翼，向吴起镇两北的敌骑兵进行突击。

毛泽东亲自对战斗部队动员说：“敌人如此猖狂，我们要狠狠地打击消灭他们！”

10月21日早晨，敌人的骑兵“如约”前来，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第二师从正面推进，马鸿宾三十五师骑兵团为侧翼，企图两面夹击红军。彭德怀直接指挥了这一战斗。红军勇猛突击，迅速歼灭了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了敌三个骑兵团，抓获了大批俘虏，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取得了重大胜利，砍掉了敌人的“尾巴”，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进犯。

10月24日，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们这次战略转移，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打断口号声继续说：“2.5万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打着手势，说道：“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会后全体进行了大会餐。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对常委作出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张闻天负责党务，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即将到达陕西的路上，那位戴着厚眼镜、直言不讳的黄克诚，心中既兴

奋又担心。他再次直言闯祸了。

俄界会议后，中央将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支队。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黄克诚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说他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

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确有其事。那是在红军出了草地前后，中央派了几位领导干部到红三军工作。红三军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这次从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改善伙食，红三军有些同志就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也常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那时一般伙食条件很差，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从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把这类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黄克诚当时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下面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很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等等。

由于他提了上述意见，有的领导认为他不可靠、不适宜担任政治工作，更不能带兵。在召开各种会议对黄克诚批判了几天之后，就安排他去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部队由于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得以恢复，所以，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黄克诚当时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他审判处理。他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黄克诚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自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他们见黄克诚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这样一来，他这个裁判所所长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情就不找他前次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他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他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黄克诚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徐海东转战三省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两支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二十七军刚刚在陕北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军劲旅，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鄂豫皖省委将留下的几个团集中起来，重新建立起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为军长，王平竟为政委，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共约7000人。主力走后，20多万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同时进行划区“清剿”，在其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对残存的苏区农村，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烧房屋、抢粮食、杀群众。

1932年底到1933年初，红二十五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边区革命形势出现转机，红二十五军由重建时的7000人，发展到3个师、9个团，1万多人。皖西北的几个团组建了二十八军，地方武装扩编为10个游击师。

这以后的半年时间，王明“左”倾路线又在鄂豫皖边区造成了严重恶果，1933年5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去夺取敌重兵扼守、工事坚固的七里坪，苦战43天，久攻不下，部队减员几千人。敌动用了14个师又4个独立旅的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增筑碉堡，扩建和封锁公路，占领了两个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危境。

这时，一位窑工出身的军官的军事才能显露出来，使这支红军部队的形势出现了转机。他叫徐海东，是年三十二岁，担任74师师长，他一向以英勇善战著称，但是在领导那里却不得人缘。原因是他对省委和军部实施的阵地战术一直持有异议。另外，他还反对肃反，总是企图担保有特务、AB团、改组派嫌疑的人，当时有1万3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被打成反革命的有3900人，其中2500余人被杀死。

1933年5月某日，正是围攻七里坪战斗的关键时刻，徐海东奉命到军部开会，会议中他的言论引起了省领导和军部首长的怒斥，省委书记徐宝珊上前喝道：“老徐，不要再搞你那一套右倾言论了，你给我出去！”边说边把瘦弱的徐海东推出了门。

徐海东受此大辱，万念俱灰，心想，这样活着真没有意思。他黯然走着，正在这时，通讯员从前面跑来报告：敌人偷袭过来了，已打到军部附近。言未毕，溃败下来的红军如潮水般涌来，从身边跑过。

徐海东当即派身边传令兵传令两个团从侧面包抄反击，他自己脱下全身军装，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头，手执一把大刀，逆着溃兵人流向敌人冲击。身边战士紧跟着冲锋。溃兵惊异地站住了，有人跟着转身冲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反冲锋行动，最后是全线转身冲锋，徐海东高烧在身，跑得不快，战士们很快超过了他，当面偷袭的两个师的敌兵被这猛烈的冲击打得落荒而逃，红军还抓了500多个俘虏。

事后，省委书记徐宝珊向徐海东：老徐，你打仗没有说的，为什么总不来参加军里的会议呢？

徐海东说：我从没有接到通知啊！每次开会，都是政委说军部只通知他一人参加。

徐宝珊叹息了一声。

74师政委名叫戴季英，乃是大抓肃反的军长吴焕先手下红人，此人在74

师杀了数百名“改组派”，其中32团连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1934年4月，鄂豫皖红军再次整编，徐海东升为军长，吴焕先为政委，戴季英为参谋长，兵力3000余人。从此这支部队被国民党蒋介石冠以“徐匪海东部”的称号。

徐海东于1900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陂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徐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在学校里，因为衣服破烂，他总是受到富人子弟嘲笑，他拔拳相向，在老师痛打他一次后，他逃了学。

徐海东就到窑厂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命。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花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1927年。他当了排长。

是年春，国民党军队北伐至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国民党“清党”以后，他不得不逃亡，偷偷地回到了黄陂。徐海东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人几乎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之一。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他还在骑马失事时碰掉了门牙。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徐海东被国民党冠以“徐匪”级别后，他的家人遭了难，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共66人被国民党军杀死。他的妻子早在1931年被俘后被卖给汉口附近一个商人做小老婆。

在麻城，二十五军来到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找到了十二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

同一个月，在黄冈山下，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他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红军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就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红军。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第二天，徐海东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了他们熟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给经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这次经历加强了士气，在以后的反围剿中这支部队没有出现逃兵。

1934年9月，程子华受周恩来委派，由江西绕道上海，进入鄂东北根据地，11月，鄂豫皖省委遵中央之令，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另辟新

区的决定。会前，他主动出让红二十五军军长一职给程子华，自任副军长。

11月16日，长征开始后，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6000余里，进入陕南，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红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徐海东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5里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讯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徐海东打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200多人。红军经召南向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红军去路。徐海东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红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95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堵后追。徐海东找到一个货郎，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红军胜利进入陕南。

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在领导层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戴季英说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徐海东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是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领导又提出手枪团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徐海东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他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徐海东再也不能忍受自相残杀了。他最痛心的是——1934年农历四月，吴焕先、戴季英把他和郭述申在皖西领导的原二十五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除少数幸免，大部处决！

由于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都不理想，省委决定继续西进。12月8日，部队进入陕西境内。12月10日，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议未结束，敌60师突袭上来，徐海东，程子华在激战中负伤，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率队与敌肉搏，经20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打垮。徐海东在抬子上躺了4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他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他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得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他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调集数十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两次“围剿”，但均被得到根据地群众支援的红二十五军粉碎。就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最激烈时刻，省委有人对能否粉碎敌人围剿产生了怀疑，主张西遁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徐海东坚决主张开展斗争，认为红军完成有能力打破敌人围剿，他的意见获大多数人支持。

第2次反围剿在陕南展开。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都信赖徐海东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他提方案。在陕南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41个团。当时红军只有2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形势紧张。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一定要徐海东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徐海东提出：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我们是不列的。拼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拼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拼光，敌人还光不

了。因此他提出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他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10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7月中旬，为了把敌军调出根据地，扩大红军影响并补充人员和物资，红二十五军率一个游击师北出秦岭到达长安县的韦曲、杜曲一带，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军从敌人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有北上可能，同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来到军部，带来了一些文件和消息，使红二十五军领导得知一、四方面军长征在川西北会合，将继续北上。红军还侦知西安国民党军于学忠、毛炳文部已奉命西调。根据这一新的情况，鄂豫陕省委于7月15日在长安县津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牵制敌人主力，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并与陕甘红军会师。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出发西征，此时全军4000余人。部队经汉中绕道进入甘肃境内，8月14日威逼静宁县城，切断了西兰公路。

8月17日黄昏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县城。西兰公路是敌军由内地通往甘肃的唯一交通干线，红二十五军活动18天，使敌交通断绝。蒋介石在8月10日电报中曾称：“查徐海东匪军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

蒋介石从薛岳、于学忠、杨虎成部备抽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指挥，夹击红二十五军。

8月21日，在徒步跋涉油河时，山洪突发，军队仅渡过一半，敌追兵已至，军政委吴焕先率100多人抢占高地，不幸中弹牺牲，3个月前，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程子华由中央苏区调入，根基不稳。军参谋长戴季英向徐海东要求政委一职，被徐海东拒绝。9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在泾川，徐海东主持召开省委会。

会上，有人提出“省委书记没了，政委没了，应补选。”有人提议让参谋长当政委，有人提议郭述申当政委。讨论的结果，多数人的意见是省委书记和军政委都由徐海东来代理、兼任。意见纷纷，一时难以统一。

徐海东心中明白，这个时候不能选举，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选举起来必然会乱套，万一让那位想当政委的参谋长得逞，今后这支军队带起来就麻烦了。他宁肯继续让人称他“副军长”，也不愿会议作出不利于党的决定，当即宣布散会了。关键时刻，他显出了“粗中有细”的英雄本色。

满心想当政委的参谋长、似乎看穿了徐海东的意思，猜透了一些领导人的心，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泄气。吴焕先政委牺牲后，参谋长一度积极的态度，此时又变得消沉了。当部队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抢过蒲河、黑河和马连河，到达合水县板桥镇时，敌骑兵尾追上来。9月4日凌晨，参谋长讲话过长，使掩护部队出发过晚，敌骑兵部队袭来，我掩护部队打退敌骑兵进攻后，接着去追击敌人。敌骑兵从两翼包围上来，我追击部队被冲散，徐海东骑马撤退，敌骑兵紧追徐海东，并高叫要捉活的，所幸出发部队闻知敌

人进攻后，部分队伍回援，打退了敌人，救出了徐海东和一些同志，然已损失 200 余人！

9 月 7 日在保安县豹子川，省委开会，决定徐海东任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省委书记。9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延川县永平镇同刘志丹所率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 月 17 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台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红二十五军改为第 75 师，红二十六军改为第 78 师，红二十七军改为第 81 师，全军团共 7000 余人。

刘志丹陷入囹圄

刘志丹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当年，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这个乱世的豪杰生于陕西北部群山环抱的保安。他到榆林去上中学，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兴旺贸易的中心。刘志丹离开榆林以后就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在那里结业，就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他随军北伐到了汉口，国共分裂时他正好在那里。

1927年南京政变后，他逃脱了“清洗”，在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1928年回到故乡陕西省，恢复了同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他在陕西南部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地点就在华县附近。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

刘志丹在1927年到1932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夫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他还担任保安的民团团长，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一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因此保安县长被撤了职，刘志丹只带领了一个部下逃到了邻县。那里的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们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间，刘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二十支枪，逃到山间去，马上就纠集三百个左右的追随者。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运输旅后，他又重操旧业，部队被缴械了。

1931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红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着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红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志丹曾提出要处决他。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1934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两军会合后，刘志丹的危机仍在发展之中。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际，恰好赶上敌人调集了 10 万兵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立刻与陕北红军并肩投入到了反“围剿”作战之中。

当时敌人兵分四路：西路米脂一带，有敌两个师；延安地区有东北军 110 师、129 师，洛川方向有敌 107 师，甘肃境内还有 4 个师，正向苏区压来。

徐海东决定先打东北军，他的意见得到大家同意。

9 月 17 日夜晚，红十五军团悄悄地向南开动了。部队绕过延安，连续行军三个夜晚，到达甘泉以西的王家坪。

10 月 1 日，红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派一部红军围困甘泉县城，将主力埋伏在延安。甘泉间的劳山一带。甘泉守敌被围，东北军主力 110 师急从延安出发增援，途经红军设伏阵地，被红军一举歼灭。生俘敌官兵 2000 多人，毙敌师长何立中。

在俘虏中，有一位张姓军官声称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保卫局干部处决了他，然后报告上级。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以他惯有的疑心向这位本根据地的创始人下了手，他可能受了那三位中央委员的影响，也可能把它看成是久抑求伸的发展权力的机会。

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把他送进了牢房。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刘志丹五岁的女儿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外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

毛泽东东征西伐

10月底，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传到红十五军团中，全军上下一片欢腾。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派贾拓夫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联系，他带了一个连，并带了一部电台准备给十五军团。在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他们相遇了。程子华和郭洪涛通过贾拓夫带的电台，把陕北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经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1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来到甘泉道左铺红十五军团部。

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在打张村驿。张村驿，是一个小村镇，周围有四个围子，守敌有300多人枪。徐海东刚刚发出攻击命令，就收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从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来。”徐海东立即下令部队暂停攻击。他飞身上马，快马加鞭，3个小时跑完135里，回到了道左铺军团司令部。他刚走进窑洞，洗完脸，毛泽东、彭德怀就来了。未经介绍，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接着他向徐海东、程子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徐、程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拿出一张三十万分之一地图，问道：“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把敌情作了分析，对反“围剿”的打算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折起了地图，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谈话结束，毛泽东等与徐海东、程子华一起吃了饭。分别时，毛泽东对徐海东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徐海东以前通信联络主要靠骑兵通信员，从未用过电台，就说：“我不会用它。”毛泽东微笑着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带着电台，回到前方，立即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并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问候和指示，部队情绪沸腾了！大家一鼓作气爬上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打开了附近的据点，歼敌300多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发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电报，他致电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当天，毛泽东复电徐海东，向参战部队祝贺胜利。

张村驿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北返鄜（富）县以北地区。11月6日，在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与陕甘支队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将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一军、红三军台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2师、第4师和第1团1第13团；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和骑兵团、警卫团。全军共一万余人。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征战，到达陕北时经济相当困难。毛泽东亲笔

写了一张给徐海东的纸条，交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诚带着来见徐海东，说明要向红十五军团借 2500 元钱，以解决红一军团的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的字条、杨至诚的说话都很客气，没有丝毫行政命令的语气。当时。红十五军团经济也感拮据，还须数千元才能解决购买油盐、药品和冬装问题。但是徐海东胸怀大局，毫不犹豫地要军团经理部长查国桢从军团现存的七千无现洋中，“拿出五千元，送给党中央”。毛泽东赞扬说：这是“雪里送炭”。

根据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形势和当时敌情，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粉碎“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方针是，向南作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力争初冬解决“围剿”，尔后向洛川、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以扩大苏区和红军。

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了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战役部署。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敌情，讲解了部署，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杆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彭德怀又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上仔细地观察地形，进一步研究了部署。

部队认真进行了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并拆除了直罗镇东面的旧寨子，以防被敌利用。10月28日，敌西路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11月1日占领大白镇。11月6日，敌南路六十七军之117师进至鄜（富）县。为迷惑和调动敌人，红241团向甘泉加紧围攻。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令第五十七军三个师迅速东进。11月19日，敌五十七军先头第109师进至黑水寺一带。

红军派出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去“惹牛”、“牵牛”，以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牵着敌人鼻子走。敌师长牛元峰很骄狂也很“驯服”，20日下午46时许，在飞机的掩护下，牛元峰率109师进入了直罗镇，他兴高采烈，急忙向其上司报捷，说他已胜利占领了直罗镇。

当天晚上，毛泽东下达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次日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

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直罗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和战斗进行中，他一再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突然发动猛攻、激战至上午10时许，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将北山和南山守敌大部歼灭，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撤至镇东旧寨子，固守待援。红78师向旧寨子残敌第一次攻击没有奏效。周恩来亲到阵前观察，指示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半夜12时，牛元峰果然率残部向西突围，红军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当红军追近时，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着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

红军猛追贵敌，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中间歼敌后卫第106师第617团。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109师和106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在着手组织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就着手解决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

的问题。

毛泽东在吴起镇时，就听到陕北地方领导人的汇报，获悉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到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时，更进一步证实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后来毛泽东又听到徐海东等同志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悉一个多月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三等迅速赶赴瓦窑堡，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王首道等迅速到达瓦窑堡。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搬出了证明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许多案卷，王首道认真审阅了这些案卷，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戴季英等强加在刘志丹身上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强加在其他被捕同志头上的“罪状”，也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

11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首，有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赶赴瓦窑堡，与张闻天一起，亲自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认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应予立即释放。党中央对制造这次冤案的戴季英、聂洪钧给予了处分。

刘志丹等 100 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迅速获得释放。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安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刘志丹非常高兴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任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后，徐海东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活全都说出来，但因毛泽东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徐海东特别向毛泽东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 300 多个同志受冤枉。毛泽东当即指示徐海东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他还让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徐海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 300 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 多个同志全哭了，徐海东也流了泪。这样，肃反问题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不但在长征中挽救了中央红军，而且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准备实施积极进攻的方针。毛泽东提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据此，军委决定进行东征，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彭德怀任

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另外，留下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担任陕甘根据地留守任务，由周恩来指挥。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东征军兵分两路，以一军团为左路军，以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为右路军，向黄河天险进发，于2月20日20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被敌发觉后立即变偷渡为强渡，一举突破敌人河防、渡河成功。红军渡黄河后，纵横驰骋于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威逼太原，阎锡山急忙把进驻绥德、米脂的晋军四个旅调回山西，又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想插手山西，满口应承。当即决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并于4月中旬派了十个师进入山西，配合晋军，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扰乱红军后方。为避免与优势敌人的决战，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撤回陕北。这次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击溃阎军31个团，歼敌17000余人，俘敌团以下官兵4000余人，扩大红军7000余人、筹款40万元。东征战役，是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继直罗镇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

5月18日，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进行西征作战。东征归来后，林彪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任政委。

6月间，西方野战军占领了陕甘宁边大片地区，扩大了苏区。

7月17日，东北军何柱国部以骑六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进攻，直逼红军驻地七营的堡子下面，红2师一举将其击溃，消灭其四个骑兵连，缴步枪300余支。敌人见红军已有准备，即暂停进攻。红军对抓到的俘虏，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归还马匹、武器，全部予以释放。

至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中，大量消灭了敌人，俘虏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陕甘宁的广大地区。西征的胜利，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好了准备。

第十五章二、六军团

贺龙找到夏曦，把身上带的一枝白朗宁手枪也掏了出来啪地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枝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那时，贺龙已把枪上了顶门火，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

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贺龙探过头去，在他的耳旁小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耳毛直竖。

百丈关一仗失利，彻底打破了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梦想，但他仍执迷不悟。

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以“中央军委”等组织的名义致电党中央：

（甲）此间已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中央。

然而，不过数日，国内形势陡转，使张国焘顿感似乎在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涛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时，共产国际已派张浩同志（林育英）回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与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他不断地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当头一棒。

张国焘急谋妥协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他是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博古、凯丰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徐向前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德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进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后，四方面军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

中央从维护党内统一出发，也表示同意。193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系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表示同意“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这一切全发生在一日之内，1月27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气氛。

这时，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

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

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

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二、六军团则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相呼应。

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边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上述三个方案，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现，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张、陈、徐讨论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

1936年2月下旬，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甘孜进军。刘泊承、李先念率三十军89师先行，为全军开路。行军路上，天寒地冻，没有一丝春意。首先翻越夹金山，漫山皆白、积雪盈尺。

3月底，四方面军已控制了东起丹巴、南抵瞻化、泰宁、北至草地的大片土地。

朱德等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甘孜、炉霍一带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上，张国焘欣然同意。

为接应二、六军团顺利到达甘孜，四方面军派出三十二军南下，阻击敌李抱冰部对二、六军团的堵截。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指定李先念、何长工负责筹粮和各类物资。

张国焘借用达赖的“康人自治”、“建立大西藏国”的口号，于5月5日在甘孜组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藏族人民政府）。用张国焘的话说：“达赖的建立大西藏国的目的，是要使康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我们借用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兴番灭蒋，使番人真正独立与解放，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波巴政府决定从公元1936年起为波巴共和国元年，并发表宣言称：“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后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现在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

6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南下回顾与瞻望的长篇演讲——

“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的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最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会笑的！”

鼓掌。

“现在，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这就是说，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贺的！”

大鼓掌。

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成立中共西北局，

历时 8 个月的张国焘伪中央，终于寿终正寝。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 1936 年 3 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3 月 23 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北进，30 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同北进。”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

4 月 27 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从炉霍去甘孜，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徐向前因要带中纵队先行北上，留在炉霍布置出发事宜，没有参加会见。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两军胜利会师，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两军指战员互赠礼品，亲切叙谈，欢欣鼓舞，士气倍增。

7 月 2 日，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辖第二、第六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编而成的红三十二军，计一万三千余人。

夏曦肃反若癫狂

贺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传奇英雄之一，素有“红色土匪”之美名。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著名的土匪区湘西桑植，自小练就一身武艺，十五岁开始在湘鄂川黔边做骡子客。

贺龙的父亲虽然贫穷，但身任“哥老会”的领袖，他的辈份几达最高层，他把它传给了少年闯江湖的贺龙。贺龙自幼打恶少斗警匪，练就了惊世胆量，一天，当地的武官请他父亲去赴宴。父亲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据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在乱世做生意的贺龙，屡被恶霸警痞敲诈。他奋起反抗，却几次入狱，被父亲花钱救出，对社会充满了反意。1916年，在他20岁那年，机会来了，他带着20来人，用两把菜刀捣了盐局税卡，拉起了一支武装，这是响应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的护国运动，当时湘西有数万农民一轰而起，跟着贺龙攻州打县。从那以后，贺龙几次被军阀、土匪缴械，又空手拉武装兴起，一直混迹于湘川黔边，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

当共产党人20年代中前去和他联系时，他身任湘军师长，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象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在当时堪称“义匪”。

北伐时，在共产党人鼓动下，贺龙率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鄂西、豫中立下了战功，升为二十军军长。当军队内左右两派斗争激化时，他站在左派一边，处决了跟他起兵十年的老朋友、暗中已投靠蒋介石的参谋长陈图南。他率二十军参加了周恩来组织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潮汕遭到失败，二十军打光了。就在南下的路上，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香港潜至上海，周恩来安排他去苏联学习军事，由于出了叛徒未能成行，他向中央要求回湘西重新组织武装，获中央批准。

途经武汉，地下党正准备组织年关暴动，留贺龙做总指挥。不巧，阴历腊月二十五以前，地下党被破获了，暴动计划失败，他匆忙离开本地。

回到桑植，当地武装闻讯后纷纷前来投靠，一个月内，贺龙已拥有3000兵马，势头很盛。在他前去鹤峰筹款时，敌人一个师来袭，贺龙赶回桑植时，全军已溃散，贺龙率军部逃到山林打游击，最低潮时，他手下只有91人，72支枪，他背着少年红军穿山越水，身上的衣服也换不下来，他那位做了十几年侠匪的大姐贺英给他送来了一批物资弹药，劝他好好整顿军队，他整了3个月，共编成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团员，一些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营连长当了排班长，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当了班长战士，这是贺龙数年来脑子最清醒的时候。

数月后，贺龙的部队再次兴起，又有了数千人马，部队已编成为红四军，贺龙任军长，他打下了鹤峰县城，建立了连接鹤峰、桑植的根据地。不久，敌军向子云旅来犯，被贺龙诱入埋伏歼灭。

193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四军在鄂西公安与红六军会师，成立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兵力达1万军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

车立三的冒险路线，经中央代表邓中更之手贯彻下来，贺龙被迫率红二军团南下攻打长沙，迭遭失败，三停人马损失了二停，部队缩编为红三军，

这时有一支 3000 人的土匪来投奔贺龙，被红军收编。

1931 年 10 月，王明的代表夏曦来到湘鄂西，接替了邓中夏的职务，担任中央分局书记，贺龙红军的噩运到来了。

夏曦，字蔓伯，1901 年 8 月 17 日出生在湖南益阳，他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兼好友，参加了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组织的革命活动。大革命时代，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后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他被派到苏联学习，与王明成为同学。

夏曦执掌湘鄂西苏区大权后，积极推行左倾冒险路线，受到了地方和红军高级干部的反反对。

1931 年 11 月，万涛、潘家良、段德昌开会向夏曦提意见，夏曦坚持己见，为解决分歧，他们派省委委员宋盘铭赴上海向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宋带回的却是博古等人支持夏曦的指示。众人不服，再派尉士均赴中央汇报，就在尉士均找中央期间，1932 年元月 22 日，在湘鄂西党的四大上，大多数与会者站起来批评夏曦，有 77 名代表联名写信，要求中央调走夏曦。就在这时，尉士均回到洪湖，同来的还有中央代表关向应。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夏曦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而万涛、段德昌等对夏的批评则是“反党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不久，中央把江西富田事变的经验和肃反指示传到湘鄂西，夏曦地位巩固后，便借肃反之机向他的反对者动手了。夏曦亲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一般情况下，夏曦写个批条，关向应动手捉人，保卫局长江奇执行处决。

省委宣传部长万涛、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省委委员潘家辰、军参谋长段德清、红 9 师政委戴君实、红 8 师参谋长胡慎己、继任者张应南、红 7 师参谋长赵奇等在肃反中全部处决，洪湖的县区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单此第一次肃反，就杀了 1 万多人。时为 1932 年 5 月至 8 月间。就在 8 月，中央来电表扬了湘鄂西党的肃反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

由于夏曦的独断专行，红三军屡战不利，洪湖苏区复沦敌手，当红三军被迫经豫陕川边向湘鄂边转移时，夏曦又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军参谋长唐赤英、红 7 师师长王一鸣被害，另外遇难的大多是营连级干部。这次杀了 241 人。

杀红了眼的夏曦企图向屡次阻碍他的意志的贺龙下手，在竹林关，他把贺龙和关向应的警卫员枪都下了。贺龙找到夏曦，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他把身上带的一枝白朗宁手枪也掏了出来啪地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技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那时，贺龙已把枪上了顶门火，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俩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走在大巴山时，夏才叫住贺：“胡子，不要使气嘛！”贺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由于没有把握，又考虑贺龙在军中威望太高，懂军事，有利用价值，夏曦才未敢冒险一试。

1933 年 3 月，在巴东金果坪，夏曦开始了第三次肃反，他擅自下令解散红三军中的共产党组织，清洗后重新登记，军中党员只剩下了 4 人——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阴历正月十五，洪湖苏区创始人、深受军民拥戴的传奇英雄段德昌被公

开枪决。在逮捕段德昌后，贺龙忍无可忍，与夏曦拍桌大吵，仍然无济于事。

段德昌临死前、望着贺龙失声痛哭，并高声喊道：“贺胡子，我不反对你，我只反对夏曦！你不要忘记洪湖人民，一定要打回洪湖去！”

是年5月，夏曦又开始了第四次肃反。从年底到1934年4月，红三军在敌人围剿下四处流浪，兵力由近万人锐减到3000人、濒于灭亡边缘。

在段德昌遇害后的日子，贺龙心情沉痛，他与卢冬生等流着泪，秘密地把所知的被冤杀的数千名干部的名字写在一件白衬衣上，派人秘密携带它去上海找中央汇报，却一去杳无音信。此前，贺龙曾尝试在领导层内寻找支持者。他与关向应相处融洽，关为人忠厚，正直，干练，有工作能力，在段德昌遇害前两个月，一次，贺龙向关向应提出：停止肃反。关向应默不作声。贺龙又提议：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嘛。关向应不同意。这时贺龙第一次向关向应试探：“你当书记，我们开会选一下么。”关向应立即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话说得很严厉。贺龙以后再也没有提起。

在肃反中后期，贺龙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有时当面把被捕的基层干部释放，夏曦在旁皱着眉头不吭声。然而捕杀师、团以上干部，他与夏曦争执，从来没有争赢过。当时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人反对，只要政委一个赞成，也必须按他的决定执行。

肖克西征五千里

1934年12月24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这两支饱受磨难的红军部队，终于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胜利会师。

12月26日，在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了会师大会。两支红军的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这时，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任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改为二军团副政委。

此后两军团一直接受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的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战略方面军。

红六军是1932年由湘赣、湘鄂赣地区的红军部队合编组成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六军团主力第17师，曾奉中央军委命令，在肖克领导下渡过袁水，北出会合正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红16师，向南得路永修一带行动。南浔路位于蒋介石北路军侧后，是由南昌至九江的交通大动脉。16、17师北上破坏南浔路，目的在于箝制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以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红17师在敌人后方重兵围追中，纵横驰骋近两个月，有力地扰乱了敌军的布置，配合了红军主力的作战，自己也在完成任务后胜利返回。

1934年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秘密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转移，同时向共产国际报告。就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之前，为调动敌军兵力，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派出红七军团北上之后不久，又命令红六军团西征。由此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

经过充分准备，在中央代表任弼时等人的率领指挥下，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全军9000余人，在独四团的引导下，由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

12日，全军召开军人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挥师西征，并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参谋长。

部队继续向西挺进，8月17日，占领郴州，23日到达湘江右岸蔡家埠，准备抢渡湘江，敌刘建绪部发现红军意图，急调重兵堵截，广西军阀部队分两路迎了上来，湘江两岸布防严密。红军遂放弃从零陵地区渡江计划，回师东行到阳明山区，登上山顶露宿一夜，次日下山直取祁阳县白果市，甩掉了四借于我的追敌，继而折而向西，进入广西全县附近，一举击溃当面之敌8个团，于9月4日上午从界首渡过湘江。

9月上旬，中央军委下达训令，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岗山一地区打击敌人，然后沿湘桂边行动，意图是要六军团钳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六军团遵令行动，未能成功，乃迅速改变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渡渠水，西入贵州。湖南省主席何键无奈地对人说：“红六军团‘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敌军‘追逐数千里’，‘疲于奔命’。”

走到通道以西40里的新厂，六军团杀了个回马枪，击溃敌两个团，追敌从此不敢逼近。渡过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向石阡前进。

在甘溪，6军团与桂敌战斗失利，被截为三截，陷入三省敌24个团的包

围之中，几乎全军覆灭。全军各自奋战，一部在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而出；后卫 52 团浴血奋战 3 昼夜，弹尽粮绝，师长龙云被捕，遭军阀何键杀害；一部在任弼时、肖克带领下退入山林、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指战员没有鞋子，赤脚而行，中央代表任弼时患了重症疾，手拄拐杖，随军步行，部队在山林中行走了九天九夜。10 月 17 日，幸遇一位当地老猎户引路，深夜由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钻出山林，击退狙击之敌，突围而出。

当月 24 日，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红军会师。红六军团西征至此结束。

红六军团西征行动历时 80 天，跨越敌境 5000 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贺龙盘旋打圈子

中央代表任弼时自从遭博古排挤、贬到湘赣苏区后，头脑冷静了许多。在湘赣，他亲眼目睹肃反杀人之乱，痛感打AB团之非，遂以其一贯魄力制止扩大化，从刀下救出了王首道、张启龙等人。在与贺龙红军会师后，贺龙立即把夏曦在湘鄂西屠杀上万人，丢失苏区，解散党团组织，使红军由数万锐减到不足3千人的罪行，全面详实地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向关向应等人全面调查了情况，又与夏曦作了长谈。之后，他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夏曦将“十分之九连队以上军政干部”“当做反革命而拘捕”和“退却逃跑”、“出兵逃跑”以及“取消主义”等错误，要求中央撤销夏曦的主要职务，两天后，中央回电同意。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之际，也恰是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之时。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仓促由江西于都突围，经会昌、信丰、大庾向湖南转移，与敌军苦战于湘粤桂边境。蒋介石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并且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湘江与潇水之间。

鉴于中央红军的困难处境，贺龙和任弼时等两军领导人认为两军服下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用积极的军事行动来策应中央红军转移，并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11月中旬，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北的龙家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枪2000枝，打垮了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也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

在之后的一、两个月里，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这个局面的打开，既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部分地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二、六军团，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长征行动。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的攻势和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胜利令蒋介石极为恐慌，急忙调兵遣将，于1935年初，向刚刚创建的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1935年1月27日，红二、六军团在大庸县厂家溶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夏曦，清理他在肃反、建党、建军、丢掉苏区方面的错误，红军代表们愤怒地控诉了夏曦的罪行，有人向夏曦扔出了砖头，不少人呼喊：“打死他！打死他！”被贺龙、任弼时拉开。会后，任弼时上报中央，要求对夏曦作出组织结论。

2月11日，中央发来了回电，电报要求红二、六军团实行运动战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对夏曦则认为“夸大了他的错误”，“夏曦应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任弼时、贺龙等发现中央在战略战术上提法与过去不同，再次发电询问，才知道中央刚刚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登上领导岗位。任弼时、贺龙向部队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按中央指示，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贺、

任、关、夏、王为委员，贺龙为主席。经商议，任弼时调夏曦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随后，红二、六军团又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6月，突围的中央红军已胜利战胜了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进入四川西北之懋功（今小金），与由川陕根据地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在南方的主要根据地只剩下湘鄂川黔一处。蒋介石一方面调集兵力，向红一、四方面军进逼；另一方面又调集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企图尽快巩固自己的战略后方。

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的圈子，因此两军团的主要任务，便已不再是吸引和钳制更多的敌人，而是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

9月上旬，当敌人第三次“围剿”部署逐渐形成时，红二、六军团主力适时停止了东进，主动撤离津、澧地区，并准备抓住有利战机，首先击破东面急进之敌，但由于敌人采用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每天只向前推进二三公里，逐段筑堡交替前进，遂使得红二、六军团多次未能找到有利作战机会。红二、六军团反“围剿”作战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

就在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最为严重的时刻，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来的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的电讯联络，早在6月下旬就已中断，此时接到来电，两军领导人极为高兴，但同时又为中央军委使用明码发报感到疑惑。9月29日，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立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可惜，这份电报被张国焘截获去。

原来，张国焘已利用权势把持了红军总部，攫取了红军总部同红二、六军团的通讯的专用密码。第二天（9月30日），张国焘即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回电，当时二、六军团并不知道张国焘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所以把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发来的电报当作是军委的东西，遂将反“围剿”的形势向红军总部进行了汇报。

11月4日，任弼时、贺龙召开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遵义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军委2月11日关于“当必要时，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决心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贵州省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尽管红二、六军团这次行动的最初本意，只是想摆脱敌人重兵包围，创建新的根据地，但随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这次撤离却成为了二、六军团伟大长征的开端。

1935年11月18日，红二、六军团正式下达了突围命令。19日上午，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分别举行了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红二、六军团告别了艰苦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根据地人民，踏上了伟大战略转移的征途。

面对强大国民党军的包围，战略转移的首要任务就是调开敌人。

要跳出这130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贺龙认为，如果直奔贵州，后边跟着咬得很紧的十几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贺龙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

乱敌人的“围剿”计划，然后，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取得主动权。军分会领导成员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

突围开始后，红军第2天便突破了敌军渣水封锁线，第四天突破沅水封锁线，从11月23日到28日，红二、六军团截断了长沙，沅陵交通，长驱直下，到12月初，占领了湘中十几个县，整个湘南为之震动。

敌军调动7个师追了上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沅水、资水地区，红军为争取主动，决定退出湘中，向湘黔边转移。在军分会会议上，贺龙说：“敌人追来，我们再拖他们一阵。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索性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掉头去贵州。”大家同意这个办法，12月11日，红军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大量敌人穷追不舍，涌向湘东南。突然，贺龙率红军转向了西北。时已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兼程疾进，1936年1月1日进到芷江冷水铺一带，把各路敌军远远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元旦，1月9日，到达了石阡地区。

石阡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无法长期供应两个军团的给养，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敌人15个师又陆续追来。任弼时和贺龙遂决定转到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开辟根据地。

一路上，贺龙率领红军时而向南，时而北进，时而作出袭取贵州省会贵阳的姿态，时而又作出抢渡乌江的模样，甩开敌人大部队，寻机歼其小股。敌人认为贺龙企图走红一方面军的老路，乃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然而，2月2日，贺龙却率部向西巧渡鸭池河，到了黔西县，各路敌军又被甩在一边。

红军占领黔西、大定、毕节3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后，便展开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也进行了休整，加强了训练，并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从1935年11月长征开始到1936年2月，4个月以来，红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不停地与敌军周旋，到了黔、大、毕，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经过6000华里的征途，红二、六军团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达到了近2万人。

贺龙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红红火火，急坏了蒋介石。他从南京飞到贵阳，亲自布置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他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5个纵队进攻，令两个纵队在东西两面防堵，由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设防。他下定决心，妄想用120个团的兵力，把贺龙和红二、六军团一举消灭。蒋介石亲来督阵，各路敌军不敢怠慢，尽管他们几个月来已被红军拖得人困马乏，战斗力锐减，仍然疯狂地开始了进攻。红军在金沙、三重堰以北地区两次寻机歼敌，未能如愿，敌人重兵渐渐围拢过来。

贺龙和其他领导人认为红军应该转往黔西南，摆脱敌人的围攻。行前在毕节城，由贺龙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晚间，军民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气氛十分热烈。

2月27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上级派夏曦率两个警卫员两次前往驴头山做土匪胡魁兴的弃暗投明工作，不料胡魁兴反了水，追杀夏曦，夏曦在逃跑中落水而死。

时为1936年2月29日。他以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身份，担负这件危险性很大的使命，死于无人见证的地带。相比于万余共产党人的英魂，夏曦死有余辜。

贵州山区的2月，天寒地冻，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1万多人的红军在一座座大山中转来转去，艰难困苦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敌军遮断了通往黔西南的道路，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转了差不多1个月。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可以回旋的地区越来越小。红二、六军团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研究部队行动。他说：“我们的情况不妙，敌人100多个团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让我们拖起跑，比我们更受罪。敌人各个纵队只受顾祝同指挥，行动不大一致。包围圈虽然缩小，漏洞还是有的。再有，敌人对我们永远估计不足。这1个月转来转去，敌人会以为我们垮得差不多了，也增加他们的骄气。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隐蔽地从敌人的接合部钻出去，兼程进入云南，捅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赞成贺龙的主张。贺龙召集两个军团各师的和部分团的干部，下达了秘密突围的命令。要求部队行动一定要十分隐蔽，不准点火，不准喧叫，马蹄裹布，不准发出声音；凌晨从敌夹缝中通过，即使被小股敌人发现也不准打枪，不准捡歼灭小股敌人的便宜，要极迅速地摆脱敌人。

根据贺龙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从密集的敌人中间迅速穿了出去，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三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贺龙带领红二、六军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云南。这个时候，接到了红军总部的指示，要求红二、六军团在云南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发来的第一个电报，要求红二、六军团准备生姜、辣子、衣服等；任弼时、贺龙表示异议，他们认为，从全国革命大局出发，金沙江以南放置一支主力红军不无意义，过往经验证明，川、湘、鄂、黔可任红军回避，有生存能力，当时部队减员3千人，也急需休整。

朱、张发来第二封电报，提出了渡金沙江有五个渡口可选择，更说明全国形势急变，北上会师意义远大。

贺龙、任弼时等于3月29日致电朱、张，说明困难和设想，又说，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因此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兼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3月30日，朱、张回电，命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之会师。任、贺服从了命令。

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方针既定，3月3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部主动撤离盘县，冲破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后，分两路向滇西方向急进。进占寻甸县城。8日，红二、六军团抢渡普渡河，因滇敌阻击未果。4月9日，贺龙在与其他领导人研究下一步行动时提出，抢在敌前，佯攻昆明，甩掉滇军主力。4月10日凌晨，红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直扑昆明。当天，先头部队突然进抵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进至离昆明城15公里处。第二天，两军团全部进至距昆明20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了要打昆明的姿态，红军的这一

突然行动，震动了昆明！顾祝同急向蒋介石求援，龙云把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守城，还急令守普渡河渡口一带的滇军回救昆明。正当敌人急如星火地向昆明赶来，贺龙等率领红军突然转向滇西，分两路西进，日行百里，几乎一天攻占一座县城，势如破竹，横扫滇西。一路上尾随红军滇敌主力只作了“送客式”的“追剿”。25日，贺龙等开始指挥二、六军团在石鼓、巨甸之间抢渡金沙江。先头师于本日渡过，全军于27、28两日全部渡过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时，共有15995人，7852支枪。其中二军团9995人，4867支枪。六军团5998人，2985支枪。

渡过金沙江后，二军团第4师于4月30日越过海拔5300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城。至5月3日，红二、六军团齐集在中甸县城及其近郊。中甸属云南，位滇西北，只几百户藏民，红军一到，大部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归化寺，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寺里的松本活佛对红军的到来惊恐不安，令僧众关闭寺门严加防范。

归化寺里一位管事的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和红军“首领”谈判。5月1日，夏那古瓦和几位头人会见了贺龙，向贺龙献上哈达。贺龙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一一作出回答。

5月2日，贺龙应邀亲率40余名着装整齐的红军代表到归化寺拜访活佛，活佛和八大老僧及几十名喇嘛以隆重的仪式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他”（佛厅），破例为贺龙举行了跳神仪式。这种宗教盛典本来只有每年冬月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时方举行。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僧侣们深受感动，活佛和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5月3日和4日，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麦3万余斤。两天中，红军筹集了10万斤粮食。几百户人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按照红二、六军团通过藏区前往甘孜的需要，还远远不够。红军只得早日起程继续北进。

5月5日，红二、六军团分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翻过大雪山，走1个多月。除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之外，粮食极端困难，而且，一些藏族头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很深，他们带着武装阻击和袭击红军，残杀掉队的红军人员，由于贺龙和全体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团结兄弟民族的政策，才使损失减低到了最小限度。

6月3日，肖克、王震率六军团直属队及16师到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然后进驻甲洼。17师在5日也到达甲洼。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各军首长发出捷电：“六军团首长肖克，政委王震率光荣长征的二、六军的先头16师已于今日与我主力红军会合于理化南之甲洼。”

6月30日，贺龙、任弼时率二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

朱德授倒张密计

7月20日，红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

由于红二、六军团自长征以来便与党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络，因而对张国焘一年来的分裂行径毫无了解。两军会合后，张国焘抢先进行有利他的宣传活动。二、六军团前锋甫至，张国焘即派人向他们散发小册子，散布攻击毛泽东和中央的舆论。

当六军团6月3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肖克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理由凿凿，肖克盲目地相信了。他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人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但当他见到德总司令，听他诚恳地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为了澄清真相，朱德还与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地要同张国焘斗争。

当初，红二、六军团北上一事，朱德没有可能与毛泽东电商，是他自行决断的。他认为，只要与二、六军团会师，四方面军北上一事才有把握。在这个事关全国革命大局的问题上，他作了重要决断，实为“倒张运动”的重心。

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朱德都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贺龙他们。朱德还给贺龙他们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并且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与此同时，张国焘也在积极活动。他向红二、六军团派出了工作组，煽动对中共中央的不满，散发了《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贺龙、任弼时等坚决予以抵制。任弼时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以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立即打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

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贺龙对张国焘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贺龙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南下在瑞金贺龙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

会师后，张国焘主动和贺龙套交情，当贺龙向他要衣物、粮食时，他满口答应，让三十军送来了大批物资。另外，他派出红 32 军加入到红二、六军团行列，算是对受到损耗的红二、六军团的补充，三十二军原是中央红军中的红九军团，指战员们对张的分裂行为一直暗怀不满，张乘机卖了个人情，也丢了个包袱。

由于朱德向中央申请成立红二方面军，7 月中央电文指示：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贺龙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警觉性高。他洞察了张国焘的为人，做好了会师后，要员云集，贺龙主动张罗看安排住房，把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和任弼时、关向应都安置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所有警卫人员由贺龙亲自挑选，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他心想，你张国焘人多搞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你就是有歹心也不敢下手！

开庆祝大会时，张国焘是主持人、主讲人，在主席台上，贺龙坐在他的身边。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贺龙探过头去，在他的耳旁小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耳毛直竖，未敢在会上讲出一句与中央闹分歧的话来。他对贺龙疑忌颇深。

任弼时扮演包公

任弼时听从刘伯承的劝告，决定采取迂回策略介入这个矛盾。他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张国焘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张国焘嘲讽地问他是不是想做“包公”。他也不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怀着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来往的电文和有关材料进行查阅与研究，并寻访四方面军有关当事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办法，促使红军团结。

数日之后，任弼时前来登门造访张国焘。

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说：“任胡子，有何高见，快和盘托出吧，我洗耳恭听。”

任弼时郑重其事地表明他的观点：“通过走访了解，得出以下几点见解与国焘兄商榷：

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中央的倾向；

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出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何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

“最后一点，请国焘兄恕我直言，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似乎太过份了，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辩解，任弼时静静地听着，只是说，党的统一和军队的统一比什么都重要。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张国焘对此苦在心里，却无法表述意见。朱德的举措名正言顺。然而，张国焘是不甘心的，他显得非常急躁。他让周纯全找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开个干部会，首先求得意见一致。任弼时清楚，张国焘是想利用这个会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同党中央继续对抗。他当即对周纯全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公开出来，会造成上层对立，使工作更加困难，损害团结。张国焘听不进这种劝导，直接找到任弼时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任弼时非常冷静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任弼时的话，力重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孤立，就不再提开这个会了。张国焘准备换掉红二方面军4个师以上的政治委员，也未能如愿。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

现“速出甘南”的计划，7月1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7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进入草地第二天晚上，任弼时主动找傅钟谈话。任弼时和傅钟的谈话，常用俄语进行，他们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傅钟时任川康边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的西北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先向傅钟介绍了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政治组织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任弼时很惊讶。他仔细地听了傅钟讲述的当时所见所闻。听完傅钟讲的过程，任弼时严肃地问他：“北上有决议没有？”

傅钟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任弼时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傅钟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凌晨格外寒冷，他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这天晚上，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要傅钟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是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傅钟看过电报后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任弼时再次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傅钟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连陈昌浩也不晓得要干什么。傅钟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任弼时看过，任弼时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任弼时没有就此批评过哪个人，他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傅钟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

有一天任弼时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傅钟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任弼时说，和傅钟同志还没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

任弼时和傅钟都会说俄语，关键的话用俄语表达。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任弼时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的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

经过几次和任弼时的竟夜长谈，傅钟对张国焘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按照任弼时的安排，傅钟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任弼时的意见。

任弼时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他建议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

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自此以后思想有了很大变化。

红胡子筹款奇术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从甘孜等地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从甘孜随红四方面军之后北上。

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无常的水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遍布沼泽，稍不小心，脚陷进泥里，就会惨遭灭顶之灾。一路上红军得不到给养补充，起初，每人每天还有3两青稞粉充饥，后来就完全断了粮。指战员们只得挖野菜、草根，吃牛羊皮，最后，连野菜和牛羊皮也没有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未能起来，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第二天，别人来呼唤起程时，他已经牺牲了。

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给贺龙拍来电报说：“六军团由甘孜到阿坝减员750人……模范师绝粮12天。”红6师报告：该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到绒玉清点人数，干部战士死了140多人。8月初，部队走到噶曲河附近时，情况更糟糕，不仅筹粮没指望，就连宿营找块干土、找些干柴都相当困难，上千名干部战士牺牲在一些深不见底的沼泽泥潭里。看到大批指战员因冻饿而死去，贺龙心如刀绞，他知道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了！他命令各级指挥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

到了宿营地，贺龙就把自己一口一口省下来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一天，从洪湖苏区参加红军的警卫连长朱声达胸部负了重伤，口粮又吃光了，已经奄奄一息。贺龙听说了，亲自把自己的炒面用水调好，端到朱声达身边，一口一口地喂进他的嘴里。朱声达咽着炒面，流出感动的泪水，对贺龙说：“老总，你吃吧，你也该顾顾自己啦。”在贺龙的带动下，军团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捐献出来，留给伤病员。

为了使部队渡过草地关，贺龙和大家一起掘草根，挖野菜。为了防止指战员吃野菜时中毒，他指示各部队成立“党团员试吃组”，并且带头参加。当草根都难以找到时，他号召大家寻找前面部队丢下的马骨头和牛皮，亲自传授吃皮带、皮鞋的办法。行军中遇到河沟、水塘，他就动员大家去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蚱。

部队来到噶曲河边，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兵站的同志向贺龙报告，朱德总司令下令留给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牦牛，前几天被藏族反动骑兵偷袭了不少，供应出现了困难。贺龙听罢，有手向下一挥，说：“算了，天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接着又仔细地询问起剩下的牲畜数字，决定把原来准备发给每个人吃6天的6斤肉，减半发给部队。

兵站工作人员开始分肉，也给贺龙留了一份，贺龙拒绝了，他哈哈大笑，用手比划着钓鱼的姿势说：“看吧，我还要改善生活呢！”说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了。

部队休息的时候，贺龙拿着自制的鱼竿来到河边钓鱼。这一带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鱼不怕人，时间不长，他便钓了10多斤鱼。然后，他亲自将鱼送到卫生部，笑着对郭鹏等伤病员说：“把鱼熬成汤，喝了伤口好得快，同志们盼着你们伤愈归队啊！”一路上，贺龙只要有空，便拿着鱼杆去钓鱼，他的马背上经常挂着鱼，他钓的鱼从不自己一个人吃，总是和大家一起吃。正是他钓的这些鱼，使许多伤病员补充了营养，帮助缺粮的同志挺过了那一段

艰苦的岁月。

经过 40 天的艰苦跋涉，就要接近草地的尽头了，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贺龙决定杀一批马，以解决眼前断粮的困难。他让人先杀他的马。杀马前，他来到他心爱的坐骑身边，伸手理了理马身上火一样的鬃毛，抱着那粗壮的脖子，心里甭提多难受了。红二方面军的同志都知道贺老总爱马，而这匹马多次救过老总的命，在草地上也曾救过很多伤病员的命啊。贺龙久久地抚摸着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开饭时，当红军战士得知自己吃的马肉中有贺老总的马时，都十分难过，有的捧着饭碗掉下泪来。贺龙见到这个情景，开朗地说：“咱们没有吃的呀，不吃马又有什么办法？”他挥动着拳头，鼓动地说：“同志们，吃了马肉，有了精神，咱们一起走出草地，争取最后的胜利！”

贺龙爱马举世闻名，他总是寻找、挑选骏马，也颇有眼力。有时，他为了一匹良马，可以发起一次战斗。如果部下发掘出一匹良马被他知道，也难免被他用厚重的礼物不客气地换走。会师后，他听说朱老总的马被张国焘指使人牵走，就把一匹枣红马送给了朱老总。

在贺龙的队伍里，往往夹着一只多达上千人的“人质”队伍，那是从各省捉来的豪绅财主或者为非作歹的官吏，他们只有在交出一大笔赎金后才被放走，这是贺龙从做山大王以来惯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筹款办法。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会被处死。

“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一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威风凛凛的贺龙对人质“廖胖子”吼道，然后一夹骏马飞驰而去。

这一幕被一位传教士看在眼里，他叫博萨哈特，在贵州黄平被俘，会讲一点中文，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位叫海曼的传教士。红军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 70 万美元，结果传教团为海曼支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博萨哈特还为贺龙的女儿编织了一件婴儿毛衣。他们在一年后获释。

在数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贺龙学到了许多奇技。长征岁月应该是迄今为止贺龙最有成就的时代，他的才华在两军会师后政治领导贤明的情况下得到了尽情挥洒。会师时，两军仅 6000 人，8 个月后，两军兵力达到了 2 万人，即使爬雪山过草地到了陕北，还有上万兵力。在保存兵力方面，比之于毛泽东的中央红军，贺龙有优势可言。原因在于贺龙的部队有长途行军的经验，轻装上阵、收拢兵力、就地筹款、招兵扩红……各方面都有一套长期摸索出来的经验。每当军事上陷入重围时，贺龙都拿出他的绝招：打圈子。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实质上也是打圈子，乌蒙山回旋战是贺龙打圈子的佳作。长征之初，他也向湖南打了圈子，摆脱了身后十几万追兵。过去在湘鄂西根据地，每当部队被邓中夏或夏曦的冒险路线瞎指挥导致大减员时，贺龙总是把部队拉到湘鄂川黔边打一个大圈子。

贺龙个性豪迈直爽，英武之气飞扬，他善于结纳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年南昌起义失败他从上海回家乡重搞武装之时，许多当地土匪、游兵、地方军队、神枪会常常慕名来投。在贵州，一位曾任国民党的省秘书长的老乡绅，也为他的义气所感，参加了长征的行列。

那乡绅名叫周素园，是年五十七岁，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贵州省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界有相当高的威望。红军即将解放毕节时，国民党专员劝他逃走，他拒绝了。红军进城后，把他和当地一些大土豪劣绅一道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当地中学的学生、教师和百姓们向红军说明此人为人清廉、素无劣迹，红军

从他的家中抄出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几本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日记，就把他放回了家，退回了没收的物资。

贺龙得知后，亲自拜访了他，两人一见如故。周素园出山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工作很有成效，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人士。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贺龙指示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不住和我们一道长征。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我看可以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作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贺龙还指示把一批黄金和银元送给周素园作路费、生活费及活动经费。周素园知道后十分激动，他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贺龙听了十分感动地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十个八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就这样，周素园加入了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贺龙有个老部下名叫张振汉，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张振汉回了老家，投到鄂军徐源泉队伍里，后升为师长。1935年，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打回湘鄂西，6月在恩施设下埋伏，歼灭了张振汉的师部和1个旅，将张振汉活捉。他没有杀张振汉，而是留下他作炮兵教员。这位国民党军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了陕北。

贺龙长得高大魁梧，枪法如神，马技卓绝，他在数十年民间草莽枪林弹雨中崛起，崇尚响当当硬汉本色。多年的山林生涯给贺龙留下了足疾。一到冬天挨了冻，脚底便裂口、流血。在乌蒙山一带打圈子时，他的足疾又发作了，脚板上裂口有一寸多长，裂口边露出一长溜鲜红的嫩肉，稍一触动，就直冒血，几乎无法走路。贺龙决定用火烧治。他在裂口上涂满凡士林，然后让勤务员小陈用火烧。

小陈接到正燃烧的火柴，哆哆嗦嗦地移近贺龙的脚板。涂上凡士林的伤口，一碰到火苗，凡士林马上就化了，伤口轻轻地发出哧哧的声音。小陈本能地一缩手，火柴灭了。紧接着，贺龙又把点燃的第二根火柴递过来，接着第三根、第四根，一根接一根地烧，直到伤口的嫩肉烧得发焦了，贺龙才满意地说：“这才行了，蛮可以对付一阵了。”

贺龙烧伤口，过一段时间就得来一次。用完了凡士林，便抹点猪油，连猪油都找不到时，只好干烧。每烧一次，贺龙都是满头大汗，有好几次脸色发白，但贺龙从来也没有哼过一声。

贺炳炎截肢惊奇

贺龙的部下颇多这种响当当、铁铮铮的男儿，他的爱将贺炳炎就是如此。

贺炳炎是湖北省松滋县人，从小给地主放牛，九岁丧母，后在一个铁匠铺里当学徒。1929年春天，贺龙率领的工农红军转战来到湖北松滋一带，刚满十六岁的贺炳炎放下铁锤投奔了红军。因其作战勇敢，善于打硬仗，打恶仗，战斗作风颇似贺龙，故外人常将贺炳炎比为“小贺龙”。肃反时，几被夏曦杀掉，亏得贺龙相救，才幸免一死，贺龙倚之如膀臂。

长征开始时，贺炳炎已是红二军团第5师师长了。长征前，他出生入死，先后负伤16处。说来也神，他负伤多，好得也快。常是刚刚包上绷带，他又照样带领部队冲锋了。战友们开玩笑地说他的血好，可他却诙谐地说：“敌人的子弹没劲头，打到身上软不拉塌的，没什么了不起。”

一次，队伍行进到瓦屋塘，在与敌人作战中，贺炳炎右臂被炸成肉泥，必须立即截肢抢救，否则有生命危险。当时，医疗手术器械都已驮运转移了，一时无法取来。医生仅找到了一把伐木用的锯子，要用它来锯掉贺炳炎的伤残的右臂。止痛药又没有了，只有以吗啡代之。

贺龙见了，忧虑地说：“吃这么多吗啡，往后怎么打仗嘛！”

贺炳炎听后，将吗啡掷之于地，在没有麻醉的条件下让医生以木锯截臂。

医生把木锯放在开水里煮了又煮。尔后，叫来四个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的双腿、头和左臂。贺炳炎自己则把身边的毛巾塞进嘴里，咬住忍痛，医生走上前，一手握住贺炳炎的胳膊，一手握着锯，把牙一咬，便锯了起来。刹时，血水顺着锯条往下流淌。锯到骨头时，只听得骨头被锯得吱吱响。贺炳炎的头上、脸上刷地滚起一层黄豆大的汗珠儿。几分钟后，贺炳炎的右臂被锯下来了，截面是用钢锉锉平的。事毕，贺炳炎浑身像水淋过一般，嘴里的毛巾咬得稀烂，贺龙从这断臂上取下了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一直带在他的身边。他经常把这骨头给干部战士看，并充满深情地介绍说：“这就是贺炳炎右胳膊上的骨头，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一千倍！”

以后的长征路上，失去右臂、伤口未愈的贺炳炎调任红6师师长，担负红二、六军团长征后卫的重任。他既要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的追兵，保证全军安全前进，又要组织收容沿途掉队的同志。草鞋磨烂了，他就用牙咬住草绳，配合一只手，学着打草鞋。为此，他的门牙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爬雪山过草地时，由于缺衣少食，有的同志挺不住了。贺炳炎便彭动大家说：“我只有一只手了，还要吃野菜，坚持下去，活着去向党中央报到。同志，你有两只手，更要有信心活下去呀！”

独臂将军余秋里也是贺龙的一条臂膀，他的故事与贺炳炎的相比毫不逊色。

1936年春，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毕节向西南行动的时候，贺龙命令二十二岁的第18团政委余秋里率领该团作为军团前卫沿路向前去阻截敌人。敌人火力很强，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他下了这样的命令。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在余秋里的左臂上，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抖，当时麻木了，无知觉。战斗正激烈进行，胜利在望，余秋里没有顾及伤

口，继续指挥战斗。机枪连的同志见余秋里负了重伤，硬是用梯子把余秋里抬了下来。做了一些简单的包扎之后，余秋里动动手指，只有一指能动，其余四指全然没有感觉。

贺龙非常关心余秋里，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给他弄了一件皮衣，在一个天主教堂内还搞了一条鸭绒被。同志们还弄了份干粮，有青稞、糖、辣椒、酥油。可是这些东西余秋里吃起来很困难，不能大口咀嚼，只能慢慢吸入。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是那条鸭绒被救了他的命。

过金沙江后，余秋里伤势越来越重。军医本可以给余秋里做手术，但手术器械过金沙江时都掉在江里了。

部队走到甘孜时，余秋里才拆掉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帮他清洗了伤口，又换上新绷带。当时，红二方面军的医生曾经想给余秋里做手术，但是苦干没有手术器械，特别是没有止血钳，大臂上密密麻麻的血管，没有手术钳做手术是十分危险的。过草地时，余秋里手里准备了一个水壶，装满水，疼痛难以忍受时，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浇在两根突出的断筋上，余秋里觉得这是最好的“止痛药”。他就凭这种由坚强意志支持的“止痛药”走完了草地。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南部的徽县、成县，从歼灭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队中缴获了一批止血钳，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就立即组织力量给余秋里做手术。那次手术，除止血钳是缴获的外，刀是借老百姓的剃头刀，锯子是老乡使的普通钢条锯。由于锯子不好，截骨很吃力，至今伤口还不平，有个突出部位。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余秋里从负伤到做手术，整整度过了192个日日夜夜。在炮火硝烟中，在边打边走中，从贵州赫章县到甘肃徽县，他拖着那只断臂，走过了5个省，行程2万多里。

贺龙对中央代表任弼时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拥戴，没有他的清明正直和高超的政治领导力，他也许至今仍未摆脱夏曦的阴影。

1934年7月，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指派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西征。是年9月，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进入贵州地区。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脸色腊黄，常常满头满身虚汗，发烧时，头和手脚都肿起来，部队在贵州期间，红军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常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更别说吃药看病。任弼时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照常和肖克军团长、王震政委一起研究战局，安排部队的工作。战士们见他病得厉害，给他扎了一副担架，让他躺上去，他总是说：“不用，不用”，硬是手拄着木棍，率领全军前进。西征途中部队每到一地，他总是派人把老乡找来，了解人民的生活疾苦，同时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有一次，他和一个老大爷谈话，亲切的话语竟感动得老大爷泪流满面。

在翻雪山的时候，任弼时自己身体很差，却把马让出来，用于往返抢救受伤和体弱生病的干部战士。红二、红六军过草地的时候，一连走了十几天，粮食没有了，野菜也挖不到了。一天，任弼时的警卫员正发愁找不到可食的东西给首长做饭。任弼时随手从草地上拔起一把草，说：“野草甜，野草香，红军粮食满山岗。这不就是吃的吗？”

警卫员说：“草不能吃。”

任弼时略一思索，一眼看见警卫员身上的牛皮手枪背带，便乐了，说：

“快把皮带解下来，这个加工一下可以吃呀！”任弼时让警卫员找来一把小刀，一人扯住皮带一头，一寸一块，第一次割了八块。任弼时点起火，把牛皮扔进火堆里烧了起来。当牛皮烧得见焦时，他就很有经验地把皮面上的黑焦糊刮掉，再把牛皮放在水里煮。这东西是煮不烂的。煮了一个多小时，任弼时幽默地说：“可以了，咱们吃牛肉吧。”便带头挟起一块吃起来，一面“咯吱咯吱”嚼着，一面风趣地说：“这东西很有味道。”

这时，贺龙、关向应正好路过，也各自挟起一块尝了尝，连声说：“这比野菜强。你们真有办法。”于是，军团首长号召部队吃牛皮带，以解决部队的粮荒。

任弼时当时有两条牛皮带，最后吃得只剩半条，他在这条未吃完的皮带上用钢笔写下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十六章三军大会师

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人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贺。

1936年中，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东北军被俘军官和其它渠道，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取得秘密联系，经周恩来、李克农多次与张学良面洽，双方达成了携手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根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进逼绥远和蒋介石处理两广事件尚未脱手的开势，双方制定了一个寻求苏联援助、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抗日的通盘合作计划。其要点为：

第一，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的目的。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台西北，东北军与红军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而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行之。

第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是造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主要一环。打通苏联分两步走。第一步，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向兰州这一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威胁青海，吸引河西走廊马步芳部东援，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甘、凉、肃三州，接通新疆。这一步骤，约一个半月内实现之。第二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一步骤实现后，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留守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西渡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

第三，巩固内部，形成陕、甘、宁、青四省的抗日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任务包括：新老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使之成为西北局面的坚强领导中枢；东北军的加强；陕、甘、宁、青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反动分子的肃清，民主纲领的初步实现等。

第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组成抗日先锋队，出师绥远，抵御日伪军的进攻，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第五，与南京政府谈判，逼蒋抗日，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敌。为此，红军目前暂不出河南，实行“你不来攻，我不去打”的策略，如蒋介石派兵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争取议和。

张国焘再生变故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先后向甘南挺进……8月9日，攻取天险腊子口……8月10日，抢占哈达铺大草滩……

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和张学良秘密签定的合作计划电告西北局，西北局根据中央上述战略行动计划，放弃了原定乘虚向东南

发展的作战企图，作出了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为攻克岷州，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连日攻城，部队伤亡不小，但未获进展。四军一部克渭源，三十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接着红军在一个月内先后占领渭源、漳县、洮州、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红二方面军抵哈达铺后则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一带发展。

这时，共产国际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故决定派聂荣臻、左权率第1师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这样，三个方面军便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9月初，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急忙将南调兵力调回陕甘，以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已达西北战场。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决定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以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以红二方面军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宗南部，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的行动，以便三个方面军提前汇合。

9月18日，中共西北局会议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讨论贯彻中央静会战役计划问题。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进入甘北，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坚决主张立即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定。

会议开了三天，争吵了三天。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

他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

朱德气愤他说：“他不干，我来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他意想会议能出现转机。

朱德、陈昌浩等人又立即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开会。结果大家还是赞成朱德、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的主张被否决。

张国焘无奈，只好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都赞成北上，那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张国焘连夜赶到徐向前在漳县的指挥部。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大家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张国焘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大家见总政委如此伤心难过，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即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抢渡黄河，占

领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骑兵；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之敌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黄河，共取宁夏。

部署即定，张国焘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发去密令：“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切断朱德同外界的联系。

9月21日晚，待这一切布置就绪，张国焘就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速来漳县会商。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

朱德：中央再三来电详明，二、四方面军北上，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陕北既可巩固，整个西北亦可成为抗日作战的枢纽。

张国焘：我们西渡黄河，如握有河西走廊和青、新广阔地区，从政治意上说，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从军事意义上说，可以分散蒋介石的兵力于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介石在陕甘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朱德：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国焘同志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了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我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我完全负责！

朱德：总政委应当协助总司令贯彻既定的方案部署！

张国焘：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抗议并召开会议废除原决定！

朱德：既然改变原方案，你要对这个改变负责任！

张国焘：一切由我负责好啦！

朱德：若强逼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仍坚持岷州会议原案！

张国焘：你的意见可以保留！

朱德：应把改变的决定报告中央！

张国焘：马上就发报！

与岷州会议的争论情景几乎很相似，但结果极相反：漳县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陈昌浩见多数人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只好妥协了，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但他仍坚持一点的是：让张国焘去陕北，处理党内分歧问题，以便为四方面军今后的发展作好准备。

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进路线。各部队亦奉命迅速筹足八天干粮，待命行动。

三大主力聚会宁

9月26日，党中央复电，不同意这一行动方案。复电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致于受重击，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

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

这一天，张国焘因中央连发四封电报，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十二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最后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

9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电文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

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说：“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是下达了死命令，张国焘仍不打算执行，继续做向西行动的计划。

好在天公不为他作美。带领先头部队的徐向前总指挥从前边回到洮州总部，说，据老乡们介绍，黄河对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是坚持，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

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大雪封山，可不可能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傅钟等人，因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

9月29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30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10月2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5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点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盼望已久的会师日子终于来到了。

朱德率领总部在10月9日到达会宁。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同红1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2师政委肖华通了电话，朱德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西路军溃败河西

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涛中颠簸、飘摇、转舵，正沿着新的航向前进，由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掀起的巨浪，此伏彼起。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下述条件：整个红军在大西北的集中和发展壮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联系状态转为公开联合状态；扫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的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以有力打击，粉碎其“灭共”计划。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又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

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不断取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藉以抵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这时缺乏武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一支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一直不安。这时他处理两广事件已经脱手，便赶紧调兵向西北急进，下令组织“通渭会战”，并准备亲赴西安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残部”则予以收编。另一方面，强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逐步肢解，免留后患。

10月中旬，张学良把蒋介石的“剿共”部署秘密通报陕北，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根据敌我态势及三大主力会合后面临的新情况，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

10月10日当晚，张国焘等联名致电中央，赞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于10月10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

10月25日凌晨，三十军在靖远县城以西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成功。徐向前、陈昌浩随三十军过河指挥。

相继，红五军、红九军奉命向河边开进、渡过黄河。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开始从打拉池以南地区向北后撤，前往三角城准备过河。

马家军一个精税师占领渡口，狙击河东两军，飞机狂轰滥炸。10月29日，敌我双方激烈争夺渡口，红四军、三十一军被迫撤离渡口。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人割断。渡过黄河西岸的四方面军总部、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万余人，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开始了孤军奋战的悲壮历程。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整个局势处在激烈动荡之中。

为抵抗国民党讨伐军，张、杨请求西路军东返，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拟令部队东返。

12月27日，中央电示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健，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1937年1月，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受到7万马家军步骑的进攻。

1月12日，五军团的3000余名将士弹尽粮绝，全军覆灭，军团长董振堂壮烈牺牲。

1月24日，西路军主力突围，集中于倪家营子，兵力不足万人。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回归车返，至狄威堡受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右倾逃跑”，又决走连夜回归，固守倪家营子。血战九昼夜后西路军于3月11日夜再次突围。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25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指挥员在突围的激战中阵亡……军长孙玉清被敌人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在突围时身负重伤，遭敌挖眼、摘心、大卸八块……

突围出来的部队只剩下不足3000人。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北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他们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山里转移。

中央电示西路军：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

陈昌浩终于低下了头，承认西路军遭到了失败。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康龙寺地区的石窝山召开会议，作了三条决定：

一、我们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的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

二、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三、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李特、曾传六、程世才、黄超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启程东返。昼伏夜行。

1937年6月，徐向前到达延安。

陈昌浩在一位湖北老乡处躲了一阵，以后转道回了武汉，抗战爆发后才回延安。

1937年4月下旬，李先念率400余人到达新疆星星峡，后被接到乌鲁木齐，抗战返后回陕甘宁。

山城堡全军用命

10月23日，彭德怀同徐海东在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会晤，以商议下

一步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十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彭德怀于10月29日请示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消灭胡宗南1至2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由于张国焘不配合，两军临战关头，令四军，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孤立，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大片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省的时机。

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毛泽东于11月15日授权彭德怀，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

为诱敌东进，寻机歼敌，彭德怀率红军向东转移待机。

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三路追击红军。

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在彭德怀的要求下，周恩来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彭德怀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1月19日赶赴陕甘两省交界甘肃境内的山城堡前线。这里川源相交，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山城堡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彭德怀预计胡宗南军为得到饮水，非到此地不可。随即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当日，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就地构筑工事，隐蔽待机，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军民协同，布下阵势，准备打击深受蒋介石倚重、一贯骄横的胡宗南的第一军七十八师。

11月20日，胡军七十八师果然开来，占了山城堡，翌日放胆向东进攻，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团。进攻盐池之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军撤到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还进一步争取了东北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12月2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人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贺。长征结束了。

一年前，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战略方针的根本改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这样谈论当时尚未结束的长征：

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8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10月开始的我们转移。今年3月，川陕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整个局面中的

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只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